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贰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前　言

如今在国内国外，写毛泽东的书，已是汗牛充栋、多得不可胜数了。但专门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书，迄今为止，国内的出版物中还只有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1]，和根据这些片断回忆大胆想象、浓墨重彩地铺陈出来的几本纪实文学作品[2]，称得上专门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3]

---

[1] 毛泽东早年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大概是少数几本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回忆录中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的整理者李海文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利用了保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的重要档案资料，对师哲的回忆加以核实与补充。当然，凡资料欠缺之处，本书仍有不少错误之处。同时，作者在毛身边工作过的日子有限，不少问题还未涉及。毛泽东 50 年代另一位俄文翻译李越然的《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更像纪实文学。这是因为他的整理者是纪实文学作者权延赤。他在整理过程中完全没有利用档案文献对回忆者的回忆加以核实与补充的条件，相反，他更多地发挥了他的文学想象的天赋，为本书增加了许多具体的细节。另外涉及这个问题的回忆录还有前新华社社长并兼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的回忆：《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和《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2] 如闽力等的《毛泽东斯大林莫斯科会晤前后》（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三豆村与曹志为的《毛泽东两次苏联之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权延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 周文琪著《谁主沉浮——毛泽东与共产国际》是唯一可以称得上是与本问题有关的一本研究著作，不过严格地说，它其实还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缩写，并非真的是讨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内容也过于简略。

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称得上一代“豪杰”了。他至少影响，甚至是左右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命运。不要说他的那些历史功过，就连他的喜怒哀乐、生活趣闻，都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生花的重要题材，被一遍遍地写进书里，更何况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一生的他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写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少？除了长期以来政治上的禁忌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文献史料欠缺。因为资料欠缺，以反映历史真实为已任的历史学家敢于大胆涉足这一课题者自然少。也因此，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话题也就成了那些稍有文采又喜欢演义的文学爱好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只可惜，那些绘声绘色地描写毛泽东如何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斗智斗勇的纪实文学作品，造成了一个让所有历史学家都深感头痛的问题，即这些一遍遍重复着那几本原来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并加上自己大量主观想象的纪实文学作品，使得本来就有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本身变得更加面目不清，给历史学家澄清历史、说明真相增加了更多的困扰。

近年来，历史档案的解密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自 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的有关机构先后公布和发表了相当一批十分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就有大量涉及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电报、指示和谈话录等。进入 1990 年代，俄国相关档案的大批公开，更使研究中苏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当中渐渐变成一门“显”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竟开始成为许多国外学者关心的课题之一。

从国外近年来接连出版的几本谈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专著来看，国外学者积极利用新披露的资料，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1]

---

[1] 在这类著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ea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显然已经落在了后面。充分掌握这些新的资料，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说明，无疑也应当是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当然，研究毛泽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前人研究较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许多情况还没有搞得太清楚，但是，作为一代极具争议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一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大家实际上早已盖棺论定。包括对他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不论正确与错误，肯定或否定，无论哪一方面，似乎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故题目再新，真要想写出新意，同时又让读者能够相信你讲的确有根据、确有道理，很难。

目前涉及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新资料虽多，却还是存在着不少盲点，故即使在现有条件下，要想清楚连贯地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讲清楚毛泽东一生中与莫斯科发生关系的全部情况，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能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全都具备，等到所有档案资料全部公开以后再来写这段历史呢？我以为不能。

考虑到种种困难，本书的叙述虽然严格按照历史的顺序，但却主要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历史上分歧最多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件，各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最多，研究和叙述起来比较容易做到言之有据。

探讨那些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历史恩怨的重要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说法。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四十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验和需要来进行中国革命的话，共产党人大概绝不会有 1949 年的胜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经常抱怨莫斯科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就只能依据他自己的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忆和解释呢？

毛泽东对他与莫斯科关系历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我们当作金科玉律，并据此来说明当年发生过的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毕竟，对于毛泽东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自己的说法理应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清楚，对于当事人的回忆，必须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它们来描述历史，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也不能例外。

可以肯定，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官方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必须要依据史实，而不会简单地依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来书写有关他的历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1936 年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 1920 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正是这三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 许多年来，谈论毛泽东早年经历的书籍都无一例外地照此说明。可是，1980 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当时其实并未出版。很显然，毛泽东的记忆并不十分准确。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毛泽东传》时，就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来说明当时的历史。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即使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也必定是片面的。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从多方面人手，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以便能够对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及其结果，做出尽可能少带个人主观色彩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那些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本书在写法上尽量做到通俗易通。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削弱本书的学术性和严谨性，包括议论会较多、注释引文会较少等。但不可否认，本书仍是一本带有学术研究性的著作，它仍未脱开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

[1]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也因此，它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的最大愿望，只是通过对大量新披露的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人的认识能够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

本书的部分内容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陆续在《百年潮》杂志上以青石的笔名公开发表并连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并被一些报刊摘登或转载。但不少读者都表示过某种程度的遗憾，因为限于篇幅，在《百年潮》杂志刊载的内容，没有能够将文中引述的重要论据的资料出处一一标注出来。他们担心这会影响文章的说服力。比如，不止一个读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你提出的这些新的说法，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是否只是片面地使用了俄国的档案而没有利用到我们自己的资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并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那些格外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愿望。

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发现，与已经连载过的内容相比，本书在某些章节中做了一些增删和修改。这一方面是得益于那些热心读者的意见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的指点。金教授为了给本书写序，在百忙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审读拙稿，订正了原稿中一些明显的失误，并且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本书定稿过程中，我已尽可能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本书成稿过程中，承蒙《百年潮》杂志社长郑惠先生、主编杨天石教授、副主编郑海天先生，或审读原稿，或提出宝贵意见；另外，《百年潮》杂志徐庆全亦主动承担了为本书（江西人民出版社版）配图的工作，在此特一并致谢。

一些读者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书名，担心它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本书讨论的只是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个人感情问题。其实，只要读过本书之后，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能了解，尽管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感情好恶对党和国家关系确实存在着重要影响，但我在本书中通常是在党和国家关系这个更大的范围内谈论它们之间的“恩

恩怨怨”的，我丝毫没有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领导人个人感情纠葛的意思。考虑到这个标题已经为相当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在此只好请那些对此有过建议的读者谅解了。

杨奎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学

目 录

前　言 / i

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 001

一、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 003
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 009
三、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 013
四、共产国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对其另眼相看 ………… 016
五、临时中央夺去毛泽东的军政权力，却不得不要他加入政治局 …………… 021
六、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大力宣传毛泽东 …………… 025

第二章　毛泽东扳倒“左”倾中央 / 029

一、博古，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学生党员，一跃成了“总书记” ……………… 032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 037
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 042
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 046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049

第三章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053

一、季米特洛夫在统战政策和援助红军的问题上，功不可没……056
二、中共放弃苏维埃政策，共产国际担心：这是不是太急了……059
三、抗战爆发后季米特洛夫安排王明回国是夺毛泽东的权吗？……063
四、王明推举毛泽东做“主席”，自己做“书记”……066
五、毛泽东表示：“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和为贵”…071
六、王明否认中央权威，毛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075
七、季米特洛夫表态：中共中央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079

第四章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 085

一、蒋介石扬言，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来乃其生死问题……087
二、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断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091
三、毛泽东称：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不可能有根本好转……094
四、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097
五、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莫斯科支持他的先发制人……102
六、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估计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107
七、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与莫斯科政策分歧，双方关系起变化……111

第五章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 117

一、毛泽东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119
二、毛泽东“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确定……123
三、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决定澄清党史问题……128
四、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131
五、任弼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病不起……136
六、先放后收，整风运动变成组织清理，思想问题成敌我嫌疑……140

七、共产国际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147
八、毛泽东说，对错已经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151
九、中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156
十、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仍然受到普遍爱戴 ……………161

第六章　毛泽东想做亚洲的铁托？ / 169

一、毛泽东与斯诺一见如故，却很少对俄国同志表现热情 ……………………171
二、基于阶级理念，中共中央再度放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思想 ………………175
三、苏德战争爆发，美英大力援苏，中共重提与美英合作主张 ………………177
四、毛泽东相信，应学铁托那样，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 ………………180
五、毛泽东断定赫尔利在捣鬼，他希望去华盛顿与罗斯福交涉 ………………184

第七章　斯大林“不许革命”！？ / 189

一、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192
二、斯大林 1936 年秋冬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的援助 ………197
三、抗战中苏联是“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吗？ …………201
四、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205
五、毛泽东许诺：“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208
六、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大发雷霆后，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 ……………212

第八章　和战关头的考验 / 219

一、毛泽东说：计算精确，不难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223
二、苏军态度不明，中央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三十个团 ……………225
三、苏方鼓动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227
四、苏军宣布提供全部日军装备，要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231
五、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236
六、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走“法国道路”过于危险 ……………240

七、苏军要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力争以长春为自己的首都……………………243
八、毛泽东极机密地要求苏军援助，苏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246

第九章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251

一、毛泽东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重要……254
二、毛泽东急于向斯大林“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259
三、斯大林劝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疑心苏有意搞“南北朝”………264
四、莫斯科主张速占宁沪成立政府，毛强调 4 月过江，拖半年再说…………268
五、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273
六、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极力称赞中国革命经验………………276

第十章　莫斯科祝寿风波／ 279

一、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281
二、毛泽东真的曾大发脾气，拒不出门，在别墅里睡大觉吗？………………287
三、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的……………295
四、不论毛、周当时如何努力，还是没争取到中苏之间完全平等……………304
五、四个合营公司的协定让毛泽东高兴了一阵子，后悔了好几年……………311

第十一章　夺取台湾计划搁浅之谜／ 317

一、毛泽东保证，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就援助朝鲜的解放事业………………321
二、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将领一直建议请苏联帮助夺取台湾”………………324
三、斯大林赞同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他坚持必须得到中国同意………………328
四、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进行干涉，我们一定会打过去”………………333
五、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毛泽东抱怨这是个“极大的错误”…………………336

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幕后 / 341

一、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斯大林许诺提供空中掩护…………343
二、毛泽东表示，中国能够成为朝鲜强大后盾，不怕与美军作战…………347
三、斯大林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同志求援，但叮嘱“不要提莫斯科”…………350
四、两封电报，一个要出兵，一个不要出兵，哪个电报是真的？…………354
五、毛泽东说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斯大林从此改变对中共的看法…………360

第十三章 迟到的合作 / 369

一、斯大林通知：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讨论朝鲜问题…………371
二、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毛泽东下令志愿军打过三八线…………374
三、联合国通过停火提议，毛泽东决心再打一仗，根本解决问题…………378
四、美军全线反击，志愿军被迫后撤，毛泽东估计战争已长期化…………382
五、毛泽东赞同停战，斯大林断言，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387
六、停战谈判受阻，斯大林老谋深算，反对示弱，坚持强硬路线…………391
七、斯大林突然去世，毛泽东痛失有力支持，停战结果不尽如人意…………393

第十四章 马、恩、列、斯—毛？ / 399

一、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401
二、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408
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415
四、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422

第十五章“东风压倒西风”？ / 429

一、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是臭骂一顿…………431
二、赫鲁晓夫左右开弓巩固权力，毛泽东力排众议，表示支持…………437
三、毛泽东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要为首就很难”…………442

四、毛泽东不拿讲稿引起误解，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446

第十六章“联合舰队”事件 / 453

一、毛泽东大发脾气：“要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455
二、毛泽东声称：“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愿承担第一个打击” ……………461
三、赫鲁晓夫摆出智者的架势，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468
四、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必将破产 ………………475

第十七章 背水之战 / 485

一、赫鲁晓夫口无遮拦，毛泽东忍无可忍，称之为半修正主义 ……………487
二、赫鲁晓夫扬言：“如果你们要斯大林，就把尸体搬到北京去” …………492
三、毛泽东部署莫斯科会议方针，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 …………………498

第十八章“九评”赫鲁晓夫 / 507

一、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509
二、“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的威信，他转而在中国找修正主义 ……………514
三、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521

第十九章 战争即将爆发？ / 527

一、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529
二、毛泽东主张破除迷信，强调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 …………534
三、毛泽东并不想扩大冲突，主张：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537
四、毛泽东估计到苏联可能报复，但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危险 ……………541
五、毛泽东担心爆发核战争，认为领导人集中在北京太危险 ………………544
六、毛泽东不相信苏方有意缓和，决定全面备战，实行大疏散 ……………546

七、毛泽东主动缓和对美关系，中国从此放弃世界革命主张……………………551

结语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 559

附录　金冲及序 / 589

参考文献暨征引书目 / 592

修订版跋 / 602

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毛泽东三十岁首次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1927 年毛泽东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高度赞扬；朱毛红军旌旗猎猎，莫斯科称赞毛泽东是经验丰富的领袖人物；共产国际为毛泽东印制精美著作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齐集克里姆林宫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和毛泽东欢呼致敬……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1]。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2]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 1920—1935 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一、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

[1]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竖排版，第 652 页。

[2] 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5 页。

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

[1]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1]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1] 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5页。

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 1921 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2] 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 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3] 因此，当 1922 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

[1]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友信》（1920 年 12 月 1 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8 页。

[2] 《毛泽东给蔡和森信》（1921 年 1 月 21 日），《新民学会资料》，第 163 页。

[3] 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月刊（1921 年）。

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1]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2] 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3]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

---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3]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0页。

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1]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2]。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

[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国共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集），第231、236页。
[2]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1]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2]。

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

[1] 《关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调查记录》（1923 年 6 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集），第 213—214、231 页。

[2] 达林：《中国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6 页。

直到 1924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 1924 年 1 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 3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 3 月 30 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1]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

[1]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RPSDMH), 514/1/81/18-20.

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1]。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转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458页。

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1]

毛泽东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看得出他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工作繁重，但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比较早就患上严重气喘病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的蔡和森，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举家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前往湖南老家农村，说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党内通讯，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对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还在1924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扭转中共“三大”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从此，中共中央的整个方针开始左转，陈独秀甚至开始提出：莫斯科“不应当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2]。此后不久，即发生国民党内少数人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而孙中山竟然赞同于8月召开讨论这一

---

[1] 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7页。

提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陈独秀自然反应强烈，转而推动全党“由防御转入进攻”，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1] 正因为如此，早就不满于根据马林建议实行的这种党内合作形式，特别是不满意中共“三大”过分看重国民党的方针的众多党内同志，迅速反弹。12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召开会议，又进一步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马林那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遭到彻底否定，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 1924 年间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投注了极大的热情，颇得国民党领导人的好感。而维经斯基来后，却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身为上海执行部中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自然难辞其咎。联系到当时党内有人把过于热心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有人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的观点，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可能受到何种压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显然易见的：在成为中共政策左转标志的“四大”上，当年激烈反对马林主张的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了，而当年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被免去了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也许我们不必再去详细考证毛泽东当年出走的具体经过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四大”落选是因为维经斯基和与会的其他中共代表要照顾他“休养”。

三、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毛泽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已是 1925 年 9 月了。当时，曾在上海执行部与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仍对毛抱以相当好感。因此，毛泽东来到广州不几天，已经身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汪精卫就出面

[1]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 年 9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29 页。

推荐毛来代理由他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而汪精卫不了解的是，此番的毛泽东与一年前的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在乡下住着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并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永远不会被根本打倒。因此，"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 1926 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变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 1927 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 年 1 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做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

---

[1]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了正在推动中国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了。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当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几乎是赞不绝口，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2]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毕竟这两个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但毛泽东重新入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件事，至少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显然就十分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了。在他8月上旬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所谓“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继中共“三大”之后再度被提名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难看出，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转见《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8—19页。
[2] 见《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1927年5月)。

四、共产国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对其另眼相看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去当了“山大王”。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仍旧是在罗明那兹的指导之下，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仅被点名批评，而且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可以肯定，如果这一次换了别的人，多半是不会像毛泽东这样去做的。如果这样，毛泽东未必会被撤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显然也不会有后来那支创造了中共军事史之最的井冈山红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冒险做出如此选择，他的农民出身、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经历，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地显露出高度重视力量对比和善于依照力量对比灵活地决定政策策略的决策特点来了。他关于必要时应当“上山”的观点，还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最后关头，即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当时，蔡和森就提出了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极其看重军事的毛泽东当即附和，强调：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这时期考虑的中心问题。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想法，特别是提出了非掌握“枪杆子”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2]“上山”就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用来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以便日后夺取政权的一

---

[1] 《中共中央常委会记录》（1927年7月4日）。
[2]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种不得已的办法。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上了山，创立了根据地，中国从此也才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红军”。

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类似于头颅、心脏和四肢的关系，刺中手臂，并不能置人于死地，相反，刺中心脏或砍下头颅，四肢再健壮也无济于事。因此，共产国际最初也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1]

在欧洲国家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红军有什么必要以及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城市暴动和街垒战的一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却没有一次得到了像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德国暴动专家，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都开着插着胜利标志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是只坚持了不到两天就惨遭失败。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这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

[1] 见《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们不能不重新重视起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来了。在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这也许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928 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 1929 年初开始至 1936 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六十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开始的报道中，俄国人的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毛泽东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充满革命幻想，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既不了解，也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生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开始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 1929 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据这一年 7 月的《真理报》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

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1]

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更多地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是，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1930年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人们开始强调毛泽东作为党的前委书记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2] 紧接着，在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不是俄国或欧洲的一哄而起的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而非靠单纯地做工人和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斯大林明确表示肯定一直被许多共产党人怀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他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

[1] 《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1929年7月2日），A. 伊文：《彭德怀》（1929年7月24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2] 《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4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页。

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1] 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则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中央苏区中央局。[2] 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 13 个军，6 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 10 个省份的 773 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 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3] 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当 1930 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而 1930 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公开宣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也是向忠发。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不大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莫斯科方针和做法的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应当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此

---

[1]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 年 8 月 22 日）。

[2] 转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前言，第 23 页。

[3]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30 年 5 月 31 日），前引《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 2 辑，第 232—235 页。

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即得到莫斯科的认可。[1] 而按照莫斯科拟定的模仿苏联的政权体制，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当权者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五、临时中央夺去毛泽东的军政权力，却不得不要他加入政治局

1932 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一方面也是根据莫斯科的要求，陆续搬到江西中央苏区。区区一个瑞金县城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党的高级负责人，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头衔的毛泽东的日子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好过了。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听不进他的那些经验之谈，更看不惯他固执己见、轻易不肯妥协的个性。于是，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甚至，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年轻的留苏学生、新任临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等还是不甘心，试图借机将毛泽东这块“土生土长”的绊脚石搬开，把他送到苏联去“休养”。想不到的是，俄国人对毛泽东却情有独钟。

其实，在此之前，俄国人对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1932 年，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仍兼任着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由于这时中共

---

[1] 转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第 23 页。

苏区中央局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上海，习惯于根据莫斯科的原则指示，按照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问题，因此很快就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一年的秋天，双方围绕着是否应当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采取“进攻路线”的问题在宁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毛泽东坚持己见，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并通过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想不到，这一消息报给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报给莫斯科后，结果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

1932 年 11 月，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将此一争论专门上报苏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之后，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莫斯科这时的态度很明确，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未实际指挥过红军作战，更多只是凭借豪情壮志来打仗的中央政治领导人，不如更加倚重已经成功地发展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因此，他们特别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不能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1]

等莫斯科发来的裁决电报千里迢迢送达苏区中央局时，足足晚了几个月的时间，事情早就木已成舟了。而这个时候，恰好又发生了毛泽东称病离开前线以及刚刚进入苏区的临时中央提议把毛泽东送来俄国“休养”的事情，莫斯科方面的态度自然十分明确。它先后致电临时中央，告诫他们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

[1] 《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11 月），并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与毛泽东关系问题的电报》（1933 年 3 月 19 日）。

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1]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具有很高的威信并已扎下很深的根基，轻率地处理毛泽东将不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其二，毛泽东与临时中央的争论充其量只是军事策略的争论，而已经有多年成功指挥经验的毛泽东，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有过纸上谈兵经历的领导人强。把毛泽东排除在外，对苏区军事斗争未必有利。因此，当临时中央明显地表现出排斥毛泽东态度的同时，莫斯科却再度出面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

反对打击排挤毛泽东的最明显的暗示，突出地反映在1933年底关于中共中央第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人事问题的酝酿上。当时，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在酝酿之中，临时中央领导人显然想把毛泽东最后一个有着实权地位的职务，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亦即中央政府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但是，考虑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问题和莫斯科可能的态度，毛泽东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不仅不能拿掉，临时中央领导人还不得不提议把毛泽东提升成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结果，在1934年1月出现了一连串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博古等不通知毛泽东参加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却又不能不把毛"选"为政治局仅有的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五中全会上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报告者就变成了张闻天；几天前毛泽东在五中全会上才刚刚得到提升，几天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只剩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2]就在瑞金这边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几乎同时，不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反对送毛泽东来苏联治病的电报》（1934年4月4日）。

[2]　关于博古中央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没有经过莫斯科批准的情况，亦可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前言，第23—24页。

了解这一变动情况的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临时中央领导人为何一定要免去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改选政府名单时是擅作了主张。因为直到这一年很晚的时候，莫斯科方面都不了解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从政府主席的位置上一笔勾销的情况。在始终得不到苏维埃政府改选消息的情况下，王明在1934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专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询问苏维埃的选举结果。信称：“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有得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能够通知此地，作意见的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后来，当得知中共中央擅自以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消息之后，王明明确讲：莫斯科“很不满意”。

在这段历史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手缔造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那些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施加于他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会怀有怎样的怨气。他由不满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钦差大臣”，进而怨及莫斯科，当不难想象。

那么，博古等人的做法是否根源于莫斯科的意志呢？时至今日，许多人恐怕并不了解我们上面谈到的情况。因此，很多谈到毛泽东这段经历的书都把打击压制毛泽东的情况归结为莫斯科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些，是不难看出这里面的问题的。因为，事情非常清楚，如果莫斯科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意志，为什么那些习惯于“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当权的先生，竟没有对毛泽东大批特批，剥夺其一切权力，反而还要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呢？

事实上，在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不论临时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个别代表）对毛泽东的强烈个性有怎样的抱怨，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却有增无减。它曾不止一

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他们也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必须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甚至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的做法，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赞同。恰恰相反，莫斯科对毛泽东仍旧保持着特殊的兴趣与好感，并希望能够进一步利用其经验并发挥其作用。

六、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大力宣传毛泽东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好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满博古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发现，随着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排挤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南方苏区的军事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到了这一年的5—6月，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以致不能不提出撤出苏区并向西转移的问题了。面对这一严重的军事形势，莫斯科的领导人再度想到了毛泽东。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如今的结局很可能是一年多以前排挤毛泽东的后果。如果中共中央能够严格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即使只是保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也未必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困难等原因，关于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料，莫斯科几个月之后才只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典礼的记载，以及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两个小册子。很显然，即使出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结论也未必需要过于渲染，毕竟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这时对毛泽东是怎样一种态度。但是，在见到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之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其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王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就曾颇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

辞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地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1]

如果读者从上面的信中还不清楚莫斯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宣传中国苏维埃还是想要更多地宣传毛泽东的话，那么，看了一个月之后王明的另一封信的内容，恐怕就不会再有疑问了。王明在 9 月 16 日的这封信里进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说：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同志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他不无骄傲地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2]

明知中共中央在压制毛泽东，莫斯科却不仅坚持要让毛泽东进政治局，而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的领导人，坚持要用毛泽东的名义向全世界出版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单行本，并且别出心裁地为毛泽东印制精美的文集，莫斯科想要对中共中央说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博古等人已是大权在握，不仅从上海来的众多留苏学生把持了苏区的各种权力，而且他们还自觉不自觉地正在把自己摆在党政军最高的领导地位上。依据当时报纸以及从中共领导人后来的揭发

---

[1] 《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 年 9 月 16 日）。
[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摘要》（1934 年 11 月 14 日）。

中都不难看出，博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时，曾经特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将王明（陈绍禹）排在第二位，而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排在后面。莫斯科后来当然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但即便如此，莫斯科这时既不去宣传博古，也不去宣传王明，更不去宣传刚刚取代了毛泽东政府主席职务的张闻天，却刻意宣传毛泽东，其中的意图也许不难明了。

1934 年 10 月，红军终因抵挡不住国民党的大举“围剿”，被迫撤出了江西苏区。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中国问题的有关材料上看，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当中，莫斯科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考虑到莫斯科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可知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果然，在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当时在莫斯科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

---

[1]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乙）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活动情况的资料》（1934 年），《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2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1 页。

国家人才”。苏共中央正式批准共产国际在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以如此殊荣，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1]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2]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著作仍旧有意无意地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相提并论，说是正因为这种情况，博古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泽东才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注意到上述情况，这种说法显然容易让人生疑。尽管历史很难去假设，但是，从莫斯科几乎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而它这时正全力宣传毛泽东的情况看，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负总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

[1]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周和生同志致贺词》(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1935年7月29、3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1935年8月7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349、367、377、411页。

[2] 哈马丹：《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载《真理报》1935年12月13日；赫鲁晓夫：《勤劳的中国人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

第二章

毛泽东扳倒“左”倾中央

毛泽东回忆说：“洋房子先生”来了，我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过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毛泽东愤愤然：那时候真的“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Q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

毛泽东对当年挨整有强烈的印象，却体会不到莫斯科对他的器重，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他的大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人，或者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人。

为什么莫斯科器重他，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却反对他？这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长期神化领袖，党内出现过所谓的“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独有偶，当年人们也讲过“凡是”，只是当时神化的是莫斯科，主张凡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凡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要百分之百地遵行。那些曾经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凡是”派。

但是，“凡是”派充其量只是起着一种传声筒的作用罢了，他们永远只能自以为代表权威者说话，却未必能够真正反映权威者的意志。实际上，当年在克里姆林宫里决定中国革命政策的俄国人也还是效果决定论者。他固然喜欢人们把他的指示奉为教条，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发现自己的政策指示效果不佳时，改变以往那些看似神圣不可更改的决定，并起用一向只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毛泽东当年受压制受打击没有责任。事实上，权威与教条通常都是相互需要的。只要存在着莫斯科神化自己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类似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无上权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那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教条主义者，也就必然会存在维护和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斗争，因此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受到压制和打击并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挨整的时候正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严峻的战争年代，人在刀口下生活，很容易从强弱胜负的变化中判断出真理究竟在谁一边，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毫不留情地纠正错误。战争年代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总是在扮演悲剧的角色，其原因多半也在于此。

一、博古，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学生党员，一跃成了“总书记”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

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 1927 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 1929 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1]，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学革命理论的。从 1927 年初到当年 9 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他就因为俄文好，从这一

---

[1] 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情况，可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5 期。

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1929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1930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俄国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大约三年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天资聪颖，接受力强，领悟快，时间不多，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二十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人人都说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1929年回国后也不过就给了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与米夫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博古赶上的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

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且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博古赶上的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 年 3 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 4 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 6 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王、周撤走前与远东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国不久、顾顺章等人不大认得的留苏学生组成一个“临时中央”维持工作。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是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后来有过各部联席会议暂时维持，又曾设立过一个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工作，最后还是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1] 这个说法应属可信。何况王明对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

不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十五岁，刘少奇、康生大他九岁，张闻天大他七岁，黄平大他六岁，

---

[1] 《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9月11日）。

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

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1]。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2]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3]。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

[1]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电》（1932年11月10日）。
[2] 《中央关于军事路线的指示》（1933年1月）。
[3] 关于“交权”问题，博古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承认，因与远东局代表商量过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名单，故认为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任命，没有临时的观念，进苏区后“并未声明是临时政治局”。随后，博更进一步说明，自己确实“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

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1]。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

[1]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RPSDMH), 495/74/333.

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1]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

[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1]。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 1924 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 年 2 月至 3 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2]。

到了 1933 年 9 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

[1] 《周恩来报告宁都会议简情》（1932 年 11 月 12 日）。

[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 214 页。

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资历如何、经验如何,依照共产党人严格遵守纪律的特性,只要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上,且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政绩斐然,很难想象能够有人向他提出挑战。问题是,博古领导的中央抱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宁‘左’勿右”,死守着几个教条不放,以不变应万变,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着哪几个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几篇笔记,虽语言尖刻,连讽刺带挖苦,极具情绪化,但可称得上是批“左”檄文,内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这时的错误的。

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Q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1]

很难说上面的这些错误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创造，共产国际特别是力荐博古“把总”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直接刺激着毛泽东的，却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1]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1943年）。

据不完全统计，自博古中央进入苏区以后，中央苏区“左”的做法可谓变本加厉。当时不仅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与没收惩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变相克扣农民。光是 1933 年底到 1934 年 9 月这段时间，强征新兵即达 10 万，发行公债 300 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支援“国家”约 100 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 84 万担。[1] 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到 1933 年 11 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 25% 的男劳力（16—55 岁），仅当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 80% 上下。以当时苏区所有农民 200 万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 50 万左右，也就是说，到 1933 年 11 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 30 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 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情况自然弄得民心动摇，仅 1934 年 8、9 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的方针，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二十天内即在 1512 家查出所谓“翻案地富”890 家，并新查出地富 83 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其他的一部“驱逐出境”，一部“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全部充公。由于沾“富”就有生命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人干脆连田也不种，以免受累不说还要遭罪。[2] 越讲阶级、查阶级，就越能够得到下面送上来的说明阶级斗争严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紧张。准备大举突围时，他不仅对外界，而且对党内，包括对政治局大多数人也封锁消息。暗中更把党的干部也分为几类，有信得过的，有信不过的，还有有各种嫌

---

[1] 《红色中华》1934 年 7 月 5 日、8 月 8 日、5 月 3 日。

[2] 同上引注，并见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34 年 6 月）。

疑的，最后决定把信不过和不喜欢的，即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和自身条件都不适合在当地坚持斗争，如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强行留下，等于让他们白白牺牲掉；对怀疑可能成为隐患的，则干脆下令杀掉，像过去几年被俘留下已经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的一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一些被怀疑有问题者，就被秘密处决了。

很难了解毛泽东当时对博古等人的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认识。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领导查田运动。从他当时发表的关于查田运动问题的文章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博古等人当时一些做法也并不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事实上，我们从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对博古等人批判的三个方面内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将近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认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现在对待中间势力以及在党内斗争这两个方面。他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讲过的那样，苏区和红军在江西等中国心脏地区生存下来，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苏区和红军的不断扩展膨胀，它们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国民党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对待中间势力和党内斗争这方面表现得不那样极端，能够抓住一两次机会，中央苏区和红军也还是很难在江西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换了毛泽东，至少中共在军事上可能不会输得那样惨。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因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的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扬言“积小胜为大胜”，甚至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以“野战司令”自诩，在广昌和高虎堖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式，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碉堡政策，节节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来保住红色“首

都”不失，结果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眼见中央苏区再难坚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损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上报莫斯科，请求实行战略转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这一在强敌围攻下的战略性转移搞成了一个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苏区的各个机关，乃至于银行、工厂等，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挑在了担子上。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沉重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过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目标变幻不定的“长征”。如此蹩脚的军事指挥，直接关系到整个部队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事实上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应该负责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看出，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会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摩擦。[1] 但这种警

[1] 前引《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告毫无用处。

博古太年轻，资历太浅，留苏时间和学历都短，其总书记的工作又纯粹是因为一种偶然的机遇临时受命而来，但是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干部，原本就自惭形秽，再加上有党的纪律约束，再有不满，也往往安守本分，不会公开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苏学生的其他人，却不仅很难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与博古先后回国的留苏学生，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博古要想在他们中间取得威信，必须要做出显著政绩来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仅政绩方面乏善可陈，而且苏区越打越小，形势越搞越困难，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会陷于被动了。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但博古因为不信任张，因此利用与李德的关系和战争条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独断专行的条件，关键的事情多半都不让张闻天与闻其间。甚至，像1934年初让张闻天去做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与张通过气。这自然让张怀疑博古是不怀好意，既夺了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同时又把张推到最不喜欢的事务堆里去，从而名正言顺地把他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因此，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不欢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张闻天派去闽赣边"巡视"工作。张走后，博古又在会上批评张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这就进一步引起张闻天的不快与疑惑。等到张回瑞金后，"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儿了。对此，张闻天虽无可奈何，但自然"心里很不满意"[1]。

---

[1]　前引《遵义会议文献》，第77—78页。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1]

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在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领导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的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说毛泽东在离开瑞金之初就已经在设想把博古拉下来，恐怕不合逻辑。但是，毛泽东劝说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走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这时已在做"分化"工作，争取同盟者。颇为有趣的是，本来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西征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而毛泽东竟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并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显然，博古在这一点上还帮了毛泽东的忙。

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不过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1923年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应该说关系一般。担任军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来，对博古、李德肯定会有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

[1] 前引《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考虑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无意介入纷争，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为张、王二人表过功。他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1]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事实已经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要正确得多。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开始积极地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公开争论了。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他的意见没有被通过，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的看法具有远见，政治局中多数人也因此完全丧失了对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最后一点迷信。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已经能够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了。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

---

[1] 毛泽东：《关于第七届补选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0—231 页。

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1]。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起博、李的军事路线来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毛的观点，特别是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表态，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三人团”彻底瓦解，李德已开始成为孤家寡人。果然，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勉强附和了多数的看法。这弄得李德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2]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提议得到通过。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鉴于事实上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联系，再听任博古、李德等人领导指挥已没有可能，长此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因此，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毛泽东对此当然赞成。[3]

---

[1] 前引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2]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6—197 页。
[3] 转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3、246 页。

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来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来做中共领袖的说法，十分流行，其实却有些让人生疑。毕竟，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人，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来代替博的，而张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谓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毛主动推辞，并表示应该让张闻天“锻炼”一下的说法，怕是以讹传讹了。

下面这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确实还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根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其实只有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

仅靠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军事知识，无论如何不能驳倒博、李等人的辩护报告与发言。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因此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们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他。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支持毛、张、王，以往又长期主持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又有成绩，与军队领导人也配合较好，会议相信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当继续其中央军委书记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军委书记，自然应当执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工作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同样是常委，毛泽东只得到了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当然，名分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会议决定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随中央行动，周恩来凡有军事意图必报中央审核批准，中央又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恰当意见，结果，“帮助者”实际上很快成了众所周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何况长征中军事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内容，不久后张闻天干脆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因此，人们后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应该也不是妄说。

---

[1]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中共党史资料》第 6 辑，第 8 页。

第三章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中共中央表示要放弃苏维埃政策，共产国际大吃一惊；季米特洛夫派王明等人回国，本意是防右而非防“左”；王明推举毛泽东做“主席”，自己弄了个“书记”，想来个一山二虎；毛泽东表态：“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和为贵”；几年后，毛泽东承认：我们当时犯了错误……

说共产国际在1920—1935年间未必刻意压制过毛泽东，主要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至于客观效果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共产国际当时过“左”的路线和政策，注重中国实际的毛泽东确实受到过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当毛泽东向斯大林发出他的抱怨时，这段经历无疑在他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召开、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第三国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损害，就是这段时间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斯大林路线。为什么说王明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呢？他解释说，因为王明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东方部听斯大林的。[1]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作用，有过一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指什么？照毛的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2] 列宁在世的时候是1924年以前，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是1934—1943年这段时间。换句话说，从1925年直到1934年这十年时间，共产国际没起多少好作用。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显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历史结论。周恩来为此还专门做过一个解释：叫做两头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3] 但不论如何看待毛的这个说法，显而易见的是，他对季米特洛夫主持下，即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共产国际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本人仅在1950年代公开称赞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说他比较谨慎，是个好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此等等。与对同一时期斯大林的评价截然两样。甚至，即使是对第二次王明路线，

---

[1] 《毛泽东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2日）。

[2]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9日）。

[3]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15日），《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即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发生的右倾错误，毛泽东也把它归结为斯大林的问题。明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毛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回来”，说是“‘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1]。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并不是一概而论，还是有亲有疏的。谁对他和中国党好，谁为他和中国党办了好事，毛泽东心里是有杆秤的。

一、季米特洛夫在统战政策和援助红军的问题上，功不可没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打击共产党。季米特洛夫被诬参与纵火案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煽动力的讲演，竟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1935年“七大”召开，季米特洛夫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以后，他才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系。

对于季米特洛夫这一阶段的工作，目前的中共党史书上评价不一。有些著作怀疑，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这时如果不是想要共产党把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让”给国民党，也是要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很明显的是，毛泽东多半没有得出这种印象。实际上，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1] 《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十一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5日）。

改变以往过“左”的方针，实行相对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决定。但具体到中国问题上，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仍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七大”批准通过的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号召的是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它所提议的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却是排斥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从而在客观上将国民党最主要的部分排除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当然，这样一种策略较之以往那种打倒一切、唯我独“革”的做法还是一种很大的进步，而且适合于当时国内的战争形势。因此，当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很快于12月下旬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等“卖国贼”的“抗日反蒋”方针。[1]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清楚地说明了“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实质，这就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但是，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季米特洛夫很快就对这一点抱有疑问了。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主持中国问题之后，他就几次从侧面提出过这样的疑问。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

7月，莫斯科与陕北的中共中央自1934年江西中央苏区沦陷后，首次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中央半年前在瓦窑堡通过的政治局会议决议。针对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

---

[1]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5页。

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民族危机深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生存的必然要求的情况下，变反蒋为联蒋，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实际上，中共中央对此也早有了解和改变。但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在前，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又始终不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与行动，策略变换难免颇多掣肘。

这时国共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由于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会真的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除非不想保存红军，否则，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是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苏联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1] 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显然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他随后一面尽心竭力地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2]。

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

[1]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

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来往不断。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只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仍高度重视，一面积极组织接应，一面经常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来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才。与此同时，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他立即开始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管道陆续输送给中共中央，以解红军燃眉之急。[1]

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季米特洛夫或者他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这时有过不利于中国革命的企图。即使是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形式的问题，即“抗日反蒋”还是“联蒋抗日”的问题，我们也看不出季米特洛夫有要中共中央放弃自身利益的想法。

事实上，无论是在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问题上，还是在援助红军的问题上，这时直接负责党的统战和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帮助，大都抱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从毛泽东当年的众多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 1937 年迎接王明等人回国时发表的那段有名的题为“饮水思源”的谈话，实质上也包含着对季米特洛夫指导下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工作的积极肯定。只不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还不熟悉刚刚上台不久的这位新的总书记罢了。他们通常只是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帮助了中国党的”。

二、中共放弃苏维埃政策，共产国际担心：这是不是太急了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时，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人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

[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 48 页。

际派王明回来，是想要夺毛泽东的权。理由是，自从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国际就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坚持要独立自主，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放弃政权与军队，一切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

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1] 对此，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颇伤脑筋，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示直到 12 月 16 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才发出来。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 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

在事变发生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这种估计，只有亲身处在当时那种严重困境之中的中共领导人才能体会得出来。不过，毛泽东这一天对形势的估计似乎太过乐观了一些。他提出了争取"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斗争目标，和从政治上"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的估计。其策略的核心，是寄希望于迫使南京接受一个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好是以西北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政府。[3]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除了多半不赞成排除蒋介石以外，在解决办法上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想法却颇有共通之处。他在电报里明确提出："应在下列条件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

---

[1] 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第 344 页。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 12 月 16 日）。

[3] 转见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 年第 3 期。

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正因为如此，当19日政治局会议放弃了“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公开主张，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之后，毛泽东明确认为：“国际的指示，与我们意见大致相同。”[1]

新的一轮分歧仍旧是围绕西安事变展开的。由于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莫斯科从电报中发现中共中央坚持造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布蒋介石承诺条件之后，颇感不满。共产国际书记处为此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的投降，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2]

共产国际的批评显然有言过其实的成分。受命回国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林育英明确讲：抗日反蒋的指示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并且是斯大林同志看过了的。况且我们对这个口号的局限性早在1936年2月以后就渐渐注意到，并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与国际指示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国际主张用群众逼，而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主张用张学良、杨虎城这些地方实力派来逼，“所以，与国际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同”[3]。

反观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反而要平和得多。他明确讲，如果单纯从争取和平的角度，我们过去是有若干错误的。这主要是瓦窑堡会议时就应该看出并放弃反蒋，实际上我们直到1936年5月间才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则是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以后了。实行逼蒋抗日后，利用

---

[1] 前引《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及《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其中也明确提出了“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320页。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月19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月24日）。

军阀矛盾的原则没有错，我们总的是抛弃反蒋策略，要张学良去与蒋说和，可是蒋不干，硬要派兵来消灭我们，抵抗是不得已的。但西安事变后，提出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是不对的。放蒋之后，认为他近乎投降，公开宣布其承诺的条件更是幼稚的。[1]

肯定共产国际的批评有其积极的成分，对于中共中央迅速摆正自己在与国民党谈判中的位置，提出适当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坚持要蒋介石妥协，坚持西北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南京政府的半独立局面，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很快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公开发电，主动提出“四项保证”。

1937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共产国际书记处发出尖锐批评中共中央那封电报的第二天，它又发出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2]

在 1 月 2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和共意图，毛泽东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随即，中共中央将他们起草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草案电告了共产国际书记处。这回轮到季米特洛夫吃惊了。

共产国际书记处 1 月 20 日电的提议显然还仅仅是一种初步的设想，他们的提议甚至不想完全放弃苏维埃的形式。然而，中共中央的电报却准备公开保证说：（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

[1] 《林育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 年 1 月 24 日）。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1937 年 1 月 20 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

季米特洛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准备做出的政策变动竟是如此之大。由他亲拟的书记处 2 月 5 日复电称："我们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并需要各个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这种急剧变化做认真的准备。"[2]

但是，第二天，当斯大林了解到中共中央建议的内容之后，季米特洛夫不得不急忙又发出一封不同于前一天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说：我们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是基本上可以采纳的。当然，季米特洛夫仍旧有些不放心。他在电报中特别问道：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提出的这类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准备了呢？请你们回答这个问题。[3]

三、抗战爆发后季米特洛夫安排王明回国是夺毛泽东的权吗？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季米特洛夫与中共中央之间固然出现过分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和共产国际始终是右倾的发源地。实际上，他们有时是站在左的一边提出批评，有时则是站在右的一边提出批评。回顾一下 1936 年 8 月 15 日的政治指示，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季米特洛夫实际上就是左右开弓，而更多的其实还是站在左边担心中共会向右转。他一面批评中共中央不该继续实行反蒋方针，一面也在突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批评中共中央不应该放松自己的阶级警

[1]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7—158 页。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 年 2 月 5 日)。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 年 2 月 6 日)。

觉性。季米特洛夫在指示中明确讲，他们对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在维护自己阶级队伍纯洁性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特别感到不安”。他强烈反对决议中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反对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的做法；反对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如此等等。[1]1937年初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担忧，多半也是这种情况。说他把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中的几位政治局领导人送回国去，打算要王明他们来夺毛泽东的权，完全不能成立。

其实，读了前面内容的读者大概都能感觉到，这种说法首先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因为遵义会议并没有推举毛泽东来取代博古，会议拥立的新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会后不久，陈云和潘汉年就离开红军，转经上海去了莫斯科，他们甚至不了解以后军事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因此，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虽然从陈云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发生了变动，却只会知道中共中央新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既如此，假如共产国际真的是派人回来“夺权”的，那么也一定主要是冲着张闻天去的，而不会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更何况，上面谈到的情况也清楚地表明，季米特洛夫所担心的，也不尽然都是中共中央会不会“左”倾的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这时更加担心的，还是中共中央会不会右倾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内的中共领导人会不会在新形势下被“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所欺骗，以致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呢？[2]

谈到派王明回国，不能不谈一谈季米特洛夫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那次发言。过去一些谈到这个问题的党史书都引述过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发言，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大多数的引述都只注意到发言中关于需要派国外的干部回去帮助党的提议，然后就简单地把它同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反对毛泽东的倾向联系起来了。有的甚至干脆说，这是要中共改变以往的政治立场，放弃军队，并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合并。其实，只要稍微仔细点儿读一遍这个发言，就应当能够看出，那里面既没有不满意毛泽东的内容，也没有让中共听任国民党摆布的意思。

季米特洛夫是怎样提出派人回国来“帮助党”的这一动议的呢？

季米特洛夫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成功地进行了苏维埃革命，并在同南京国民党的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政治活动家。但现在，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从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转变到同国民党谈判，将苏区改为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干部，他们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转变呢？他担心：“对于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来说，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他表示，中国党大多数干部是农村游击战争中培养锻炼出来的，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面对如此之大的政策变动，在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包围之下，难免存在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很显然，季米特洛夫在这里所担心的，并不是中共会拒绝统一战线，恰恰是害怕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共阶级立场不稳，会因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方向。正是在这样一种担心的基础上，他才感觉到需要能够辨明方向的同志去帮助中共中央，去利用新的形势加强在工人中的影响，从而使党真正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而他认为，“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1]。

可以肯定，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不仅不是冲着毛泽东去的，而且也不含有任何想把中国党引向右倾的痕迹。作为欧洲国家党的领导人，承继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

---

[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 年 8 月 10 日）。

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把握政治方向。在这里丝毫也看不出季米特洛夫有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倾向，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保持着高度的戒备。

10月10日，在确定了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保持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1] 季米特洛夫这时究竟担心什么，他希望王明等人回国能够从哪方面帮助中国党，从这一决议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四、王明推举毛泽东做“主席”，自己做“书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以及康生、陈云等乘苏联飞机抵达陕北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2]。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相信毛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而且中共刚刚从长征的千难万险中解脱出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在政治上的帮助和在物质上的援助，更是让中共领导人心怀感激。在这种情况下，感谢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等人，其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7页。

[2] 《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9日。

实也就是利用这种机会向共产国际表示敬意。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十天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了。

既然季米特洛夫派王明等回国，很大程度上是想要王明帮助国内中央加强党的政治敏锐性；既然共产国际并无向毛泽东“夺权”的意图，何以王明一回来就要同毛闹别扭呢？谈到这一点，不能不稍微追溯一下王明的发家史。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明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的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其实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说他是米夫扶植起来的，是因为与中共党内其他通过实际斗争成长起来的领导人相比，他的提升并不是因为在中国革命中有过什么较为突出的业绩，而是因为米夫过去是王明所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对王明聪明机敏和领会力强颇有好感，一直大力提携。

也正是由于王明在莫斯科的经历远不同于一般中国留学生，他不仅早就做了米夫的翻译，在中山大学风云一时，而且 1927 年武汉政府期间还作为苏共宣传代表团的随员到过国内，1928 年更是做过向忠发的秘书，并在中共“六大”上因为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过好一阵风头，因此，当他 1929 年被派遣回国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只做到宣传部干事的职务，难免会在内心有些不平衡。1930 年，王明还因为被捕后泄密受到了处分，被下放到全总宣传部《劳动报》当编辑。这自然也就更让他耿耿于怀了。王明能够在不过半年多时间里，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更成为最主要的常委之一，俨然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纯粹又是由于一向机敏的他看出了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不敬的倾向，大胆地起来反对，结果再度赢得了米夫的信任，于是被破格任用。

李立三是向忠发做总书记时的中央宣传部长。由于他提出了一套以中国革命来掀动世界革命的激进革命的理论，并不顾共产国际反对而全力推行之，被共产国际冠之以“立三路线”的头衔。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受

苏联教育多年，清楚地知道只有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利益的道理，绝没有苏联利益服从于中国革命的道理。因此，他们原本就看不上从未在苏联学习的李立三的理论素养，这时就更是认为李立三的做法是对共产国际的大不敬，因而公开向李立三的权威进行了挑战。二人虽然一度受到压制，但由于共产国际很快就发现了李立三的问题，并迅速加以干预，二人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反而还因祸得福地都进了中央最高权力机关。

王明之能够从一个一般干部，一跃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显然也是得益于中共这时的人事体制。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实行的是集权制。这种集权的体制，对实行秘密工作和暴力革命自然有其便利之处。但其人才的推举和选拔，却极大地受到各种人事关系和权力格局的影响。最高权力机关，乃至于最直接的权力负责人，往往可以轻易地影响和决定党的人事任免。王明等人在党内的发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米夫受命纠正所谓的“立三路线”来到中国上海，坐镇改组中共中央，由于人事权完全掌握在他个人手中，而他这时在中共党内唯一熟悉和真正能够信任的，又只有王明和其他几个他过去的学生。结果，尽管王明等人几乎没有在中国真正做过多少实际工作，又仅为一般干部，仅仅因为政治上可靠，米夫就独断专行地把王明等人扶上了台。很快，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两位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叛变和变节，王明等政治局成员无法继续留在上海。王明又利用米夫的关系坚持要去莫斯科，又是在米夫的直接要求下，共产国际特批王明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去了莫斯科。在此之后，很自然地王明就成了中国党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代言人，因而很快荣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最得意时甚至还分工负责拉丁美洲国家党的工作。

由于王明在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很容易两面讨巧。对中共中央，他俨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对莫斯科，他俨然又是中国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种光环纷纷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价百倍。正是这种多少有些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

的心态。当然，“跟”风跟得紧，亦即政治上比较乖巧，也是王明这种人容易讨上级喜欢的重要资本。但这也注定了王明其实并没有特别执著的观点和坚定的个人意志，像毛泽东说的，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向右倒。因此，“左”也是他，右也是他。[1]

看风使舵是不是都错呢？也未必。1934 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开始放弃过“左”倾政策，改取统一战线的方针，王明也跟着做了不少宣传政策转变的工作。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也是毛泽东将他比喻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共中央早就知道，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八一宣言》，就是王明按照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精神起草的。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王明的一些文章还曾经是中共中央研究参照的重要文件。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不太清楚的是，王明的转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像在“抗日反蒋”的问题上，王明一直到 1936 年 7 月初还在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同情国内反蒋派的文章。[2] 只不过，受到季米特洛夫的批评后，他就在 7 月 22 日讨论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转而批评起中共中央那个主张“抗日反蒋”的瓦窑堡决议来了。[3]

王明的为人和作风，看来也未必是季米特洛夫喜欢的。当王明在 22 日发言中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决议时，季米特洛夫就有些不以为然地表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4] 在决定派王明回国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这个差不多是在莫斯科成长起来的小个子的领导人，不要有太多非分之想。他早就听说，米夫曾不止一次地在向他人介绍王明时，有意无意地把王明说成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因此，季米特洛夫当着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专

---

[1] 《毛泽东同艾地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29 日）。

[2] 《救国时报》1936 年 7 月 4 日。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记录》（1936 年 7 月 22 日）。

[4] 同上引注。

门就这个问题提醒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1] 季米特洛夫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共产国际并不认为王明适合做中共的领袖。师哲当年曾经在莫斯科，后来做过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他在回忆中对这件事讲得更加直截了当。他说：季米特洛夫讲过，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2]

师哲的这段回忆并不十分准确，至少季米特洛夫这时知道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而非毛泽东。尽管季米特洛夫应该对毛泽东有更深刻的印象，但依照他行事的个性以及一般的惯例，他也很难马上就提出更换中国党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当王明回国时，他就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建议是，中共中央今后应当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当然，师哲的回忆有一点大致是不会错的，那就是，莫斯科这个时候不打算让王明担任党的领袖。关于这一点，从王明回国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中，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项关于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要"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如果依照中共遵义会议安排的负责人选，在这项工作中首推负责者无疑应当是张闻天；如果共产国际真的想要推举王明来做"七大"以后的中共领袖，那么负其责者显然应当是王明。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按照王明转达的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大会决定成立的准备委员会，主席既非张闻天，也非王明，却是毛泽东。[3]

由于将近九年时间没有召开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等人对

---

[1] 《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1 年 9 月 12 日）。
[2] 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 页。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 年 12 月 14 日）。

这次大会格外重视，曾专门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具体谈过尽快召集“七大”的问题。以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的提议，自然不可能是王明别出心裁的谦让结果。它明显地反映了莫斯科在未来中共领袖问题上的倾向性。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材料的缺乏，不知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昆仑山的“神仙”的尊敬，还是王明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怎样的暗示，总之，与会者还是推举王明充任“七大”准备委员会的“书记”。实在不知道一个准备委员会，在“主席”之外如何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不知道是不是王明不想要那个“副”字而想出来的办法？不管怎样，王明推举毛做“主席”，自己又弄个“书记”做，这种一山二虎的架势，很符合王明的作风，显示了他不甘寂寞的心态。而尤其会让人要猜疑到王明头上的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在这个文件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还破天荒地被要求依次签名以示赞成。[1] 这在中共历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五、毛泽东表示:“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和为贵”

总想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有时甚至还会颐指气使，这在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来说,这时实在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他在回来后,即 1937 年 12 月第一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上来就批评说 :“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他说 :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领导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西班牙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欧洲资产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 年 12 月 14 日)。

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高喊无产阶级领导会吓退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从抗日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要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1]

有季米特洛夫8月10日的谈话，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0月10日的决议，王明为什么突出谈论的却是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呢？这与王明等人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的谈话不无关系。

在这次谈话当中，斯大林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谈到，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2] 不过，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清楚斯大林不会把未来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去。简单地认定王明这时的主张是想取消共产党、八路军的独立性，投降国民党，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后来的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却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说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这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人们通常只是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很少注意到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

[1]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12月9日）。

[2] 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1]

不能否认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这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自从1937年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之日起，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从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故“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2] 毛泽东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这恰恰是善于纸上谈兵的王明所欠缺的。但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抗日大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利益和便利革命前途，严格地说，就是毛泽东也还缺少经验。因此，他尽管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问，但对王明谈话的基本精神他还是接受的。他明确讲：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对于统一战线，“目前是和为贵”，我们在政治上要有号召，但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3]

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怕是很难同意那样一种说法，即说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成功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其实，近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已经多少改变了这种说法，它们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4]。

之所以感到“孤立”，是因为他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在这次会议上很多都被否定了。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不够策略的做法，甚

[1]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2日）。
[2]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9日）。
[4]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

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只有毛泽东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部队实力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不难看出，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对一件新事物的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形成一套稳定的观点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将近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毛泽东抗战伊始就有了十分成熟的意见。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后，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于力量弱小的共产党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正因为如此，十二月会议最后决定：“决议：王明起草。”[1]会后，毛泽东也立即发指示、写文章，要求所属各部门切实贯彻会议精神，“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与幼稚，甚至违反路线的行为”[2]。这也就是说，十二月会议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毛泽东即使对个别问题尚有保留，但也按照会议的精神，承认过去有些观点不尽妥当，因而开始按照会议的要求重新审定对国民党的统战策略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我们曾经要改造国民党，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3]，指的就是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依照王明转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 年 12 月 14 日)。

[2] 参见《毛泽东致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肖、关、刘、徐、张、小平、子华、雪枫电》(1937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肖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 年 12 月 24 日)，等等。

[3]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13 页。

达的莫斯科的指示精神进行工作的一段历史。尽管按照后来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情况，毛泽东发觉还是他最初的看法更正确，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在王明回国后一度赞同过共产国际意见而改变过自己最初的看法的事实。

六、王明否认中央权威，毛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说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1938 年 10 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在今天也许会引起一些异议。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时局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诚意，却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1] 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格格不入的情况，中共党的各级领导人自然不能不渐渐地放弃了曾经有过的亲密合作的幻想。

其实，到 1938 年 2 月底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时，王明自己也承认：“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字眼儿），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从这一形势看，王明也坦率承认：“确实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弄得蒋介石以为可以取消共产党，在《扫荡报》上向我们进攻，说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党等，想用民族统一的口号制服我们，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进行反击。王明这里所提到的不得不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谈话，指的是 1938 年 2 月 9 日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篇谈话记录稿。在这篇谈话当中，王明以毛泽东的口吻告诫国民党人，不要幻想可以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

---

[1]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29 日）。

共产党人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组织和主张。[1]

可以看出，对国民党开始抱有较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汉呆了几个月之后，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简单地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势，远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根本取消共产党的政治企图和尝试。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的那个自十二月会议以来，想要改造国民党的“错误”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从十二月会议关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的方针出发，中共中央领导人仍旧相信两党关系还有进一步改善与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对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抱有极大的热情。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就特别强调：我们要看到国民党在开始改革，并且在酝酿改组，国民党必须也可能通过改革清除腐败。大革命以前国民党就是通过改组，增加新的成分才壮大起来的。今天，有蒋在，改革就有可能，“我们便要利用蒋进行顺利的改组”[2]。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

[1] 《（毛泽东）与〈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见《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二版。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38年2月27日）。
[3]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8年4月17日）。

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也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在政治上不断挤压和日本人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则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1]

但无论如何，一直到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自十二月会议以来过高地估计国民党改造的可能性的倾向没有被根本消除。毛泽东相信：“现在国民党在抗战中可能由内部发生变化，要找新的力量，执行新的政策，因其阶级基础变化等等，国民党有变成民族革命联盟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公开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宣布“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而且提议“将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承诺共产党必定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绝不组织让国民党害怕的“秘密党团”，绝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2] 对于毛泽东这时在党内和公开场合的这一表态，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用来应付莫斯科的策略和做给国民党看的宣传手腕。

这样一种期望，这样一种态度，毫无疑问仍旧是属于被毛泽东后来否定了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很坦率地承认：“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而后来，人们渐渐淡忘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两个字，简单地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把这笔账都记到王明一个人的头上去了。

那么，既然这段时间里，大家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都还处于一种摸

---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

[2]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对改造国民党抱有幻想，为什么他与王明之间还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到王明在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王明当时这样解释他在抗战开始初期这段时间与毛分歧的原因。据他说，这个问题的造成，是因为他“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轻描淡写的味道。但从1937年12月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赴武汉（以后又增加凯丰）工作，与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来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为武汉与延安，即王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矛盾；第二，武汉与延安之间的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毛在六中全会之前曾总结说：现在党内没有大的原则的分歧，对于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等原则都是一致的，只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线上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之前，毛还是这样认为的。

既然如此，这种矛盾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说的：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个人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把延安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弃如敝屣。与此同时，王明等还不经延安同意，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张浩（即林育英）在延安关于统战策略的讲演纯属伪造，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拒绝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毛泽东等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如此等等。

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比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是采取协商的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加以批评；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不经延安同意即公开发表声明否认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为 1938 年 2 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并且公开发表；以陈（即王明）、周、博（后加凯）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的意见；反对毛泽东关于应当赞助国民党组织三青团，争取各党派共同加入的主张；等等。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的问题，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1]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2] 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七、季米特洛夫表态：中共中央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

[1]　转见《两条路线斗争》（油印本），第 11—19 页。
[2]　《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电》(1938 年 2 月 9 日)。

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的领袖地位。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中共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的提议，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中共的工作。如果注意到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曾受过打击，背过处分，这时又一直在延安的情况，很容易想象他对王明与延安中央之间的分歧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不过，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报告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由他首先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的。

据他说，他在汇报中共工作时，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第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第二是问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第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弼时回忆说，季米特洛夫听了介绍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还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国人米夫，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的问题，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

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鉴于任弼时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1]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也在会上发言，称赞毛十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毛是中国党当然的领袖，并且说："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2]

就形式而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实还并没有能够根本解决毛泽东的领袖名义问题。由于共产国际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到应当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的问题，仍在名义上负总责的张闻天多少还有些"恋栈"，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曾经向毛泽东提过这个问题，

---

[1]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参见徐则浩主编：《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

在毛表示推辞后，自己也就没有再提了。出现这种犹豫态度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自己“还没有感觉到有变动的必要”，“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对于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因此当时“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而把这件事轻轻放过去了”。

不过，从莫斯科很快转载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专文发表介绍毛泽东生平的传记等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在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据他回忆说，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了。进入到1940年，他更明确承认毛泽东应当是党的领袖，故几次提出让位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1]

当然，不能不提到的是，到了六中全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相当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会议的认识了。毛泽东虽然仍旧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革，主张“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但他很清楚：国共两党“这种合作是带勉强性的（不自由的婚姻）”，我们的实力不大，一时还不能与国民党取得平等地位，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必须要争取实力对比上的变化，从不平等走到平等。只有到共产党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才能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既要发展实力，就难免要有摩擦和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发展统一战线。统一和斗争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2]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被放弃了。因为正如张闻天和刘少奇这时所讲的，在中国不存在法国那样的统一战线，“一切经

[1] 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注2。

[2] 毛泽东：《论新阶段》（口头报告）（1938年10月12—14日）。

过统一战线”在中国就等于一切要经过蒋介石，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1]

同样，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发展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共中央下一步工作的重心。而国民党加剧其反共、限共的倾向，引发了更激烈的斗争。随着这种斗争的加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想改造国民党其实是一个“错误”。

所有这一切都与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很难设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的话，那对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2]

---

[1] 《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38 年 11 月 12 日）。

[2] 《毛泽东同艾地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29 日）。

第四章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斯大林确信英美是主要敌人；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毛泽东相信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实力领导地位，抗日和革命是一回事；英法战败，为何作为英美派的蒋介石反而气焰嚣张？国民党人蠢蠢欲动，蒋介石是否有与日本联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计划？毛泽东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又担心“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莫斯科坚持抗日高于一切，蒋介石却突然袭击，搞出一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按照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的说法，毛泽东自从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开始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什么是“独立自主”？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中共从此就开始特立独行，对莫斯科敬而远之，显然不太准确。我们已经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的毛泽东，对莫斯科依旧尊敬有加，不仅没有摆脱共产国际领导的迹象，而且在涉及中共命运和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对来自莫斯科的意见通常都是言听计从的。哪怕是莫斯科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不尽一致，比如像国共合作开始时，对国民党究竟是应该强调阶级界限，防范为上，还是应该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以坦诚相待，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修正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尝试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才会对毛泽东信任有加，在发现王明有问鼎最高领袖的企图之后，迅速出面表明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见。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莫斯科貌合神离的呢？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40—1941年这段时间。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是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当共产国际力主国共合作时，他曾努力巩固和坚持统一战线；而当共产国际强调国民党反共倾向时，他则积极设法排斥蒋介石集团，为未来的革命转变早做准备。但是，当共产国际的政策随着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一变再变，重新又转回到强调统一战线，并且要求中共不惜暂时损失自身发展的机遇，也要服从于国共合作的大局之后，毛泽东由困惑渐至走向抗命了。

一、蒋介石扬言，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来乃其生死问题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但是，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就奉命带着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去会见蒋介石。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向蒋介石转达经过季米特洛夫批准过的毛

泽东的提议，即恢复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或组织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以此表明中共中央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诚意。

10月4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周恩来。周首先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给蒋介石的亲笔信，然后详细介绍了刚刚举行过的政治局会议对坚持抗战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在听到周恩来谈抗战问题时，蒋显得有些不以为然，只是讲：坚持抗战，这没有问题。但听到周恩来介绍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公开自己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设想时，蒋介石听得聚精会神。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将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的决定，蒋不住地点头，觉得很入耳。他当即提出，请周恩来尽快把这些意见写成一个材料，他好研究一下。

8日，周恩来写好书面意见，递交给蒋介石。蒋当天就召集陈立夫、朱家骅、康泽、贺衷寒等，通知了他们这一新的情况，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14日，蒋再约周恩来谈话，告诉他说，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怕是还需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才行，他的意见是，三青团章程修改一下共产党同志就可加入，他要周立即与三青团的干部商谈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恰值武汉、广州失陷前后，形势严峻。因此，蒋介石对周恩来显得很亲热，并且还见了朱德总司令，谈了八路军在敌后发展的问题，蒋还鼓励周恩来与叶剑英协助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愿意听取中共方面关于军事工作的意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前景似乎真的出现了。周恩来电告中央：蒋介石对我们态度相当转好，机密事也渐不回避，限制与束缚虽未放松，但可徐图冲破。[1]

然而，随着在此之后日军攻势渐渐停顿下来，国民党内部那种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竟陡然加剧起来了。

12月6日晚，周恩来再见蒋。尽管他已经听到不少国民党高层人士反

[1]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1月4日）。

对中共六中全会“跨党”主张的议论，但蒋介石的说法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蒋介石说：跨党的办法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个办法可以讨论，他愿意约毛泽东面谈。

周当即解释说：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日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必都如此认识，故国共两党终究还是两个党；跨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互信。

蒋掉转话题，提到当年合作破裂的情况，称还是合并好，因为大家都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

周见谈不拢，表示：合作方式问题不必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也可考虑其他办法。

蒋提出：如果全体加入国民党做不到，可不可以一部分党员转入到国民党中来，而不跨党呢？

周表示：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怕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行不通。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这种既失气节又失信仰的人，对国民党也是有害而无益的。[1]

12日，已到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的王明，会同周恩来等再度与蒋谈组织合作问题。这次谈得更糟。蒋的态度更趋极端。他断然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2]

[1] 《周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6日）。

[2]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下），第183—184页。

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根本上是由于自身在战争中的削弱和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壮大这种强烈的反差引起来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只有三四万军队，地盘仅陕北一隅之地。如今，国民党丧城失地，一发而不可收，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迅速从陕北而山西而河北而山东，扩展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军队人数也由三四万扩充到近二十万人之众。此时距抗战开始才不过一年多时间，共产党的力量和地盘已经数倍增长，并开始要求重新划分华北战区，这不能不让众多国民党人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1]。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谈话和大会代表们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很快起草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议甫一结束即迅速下发执行。[2]《办法》开宗明义即提出：“共产党在本党权力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本党唯有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办法，方能有效对付异党之扩张。为此，《办法》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办法。“积极”办法就是要调动各地党政机关，全面加强对学生、民众及其群众团体的引导和控制，对异党活动最烈的地区，更“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至于“消极”办法，就是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活动要严格防制，如“任何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办法》并明确提示称：“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3]

---

[1]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33页。

[2] 《院长孔祥熙令》（1939年3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5/25.13。

[3]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2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京）53。

国民党中央既然有令在先，国民党各部门以及各地区自然纷纷开始制定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于后。结果，自1939年初开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迅速白热化起来。先是在陕甘宁边区，然后是湖南平江，接着是河南确山竹沟，两党之间以往就有的摩擦和冲突这时迅速升级。特别是随着蒋介石开始向过去丢掉的敌后大批派遣正规军和军政官员，国民党人的防共措施已明显地由一般性的查没报刊、封闭社团、逮捕人员，急剧地走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武装驱逐对方军政人员的地步，由此而造成的中共方面的人员伤亡明显增多。

二、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断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明明中国这时在军事上已处于严重困境，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可能进一步危害整个抗日大局的“防共”、“限共”行动呢？毛泽东显然无法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想法。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共产党人久已习惯地把国内阶级斗争的动向与国际阶级斗争的动向联系起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促使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怀疑蒋介石如此动作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

1938年9月29日，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来换取法西斯德国停止向西欧扩张的保证。英法单独与法西斯德国达成的这种妥协，意味着共产党人前此为应付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设想很可能落空。《慕尼黑协定》再度使共产党人想起列宁对资产阶级妥协本质的论断，在他们看来，不论是英、法、美等国政府，还是蒋介石国民党，自然都不出列宁论断的范围。

1939年春，在一次讨论国民党反共摩擦问题的政治局会上，与会者列举了许多可能的原因，而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确，那就是：“蒋的政策很大的

成分是依赖英美”的，因此，“最近的摩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得到的情报说，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只要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战争即可停止。而英美也在积极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意味着，蒋想造成“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法”，“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既然如此，主张抗战反对妥协的共产党自然就成了他妥协的最大障碍，他当然要加紧反共了。

国民党要“限制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注意到这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蒋介石坚决反对，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改变对国民党进步趋势的肯定态度。在他这时的谈话当中，对国民党还经常强调“要亲爱，要团结”的方针。[2]

不过，与此前有所区别的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反摩擦这一条”了，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来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换言之，对国民党“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3]

既然国共摩擦的背后是资产阶级妥协本质所决定的，两党之间真的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吗？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和平力量和联合对象的英法等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5月7日）。

[2] 毛泽东：《对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总结会议时之演词》（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5日）。

[3] 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5日）。

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1]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自“七大”以来实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明显地开始转向。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只是在斯大林讲话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了解到其讲话的具体内容的。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一份指示电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按斯大林的新思路考虑问题。指示电明确认为：目前中国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

还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强调过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断言“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回来强调抗日和团结以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给人的感觉似乎在抗日这个大局上，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不再有根本性的区别了。然而，如果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决心抗战到底，他们又怎么会突然加紧反共了呢？这个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反共多半就是准备投降的前奏。

6月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估计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以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全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估计及其对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其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强调国民党“光明前途”的方针改变了，开始明确肯定“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

[1]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参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246页。

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1]

三、毛泽东称：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战争与革命”的局面呢？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历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遗憾地没有能够最终结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但它毕竟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浪潮。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铭记在心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大战刚一开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声称：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2]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不相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

[1]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206 页。

[2]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 年 9 月 14 日）。

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抗日与否的问题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改变。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五十万之众，已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的话，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可能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

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抗日仍然高于一切，再加上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同为国民党，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使在资产阶级这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

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入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又不能不顾实际地将其纳入到应当反对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1] 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应当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那个“顽固势力”。何谓“顽固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表示，他确信：“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2]

既然肯定国民党现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么，区别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

[1]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曾两三次谈到他解决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资产阶级区别的问题，最初曾提到在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起草《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政策的决定》时才认识清楚，后来又谈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搞清楚。对照最初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原文，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是准确的。

[2]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目前时局问题的结论》(1940年7月13日)。

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即是”。[1]

四、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强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不是没有来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欧洲战场上德、意很快就占尽上风。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应当收敛自己的反共行动了。但事实上，正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摩擦行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了，两党之间的这种冲突甚至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来了。这一度让毛泽东很难理解。

进入到1940年2月，八路军在华北的反摩擦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中央已经开始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要求，并明确主张下一步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五十万的基础上要扩军三十万，争取尽快达到一百万。[2] 让毛泽东不解的是，尽管蒋这次在军事上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华北敌后控制权大部丧失，他的态度却仍旧非常强硬。

蒋介石为什么还会如此强硬呢？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英、法、美仍旧有干预东方事务的相当能力。他估计：蒋介石一定是在执行“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目的多半还是要“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3]

[1] 《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致恩来电》（1940年9月6日）。

[2] 《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

[3]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1940年6月）。

不过，莫斯科之所以会在欧洲采取废弃统一战线的策略，转而向德国示好，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来自法西斯的威胁太大，而英法等国通过《慕尼黑条约》把祸水西引，促使斯大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在东方，却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相反，日本依然是苏联在远东的最大战争威胁。因此，莫斯科改变了在欧洲的统战策略，却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东亚的统战策略。1940 年 5 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就带来季米特洛夫希望继续努力保持国共合作局面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随着 6 月法国战败，英国本土开始受到进攻，英、法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毛泽东也转而估计蒋介石将“被迫让步”，“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他随即亦同意为减少军事摩擦，与国民党进行划界谈判。毛泽东明确表示：“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的延长。”[1]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然而，7 月 16 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并只允许中共编八路军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2] 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再度深感困惑。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会上已经开始提到蒋介石有没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可能的问题，但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什么可靠的凭证。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划界，但强调必须以新黄河为线，并且新四军实际上不能向北集中。殊不料，条件提出后，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此时华北敌后已经基本上为中共所占有，国共争夺的中心已经移至华中地区来了。新四军原在苏南的部队挺进苏北，决心在长江以北的敌后地

---

[1] 毛泽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1940 年 7 月 6 日）。

[2] 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7 年版，第 227—230 页。

区建立根据地，受到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及其所部八十九军的坚决抵制和压迫，终至发生黄桥之役，新四军江北部队一举消灭国民党三旅之众。国民党方面恼羞成怒，于10月19日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形式，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1]

在共产党已经强大到有五十万军队、六十万党员、控制着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小部分地区的情况下，蒋介石到底有什么资本能够向共产党下最后通牒呢？难道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破裂关系？注意到9月27日德、意、日三国正式宣告结成军事同盟，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有步汪精卫后尘的危险。但是，共产党一向都很清楚，蒋介石历来都是倾向英美的，他真的会轻易地离开英美集团去加入德意日集团吗？

10月中旬，中共中央相继得到消息，美国已经提供给蒋介石一笔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英国也开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压迫而关闭的滇缅公路，以便于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周恩来亦多次来电强调蒋介石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可能，并判断，如英美集团战胜，则国内形势将更形逆转。南方局20日发回的政治情报也断定：蒋介石还是英美派，其加紧反共反苏，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2]。对此，毛泽东亦表示赞同。他并且在10月12日就强调过这一点，即“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3]。但到25日，他已估计大资产阶级未必会加入英美集团了，因为“德不攻英伦，必向非洲、印度，英国快到手忙脚乱之时。日本将取先占南洋，后扫中国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属四地一旦落入日本之手，中国英美派又将手忙脚乱”。美国准备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战。只要日美战争迟迟不爆发，大资产阶级就只能动摇于英美路线与法国投降派贝当路线之间。当然，它们既处于动摇中，就“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

[1] 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8页。
[2] 《中共南方局当前政治情报电》（1940年10月20日）。
[3]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可能加入英美集团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12日）。

不容易下”[1]。

不过，反复研究陆续得到的各种外电，毛泽东当天又发出电报，估计：“德国仍在准备攻英伦，即使不攻英伦，但有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入德军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总之英国倒霉时期快到了，不论美国是否迅速参战，英国倒霉是定了的，美国迅速参战也无救于英国倒霉，因此中国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据此，他判断：“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2]

自10月19日何白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共产党既然不能答应国民党关于一个月内将全部军队撤过旧黄河以北的“最后通牒”，就必须迅速准备对付国民党可能的大举进攻。因此，正确判断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及其背景，显得异常重要。为此，毛泽东一连许多天夜以继日地分析局势，判断动向，深感关系重大，拿不定主意。

29日，毛泽东终于初步认定：“美国现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打败日本”，而“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在（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做贝当的”，“故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他告诉周恩来等：“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

[1]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

[2] 《毛泽东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25日），前引书，第35—36页。

传所迷惑，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为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1]

据此，他明确指示，蒋已准备局部讨伐，直至取消新四军番号，而我们决不能退到旧黄河以北，非在华中或华西划出几个较大的省区给我们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而要达此目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必然是一场严重斗争，甚至闹到天翻地覆也难说。”[2]

如果说毛泽东 29 日还在犹豫蒋是否最后下定了投降决心的话，那么两天后，即 31 日，毛已不再相信蒋有当戴高乐的任何可能了。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他声称：“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急转直下。”[3]

11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等从重庆发来电报，一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形势估计，一面仍强调蒋举棋未定，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称：“你们电报中似乎表示与中央有分歧，当此严重时机是不相宜的。”“目前时局很显然是直接准备投降，抄贝当老路，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的烟幕弹，日本已准备了对蒋让步与日蒋联合剿共计划，我们应做此种判断。”[4]

为什么判断蒋介石会“直接准备投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严重怀疑蒋介石要中共军队退至旧黄河以北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阴谋，是要使中共军队全部集中在河北和察哈尔这两个不大的地区内，以便于被日军消灭。在此之前，他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共冲突这时比较严重而国民党势力相对较强的华中特别是皖南地区，估计蒋若加入英美集团，蒋会取缔新四军，整个南方将陷入黑暗局面。但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这样做不可能

[1]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恩来、德怀、胡服、项英电》（1940 年 10 月 29 日）。
[2] 同上引注。
[3]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动向致恩来电》（1940 年 10 月 31 日）。
[4] 《中央书记处关于加紧准备对付蒋介石的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1 日）。

取得多少收获。以华中现有的兵力以及与华北敌后的联系，新四军江北部队现在就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一旦按照预定方案将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其结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蒋指望谁来帮助他实现那个命令呢？总不会愚蠢到指望英美会马上帮助他反共吧？因此，毛泽东不能不渐渐怀疑蒋介石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一个与日本合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

故在 11 月 1 日，毛泽东已明确提出："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

五、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莫斯科支持他的先发制人

毛泽东对形势做出如此严重的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 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其反共、限共的态度日趋明朗化，两党摩擦日趋白热化，地方性的军事冲突更是司空见惯。国民党以政府名义提出《中央提示案》，甚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任何人都会猜测蒋介石心存根本破裂两党关系的想法。联系到这时白崇禧等人的战争言词，和军令部拟就逾期即不遵"剿击"中共军队的军事部署以及蒋介石早有中共军队"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为力"的观点，可知整个形势确实存在很大的危险性。[1]

注意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使中共中央异常紧张。

从 10 月 20 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因为情况仍不完全明朗，会议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31 日以后，毛泽东判断已下，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既然

---

[1] 据中共中央书记处 11 月 1 日致关向应、贺龙、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电报称，白崇禧这时公开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根据蒋中正档案亦可知，作为参谋副总长的白崇禧也是极力主张就势歼灭中共军队的主战者之一。另据徐永昌 1939 年 11 月的日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 18 日已"以委员长名义命令"各部准备"对该作战地境外之共军予以剿击"。《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版，第 469 页。

断定蒋“直接准备投降”，就不可避免要提出一个要不要准备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决裂的问题。周恩来提议表面上服从并做某些实际的让步，比如新四军退出皖南，以求减少损失并拖延内战，而毛泽东首先考虑到的却是“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表面文章和局部让步的策略问题，而是如何应付这一被迫的决裂而不受大的损失的问题，因为他估计：“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1]

要下此决裂的决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上措辞容易，军事部署困难。”延安的领导人反复研究后，确信当前只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政治进攻，军事防御；一是政治与军事同时进攻。按照前者，在毛泽东看来，“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军事上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的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按照后者，“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2]。很明显，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是倾向于先发制人的。

这时距国民党最后通牒所宣告的最后的时间表，即11月20日，只有不足三周的时间了。国民党二十天后随时都可能对华中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发起进攻。时间紧迫，而对策难产令中共中央领导人极感焦虑。

鉴于周恩来对形势估计略有不同，毛泽东明确去电批评周恩来等与中央不应有所分歧。但第二天，即11月2日，书记处开会，大家意见也还是不能一致。因为这项决策关系重大，毛泽东自己其实也深感犹豫，不得不慎重行事。他当天会毕电告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开会

[1] 《毛泽东关于目前根本问题致恩来电》（1940年10月30日）。

[2] 《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10月30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恩来、德怀、胡服、项英电》（1940年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加紧准备对付蒋介石的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讨论你东日（即 1 日——引者）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能打得开局面的。”与此同时，他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电示皖南新四军叶挺、项英：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

当然，毛泽东坚持他对形势的估计。2 日周恩来转达苏联大使潘友新的意见，指出目前尚不能断定蒋已决心与日本妥协，蒋实际仍在三岔路口。毛当即要周恩来转告大使称："潘友新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唯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蒋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那时苏联再出来调解一番，好转也不是不可能的。自然，打起来后，蒋介石也有当贝当的可能，“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滨海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2]。

既然要充分做好对付蒋介石“剿共”的准备，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不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3 日，他分别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

[1]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电》（1940 年 11 月 2 日）。
[2]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 年 11 月 3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38—39 页。

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他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两万人左右的挺进军，乘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1]

计划已至如此具体，可以想见毛泽东又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方案了。只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因此他还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用他的话说，是“鲁莽不得，错误不得”。[2]

11月3日，毛泽东事实上看法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剿”，“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为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当国民党“‘剿共军’前进时”，即以十五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发。[3] 但面对这一孤注一掷的重大步骤，他深知仍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电季米特洛夫，“请求”莫斯科给予“指示”。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

[1] 《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

[2]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

[3] 《中央书记处关于行动布置致恩来同志电》（1940年11月3日），前引《皖南事变》，第78页。

的电报，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

他说：蒋介石现在正压迫我们在华中与山东的三十万人退往旧黄河以北的华北三省，而那里我们已有五十万人，敌人扫荡异常激烈，根据地日益缩小，给养十分困难。“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就范，准备举行自卫的反攻。为此在军事上拟以大部军队（约三十五万）坚持各抗日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以期粉碎这一进攻。但此举必被蒋指责我们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表示：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1]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想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事实上也都没有达到这样做的条件。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国民党的军事威胁所迫。但问题是，只要有破裂国共关系以至于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的任何可能，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不愿意见到的。

就在毛泽东准备寻求莫斯科支持的时候，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在与崔可夫的最后谈话当中，斯大林明确讲到对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采取与蒋介石为敌的做法。他说：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2]

季米特洛夫对这时国共之间的严重局势也深感担忧。在与毛泽东的往

---

[1]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 年 11 月 4 日）。
[2] 崔可夫：《崔可夫赴华使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3、35—36 页。

来电报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他强调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故在政治上应把矛头对准亲日派，军事上只应做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党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1]

六、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估计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即不能实行，这一点很明显。况且，他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不能不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

6日，他读到周恩来发来的“重要情报”，了解到英美正极力设法控制中国，国民党内高层亦强调“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力主发动英美反对亲日派逼蒋投降阴谋，制止“剿共”战争。蒋本人也在3日下午将各地请求“剿共”的电文改为“缓发”，说是需要再作考虑。他当即一改前此方针，致电周，主张：“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当天，他致电南方各地党的领导人，强调务必“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动员党与非党的多数人员四出活动，“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力求缓和。[2]

11月7日，中央据此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

---

[1] 转见《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电》，1941年2月6日，转见 Chinese Law and Goverment，Vol.30，No.1—2（1—2，3—4，1997）。

[2] 《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

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指示强调：“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1]

距离蒋介石规定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自然多少还有些怀疑。他一面肯定新的对策已为蒋留有余地，一面却仍不时地表示担心，称“恐蒋不争气耳”，相信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但新方针既然确定，各种情报也证明“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之决心”，毛泽东也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内战之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2]

注意到蒋介石对有关八路军调动的谣传十分恐慌，毛泽东开始大打心理战，要求各地放出消息，“如彼方大举进攻新四军时，八路军决难坐视，以恐吓之”，称“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与此同时，他要求各地不得擅自开衅。刘少奇来电，说明国民党两师进攻皖东新四军，新四军决心报复，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毛泽东明令目前只能准备，不能动手。彭德怀来电提议调派主力援助华中新四军，先发制人，毛同样复电说明：“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华北各部暂不调动。[3]

11 月 15 日，为劝阻党内军内急于转入攻势的强烈要求，毛亲拟电文指示各地，全面解释蒋介石目前进攻还有种种困难，与日本人也没有真正讲好条件，“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4]。

但 15 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的答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公开发表后，毛泽东得到各方面的反映，判断“大局有变动可能”，形势估

---

[1]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7 日）。

[2]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电》（1940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恩来电》（1940 年 11 月 6 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7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80—81、40—43 页。

[3] 《毛泽东关于在华中决采取自卫的措施致彭德怀电》（1940 年 11 月 14 日）。

[4] 《中央关于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给各分局的指示》（1940 年 11 月 15 日）。

计上又显得多少有些过于乐观了。

21日，他开始断言：“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而我们是不吃这一套的，即使皖南“一点点让步”，我“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如果他敢叫胡宗南在边区挑衅，“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一块地方”，“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1]

据此，毛指示叶挺、项英：皖南新四军北移“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并批准了苏北新四军部发起曹甸战役，即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凤谷村、车桥、平桥、阳念、黄浦、安丰等地的局部战斗计划，以打通皖东与苏北的联系。[2]

24日，日军开始向鄂西、鄂北发动进攻。30日，日本同盟社消息，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反其道行之，宣布将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政府随后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的巨额贷款。甚至斯大林这时也宣布将进一步支持中国抗战。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关于蒋介石投降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快得出结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无办法”，“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他确信：“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3]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甚至明确承认，过去一段对英美的政策是不妥当的。

---

[1] 《毛泽东关于打破蒋介石诡计致胡服、德怀电》（1940年11月21日）。

[2] 毛泽东估计：“苏北动作不碍大局”，认为“顾、韩会要叫几声的”，皖南新四军被问到“敷衍一下就完了”，至少“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见《皖南事变》，第105页。

[3] 《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

这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苏联大使就特别告诫说，从目前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看，新四军不退出华中蒋是不会罢手的。冯玉祥也特别提醒中共说，蒋对苏北问题十分恼火，蒋惹急了是会撕破脸皮乱打的。对此，毛都表示不可信。他告诉周恩来说：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1]。

毫无疑问，毛泽东没有估计到这个时候在国民党方面最为敏感的苏北方面再度主动发起作战可能带来的后果。曹甸战役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向蒋提议，原定皖南新四军经苏南转苏北的北移路线应废止，“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2]。蒋随即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剿灭黄河以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9日下达手令限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12月31日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此举显示，蒋已忍无可忍，决心要实施肃清江南乃至黄河以南新四军的作战部署了。

显然，毛泽东低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这时与共产党争夺华中地区的决心，对皖南部队所处的危险形势这时也还有些估计不足。毛泽东确信，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的强调反投降了”。“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他反复讲：“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大吹小打而已。”[3]

眼见最后期限将至，12月26日，蒋介石再度约见了周恩来。他话里有话地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

---

[1] 《毛泽东关于对蒋策略致恩来电》（1940年12月4日）。

[2] 同前引《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

[3] 《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中各派系情况致恩来电》（1940年12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111—112页。

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周恩来已经听出蒋介石的某些话外音，估计蒋是“半打半拖”，打的可能仍然存在。考虑到这时的敌我态势，他相信，最危险的是皖南，顾祝同固然未必有先动手之意，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恐均有此意。其目的在企图消灭我新四军一部，以逼我北上”。当然，他也认为：“整个破裂尚不至于。”[1]

蒋介石真的会对皖南下手吗？一直怀疑国民党会把局部进攻重点放在华中的毛泽东，这时多少还有些怀疑。直到 12 月 31 日，他还估计：“蒋及国民党虽然气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不过，他还是接连去电提醒项英：“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由于实在无法确定蒋介石究竟打算怎么做，他甚至干脆表示：“他们要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

七、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与莫斯科政策分歧，双方关系起变化

项英不是没有估计到新四军军部北移“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他所以选择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南下茂林，然后兜一个大圈子去苏北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北上的道路或者被国民党拒绝了（走苏南转苏北），或者是军事上风险太大（直接由云岭北上渡江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皖北桂系地盘），不得不下决心先南下再东进，绕过横阻在其东去苏南路上的国民党两个正规师，乘其不备，转进苏南，再渡苏北。结果，这支部队正好闯

[1]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 年 12 月 26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121—122 页。

人按照蒋令正在南面陆续集结起来，准备期限一到即压向云岭，逼迫新四军军部渡江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部署的封锁线。这支近万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损失了七八千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再也没有比这种打击来得更沉重的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蒋介石国民党动辄就要动武的本性，甚至不是没有预见到这种可能到来的反共战争，他甚至也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因此，他显然认为他是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相信了共产国际！由于太过于听信共产国际，如今蒋介石的进攻已经开始，共产党却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他为此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刚刚上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1]

同前此的情况一样，毛泽东绝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进攻刚一发生，他立刻就做出反应：应当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1941 年 1 月 14 日，国民党在皖南的军事行动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 17 日发布了一道取缔新四军的命令。毛泽东当即指出：蒋介石"有与我党破裂决心"，蒋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其"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2]

进而，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毛泽东认定："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因此，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他明确告诫全党：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3]

---

[1] 《毛泽东关于将皖南事变告崔可夫并征询意见致周、叶电》(1941 年 1 月 15 日)，前引《皖南事变》，第 147 页。

[2] 《毛、朱、王关于我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 年 1 月 19 日)。

[3]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 年 1 月 20 日)。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这时也急忙出面，一面向蒋表明不满的态度，一面则劝告中共中央不要采取破裂步骤。对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这些苏联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1]

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人们显然注意到军事上大举反攻目前未必适宜。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他指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轻率采取，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他因此对莫斯科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做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2]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3]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莫斯科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旧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它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1]《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董、叶电》(1941年1月23日)。
[2]《毛、朱、王关于我军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
[3]《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5日)。

毛泽东告诉叶剑英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因此，毛泽东这时强烈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连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1]

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服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反复来电要求毛泽东考虑日蒋矛盾问题。终于，在蒋介石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发现蒋介石其实并没有勾结日本准备投降的企图，他的怒气也逐渐地平息了一些。他开始强调：“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而根本上的问题在于，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必须“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这里所说的国际条件，仍旧是指苏联。因此，他仍旧希望莫斯科能够明白：“蒋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2]

自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之后，同已经被定义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集团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中共中央一种必然的选择了。至于何时明白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它，其实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时机似乎出现了。

1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由开始

[1] 《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2] 同上引注，并见《毛泽东关于处理两党关系必须坚持十二条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1]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由于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别是由于事实证明蒋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合作的政策，但是，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是抗战中的共产党迈向它的1949年的关键性步骤。

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之大，是显而易见的。1941年2月6日，季米特洛夫特别就此致信斯大林，断言：从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相信同国民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正在不假思索地走向分裂。在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称：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分裂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应当坚持分裂的方针。恰恰相反，您应当依靠抗日统一战线的广大群众，共产党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分裂与内战。请您清楚地考虑局势，重新研究您现在的立场，并通知我们您的意

[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

见和建议。[1]

事实上，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再度调整了自己的对策。但无论如何，由于各自关心的利益有所不同，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已经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分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近乎公开的意见分歧乃至政策冲突，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迅速改变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必要性。毛泽东与莫斯科、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了。

[1] 见 RCPSMH，495/74/317/75。

第五章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匪夷所思：毛泽东不敢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宣传部只把毛泽东的著作当作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文件？毛泽东批评延安宣传教育工作的讲话措辞尖刻、态度激烈，张闻天坐卧不安；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引火烧身；毛泽东由王实味想到张实味、李实味，思想清洗走向组织清洗，毛泽东发现“特务如麻，到处皆有”；共产国际突然解散，王明问题上纲上线；毛泽东断言：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1940年秋冬，因为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十五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被歼，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如果说过去双方之间的历次冲突，都是莫斯科立于主动地位的话，那么，这一次它就不能不处于下风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而且因为这个党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必须要依靠莫斯科的援助才能生存和发展的小组织。它有着相当庞大的组织系统，有几乎独立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得到极为广泛的敌后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也就具有了足以支撑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有这样的党做基础，再加上毛泽东的强烈个性和勃勃雄心，他自然不会听任莫斯科的摆布。由于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中共党内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经留学苏联，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莫斯科完全有可能通过组织的手段，颠覆毛泽东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由此而发生的。

一、毛泽东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

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

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那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全军覆没？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依据这一观点于事变后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明确肯定，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项英“对统一战线的了解，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1]

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还在1月15日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讲过，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他情绪激动地讲这句话时不知是不是话里有话，但在座的王明听着肯定不会顺耳。

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刚刚得知自己被共产国际确定为党的领袖，他就已经在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了。而所谓“具体化”，就是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

[1]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1] 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擅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顾虑不是多余的。自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大批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来了。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而让毛泽东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当中留苏学生不占多数，但对于一个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生命的党来说，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苏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1944 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2]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对于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王明等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确实有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势，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这时已经有了一些理论成就的党的领袖，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可能不去涉足他们的“专业领地”。

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国门也没有跨出去过，这显然是一个弱点。正因为如此，当大批留苏学生开始在江西苏区指手画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痛感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了。这也就是他自觉必须“恶补”的原因。所谓“恶补”，就是后来人们所看到并经常提到的，在江西时的他已是“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3]

问题是，发愤读书，乃至发愤写书，也并不能让那些留苏学生从内心里改变唯书唯上的思考习惯。这里讲的“书”指的是俄国版的理论著作，“上”指的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至于毛泽东的书和毛泽东的指示，是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 522—523 页。

[2] 见《康生在中央党校的报告》（1944 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油印本。

[3] 参见《毛泽东致中央信》（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27 页；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 1 辑。

不在其中的。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并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已蔚然成风。皖南事变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1] 这自然是有所指的。

在这个时候的延安，谁会“言必称希腊”？什么人会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希腊”，无疑是指苏联；而能够成为对党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的，自然也只有来自莫斯科的人。反对引经据典，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留过学，又忙于革命工作，读马列的书大大少于那些留苏学生，而且也是因为他土生土长，从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一贯重实践轻教条。特别是发愤读书几年之后，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他与留苏学生之间围绕着马列书本知识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一个读书多少的问题。书读多了，不见得有用。博古的马列著作肯定读得比他多，犯错误不是更多？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能依照中国革命的利益和需要来考虑问题，一味地照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去做。皖南事变前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形势估计及统战策略问题上所发生的意见

[1]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797—802 页。

分歧，其实也就包含着要不要一切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利益着想的问题。外国人如此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部一些人也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而是“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当然，类似的问题，毛泽东不是第一天看出来的。问题是，在与共产国际关系还相当好的时候，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还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动莫斯科胡思乱想。而皖南事变之后，在与莫斯科发生明显争执以后，考虑到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中国党已经相当壮大的现实，依照毛泽东的性格，继续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 5 月 14 日给周恩来的一封批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电报，很能够反映出他这时的心态。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要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崔可夫“不要随便乱说”。毛同时告诫周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1]

几天后，即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2] 很明显,毛泽东这时已经是有感而发了。

二、毛泽东“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确定

这个时候，有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发生苏德战争，毛泽东会不会发动消除那些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钦差大臣”的影

[1] 《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 年 5 月 14 日）。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响的运动？无论如何，就在毛泽东还在担心是否存在莫斯科干预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危险性的时候,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准备不足，苏联的形势一时间变得十分严峻。自顾尚且不暇，它又怎么会有多余的精力再来干预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呢？这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苏德战争刚好爆发于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一个月后。战争刚刚爆发，苏军情报机关就侦察到在华日军有向外蒙古边界集结的迹象。由于德日是结盟关系，莫斯科急忙致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对此，与过去历届中共领导人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给予格外的重视。他考虑问题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而这时八路军刚刚发动过一个所谓的“百团大战”，伤亡超过两万人，不仅在军事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而且因为暴露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引来了华北日军的大规模报复作战，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都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毛泽东明确告诉莫斯科：我军之配合只能限于情报和破路两个方面，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1]

在以往苏联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以“保卫苏联”，甚至是“武装保卫苏联”为号召。如今，当社会主义苏联真的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当苏联真的需要中共“武装保卫”的时候，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让俄国人愕然的反应。他们显然感到不可思议。[2]

毛泽东敢于这样答复莫斯科的要求，清楚地反映出他此时对掌控党内局势已然成竹在胸。利用苏联自顾不暇的机会，毛泽东下决心要把共产党变个样了。他的目标，就是要改造那些习惯于口含天宪,按照他的说法是“四

---

[1] 《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 年 7 月 15 日)，并见 RPSDMH，495/74/317。

[2] 参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31、38 页。

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唬人的领导人，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心理。[1] 至于改造的方法，就是拿事实说话，以江西苏区从成功到失败的事实为例，来证明谁对谁错，从而彻底扭转党内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传统和习惯。

江西挨整的经历，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江西的红军和根据地是自己和大批地方干部千辛万苦地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除了大部分原来的领导人；再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左”政策，又把红军和根据地弄得精光。经过长征之后，红军在陕甘立足未稳，毛泽东就在 1936 年 9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二十四个领导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2]

那个时候，刚刚开过遵义会议不久，博古已经下马，多数领导人都存有一种不愿再落井下石的心理，因此，当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毛泽东也无法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但毛泽东在内心深处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皖南事变之前，他又再度开始试图提出总结和清算博古等人在江西时期所犯错误的问题。为此，他在 1940 年下半年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江西时期的问题。这得到了包括王明在内的多数政治局领导人的响应。因此，博古 11 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王明很快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

---

[1] 参见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62 页。

[2]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6 年 9 月 15—16 日）。

不愿意坦率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这促使博古不能不正视自己过去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显然都同意就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和讨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代。1940 年 12 月 4 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1]

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后，博古坦然表示愿意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够作出检讨。与会者几乎也都一致赞同毛的说法，并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当然，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同为留苏学生，并且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就表示说：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知，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问题，仅仅批评一个博古显然是不够的。

经过皖南事变之后，即 1941 年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矛头转向了张闻天。他不止一次地批评了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5 月 19 日他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的公开讲演，尖刻批评当前延安的宣传和教育“理论和实际分离”，“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2] 其矛头所向，显而易见。以致博古听了讲演之后，心理压力都减轻了许多。因为遵义会议之后，教条主义这顶帽子通常都是戴在他的头上的。他听得很清楚，毛泽东的批评矛头是冲着张闻天去的，至少也是对着多数留苏学生出身的领导干部的。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0—192 页。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措辞尖刻，态度激烈，不可避免地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了震动。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1] 因此，不难想象张闻天听了报告之后，会如何坐卧不安。本来，江西时期"左"倾错误应该由博古负责，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应该由王明负责，毛泽东应该去批评他们，想不到毛却转而公开把矛头指向了他。而他却一直自认为在反对博古和王明的问题上，他一直都是支持毛的。为此，熟悉苏联党内斗争历史的张闻天自然相当紧张，且颇不理解。他几度私下里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有些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了。经过其他人的劝说后，张闻天才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

第一次谈话时，事先没有约好，毛泽东对张闻天当面交换意见看来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他对张的态度很温和，只是做些具体的解释说明，几乎没有对张进行批评。但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等就张闻天的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同。然后，他约好这几位领导人一同找到张闻天谈话。这一次，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在政治上不能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态度摇摆的情况，进而严厉批评张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极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这次的批评依旧相当尖锐，但他能够出以信任的态度，把自己的意见当面讲清楚，这毕竟让一直感到委屈的张闻天吃了一颗定心丸。除了对毛泽东所说的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稍加辩解以外，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的批评。事后，张在行动上也确有改进。这种情况显然也使毛泽东对根本上"打通"党内这几位"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领导人的思想，开始有了相当的信心。

---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92 页。

三、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7月1日，鉴于即将展开党内斗争，为避免受到触及的干部互相串联，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1]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根据毛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为名，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2]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系统考察江西时期错误路线的根源，开始收集中共“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从已经搜集到的大批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文件中，他更加认定这批留苏学生的错误是有系统的，是盲目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既有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有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据此，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于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

[1]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44页。
[2]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同上引注，第176页。

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议，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1]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一定要补课。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年到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2]

唯一让人有点儿不可理解的是王明。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犯有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竟无动于衷。相反，他自信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沾边儿，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在六中全会上也承认，他对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毛提到的抗战初期的所谓“右倾”，他自信也与他无涉。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因此，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当天只做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自我批评。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

[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326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194页。

[2]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5—196页。

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 1939 年后开始实际问题的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1]

这次会议从 10 日起接连开了三天，直到 12 日告一段落。本来，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讨论内容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毛的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会后，毛泽东准备在延安召开一个全党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并人人表态讲话，在全党造成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空气，从而使党的领导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就足以扭转党内的空气了。[2] 因此，与会者大都主动地检讨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但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以及所犯错误的经过很少具体涉及。毛泽东也并未因此提出进一步的检讨计划。

想不到，因为没有人把矛头指向王明，王明自我感觉太好了，9 月 12 日这天，他忽然一时兴起，揭发批判起他自己的那些同学来了。

他在这天下午发言时，先是批评李维汉，说李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然后义正词严地批评起博古、张闻天等人来了。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主席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主席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主席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

---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99 页。
[2] 同上引注，第 194 页。

王明要揭穿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据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当年，即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1]

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本来就对江西时期被夺权、冷落，并被影射批判的遭遇耿耿于怀，如今得知博古这些年轻学生当年所以凌驾于自己之上，竟是假传圣旨的结果，其内心之感触更是可想而知。而王明本来就是留苏学生的领袖人物，其在莫斯科又有特殊身份，回国后明明对国民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却拒不认错，如今反而摇身一变，俨然也成了正确路线的化身，这种结果显然也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2]。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

四、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1941年9月29日，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均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但多数发言者显然对王明前此的表现颇多不满，开始拉王明下水。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

[1] 参见RCPSMH，495/74/333。

[2] 《毛泽东年谱》（中），第329页。

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国际和中央驻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就连当时同在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1]

在9月会议召开前，确实看不出毛泽东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至少毛还没有在政治上搞臭谁的想法。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边区工作，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每周开会两次。[2] 这些都反映出毛当时对王明尚无打击排斥的倾向。包括对张闻天和博古，毛泽东的态度也很明白。那就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像8月27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责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的办法，彻底打破目前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3]，也显示出他这时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尚无惩罚个人的想法。

王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因此一直小心翼翼，甚至在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

---

[1] RCPSMH，495/74/333.

[2] 《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3] 《毛泽东年谱》（中），第324页。

就相当机灵地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带头公开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1] 在张闻天受到批评，博古也面临冲击之时，他却被指派接替毛泽东最信任的任弼时，负责地位重要的西北中央局和整个边区的工作，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王明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王在12日会议上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的信任。然而众怒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了。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最主要的张闻天和博古等人都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唯一没有认错的就剩下王明了。眼看大家已经把矛头转向了他，毛泽东也期待着王明能够有所表现。

9月中旬至10月初，毛泽东两度找王明谈话。第一次谈话是王明自己9月12日的发言引起的，毛泽东很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

第二次谈话是在9月29日会议之后，毛泽东约了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并具体提到了王明当时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王明当时拒绝发表毛《论持久战》的问题；王明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关系问题。[2] 虽然毛泽东两次谈话的态度仍是商量的，但过去在莫斯科整惯了人的王明却神经高度紧张，深感毛的态度已经改变，谈话的背后定有文章。和博古、张闻天不同的是，由于王明在莫斯科有过显赫的经历，又有很强的政治欲望，故其内心无论如何不愿向毛认错。

还在9月会议之前，王明就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是那种睚

[1] 王明：《学习毛泽东》（1940年5月4日），《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1940年7月5日）。

[2] 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第4期。

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泽东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和他算总账了。恰在这时，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十五个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在电报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它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得知这封电报之后，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悉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按捺不住地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断言，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1]

据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毛泽东原本就是为了彻底改变党内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习惯，和防止莫斯科利用留苏学生在组织上进行夺权，才发动这一次党史大讨论的。如今王明竟逆向而动，借机发难，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为震怒。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在次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向王明摊了牌。他一上来就介绍了头天晚上与王明谈话的情况，并要王明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王明自知情况不妙，但为了争取与会者的支持，还是明确地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

---

[1] 参见《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90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0页。

必要，而且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它也反对日本，即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与他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毕竟，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能够执行统战政策的，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而我们现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得过分了，对地主的政策搞得太“左”了，并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还把中国革命的民族革命任务，即把反帝任务与反封建任务相提并论，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只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无疑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要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即对国共关系没有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军事战略上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形势估计上过于乐观和组织上常用个人名义发带指示性的电报给中央与前总等问题，他则辩解称：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他特别强调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他看不出他的路线哪里错了；如果有错，也只是个别问题上有缺点错误罢了。如他确有对国民党强调斗争性不够的地方，但在武汉工作中他不仅坚持了独立性，而且进行了很多斗争；如他对片面强调游击战是有看法，但部分军事领导人反对洛川会议的精神与他并无关系；如对《论持久战》中的个别观点他确有不同意见，但并不是他不让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至于在武汉时期确有许多事情未向中央请示，但具体原因很复杂，多数与他无关，他主观上并没闹独立的想法，多半是因为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惯了，客观上使长江局形成了半独立的局面。[1]

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因此王明的发言很有点破釜沉舟，

---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0—202页。

背水一战的架势。但王明没有想到，这回不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斯大林，都帮不了他的忙了。

五、任弼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病不起

王明的说法当即就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期间，不时有人插话。他发言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当场转述的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王明的谈话，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之外，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懵了。

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

毛泽东显然已经和书记处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与会者众口一词地批评王明，反而使毛自己的心态变得相当平和了。他当然知道对王明问题的处理，乃至于批评的程度，都涉及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不能草率从事，因而，他只简单地说明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强调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等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他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目前双方

分歧的症结就在于："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主张，鉴于王明所提出的问题涉及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目前不能不迅速改变此前的计划，暂时停止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的讨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1]

以王明过去违心地颂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如今转而指责毛的新民主主义太"左"的情况来看，可以了解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之所以会在整个形势一边倒的情况下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反过来批评毛泽东，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错估了形势。当他意外地得知莫斯科的意见在党的领导人当中已经没有权威性，且共产国际领导人还在背后对他有如此多的批评之后，发现自己既得罪了毛，又不能取悦于莫斯科，不免内心变得异常紧张，并深受刺激。惶惶不安了一天之后，他终于因过于紧张使心脏承受不住而突发休克病倒了，原定 12 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因此也只好被迫延期。

13 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已经没有了 8 日会议上的那股勇气了。他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 8 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故拐弯抹角

---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00—202 页。

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1]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的情况，同时由毛泽东宣布停止关于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错误的日程安排，并对前一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问题作一小结。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他再度强调，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中国问题的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务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2]

本来，为了准备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辩论，毛泽东在会前专门准备了讲话大纲，逐项批驳王明的错误。王明的缺席与示弱，使他不必再为王明的反抗而费心，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此前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长约两万字。它在肯定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明确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

[1] 参见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2]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2—223页。

误路线。这条路线的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太少，“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条路线的组织特点则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 1931 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的选举，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且故意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表现在 1933 年临时中央迁住苏区后，打击一切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实行“钦差大臣制度”；表现在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其所作所为，是过去任何路线错误时期所从未见过的。鉴于政治局多数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准备速战速决，于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结束有关苏维埃后期历史问题的讨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 10 月 22 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结尾处，当时曾特别注明“1941 年 11 月 ×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1]

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的问题及反抗虽有诸多不满，但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仍相当顾及与莫斯科的关系，故抱与人为善之心，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问题只提到个别的原则性错误的高度，对其在苏维埃后期的表现只提出反立三路线不够彻底。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这显示毛泽东这时已不感觉王明对他的领导地位存在任何威胁，仍准备王明病好之后重回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没有借机上纲上线把王明搞臭的想法。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24—231 页。

六、先放后收，整风运动变成组织清理，思想问题成敌我嫌疑

11月1日，毛泽东指示各地高级学习组着重学习理论材料，共开出一部《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一部《季米特洛夫文选》、一部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哲学著作、三篇与学习《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有关的苏共决议和文章，强调先从理论学起，包括要研究思想方法论。[1]在反对唯书唯上、反对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同时，却又提倡仍要以来自莫斯科的文章和著作作为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这既反映出毛泽东仍在小心翼翼地维持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反映出他并非不承认列宁、斯大林以及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在方法论方面更具权威性。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前段讨论党史问题的基础上，使党的高级干部认识到自己过去思想方法上所存在的错误，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是在王明等人手里，而是在那些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党人手里。因此，12日，毛泽东在再发有关学习内容的指示时，其侧重点已经开始变化，决定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要求理论材料只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的报告与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他着重于通读“六大”以来的八十三个文件，准备明春对“六大”以来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2]

12月中旬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决定要着重研究中共党史，强调各地应“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3]。但差不多在整个1942年，毛泽东都没有决定把整个斗争矛头指向王明。他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曾有一封电报，明确表示他仍然保持1941年10月会议期间的观点。他当时写道：“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

---

[1] 《毛泽东、王稼祥致各地高级学习组副组长电》(1941年11月1日)。
[2] 《毛泽东、王稼祥致各地高级学习组副组长电》(1941年11月12日)。
[3] 《毛、王致恩来电》(1941年12月30日)。

中央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恩来）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1]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最需要清算的那段“左”倾错误，还应该从博古中央成立之日，即1931年“九一八”以后算起。

在1942年出现的一个重大事态，是毛泽东开始了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

年初，张闻天说，“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也为了实践自己在十月会议中表明的愿意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的决心，他主动申请率团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去了。中宣部长改由凯丰代理。于是，毛泽东对中宣部的工作重新加以部署，很快亲自起草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中心内容的《中宣部宣传要点》，宣称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这以后，他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坦率地说，整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进行，是挟战胜王明等头号教条主义代表之余勇，一鼓作气将中下级干部统统纳入其思想轨道的努力，目的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在他领导下造成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他反复讲：“这一次整顿三风的斗争，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为过去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结果弄到现在党内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

[1]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2月21日）。
[2] 《中宣部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

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看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搞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走，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不仅将来不会有光明的前途，搞不好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1]

可见，就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而言，毛泽东既不是针对已经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针对一般党员群众来的，他的基本目标是那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

毛泽东一向主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爱搞群众运动，原因就在于他相信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来监督各级干部，暴露问题。也正因为如此，1942年发动的这次整风，同十五年后他发动的另一次整风运动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开始的时候，他显然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结果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创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创办的《矢与的》了。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之类，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严重反感。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接替丁玲来主持《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这种“大鸣大放”的自下而上的斗争形式。他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他甚至委托自己的秘书胡乔木找王谈话，还托胡一再写信给王，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

[1] 《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1942年4月20日）。

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1] 这自然不能迅速刹住"大鸣大放"的势头。

在 4 月 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毛泽东的态度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并主张"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强调"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反对避开自己专攻别人，和"一切冷嘲热讽、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2] 很明显，毛泽东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4 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 5 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相反，他相信形势是好的，并试图缓和新老干部中正在白热化的矛盾，要求老干部注意爱护新干部。他为此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称，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

[1]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1 页。

[2]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364—366 页。

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作“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1]。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

不过，从5月份开始，毛泽东毕竟已经开始对王实味的问题用“坏”字来概括了。这反映出他对王实味问题的认识已在变化中。当然，影响到毛态度变化的背景还有两个因素。

其一是这时毛泽东深信苏联和中共都处于最困难时期，而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同时并举，搞垮中共，这使他对敌情估计渐趋严重。中共中央为此接连两度发出“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得已时不惜投鼠弃器的通知，同时全力部署破获“国特”，以绝内患。故5月初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的考虑。

其二是自5月以来，陆续得到消息说国民党的舆论对王实味及《轻骑队》等颇多呼应和与赞赏，这明显引起政治局领导人的普遍关注，并不断加以强调，表示不满。“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也自然也开始高度警觉起来。他开始把过去从积极方面来理解的许多言论，重新加以考察，并决心制止之。作为这种考虑的一种直接反映，就是决定将

---

[1]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

王实味的文章印发各单位讨论，不仅要组织反驳，而且要在各单位联系实际。这个决定毛泽东是在5月下旬做出的。尽管他这时还不认为王实味就是反革命，但在党内诸多高层干部憋了一肚子气和敌情反映严重的情况下，把目无领导、锋芒毕露的王实味现象打击一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了。

只是，把王实味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提供给干部群众去批驳，并且要求联系各单位的实际，不可避免地会在那些新干部跳得较高的单位造成反动，促使本来受到冲击的部分单位领导和老干部，转而组织中间群众向那些曾经激烈地进攻过他们的年轻干部算后账，上纲上线。再加上毛泽东这时还要求社会部、组织部和宣传部联系检查坏分子，把考察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了，这就使得事情更加趋于复杂和严重。

这个情况同1957年由整风而反右所出现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最初设定的延安整风的对象逐渐开始发生转移。他本来是想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中上层干部的问题，烧一烧这些人，达到打通思想、肃清这些人当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的目的。现在，虽然毛泽东仍旧继续强调：这次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1]，而事实上，运动却在明显地开始以下层党员干部群众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为对象了。

据这时被指定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全党“八十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这些同志们都是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但免不了带着颇长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尾巴，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也是不能容许的，如不改正，也将造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毒害”[2]。

---

[1] 《毛泽东致聂荣臻同志电》（1942年7月4日）。

[2] 陆定一：《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1942年5月23日），《陆定一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页。

有组织地批评王实味，并且把思想考察和组织考察结合起来，立即使自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之中的各级领导人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1]

对王实味的定性，实在是再容易没有了。受苏共的影响，“托派”在共产党人眼里，一直是最危险的敌人。王实味的问题由此得到了最简单的答案。就在延安文艺界通过决议后的第二天，即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

对王实味一时看走了眼，使毛泽东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更加绷紧了起来。言论＝立场＝敌我关系，王实味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使共产党人要把三者联系起来。整风以来，有许多人表现出对延安的不满，谁能保证其中没有张实味、李实味？毛泽东对此表现出格外的担心。他开始强调，那些一触即跳的不可怕，可怕是的那些表面服从而实际上不服从，“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着坏人。”据此，他明确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查，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2]

[1] 转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2]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388页。

七、共产国际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整风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统一；而思想统一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求得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统一。

抗战开始以后，党内军内的形势相当复杂，这不仅在于延安存在着像王明这样的领导人，而且在于根据地散布外地，各自为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山头”。中央不统一，下面更难统一；即使中央统一了，地方也未必就能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1942年8月起，中共中央就陆续制定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一步步提出了规范上下级关系和全党服从中央的具体模式，力图解决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的问题[1]。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提出目前的书记处办事方式不够精练，作为政治局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也应大大精简，并有权随时处置决定日常工作。[2]只是，在刘少奇到达延安以前，这个问题一时还不能提上日程。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辗转山东、晋北等根据地回到延安。刘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曾与任弼时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一年后即归国，以后一直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同毛泽东一样，刘也喜欢独立思考，常常与中央的意见不尽相同，因而直到六届四中全会才得以补选为中央委员。但刘少奇一度进入临时中央工作，至五中全会又入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仍旧不免屡屡被“左”倾中央批评为“右倾”。

---

[1] 《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6—436、465—467页。

[2] 《任弼时年谱》，第440页。

在遵义会议以后，刘少奇得以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后即被派往天津领导华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其独立思考的特点逐渐显露优势。尤其是抗战开始之后，刘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华北游击战争，与毛遥相呼应。调其主持华中局工作后，一度受到王明和项英影响的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备受毛泽东的欣赏。

到 1941 年九月会议时，刘少奇已俨然被党内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以外中共党内唯一的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力赞“刘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王稼祥也明确讲：过去中央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康生也都将刘与毛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如果临时中央由刘少奇负责，白区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此，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已经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会议结束不久，毛在起草《决议草案》时，也特别点了刘的名字，称赞其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 月份，毛泽东更两度电召刘来延安工作。[1] 只是因为刘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其暂留山东帮助解决，所以才耽搁下来。但毛泽东隔三差五不断去电询问行止，其关切之殷令人瞩目。

毛泽东对调刘少奇来中央之热心与关注，反映出他对根本解决党的正确路线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重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中共中央早已是一言九鼎。问题是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张闻天虽自觉退位，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始终尚无正式的手续和名分。况且原先书记处的七位书记，即毛、王、张、博、周、陈、康，一半以上不是在外，就是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这时实际负责或公认应当负责的刘少奇、任弼时等反倒不在其位。因此，既然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早已一致肯定毛泽东为最高领袖，刘少奇和任弼时事实上已受命掌管全局工作，借着建立一元化领导机构的机会，授予毛以正式的领袖名义，委刘、任以书记职务，自然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1]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1 年 10 月 3、11 日)。

在刘少奇回到延安两个月后，张闻天亦被召回中央，政治局很快进行了三次讨论，由任弼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案，刘少奇提议以毛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2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

>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
>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它的经常事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所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
>
>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
>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以毛为书记，王为副书记，负责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化委员会、出版局等宣传文化部门。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同志组成之，以刘为书记，负责管理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等组织及

政策部门。原先设立的各类党的部门，一律归口合并或撤销。[1]

3月20日的《决定》，使毛泽东名正言顺地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而以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得力副手，更分担了前两年时间里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毛泽东更有如虎添翼之感，觉得现在“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2]。

让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共中央刚刚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一切工作都感到得心应手之后，季米特洛夫竟发来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3]

几年来，毛泽东无疑是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电。据莫斯科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他还特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据说是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4]。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始终在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尽管中共在毛泽

---

[1]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44—346页。

[2] 《毛泽东年谱》（中），第426页。

[3]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5月21日）。

[4] RCPSMH，495/74/333.

东领导下已经日益长大成熟起来，经常违拗其意志，但作为其下级支部之一，中共中央仍旧无法摆脱其权威和复杂的亲缘隶属关系。不管俄国人这时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双方的关系经常使毛泽东倍感束缚与不快，甚至还不能不为自己搞坏与王明等人的关系而感到担心，应当是事实。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实可以看成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深为自己领导下的中共发展壮大而自豪的毛泽东，迅速流露出对莫斯科过去遥控指挥方式的不满。他公开宣称："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三次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远离各国革命斗争实际的共产国际，当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中共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大因素，照《解放日报》社论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1]。

八、毛泽东说，对错已经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既然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毛泽东再也用不着担心对王明的严厉批评会在莫斯科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了。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展开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了[2]。由此可见，毛泽东此前对王明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对莫斯科的顾虑有关。只不过，对王明批判的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王明自己破罐破摔、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王明是于 1941 年 10 月 13 日躺进中央医院的，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

[1]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28 日。
[2]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1956 年 9 月 29 日）。

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或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甚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表明自己对莫斯科忠心耿耿的态度，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到来。

比如，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所以就开始反对你，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如此等等。[1]

王明的两面手法，毛泽东初时尚不十分了解。但随着 1943 年初王明重新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串联的情况为毛所知后，不能不使他大为不满，从而逐渐认定王明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不把王明搞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

早在 1941 年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陆续对这九份文件写出过文字批判的笔记。只不过，在当时他的矛头还是指向博古的，情绪还较为平和。这时，毛泽东显然带着极大的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因而大大修改了原先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转而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头号罪人了。

这份修改过的笔记，第一篇就是评论王明起草的 1931 年 9 月 20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

[1] 参见《王明评传》，第 408—409 页；吴黎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模范》，《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2 页；等等。

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这时一改 1942 年上半年的估计，一上来就根本否定了六届四中全会，并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笔记写道：

>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
>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按照胡乔木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这个笔记是“嬉、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这时对王明的痛愤以及因这种痛愤的心情所导致的对王明等人当年所作所为的深恶痛绝：

>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
>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

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

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1]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烈的批判王明的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气以外，当然还有别的目的。他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在他发动批判王明问题上给予理解和支持。因此，他特地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任弼时去看。然后，毛泽东越来越激烈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王明。

首先，毛泽东因极端厌恶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再次强调必须把肃清“小广播”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重视。其次，针对共产国际来电坚持把国民党视为民族联盟，与王明的观点遥相呼应，毛泽东公开主张加强阶级教育，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由上而下地对全党进行对国民党本质认识的教育。[2] 据此，从 1943 年 7 月开始，他结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和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调集大军围迫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自抗战以来即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不正确的了解，犯了许多错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问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上来批判。他在 7 月 13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异常尖刻。他认定：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

---

[1]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此文写作时间，毛泽东后来回忆为 1940 年或 1941 年上半年，胡乔木判断应在 1941 年九月会议以后。鉴于毛只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才得知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产生的细节，而文中既提到九月会议，又提到临时中央产生的情况，可知胡的判断是对的。但从文章题目不包含对四中全会的批判，而毛直到 1943 年才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并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故可以判断此文从最初形成到最后改定有过一个过程。毛回忆他这个东西写定后，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而刘 1943 年初才回到延安，刘、任作为他的副手也是 1943 年的事情，故可以肯定目前看到的这篇文章应当是在 1943 年写成的。

[2] 《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1942 年 12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468—470 页。

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1]

毛泽东进而情绪激动地提出：谁对谁错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而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人坚持错误观点，还有人搞不清过去的历史，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些搞清楚，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弄清楚，对党外也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就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2]

九、中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王明问题政治化，除了共产国际不复存在和王明自己搞小动作以外，整风运动本身逐渐政治化，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整风运动发生在对敌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背景之下，毛泽东从1942年下半年就逐渐开始把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同阶级斗争、组织清洗联系起来了，从而使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延安的政治空气也渐趋紧张。胡乔木对整风运动的回忆明确讲过这种情况。他说，当时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很紧张，"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3]。在这种空气之下，毛泽东逐渐改变对王明的宽容态度，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为，随着1942年下半年提出思想清理与组织清洗相结合之后，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越来越严重。

---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7月13日）。

[2] 参见《毛泽东致德怀电》（1943年6月6日）；《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1943年8月5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284页。

[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

1942年6月，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的毛泽东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当时由康生领导的审查机关更是怀疑一切，甚至唯恐找出的坏人不够多。在这种情况下，由思想清理走到组织清洗不可避免，而“逼供信”之类的办法也很自然地被派上了用场。当真的逼迫一个叫张克勤的年轻人供出来一个所谓“红旗党”之后，找出一批所谓国民党特务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再加上苏联方面也有情报告诫中共内部确有奸细在帮助国民党，毛泽东对反革命“内奸”的担心自然更加严重。[1]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一边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整反革命。4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著名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决定》公开提出：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随后，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整风也由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转入急风暴雨的组织清党，即审查干部阶段了。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万人大会，传达贯彻《四三决定》，并以张克勤为现身说法，号召所有“失足分子”自动自首坦白。不出三个月，经过大会控诉，小会揭发，个别谈话，康生宣布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坦白”了他们是“国特”或“日特”。

随着“坦白”人数不断增加，进入到8月份时，毛泽东也不能不相信延安确实是“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了。总不能把这么多的干部统统清理掉吧，于是，审干一夜之间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当中，延安除了那些中央领导以外，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的热潮之中，光是一个两千五百人的中央党校，据毛泽东8

[1] 《鲍尔沙科夫致季米特洛夫》（1943年2月6日），RCPSMH，495/74/333；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5页。

[2] 《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

月 8 日报告称，就挖出来二百五十个特务，并且毛估计还不止这个数字，“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据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

这样一种紧张形势，这样一种严重估计，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迅速开始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王明的错误问题。据俄国人报告说，康生在一次相当规模的会议上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告说，延安存在着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中央不久就将讨论他们所犯的错误，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入到延安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苏联联络员已经注意到，康生提到的中央成员，多数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尽管“有些很慢，另一些很快”[2]。

从 9 月 7 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

从会议一开始，所有人的批判矛头一齐指向了王明。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六个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

[1]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43 年 8 月 8 日）。

[2] RCPSMH，495/74/333.

作为王明“宗派”的最主要领袖之一，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肯定一条是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并断言，这条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影响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的。

在毛泽东表明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创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见之后，一些发言者更是跟着上纲上线，说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也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1]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从重庆回来不久的周恩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从 11 月 27 日开始，中间 29 和 30 两天没讲，一直讲到 12 月 3 日，整整讲了五天时间。

11 月 29 日，鉴于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上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由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巩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只好让孟庆树代笔，表示全盘放弃自己过去提出的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他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2]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90—297 页；《毛泽东年谱》（中），第 469—470 页。

[2] 《王明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1943 年 12 月 1 日）。

王明这时尚不知道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当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形成正式决议之后，王一时颇难接受。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这时除了继续给王明路线上纲上线，痛加批判以外，还特别发表了集合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有关论述的专题文章，要求全党学习并遵循。中共中央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完全符合的”。

在这时的中共中央文件当中，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下面这段话，即“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当然，文件的核心未必在此。它明确指出：目前在一般干部中虽暂时不必传达上述指示，但应研究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这些指导原则，“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们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1]。

---

[1] 《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此前已经将博古与王明加以区分，这时为何又将二人相提并论，并强调“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均团结一致，尚不十分清楚。

1944 年 2 月 26 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时王明刚刚了解到中共中央的结论，他感到颇难理解。事后他写信给周恩来，对为什么要根本否定四中全会以及为什么把他算成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代表问题表示疑问。但这件事对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来说，已经不很重要了。因为不久之后，王明就已经明确表示，他对中共中央“对这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并且愿意“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用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为今天自已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1]

不管王明这时的态度是否真心，从 1943 年 7 月开始，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敬服。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以及 194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进一步一致高声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致拥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 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已经牢不可破，甚至接近于神圣化了。他再也不必担心来自党内的或莫斯科的任何挑战和威胁了。

十、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仍然受到普遍爱戴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这时一面把斗争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实际利益的代理人王明，不顾莫斯科愿意与否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

[1] 参见《王明评传》，第 408、419—420 页。此书关于周恩来与王明谈话时间误记为 1942 年 2 月 26 日，实际上周当时还在重庆，1943 年 7 月才返回延安。

[2] 参见 1943 年 7 月 6 日、7 月 8 日、7 月 13 日、7 月 16 日、8 月 3 日等日期《解放日报》所载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拥护毛泽东的重要文章。

一面仍旧继续表现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态度，极力在王明与共产国际之间寻找不同点，一切整风学习的理论材料和指导原则大部仍旧源自莫斯科。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的尊重态度，在周恩来的自我检查里尤其看得清楚。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的错误也受到批评，但周恩来仍旧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所谓“真假国际”，详细介绍每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莫斯科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把绝大多数错误都归结为个人行为。根据他的说法，共产国际所以在中国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关键在于那些曾经亲自指导过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包括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季米特洛夫等少数人以外，大部分都在苏共肃反运动中或在中国革命中被证明是“坏人”。而斯大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则是始终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如肯定中国党已经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政治因素，强调国民党的动向以帝国主义的态度为出发点，指出中共的任务在于武装人民、瓦解敌军、组织农民，反对危害边区和削弱八路军，揭露王明与米夫的关系不正常，批评王明有政治野心和不该反对毛主席，等等。他的这番讲话，就连对莫斯科内部的情况不甚了了的毛泽东听后也得出结论说：“列宁主义及国际无产阶级影响中国党的产生，但国际中的坏蛋也影响中国革命的失败。”[1]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也并非简单地是受了周恩来介绍的影响。即使他这时与莫斯科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利害冲突，与莫斯科翻脸，也非其所想。

应当看到的是，在与莫斯科的关系当中，毛泽东所反感的，其实主要是过去共产国际与中共那种父子党的关系。而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位典型的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

---

[1]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6页。

师生的关系。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之所以始终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奉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就是因为他深信，同马、恩、列、斯、季等比较起来，自己还只是学生，自己思想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正如张闻天在中共"七大"上公开宣讲的那样，无论中共领导人，还是毛本人，都不否认毛是马、恩、列、斯的学生，他们"不但不以此为耻辱，而且以此为光荣"[1]。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相信，共产国际的基本理论及其基本路线，仍旧是正确的。即使在他极其情绪化地批判王明、博古"左"倾路线期间的九份文件时，他也没有忘记要将真假国际路线相区别。他明白写道：

> "左"倾路线随时都把自己的路线冒称为国际路线，许多文件上都可见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说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没有错误，这是有过的，并且是严重的；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那个路线，就是反对先锋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冒险急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畏缩不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路线。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否认革命不平衡，又没有叫我们在华北建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帝国主义全体一致地进攻苏联，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国民经济总崩溃或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

[1]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2日)。

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与命令一切……又没有叫我们幼稚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Q，与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并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乎不可以不辩的。[1]

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时候的在与王明和莫斯科的较量中大获全胜的那个真实的毛泽东。他后来曾解释说，当时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2]。因为，我们不愿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引起不愉快。然而，如果从我们上面谈到的情况看，当时的情况，包括毛泽东本人当时的认识，大概都远比他后来的这种解释复杂得多。

下面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莫斯科的那种复杂心态。

1943年12月底，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减少对日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3]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那里看到了这封来电。他对来电显然不以为然，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

---

[1]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2]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

[3]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12月22日），RCPSMH，495/74/342。

电稿，要弗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直言不讳，称：

（一）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在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五十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二）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7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三）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四）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五）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弗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1]

这封电报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读到来自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时的心态和

---

[1] 《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RCPSMH，495/74/342。

他对季米特洛夫提到的各项问题的真实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他对康生和王明截然相反的态度。在他随后的谈话中尤其能够显示出他对康生的信任程度。他明确告诉弗拉基米洛夫，这封电报只能你知我知，包括康生他也不准备告诉。当弗拉基米洛夫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的说法。

不过，就在1月2日电报发出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急忙找到弗拉基米洛夫，有些不安地询问弗拉基米洛夫，那封回电是否发出去了。他告诉弗拉基米洛夫说，他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最担心会引起不满的显然是上封电报中他在国共关系和对王明态度问题上的说法。因此，他特别解释了他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他只是认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只有力的拳头，否则不足以威慑国民党进攻边区的企图。谈到党内王明的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没有再提到王明的“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4日晚，毛泽东特别宴请了在延安的军事领导人和苏联红军驻延安的联络小组成员，与会者全都十分热情地向苏方人员表示他们对苏联对德战争进展的关切和祝愿。晚宴后，大家都来到苏方联络小组的驻地，关切地问这问那。

5日，毛泽东再度找到弗拉基米洛夫，再度谈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问题。显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封电报以挽回1月2日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7日上午9点，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的窑洞，告诉弗拉基米洛夫说，他同意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所给予的关注。他当着弗拉基米洛夫的面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后者转给季米特洛夫。他在电报中说：

>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

> 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
>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
>
> 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
>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1]

在这之后，毛泽东确实在上述两方面做了适当的努力。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愿意重开与国民党的谈判。与此同时，他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做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2] 当然，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妥协的表示。他终其一生都相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

---

[1] 《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1944年1月7日)，RCPSMH，495 / 74/342。

[2] 《毛泽东年谱》(中)，第493、496页。

第六章

毛泽东想做亚洲的铁托？

毛泽东对斯诺无话不谈，对俄国人却很少信任，他真的喜欢美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毛泽东担心美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苏美意外结成盟国，毛泽东不再说美国是帝国主义;理直气壮地与蒋介石争夺美援，想不到半路杀出一个赫尔利；毛泽东想去华盛顿让罗斯福评理……

很少有人不知道毛泽东曾经被人称为“亚洲的铁托”。最早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的，大概是俄国人。1948年6月，以苏联为首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已经走上反苏联的道路。在此之后到莫斯科和到东欧去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俄国人在把毛泽东与铁托相提并论，并且亲耳听说过所谓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的说法。[1] 1949年4月，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公开发表《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一文，更是给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怀疑毛泽东的口实。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把毛泽东比作铁托，并断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2]。但毛泽东真的想做铁托吗？

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毛泽东的确曾经想到过要学铁托，但那不过是在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之前的事情。当他了解到苏南冲突的情况后，他也就再也没有过想做“亚洲铁托”的想法了。

一、毛泽东与斯诺一见如故，却很少对俄国同志表现热情

注意到毛泽东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毛泽东好像很少有俄国朋友，但却比较喜欢结交美国人。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最早深入到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来的，是俄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最多的，也是俄国人。但是，从早期前来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维经斯基，到背靠苏联与中共直接参与策划了几乎整个国民革命进程的俄国顾问鲍罗廷；从打着商人名义藏在上海租界里暗中扶助中共和红军的大批共产国际代表，到住在延安与毛泽东往来甚多的苏方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

[1] 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年7月）。
[2] 埃德加·斯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油印本），1949年。

从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来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到毛泽东亲自邀请来帮助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自己的选集，随后又当了几年驻华大使的尤金，他们中有哪一个成了毛泽东，或者是其他当政的中共领导人——当然不包括王明之类的留苏学生——的私交好友？包括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内，尽管毛泽东很长时间都公开表示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事实上毛与他们之间始终也没有建立起真正信任的关系。结果，不要说中苏交恶之后在俄国出版的诸如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那些满是怨言的亲历记[1]，就是在中俄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之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所有中国方面回忆或者描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这些俄国人关系的文章书籍，也仍旧很少能看到他们对俄国人表示好感的内容。[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他们对美国人的态度。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才到陕北苏区，他是第一个直接接触到中共领导人的美国人。他描述这头一次的经历颇有戏剧性：

> 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在斯诺抱歉地摇摇头之后，“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抑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他，

[1] 比较著名的有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李德的《中国纪事》、潘友新的《中国回忆录》以及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

[2]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3页。

这个大名鼎鼎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得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给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斯诺的这段描述，生动地再现了中共领导人对这位美国记者一见如故的情景。没有人见过这个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美国人，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只是得到报告说，这个美国记者可以信任并会如实报道。[1] 除此之外，他们对这个美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是，斯诺很快就成功地取得了当时在陕北的几乎所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的信任。毛泽东本人尤其重视和信任斯诺。他花了差不多二十多个晚上（毛习惯于晚上工作）来向这位美国记者介绍他的党和他的军队，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其生平中唯一一份详尽的自述，也是这时讲给这位美国人听的。[2] 当这位美国人将要离开陕北时，他更是关心备至，一连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询问接运斯诺的车辆安排。斯诺去后五个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捎信的机会，他即去信表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3] 可见，毛泽东已经把斯诺当成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随后在1939、1960、1965、1970年，毛泽东又四次与斯诺长谈，差不多每次都是在他最需要向外界说明自己政策意图的时候，把这位他最信得过的美国记者招来，通过谈话的方式把消息发出去，

[1] 前引《西行漫记》，第42页。

[2] 同上引书，第103—157页。

[3] 已知1936年9月29日李克农致电中共派驻西安的联络员刘鼎，告知美记者斯诺要回西安事，请立即派车往接。随后，自10月初起，毛4、5、7、10、11日连续数日亲电刘称，斯诺急须出来，望来车接，并催问车辆安排。另，1937年3月10日，毛亲函斯诺称：“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见埃德加·斯诺著，奚博全译：《红色中华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299页。

其中甚至包括他想与美国缓和关系这样重大的外交信息。因此,有人评价说,斯诺是毛泽东唯一能够向之敞开心扉的外国人。

除了斯诺之外,曾经得到过毛泽东某种信任的外国人,至少还有两三位,他们都是美国人。比如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一个早就受到莫斯科非议的人物,毛泽东对她却有不错的印象。他关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述,就是通过与她的谈话公布出来的。她还第一个写书宣传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1948 年,毛泽东甚至通过秘书邀请斯特朗经苏联去解放区帮助他编辑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想不到苏联人得知后,竟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将其扣押并驱逐出境,不允许斯特朗到中国来。[1] 而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让斯特朗到中国来了,并且欢迎她到中国定居。

与斯特朗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另一位记者,那就是史沫特莱。当她第一次到陕北来的时候,莫斯科就专门提醒过中共中央,宣称她有破坏嫌疑,要中共中央将其扣留,直到没有危险再放她出来。但毛泽东显然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要求行事,史沫特莱进入苏区不足两月就出来了。毛泽东很热心地接待了她,并通过与她的长篇谈话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2] 不仅如此,红军总司令朱德还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像毛泽东一样,朱德向史沫特莱讲述了他曲折的经历,史沫特莱据此写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3]。在中共著名领袖当中,只有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曾经向外界详细地讲述过他们自己的生平事迹。而他们讲述的对象,又都是美国人。

另外还可以提到的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前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除了斯诺以外,谢伟思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与毛泽东谈话最多的另一位美国人了。他

---

[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毛泽东主席的信》(1949 年 11 月 5 日)。

[2]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479—492 页。

[3]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所记述下来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有六次之多。从一些内部谈话看，毛泽东对这个谢伟思不仅比较重视，而且也颇有好感。

二、基于阶级理念，中共中央再度放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思想

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一贯强调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却不能同具有同样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苏联人建立真正的友谊，反而与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立场肯定也不同的美国人推心置腹，这有点儿匪夷所思。于是，有人怀疑，毛泽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本质上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确，任何人要是像毛泽东这样在某些美国人与苏联人之间厚此薄彼，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人视为具有某种亲美倾向。但是，这似乎不能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

首先，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毛泽东同这些美国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时间。不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斯特朗、谢伟思，毛泽东同他们发生关系的年代，都是在抗日战争前后那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而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广泛宣传和介绍他们自己，最重视和强调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换了另外任何一个时期，毛泽东是否能够同这些美国人推心置腹，都是大可怀疑的。曾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生活过的中国人都能记得，那时候，不要说有一个美国朋友，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点“海外关系”，几乎都是罪过。同样的情况，在阶级斗争盛行的苏维埃时代，也就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番五次地“查阶级”，并且把一切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敌人的 1930 年代前半期，即使毛泽东还是中央政府主席，他要想像后来那样接待斯诺，并同这位美国人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恐怕也难以想象。

其次，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人、看事的，他比较容易与斯诺这些美国人交往，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性有关，但这并不违反他的阶级理念。也就是说，他亲近普通的美国人，并不等于他喜欢资本主义的、更不要说是帝国主义的美国。正像他晚年常常提到的“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一样，那是把美国政府排除在外的。

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某些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厚此薄彼，丝毫不影响他亲苏反美态度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系列言论。

从1936年起，毛泽东就是公开主张美、苏、中联合反对日本的。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即斯大林断定这场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同为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毛泽东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本来，法西斯德、意、日早已结成军事同盟，处在日本入侵之下的中国理应与对德、意宣战的英、法等国相互联合，而毛泽东却马上毫不犹豫地跟着斯大林的步调，也放弃了刚刚实行了不过两三年的联合美、英等国反对日本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公开宣布说：交战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并且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今后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1]。他对美国的态度自然也根本改变。他再不提美、苏、中联合的问题了，甚至就是在这时对斯诺的谈话中，他也毫不掩饰地把美国视同帝国主义。[2]

毛泽东这个时候之不信任，甚至敌视美国，突出地表现在1940年10月25日的一封电报当中。他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深知美国有能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因而对美国的威胁表现得格外担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这时甚至已经预见到了五年后的情景。他认为，即使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抵抗，投降日本，也不如美国参战，打败日本更可怕。他在电报中写道："最黑暗的情况还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险就加大了，大多数中间不[派？]跟蒋介石跑的危险也更大了。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

[1]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提纲》，延安：解放社1939年单行本，第21页。
[2] 《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与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6日），《毛泽东自述》，第150页。

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1] 显而易见，抗日战争结束后，按照中共的观点，中国不正是变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情况了吗？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自然对毛泽东的形势估计有所影响。但把美国的威胁看得如此严重，却与莫斯科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苏联大使也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影响毛泽东形势判断的关键因素是他的阶级观和革命观。他这时讲得很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他尤其担心的是美国将会帮助蒋介石，那样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可能变得遥遥无期。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并不喜欢苏联人，但却高度重视与莫斯科的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吧。他明确强调说：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人民来说，“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毛泽东后来那个“一边倒”政策，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就已经阐明了。他宣称：“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2]

三、苏德战争爆发，美英大力援苏，中共重提与美英合作主张

重新回到“纵横捭阖”的策略上来，大约在1940年底。当时毛泽东一面强调不要忘记“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一面提出了对帝国主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3] 而到了1941年6月，

[1] 《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第34页。

[2]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651—652、674页。

[3] 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762页。

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也不能不跟着进一步修正他的看法了。

新形势带来的最大难题，就是让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面临着不知如何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问题。一直标榜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社会主义苏联竟然被拖下了水，继续按照要就是“帝国主义战线”，要就是“反帝国主义战线”这一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来划分世界，行不通了。就是以前所谓“两大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了。因为苏联已经成为战争之一方，并且很快就与美、英这些“帝国主义”结为盟国了。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宣布：“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但对于习惯了用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简单地用“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这种说法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不合乎列宁主义理论思维的要求。[1]

1940年，毛泽东刚刚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确信，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世界已经划分成帝国主义战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进入到“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这一观点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列强与苏联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基础上的。而美、英与苏联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无疑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特别是1941年8月14日，美、英两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发表了得到苏联同意的《大西洋宪章》，公开宣布两国将不再追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赞同国家不论大小均应享受平等权利，各民族

---

[1] 《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64—165页。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2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673页。

有权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等，[1] 使人即使在本质上也难以继续按照列宁的理论观点把它们继续视为帝国主义。1942 年 5 月 26 日，英国又进一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英同盟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即使到了战后，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要长期合作，相互援助。这样一来，哪怕是想要像过去那样强调现时政策与将来政策的区别，都变得极为困难了。

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的这种巨大变化？英苏协定发表后，毛泽东多次与在延安的有关人士探讨对战后形势的估计问题。但是，苏联陷入严重困难，需要美国大力援助的现实，似乎并没有让毛泽东动摇他关于“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基本理念。相反，6 月间，他得出的结论是，本次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现在只有德、意、日、美、英五大帝国主义国家了，战后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倒台，《大西洋宪章》不能不实行，帝国主义将不可能继续存在了。

然而，说美、英目前还是帝国主义是否合理呢？7 月间，在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谈话当中，毛泽东已进一步提出，即使现在恐怕也不能再把美、英看做是帝国主义了。他解释说，帝国主义是不会援助社会主义的，美、英两国援助苏联的行动，以及《大西洋宪章》的表示，都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做的。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把美、英看作帝国主义。当然，毛泽东并不否认美、英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他看来，唯一危险的只有美国，因为它是个“大家伙”，战后那些法西斯战败国都会依赖它，因此它“可能支配世界”。但他认为，英苏协定显示，英国将来一定会亲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战后也会迅速发展起来，那时候美国很可能会孤立，不可能出现新的帝国主义营垒。他据此断言：“就时代说，资本主义时代是根本过去了。”

了解到毛泽东 1942 年对美国看法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我们就不难想象，那种关于美国曾经有过机会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

[1] 转见颜声毅等编著：《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2—533 页。

所有谈到这种机会的著作，显然都注意到1944年有一个短时期发生在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外交官以及美军观察组之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交往。问题只是，它们没有能够回答——如果不是简单地拿民族主义来解释的话——中共这时为什么会如此热情？

谈论美、英政府的性质，与随后出现的那段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昙花一现的蜜月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们只要注意到毛泽东在中央开会讨论这些理论问题时的一段发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确实是有联系的。毛泽东当时肯定地讲:这种讨论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与英美好好合作”。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

考虑到毛泽东发言时特别强调了那个“大家伙”在战后的危险作用，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在谈论那个“起了变化”的资本主义美国时，真的就不再担心它在战后干涉的可能了。事实上，毛泽东随后实行的对美外交明显地是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的。只不过，他最初的目的应该说更多地还是防御性的：一方面是争取美国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争取美国承认，借助美国政府来遏制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企图。只是到了1944年春天以后，他的对美外交才开始带有某种进攻性了。

四、毛泽东相信，应学铁托那样，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

1944年春夏两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再加上来自重庆的报告和外国记者的评论，毛泽东深信重庆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失去统治的实力。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估计,随着日本进攻的延续,国民党将面临四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实力大大削弱，但得到美国援助渐渐恢复起来；二是削弱后得不到援助，但也不投降；三是引起内部分裂，一部投降，一部抗战；四是全面投降。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第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要争取抢在国民党和罗斯福前面夺取城市，谁夺取了中心城市，谁就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

“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明显地比毛泽东更乐观。他们认为，国民党这次垮下去不容易起来了，美国派兵到中国来直接干涉也是困难的；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是老大哥了；国民党力量太弱，到时候美国非援助我们不可。

从毛泽东上面的谈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美国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警戒。尽管，他确信要与美国好好合作，并估计美国最终可能不能不援助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依旧担心罗斯福最终仍可能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对付共产党。因此，他仍旧强调要准备美国援助国民党，与中共争夺大城市。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得知罗斯福已经迫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之后，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7 月 13 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通报了美军观察组即将来延的消息，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将利用国民党的进一步失败，推动美国向它施加更大压力，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1] 但电报丝毫没有流露出满意的心情。

7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毛泽东仍然不动声色。他只是在不卑不亢的接触中对美方人员进行审慎的观察。谢伟思就是作为第一批观察组的成员于这时到延安来的。作为美军印缅战区司令部的一名政治顾问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谢伟思的身份在美军观察组中显得颇为特殊。在周恩来介绍说谢“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之后，毛泽东也只是利用欢迎的晚宴，在饭桌上同谢伟思很有分寸地“认识认识”了事。但是，在他似乎不经意地提出“国务院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这个问题之后[2]，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其实是很想要得到美国的承认的。

毛泽东争取美国的热情极大可能是受到乐观的谢伟思的鼓舞。这不仅

---

[1] RPSDMH，495/74/342.

[2] 《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备忘录》（1944 年 7 月 27 日），约瑟夫 · W. 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外交官约翰 ·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43 页。

仅在于谢伟思同斯诺一样，对中共印象极佳，而且在于他明确地向毛泽东表达了他赞同中共取得美援乃至改组政府的想法。很明显，由于谢伟思抱定了国民党不可救药的想法，他所表现出来的坦率就格外能够引起毛泽东的好感。而特别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透露着美国政府的种种意图。毛泽东很容易得出一种印象：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是有深远的政治外交目的的。尤其是，当他得知，美国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之后，[1] 他自然会更受鼓舞。

8月15日，差不多是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将近一个月后，毛泽东开始做出热烈的反应。他亲笔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文章称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2]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有史以来第一件"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示虽然也像以往的外交指示一样，提到区别问题，但并非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而是强调要区别"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而且指示强调的重点在于："凡愿与我们来往的英美人士及其军事人员，顽固保守分子总还占少数，且其顽固又常常是只反对其国内共产党，而不反对我们者。"中共中央相信，只要准其到我根据地来，争取逐渐实现军事合作，随后文化合作、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3]

毛泽东一向是情绪中人，《解放日报》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心情，自然不是装出来的。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与援助看起来希望很大，中共内部这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谈论过改变名称的问题。

---

[1] 关于谢伟思告诉毛泽东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一事的确切时间，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我们只是从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的发言中得知这一情况的。

[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3]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5—316页。

8月中旬，美联社记者在重庆与董必武等谈话，明确表示中共前途广大，只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最好能够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南方局为此致电中共中央，谈到两个重要情况，一是说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二是说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8月23日，谢伟思在与毛泽东的谈话当中也提到改名的必要性问题，毛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只是说他也“曾经想到改变名称”，但如果大家都了解中共的主张，就没有必要害怕。而对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却主动表示说：“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却“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的理由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而“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我们“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1]

如此议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共中央前此在内部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我们似乎很难简单地把上面的议论看成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人的纯粹的宣传。在上述党内指示中，中共中央破天荒地把美、苏、英相提并论，宣称：“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尽管三国外交重心均放在国民党方面，但相对而言，美国较英国对我要好。

中共中央态度上有此变化并非偶然。这时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中一直弄不清苏联将来会否出兵中国；即使出兵，他们也很清楚，苏联关心的地区只会是东北地区，因此，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倾向性将会对国共斗争的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既然如此，长期不满莫斯科重视国民党甚于重视共产党的毛泽东，这时在美国人面前强调中共“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看重美国的作用，未必可以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来获

[1] 《1944年8月23日和毛泽东的会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9—260页。

得合理的解释。任何相信美国曾经有机会争取毛泽东在战后转向西方的说法，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始终坚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具体到改变党的名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很在意的。在9月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到了改名问题，并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他说，大概每一国资产阶级都恨死本国共产党了，但真的要改党名却值得考虑。很显然，毛泽东的目的其实只是想像铁托那样，拿英美的援助，打共产党的天下。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时又说：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1]

五、毛泽东断定赫尔利在捣鬼，他希望去华盛顿与罗斯福交涉

铁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他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英国的援助，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人民解放军。这个时候南人民解放军刚好胜利地实现了与苏联红军的会师，南共并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具有全国政权性质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铁托的胜利明显地影响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开会时多次提到过南斯拉夫和铁托的胜利。毛泽东甚至仿照铁托的办法，提出了在中国组建解放委员会乃至解放军的设想。他对争取美国承认和援助的重视，以及对美国援助的高度乐观，很显然都来自铁托的成功经验。

强调美国援助，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毛泽东这时确实一度相信美国会援助自己。在整个1944年的9月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同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前景可以说充满了希望。他们这时甚至连向美国要什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7—128页。

么样的武器装备都谈得很具体了。这是因为，他们一致相信，美国要打败日本必须借助中国沿海地区,因此必须和那里的共产党部队进行合作。因此，多数领导人都认定：美国打日本需要用我们，是确定了的；与我们发生关系并给以有限度的援助，是确定了的。然而，就在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布说：我们“要美国帮助的政策确定了”的时候，来自美国的风突然转向了。

10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的顶头上司，对中共抱以好感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被召回。毛泽东在 28 日给莫斯科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他写道：“与特区有着良好关系的史迪威将军被美国政府解除了职务。美军观察组人员对此都表示了极度的不满。”这时，他并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不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作战部署，更不知道史迪威正是依照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的建议被撤换掉的。他对罗斯福还颇多幻想，因而对赫尔利的话也十分相信。他告诉莫斯科说：在重庆的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正在考虑我们的建议，他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反对特区的计划，已经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方案。[1]

但是，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现事情满不是那么回事儿。11 月 8 日，赫尔利来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在双方一致同意改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基础上，弄出了一个双方基本认可的《五条协定草案》，毛泽东甚至还在那上面郑重地签了字。然而，赫尔利把协定草案带回去后，当即就被国民党根本推翻，赫尔利转脸一面表示对国民党不满，一面又劝说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说是只要插进一只脚去就有办法。

这一反复，惹得毛泽东大为不满。本来，早就想学铁托抵制流亡政府的毛泽东，对同意与蒋介石“再合作”已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是“极大的让步”。如今赫尔利干脆站在蒋介石一边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派几个人到政府里去做官，闭口不提改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前提条件，这让毛泽东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不过，由于太过相信谢伟思的乐观说法，毛泽

[1] RPSDMH, 495/74/342.

东怀疑罗斯福总统对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因此，眼看可以到手的军事援助可能化为乌有，在反复交涉无效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日后引起众多猜测的最后挽救局面的重大步骤。

1945 年 1 月 9 日，周恩来受命向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说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接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讨论美国感兴趣的中国当前形势和问题。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他们怀疑整个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出在赫尔利身上。可是，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还是迅速得知了这件事，在他大发雷霆之后，一切很快都变得不可挽回了：美军观察组组长被撤换了；包括谢伟思在内的所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都被调离或召回；2 月 15 日，接替史迪威的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宣布：我的任务是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美国军官、美国军事人员，将不给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援助。[1] 这大概是毛泽东此生中唯一一次想去华盛顿访问，但没能实现。而毛泽东做亚洲的铁托的可能性也因此不复存在了。

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明显地开始改变。当然，注意一下会议期间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反美口径的细微变化，对我们理解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变化和政策变动仍旧是有益的。

会前，毛泽东显然还没有完全堵死对美外交的可能性。在起草书面政治报告时，他显然有意没有加上公开批评美国的内容。因此，我们在 3 月 31 日毛泽东就《论联合政府》这一书面报告的说明中，以及发到代表们手上的正式报告中，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直接对美国表示的不满。但是，在 4 月 24 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他已经开始提醒与会代表，与美国可能有一场麻烦。这是因为，英国在希腊利用驻军司令斯科比压迫希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

---

[1] 有关美军观察组组长鲍瑞德被撤，谢伟思等被调离或召回的情节，可参见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4—462 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 Vol.7, p.233。

消息陆续传来，他估计美国很可能也会帮助蒋介石如此做。因此，他提出，如果美国要在中国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们就“要斗一下”。

随后，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公开发表反对中共演说[1]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对美国的反感进一步加剧。他重新给美国戴上了帝国主义的帽子。他在5月31日做大会结论时说：“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战后国民党削弱了，不得不依赖美国，“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

紧接着，谢伟思等人6月6日因《美亚》杂志事件被捕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更是确信美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敌人了。他在大会结束之际开始重提区别问题，除了继续强调“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之外，还特别加上了一条：“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他提出，现在应该重新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去认识世界，不要怕美国反动派，要看到世界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开始大谈斯大林伟大，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总司令，并且断言“国际援助一定要来”[2]。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不论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他追求共产党最终胜利的目标。即使在那个来谈论争取美国承认与援助问题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它所强调的也

---

[1] FRUS, 1945, Vol.7, pp.317-322.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2—123、192、235—236页。

仍旧是："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无疑也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美政策的主要出发点。考虑到这一点，美国的亚洲政策毫无疑问是不可能适应于毛泽东的。因此，毛泽东事实上绝对做不成亚洲的铁托。受此影响，毛泽东显然也不会想做那个被九国情报局开除的铁托，因为那同样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

第七章

斯大林“不许革命”！？

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慷慨相助；毛泽东曾衷心称赞斯大林“拿我们当弟兄看待”;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问台下的代表：你们有谁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他用手比划着，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在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诸多抱怨当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能看出他愤懑情绪的，其实还是1945年斯大林“不许革命”的这一段。毛泽东一生中提到中共同莫斯科关系问题最多的时候，是在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而他这时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又是“不许革命”这件事情。

何谓“不许革命”？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

对于“革命”二字，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背诵毛泽东关于它的一段有名的解说，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只不过，当年人们背诵这段“毛主席语录”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为自己不要“文斗”要“武斗”找借口，而事实上毛泽东这段话的核心却是在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

革命就是夺权的意思，毛泽东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有过直白的说明。比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就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3] 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十分有趣的是，为了这段话，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与英国共产党人之间还弄出一段公案来，争论的核心真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问题。当时英共特意将《毛选》译成英文，唯独对这段话，英共中央因担心会引起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多数

[1] 《毛泽东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2日）。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8页。
[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同上引注，第529页。

英国民众对共产党的反感，主张删去，告之中共中央，毛泽东坚持不能删。事后，英共还是删去了这段话。毛对此十分不满，几度表示这是个原则问题，批评英共被和平过渡的幻想冲昏了头脑。[1]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革命"这个字眼儿所包含的内容有他特定的理解。在他看来，暴力与夺权二者相辅相成，无夺权不成革命，非暴力不能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其实就是说要通过暴力的或曰武装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国民党夺蒋介石的权。因此，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不许革命"，自然也就是指斯大林不许毛泽东用武装的方式去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尽管后来斯大林道了歉，毛泽东对这件事始终还是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一有机会，他就会拿来说明当年斯大林是如何"整我们"的。

一、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斯大林为什么不许毛泽东夺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呢？斯大林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这种方式，抑或斯大林喜欢国民党甚于喜欢共产党？从毛泽东总结斯大林"整我们"的四次情况看，这似乎都不成其为原因。至少，毛泽东不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但是，毛泽东讲过斯大林四次"整我们"的情况，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左"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倾；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是"半个铁托"。[2] 从他讲的这四次"整我们"的情况看，似乎泛泛地说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也难成立。因为，照毛泽东所说，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就不是因为"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倒是不

[1] 《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作删节的批评》（1954年8月13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0—532页。

[2]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9日）。

适当地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过分迷信武装进攻和打倒一切的革命路线，而铸成了大错。

那么，能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失败了，所以斯大林就转而相信国民党甚于相信共产党了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因此把武器都给了国民党，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关于苏联援助的问题，过去研究和说明得太少，而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确实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当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是禁区时，有人得些零碎资料和传说，就可以诌成一个骇世惊俗的说法来。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所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一文，作者仅凭借几条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谈毛泽东得斯大林金钱和武器如何多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统治者，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关于毛泽东的制胜之道，过去的表述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更准确的表述应是‘依靠农村等待苏援’。”因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钱和武器上给予毛泽东大量援助，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人那里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同其他时期相比，恰恰这个时期是莫斯科对中共财政援助最少的时候。

显然，过分夸大莫斯科物质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过去过分讳言中共当年曾得到莫斯科援助的情况密切关联着的。凡事捂得越严，猜测和谬说越多。其实，讳言苏联的援助，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如何不听莫斯科的话，如何独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毕竟，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或经济上，它更多地还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面。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各种干部人才的培训以及中共转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设想

……几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俄国人积极活动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质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论成败得失，有时更有决定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援助不重要。我们只要稍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就从苏联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资助。在那个时候，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光是靠陈独秀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1920 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各种预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宣传刊物就办了几个。但是，1921 年 1 月，维经斯基回国，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书刊的出版被迫中断，计划中的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连其机关报《共产党》月刊也停办了。据后来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那时一度连派人南下向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拿不出来了。[1]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了解，当年参加建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只有极少几个人，如李大钊等，有稍好些的收入。多数年轻人，或无固定收入，或靠稿费维持，或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快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当时情况下，开会、办杂志、出宣传品、搞工运、办外国语学校或工人补习学校等，没有哪一样不要钱。从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

[1]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 年 7 月 11 日），《“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21 页；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 年 5 月），《“一大”前后》（二），第 384 页。

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1] 这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之后，有账可查的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钱，平均每月大约就有 1850 元，自己筹来的钱每月还不足 100 元。到 1923 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大部分职业化，连这 100 元也筹不到了。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 1923 年头八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2] 平均每月得款约 1875 元。而这个时候，像工人运动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 1500 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一些开销，比如，在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1923 年 5 月的笔记里就记着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 2000.78 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 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1500（美金），中国共产党 3—5 月份的预算”，“额外给 1000 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3]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量大致上也有账可查。1924 年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 36000 元，中共中央平均每月得款约 3000 元。1925 年预算每月领 2250 元，从 4 月起增至 3650 元，平均每月得经常费约为 3300 元。1926 年以后，不仅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数量大增，实际收入与预算相差甚远，中共中央每月得经常费当不少于万元。1927 年的经常费原定 1.5 万元，实际上中共中央每月平均已收到 3 万元以上的经常费。1928 年至 1932 年每月预算更是在 5 万元左右。而需要强调的是，自 1927 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一项，中共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如 1927 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 3 万元；为开办党校得 5 万元另月开支 1.5 万元；7—8 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 5 万元；9 月为准备秋收

[1]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7 页。
[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 年 7 月），前引书第 1 卷，第 168 页。
[3] 参见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69 页。注意，这里的有些数字有误，应对照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1991。

起义得援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10万元。1928年的数字目前公开得还不很具体，但看起来不会少于1927年，因为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1929年的预算时，仅特别费一项就明确要求得到100万元。当然，莫斯科批准的数字还未见到，可能不会这么多。[1]

近年俄国出版并已陆续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层决策的一些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态度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于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数援助无疑也是斯大林所赞同的。足以证明斯大林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联共（布）中央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牢牢地掌握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权以后，莫斯科丝毫没有减少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援助。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经赞助共产国际花费相当人力、物力和财力，冒险把中共几乎所有重要干部统统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开代表大会，为中共中央拟定各种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苏区为止，已知1929年党费每月约为4万元，1930年每月约5万元，1931年“每月一万五千美金，中国（元）五六万元”。这也就是说，仅党费一项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约6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济难费11.4万元，团费约7万元，等等。[2]可见，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的经费援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

---

[1]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1927年9月15日），《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7—1931）（7），第16—19、20、71、35、396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5月26日、9月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8年1月1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5月26日、9月15日）；等等。

[2] 转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159—164页。

当然，这个时期算起来可以说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的那个时期，是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力量的时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问题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二、斯大林1936年秋冬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的援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当中，我们看不出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苏区以后，直到红军长征到陕北这段时间，莫斯科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帮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间，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是积极准备并且是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帮助的。

讲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鉴于中国红军遭受重创，退入西北，共产国际曾经有过一个大举援助中国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斯大林批准的。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得知中共代表团要派林育英回国联络红军，传达贯彻“七大”精神，斯大林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中共中央知道：“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

鉴于当年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创建军队，大举北伐，一举夺得中央政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国民党大军层层包围的南方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会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虑到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赞成中国红军与苏联接通。最早如1927年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的向中国西北发展的所谓“西北路线”，就曾被指责为“逃跑路线”。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秘密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这后一回，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莫斯科

[1]《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这一态度的影响，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很长时间不能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围绕着南下北上问题发生的争论乃至分裂，也与此不无关联。当时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感觉不到向苏联求援的迫切性，他们不同意北上，强调“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应把取得苏联援助当成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受苏联态度影响很深。四方面军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来之所以一度跟张国焘走，而没有跟中共中央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然，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的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认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而且显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意通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直接的帮助。

关于莫斯科的援助计划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艰辛尝试，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详细交代清楚。[1] 但在这里简单地举出几件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使读者有所印象还是可能的。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开始考虑通过中国的西北边境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和前期准备。它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则较晚，已经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间才逐渐详知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9月11日，莫斯科即发出同意经过中国的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这通明显地是得到斯大林首肯的电报指示是这样说的：“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

[1] 想要具体了解这一情况的读者，可以看杨奎松：《中国红军打通国际战略方针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增刊；《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重要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1]

电报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准红军发动夺取宁夏的战役，以便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时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强调红军不宜马上经河西走廊去新疆，因为这可能便利国民党利用黄河天险将红军同中国主要区域隔离开来，不便于中共今后的发展。

关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数量，在9月27日的电报和10月18日的电报中有较具体的说明。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定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一百五十辆汽车来回两次将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的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2]。

令人遗憾的是，红军10月间发动的宁夏战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计划功败垂成。11月3日，鉴于日伪和国民党军在绥远地区开始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方面进一步发来电报：一方面强调必须改变提供援助的方向，以避开绥远；一方面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可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一千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去接运。[3]只可惜，已经渡过黄河西去的红军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到达新疆，尽管莫斯科后来一再来电催问西路军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将援助物资的数量再增加一倍，红军还是无缘得到这批援助。

众所周知的是，当斯大林批准并且关注着这一援助计划时，他并非不了解到红军当时的际遇，即这时是中共革命史上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根据地几乎全都丢光了，红军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11日）。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27日、10月2日）。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

以上，白区工作则损失了百分之百。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各种史料显示，斯大林不仅没有因此“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他还在积极想办法大力援助红军。尽管，这时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莫斯科曾经设法提供援助的事实。而且，军事装备上的大规模援助虽然没有实现，莫斯科在财政方面也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援助的。这种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宁夏战役失利后，五万红军被围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不仅作战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弹药奇缺，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还有粮食和冬装的匮乏。当时已进入 11 月，二、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几乎还都是单衣单裤，再加上甘北人烟稀少，数万大军粮食无处可觅，故当时负责中央的张闻天不能不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大声疾呼尽快寄送援款，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1]

实际上，还在准备军事援助的同时，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赞同共产国际同时通过经济的办法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额援款。共产国际 11 月 12 日已电告中共中央说，他们已准备好援助的款项。很快，莫斯科通过美国的银行寄出援款十五万美元，12 月又续寄五万美元。1937 年 1 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准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八十万美元的援款，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一笔相当数量的援款。[2] 加起来，这个时候莫斯科至少已经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数额就在二百万美元左右。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距离国共合作形成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周恩来与南京代表达成秘密妥协，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粮饷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一决定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之举。如果斯大林这时真的像我们一些书中所说的，已经是只看重蒋介石国民党，甚至想要取消红军，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大概是不会有的。

---

[1] 《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 年 11 月 9 日）。
[2] RCPSDMH，495/74/285.

三、抗战中苏联是“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吗？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红军，当然不纯粹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世界上始终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决心大力援助中国红军的时候，苏联正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战争威胁。西线欧洲是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德国，东线亚洲远东则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了牵制德日，他这时还只能借助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苏联这时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的内战；在远东，斯大林无疑对中国红军有所指望，其不惜冒外交风险大力援助红军，与此亦不无关系。

然而，1937年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去了。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开始看重国民党。事情很明显，如果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弃援助，或干脆转而援助共产党，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甚或投降，日本人就可以轻易征服中国大陆，紧接着就会以中国为基地扑向苏联。而要苏联指望在国内尚无足够影响且军事上装备及训练都极为落后的几万红军来拖住日本，是不可能的。

1940年，也就是在毛泽东对自己军事力量的扩展已经相当满意的时候，斯大林在与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谈话时，仍旧持这样一种看法。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

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1]

列宁有云：“要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忘掉了列宁这条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铭”的重要遗训，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甚至可能在留意斯大林上述谈话的时候，只注意到他关于中共“太孱弱”的评价，而忽略了斯大林谈话中的那两个中共“更亲近些”，“主要援助该给予他们”的“照理”。

其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外交利益优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热衷于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时，他对周边资产阶级当政的国家的共产党，通常也要视外交关系如何来决定要不要采取直接援助的办法。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更亲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过其他方法给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适当的帮助。当年斯大林所面对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换句话说，苏联当年的“主要援助”没有给中共，不等于“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么简单。斯大林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知道“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国共产党；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在他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关抗战期间莫斯科在物质上援助中共的详细资料目前公布得还不多。但从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资料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个时候对中共，并不像一些党史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吝啬。

1937 年 9 月，潘汉年致信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

[1] 崔可夫：《赴华使命》，第 33、35—36 页。

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他在信中写道：中共中央急需钱，因为有许多战士牺牲在前线，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扩展到全国范围去，也需要一笔数目适当的资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们能够继续按月拨给经费。[1] 而后，在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任弼时和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五十万中国元，合美元约十六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2]。这时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和弹药。对此，季米特洛夫给予了高度重视，紧急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他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谈话后的结果："援助中国共产党五十万美元。"[3]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又提出了援助请求。这一回是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四千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工作的六千名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

任弼时的求援信没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细节，只说明"随后我们会向您

[1] Wang Ming's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an's Letter to Wang Ming, September 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2, March-April 1997, pp.10-11.

[2]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RPSDMH, 495/74/291.

[3] 《季米特洛夫日记》，第64页。

提供具体的数字和资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数字还不得而知。但联系到7月份回国的中共代表王稼祥带去三十万美元的援款，可以想象它或许会与这一情况有关。当然，对此也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任弼时这时还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请苏联向八路军提供一些武器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对此的态度是："给八路军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因为这会恶化国共关系并为国民党孤立和封锁延安提供口实。最后，“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1]。

能够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举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机器和其他各种用品的名称。中共中央强调，这些物资对于八路军在居民当中和在部队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后，苏联人确实把一批印刷机械送到了延安来。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臂伤并汇报工作，他显然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恩来的说法，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2]。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不详的援款。据7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可知，这笔援款数额不小，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

---

[1]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297页。
[2] RCPSMH，495/74/317.

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以致援款不能及时送到。季米特洛夫为此通知莫洛托夫说：“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非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1]

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多半可以推断，莫斯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根据中共的预算定期提供经费了，大多数援助都是临时申请临时拨款的，数额似乎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同苏联向国民党提供的上亿美元的贷款数和中共日益庞大的组织相比较，我们多半能够理解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批评莫斯科“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本来，如果斯大林也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早些看出中国革命成功在即，多冒几次险，从蒙古直接送些武器来，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日子可能还会早些。但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去，这却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四、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1950年代对斯大林的那些批评，能不能代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心态，有时候还要做点分析。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即1953年。毛泽东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战中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是真实感情的

[1] RCPSMH，495/74/317.

流露，后来两篇都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1] 如果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很显然，抗战中的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和做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对斯大林并无多少怨气。尽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苏联援助多少的问题，甚至存在着对莫斯科支持王明搞右倾的怀疑，毛泽东似乎也并没有把账都算到斯大林的头上，仍旧发自内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并“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2]

是后来斯大林减少了援助，还是后来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况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以至严重破坏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敬爱”之情呢？

从1940年到1949年间，围绕着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们已经大致有过介绍，像皖南事变前后双方在对国民党问题上争论的情况；像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为出动八路军牵制日军保卫苏联而产生的分歧；像基于肃清王明教条宗派目的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像双方对共产国际解散的不同反响……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唯一使毛泽东发过脾气，对斯大林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以至念念不忘的，主要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5年的“不许革命”。

应当承认，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严格说来都对毛泽东同莫斯科的关系有破坏性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加剧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疑惑与不满。但是，一直到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纷纷起来揭露教条主义危害，乃至批评共产国际错误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整风的各种理论学习文件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最主要的著作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毛泽东在谈到对整风目的以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的时候，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话来作为标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当1944年季米特洛夫根据王明背后

[1]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2]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652页。

的小报告提醒毛泽东注意党内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时，毛泽东表现得是那样惴惴不安。他不仅郑重致电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并且一连几天专门到苏联联络员的住处去做解释工作，深恐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事实上，如果说1939年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显示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敬爱”的话，那么，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现出的对斯大林的“敬爱”，恐怕也不出其右。

就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书面和口头的报告和讲话至少有九篇，几乎回回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而且大讲特讲，充满敬重与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内部讲话中，他讲得直截了当，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苏五大国，而“五大国中苏联为首”。具体到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一定要明白：“（共产）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犹之玉皇大帝经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评，搞得好，万岁；搞不好，减少岁把子，总之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了，“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他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毛泽东面对台下数百名代表自问自答地说：你们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我们现在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1]

---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184、187、189、197、199页。

遍查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和讲话，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斯大林和苏联伟业的，主要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间，那是散见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文章和讲话中，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党的关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中共“七大”。而讲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彻，评价也是最高的，则非这一次莫属。如果说1939年毛泽东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时，表露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很难相信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是他违心讲出来应景的。事实上，整风已过，权威已立，又在内部讲话，也没有那个必要。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热情讴歌斯大林？据毛泽东自己说，是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而列宁的话太“灵”了。列宁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列宁说，如果苏联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内巩固住自己的胜利，它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结果，二十年后尽管苏联受到了严重的入侵，战争的结果，半个欧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来了，苏联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因此，列宁伟大，领导苏联胜利的斯大林当然也伟大。[1]

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味，我们不难发觉，毛泽东称颂斯大林和苏联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革命，寄希望于苏联将会大力援助中国革命。

五、毛泽东许诺：“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抗战中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

[1] 前引《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寄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1]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前所未有地拥兵近五十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2]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九十一万军队，一百二十多万党员，一亿人口，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师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四川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之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显露头角。而无论是中国

[1]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199页。
[2] 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1939年5月5日）。

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究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 1944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1] 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2]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大肆发表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包括认为中共不过是"人造黄油的共产主义者"之类的

[1] 《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的批示》（1944 年 12 月 20 日）。

[2]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01、103 页。

话。[1] 这些也许不假。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拒绝动用自己的军队牵制日军，很难不让莫斯科怀疑中共是否真是共产主义者。但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讲的话，是不是就一定真实可靠呢？恐怕未必。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俄国人当时讲过不信任中共的话，就得出结论说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这些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我们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

“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1] 最早见之于赫伯特·菲思的《中国的纠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一书，中文可见林海等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9 页。以后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如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6 页；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4—485 页。

"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自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1]。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他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2]

六、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大发雷霆后，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

1945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为什么突然逆转，到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仔细研究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特别是从年初到年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前期，他谈论力量对比的变

[1] RCPSMH，495/74/342.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油印件。注：此段引文不尽相同于《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9页上的相关文字。

化和要准备胜利较多；后期，他谈论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和“准备内战”较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事件，一个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于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被迫缴械的情况；一个就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完全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仅仅因为英国的干涉，就迅速归于瓦解，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领导人立即联想到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这个时候，恰恰也是美军在延安的人员一再表示他们要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候。显然，一旦美军登陆，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共产党人，那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将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失败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几次会议上都讲：同希腊共产党一样，我本钱不大，不能阻止美国登陆。但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绝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它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让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变中国为希腊。对付的办法：第一，“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我们不仅不能交枪，而且还要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进行封锁，遮断苏联，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毛泽东甚至明确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

“七大”后，中共中央对于战后形势的估计多半是严峻的，那就是：“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要胜过蒋介石，必须设法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因为蒋介石的背后是美国。可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国硬要在中国充当斯科比，苏联会不会也像对希腊那样，袖手旁观？

---

[1]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已经得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这无疑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苏联与美国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国前与中央政府签约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唯一希望的是，苏联的签约还能够包含有防止日本再起，打破美国独占中国，便于日后在中国插手的目的，那样的话——毛泽东说——苏联同意签约，对我也并无害处，“因为并不限制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当然，毛泽东对此也未必十分放心。他在谈到不派代表出席参政会的问题，以及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样做也是要向苏联发出“暗示”，即中共不会容忍国民党继续其一党统治。

8月9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消息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了。当天下午，毛泽东一面与朱德联名致电祝贺，一面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在杨家岭开会。他高兴地宣布：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在美苏合作、中苏协定的基础上，国共谈判不可避免。他指出：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但蒋介石恐怕不会很快就宣布全面内战，因此我们目前第一位的还是打日伪。[1]

毛泽东原来估计，打败日本至少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使苏联出兵，他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几天后就宣告投降。原来计划中的敌后大反攻几乎还没有全面展开，战争就结束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德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开始对各解放区发布反攻命令，蒋介石竟于次日下令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对中

---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5、232—233页。

共参加任何接收和受降工作的立场，并且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1]

怎么办？打了八年仗，死了那么多人，国际国内的舆论都呼吁和平，坚持向日伪进攻和受降，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武力相抗，结果内战将爆发，并且很可能得不到大多数渴望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如何处置，这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确是重大考验。

8 月 14 日，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提醒下，不失时机地摇起了橄榄枝。他致电毛泽东，邀请毛前往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即以朱德名义去电要求蒋取消前令，蒋随即冠冕堂皇地打出盟军做挡箭牌，电毛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2]

显而易见，对蒋介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对此，毛泽东也是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在蒋介石来电前一天，他就在延安公开宣称："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而抗战胜利的果实，也不能轻易听任国民党抢了去，要"力争"。他宣布说：我们现在有一亿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取得察哈尔、热河、河北、山西大部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完全可能，但我们要争取控制整个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区。蒋介石来电第二天，他又特别命令绥远、太行、冀察各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及北平，迎接苏军，争取背靠苏军控制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与山西。[3]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为此专门通告党内：蒋介石一面骂我们是人民公敌，一面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4]

---

[1]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0 页。

[2] 《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致毛泽东电》（1945 年 8 月 20 日），等等。

[3] 《毛泽东关于配合苏联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等地给程、耿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

[4]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 1126—1127 页；《中央关于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给徐冰等同志的指示》（1945 年 8 月 16 日）。

与蒋介石对抗，就是同美国对抗。毛泽东经常讲："国共反映美苏。"那意思很清楚，自己同国民党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反映着苏联同美国的斗争。而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输了，也等于苏联的失败。因此，他这个时候仍旧十分看重同苏军的合作和苏联的援助。8月20日，根据苏军进展情况，他亲自作出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九个团，连同已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开赴东北，并明确宣布部队的任务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1]

毛泽东此时不惜得罪美国的决心，从他当天的另一项人们后来很少提及的重要决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美国正在调派大批飞机、军舰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的目标之一。然而，毛泽东这一天却批准了华中局从日伪手中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当天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坚决彻底地执行起义方针，除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以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他并且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做法，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2]。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几乎就在他发布上述命令的当天，他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电报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当然，谁都清楚这是来自莫斯科最高决策者的电报。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说是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3] 尤其是后面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关于斯大林当年发出这封电报时的真实想法，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历

---

[1] 《中央军委关于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

[2] 《中央关于批准上海武装起义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等等。

[3] 有关这封电报，虽经中俄两国学者反复查找，目前仍未见到原文，且有当时斯大林曾两电毛泽东之说。

史文献能够说明。但联系到1948年初斯大林承认他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和1949年初斯大林再度劝毛与国民党谈判时极力强调斗争策略的情景，说斯大林就是想要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可能也有点简单化。但不论斯大林如何考虑问题，毛泽东相信斯大林是要中共走法国式的议会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苏联一定援助中国革命之后，得到这种几乎是要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的命令，毛泽东内心会激起怎样一种感情波澜，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关这封电报引起的直接反应，毛泽东当年的翻译师哲的回忆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而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则描述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大发雷霆”。当然，毛泽东不满归不满，最后还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

从21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并明确指示各地，除个别地点外，一般应去占领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去夺取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亦致电重庆，表示将派周恩来先行前往重庆谈判。已经开始赶往东北的部队，也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说是必须暂时“开至热河边境探明情况后再行决定”，因“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1]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详细说明了他考虑到的苏联坚持不允许同国民党发生对抗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并且举希腊的例子说，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就是因为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中共，也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而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

[1] 《中央关于将派周恩来前去谈判给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8月21日）。

不过，他还是想要安抚领导人中间的失望情绪。他强调说：这并不等于苏联不帮助我们。事实上，苏联现在也是在干涉中国，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当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装去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而毛泽东是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谈判不可怕，“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1]。

两天后，基于莫斯科的建议，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同周恩来一道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了。这次谈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谈判恰如毛泽东所料想到的，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他对这段被强加给他的经历始终愤愤不平和耿耿于怀。以至于他总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断言斯大林这样做，其实就是“不许革命”。

十年以后，毛泽东多次不满地谈到过这件事，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明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提到：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想不到，“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

[1]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 年 8 月 23 日）。
[2] 《毛泽东同艾地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29 日）。

第八章

和战关头的考验

一道让人奇怪的命令：凡是需要与苏军接洽的部队，务必注意自己的着装；山海关来电："辰兄"与我开盛大联欢会，并允许我一部进入东北；苏中央军事委员接见彭真，表示可以将东北全部日军装备交给中共；毛泽东主张：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不让国民党插进一兵一卒；由于在重庆谈判中紧张和劳累过度，毛泽东住进了医院……

谈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战后东北问题。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从没有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时，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个时候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1] 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战后共产党能够一举打败国民党，有种种原因，政策对头，民众拥护，指挥得当……但中共军队立足东北，获得大量较现代的武器装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还是那些将军，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时是何等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将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中而华南而西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国民党军，摧枯拉朽，锐不可当，更遑论一个区区“马家军”！这里面武器装备之重要，一目了然。对此，当年兵败甘肃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他说，

---

[1] 按照苏联单方面公布的统计数据，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武装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有步枪约为 70 万支，机枪约为 12000—14000 挺，各种炮约 4000 门，坦克约 600 辆，汽车约 2000 多辆，另有弹药库 679 座，800 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此说目前尚无可靠文献史料与史实考订予以印证，但从相关史料仍可看到如下一些情况，如从 1945 年底到 1947 年初，苏军提供的步枪数量在 30 万支以上。又如 1948 年前后苏军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的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 1949 年 2 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 1948 年 11 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参见 1971 年 8 月 26 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K. P. Ageenko, P. N. Bobylev, T. S. Manenkov, I. F. Yakushin, and R. A. Savshkin, Military Aid of U. S. S. R i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Moscow, 1975, p.100；Archive of Presidential, Russian Federation（APRF），fond1, Opis 16, Delo 39, Listy, pp.3-4；Sergei Goncharenko,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old War in Asia”,1996；A. 列多夫斯基编著，李玉贞译：《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 年 1—2 月）》，《党的文献》1996 年第 3 期。有关苏军战后援助中共武器装备最新研究进展，可参见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读史求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3—268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第五章第二节。

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1]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很难推测，如果1936年红军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毛泽东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且深信他必须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够打到苏联边界去，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够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2]

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3]

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不是因为它不存在，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页。

[2]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转见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参见前引《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页。

一、毛泽东说：计算精确，不难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道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徒费口舌地解释了半天，对方一句也听不懂。最后连比带划折腾了半天才大约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的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却互不了解，且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了一道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要将中国东北交予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意八路军担任其进攻的破路行动。毛泽东显然相信，莫斯科有些做法只是为了应付外交的一种需要。因此，既然苏军态度友好，八路军能够抢在蒋介石的前面进入东北，就一定有机会插进一只脚进去。故他一

得到消息，即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1]，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2]。当然，斯大林随后的一封要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他不能不又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怀疑。

不过，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在讨论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时说：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他相信，这样同样大有可为。[3] 而他内心里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接收。他明确提出，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他这时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在政治局会上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4] 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5]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在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为什么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他在政治局会上就此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占据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有很大

---

[1] 《毛泽东关于配合苏联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等地给程、耿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

[2] 《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北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5 页。

[3] 《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2 日）。

[4] 1937 年 7 月，中共南方游击队福建何鸣部因过于轻信国民党人的许诺，致使全部被国民党地方武装缴械，是为“何鸣事件”。

[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 年 8 月 26 日）。

影响和利益。他强调：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1]

二、苏军态度不明，中央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三十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负责主持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美苏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毕竟，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东北，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实在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主张：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应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苏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2]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8月26日)。

[2]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乘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当成土匪，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9月7日，他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五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二十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五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晋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两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1]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得。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召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仪式。苏军并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和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

[1] 《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5年9月7、10日)。

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苏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十五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1]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由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2]

为了推迟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他们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三、苏方鼓动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几乎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

[1] 《程、耿致军委电》(1945年9月9日),《胶东区党委给罗荣桓黎玉并中央电》(1945年9月10日),《聂、肖、程、刘致叶剑英电》(1945年9月10、11日)，等等。

[2] 《中央关于抽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页。

东北人民自治军卫戍司令部，和苏军沈阳城防司令部一同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参加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允许他们大量收缴沈阳、锦州、抚顺、辽阳、本溪、鞍山乃至营口等地的敌伪武装，接收各地的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电台、医院和军火库、军需库等，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对八路军颇多限制，最初甚至不让曾克林的部队在沈阳下火车，但凡与苏军接触者都了解，苏军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曾克林部入驻沈阳，就是经过莫斯科最高当局批准的。据曾克林回忆，最初驻守沈阳的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对八路军进入沈阳一事不知所措，致电上峰请示办法，“斯大林、莫洛托夫来电报”后才同意八路军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留下来。苏军允许曾克林部收缴和接收日伪装备、器材、工厂，并把沈阳附近最大的军火库一度交给八路军，显然也是受到莫斯科这种态度影响的结果。[1]因为，苏军官兵明显地同情中共，厌恶国民党。当时来自东北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军纪松弛，酗酒，搞女人，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官兵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拇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愿意交给国民党。

不过，让中共军队公开进入沈阳并到处接收政权，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从曾克林的回忆，以及后来的各种报告中可以看出，苏军公开允许中共军队进入沈阳等东北重要城市，除了上面谈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中共军队来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由于苏军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军纪不好，再加上其兵力也不足以彻底收缴日伪军的武器装备，当时仅沈阳城里，就有相当数量的日伪军、警察和宪兵保留着武器，

[1]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25页。

同时打着国民党地下军旗号的武装就号称有四十个团之多，整天开枪开炮，烧杀抢掠，破坏治安，苏军官兵经常遭到杀害。曾克林部入驻沈阳后，这种情况迅速得到了改观。[1]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对苏联来说却绝非明智之举。莫斯科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苏军已占领之地区。

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似乎有理由对苏方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做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得知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后，深受鼓舞。

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即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式装备。仅沈阳由曾克林部看管的军火库就“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2]。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

[1] 前引《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9—221页。
[2] 《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转见曾克林前引书，第235—236页。

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1]。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做法，再次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了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2]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人，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

[1] 《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1945年9月17日）。
[2]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1]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十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2]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四、苏军宣布提供全部日军装备，要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日益明朗化，明显地与美军 9 月 13 日在青岛登陆有关。严格地说，当时斯大林真正关心的，是把中国东北真正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美国或其他第三国势力染指。在 1945 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他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并在与国民政府的条约上规定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在他看来，一旦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苏联的远东将从此不得安宁。[3] 因此，美军公然在毗邻东北的华北沿海登陆，不可避免地对莫斯科形成了强烈的刺激。美军原本就在

---

[1]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278—279 页。

[2] 前引《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并见《中央关于阻止蒋军进入东北问题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8 日）。

[3] 更不要说斯大林这时还多少有一种成就彼得大帝伟业的满足感。据称此前斯大林曾用烟斗指着一幅特制的、标有苏联新国界的地图，得意地对他的部下说，俄国东边的情况非常好，“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了，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了，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见费·丘耶夫著，王枝南等译：《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16 页。

帮助运送国民党军赶去东北，如今美军更进一步自己登陆华北，不仅成为国民党进入东北部队的强有力后盾，而且势必会便利其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实践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这种情况自然让斯大林放心不下。苏军这时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与此不无关系。

可是，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数上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东北，直至9月底因种种原因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山东、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踏上赶往热察和东北的道路。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八万到十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进行作战，“更快则不可能”。比较之下，蒋介石运兵至东北可能较中共更快，就是自己先机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提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美军更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将领的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

[1] 《军委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

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十五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占东北。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1]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现得很痛快，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会谈后一次即得到步枪三万枝，机枪一百挺，大炮十五门，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东北局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2]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响，因此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他们甚至提出，是否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3]

[1]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
[2]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
[3] 《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1945年10月9日）。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即："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

10月中下旬，美军企图运送国民党军队从大连登陆遭到苏联明确拒绝。[2]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并公然武装执行护路任务，这更让苏军大为恼火。苏军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了同国民党的交涉。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防止其空降。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将协同我打击"国民党。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三百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同时还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及全部人员交给了他们。[3]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

[1]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2] 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9页。

[3]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五十五万至六十万野战军，尚有七十万至一百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只是希望，苏军能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因为集中这么多的部队进入东北时间上确有一定困难。

10 月 27 日，按照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与苏方代表商定的地点，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准备登陆[1]，遭到同样得到苏方协助、预先占据了葫芦岛的八路军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中共军队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端。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的态度毕竟不像东北苏军那样无所顾忌，他们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 28 日又赶紧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实施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已经指示当地苏军撤出原防，全部设施交中共。同时，苏方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2]

11 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二十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登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的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队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加上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达到十五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 10 月 12 日与马利诺夫斯基商谈时曾提出在营口、葫芦岛、安东三处港口登陆的建议，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不反对，称苏方并可派部分车辆协助国民党部队陆路之运输。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 121 页。

[2] 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 138 页。

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陆续输送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1]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开始雄心勃勃地主张："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2]

五、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1945 年 11 月 3 日，由美军运送至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通过美海军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向据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发起了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打响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已有三个军约八万人，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毛泽东一面部署山海关前线部队"坚持半个月"，一面紧急催促正在北上的部队火速赶往南满，并成立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锦州一线布置战场。鉴于"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他同时还决定再调十万兵力赶往东北，要求各部"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千万要快"。

但是，在了解到中共大部分主力仍在路上，非苏军协助缓撤一两个月

[1] 关于向关内运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在曾克林前引书第 257--258 页亦曾提到，称曾用火车先后运送数批军火给鞍山、营口、安东等地新到之内地部队，并利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五百万发子弹、炮弹，支援山东部队。这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来往电报中也几度提到向内地调运武器弹药的情况。但从东北苏军和朝鲜苏军那里得到武器弹药、大批经山东转送华北各根据地的情况，更多地还是发生在 1946 年间。

[2]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 年 11 月 3 日）。

不能有效拒止美蒋进入东北之后，苏方首先泄了气。

苏军代表当面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既然有五十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当初就应早下决心调五十万主力来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现在，苏军所能做的，只有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帮助，缓撤在外交上完全不可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共要想独霸东北已经不可能了。[1]

随后，中共东北局又得到了六架运输机、五十辆坦克、上百门各种炮，接收了沈阳兵工厂的设备，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但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开始怀疑毛泽东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大使解释说，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的势力从中国赶出去。中共制订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实政策。[2]

毛泽东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 月 7 日，毛泽东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旧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使将来不好说话。

[1] 《东北局致毛泽东电》（1945 年 10 月 31 日）。
[2]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4 日）。

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几乎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

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五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军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苏方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一直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接收工作，如今公然于11月12日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东北行营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无法实行。[1]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

[1] 《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电》（1945年11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7—149页。

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四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显而易见，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了。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由于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不仅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也很少可能。

但形势变化之突然，仍旧颇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独占东北计划受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赴重庆谈判以来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 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阻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1] 到次日，刘已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霸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仍寄希望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满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共产党人称之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之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满足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这之后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

---

[1] 《中央关于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条件下力争大城市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9 日）。

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与国民党军队一起进了东北？但是，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六、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走“法国道路”过于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扭转了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了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自己在东北占据的军事上的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是赞成的。

但是，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中共方面还明确同意“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1]。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2]。这样一来，中共本来想乘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政治解决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如今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就在营口发生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

[1]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2] 《中央关于要求苏联出面发起东北问题谈判事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9日)。

蒋介石却坚决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中共占领区。要想保持根据地，中共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相信，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1]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2]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应该说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194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3]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

---

[1] 《中央对目前东北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46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57—60 页。

[2]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 年 2 月 4 日）。

[3] 《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指示》（1946 年 2 月 1 日）。

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从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始终没有出席过中央会议，没有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毛泽东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1]，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毕竟，这种以所谓“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标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为前提的。在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共产党即使能够得到几个部长席位，也不等于能够实现“政治民主化”，甚至也未必能够实现“军队国家化”。

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天的会议，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指示的发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了。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

[1] 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55页。

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1]

七、苏军要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力争以长春为自己的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对方五个营。国民党更是恼羞成怒，公开宣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不能增兵，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这使苏方极为愤怒。因此，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乘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给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并且沈阳以南苏军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2]

东北局提议，乘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

---

[1]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6年2月12日）。

[2]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9日）。

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1]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军方面得知中共中央的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中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2]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 月 15 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绝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3]

16 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恩来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

[1] 《中央关于不要进攻沈阳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2 日），《中央关于东北谈判中心盘子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89—90 页。

[2] 《彭真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6 日）。

[3]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 年 3 月 15 日）。

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一切让他们到东北去与我前方将领商谈。[1]

1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并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2]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3]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已全无可能。毛泽东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刻动员全军乘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4]。毛泽东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拖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毛泽东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5] 毛泽东甚至考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的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3月27日，在马歇尔的催促下，国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它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

[1]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
[2]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17日）。
[3]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6年3月21日）。
[4]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3日）。
[5]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3页；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页。

29 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驻军，以便中共军队占领。4 月上旬，苏军开始向中共转交北满的日军武器库，其中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之上，各种炮上千门。苏军要求中共派主力分别控制于长、哈、齐等城郊，并派少数部队先入城，以便苏军撤出时可顺利夺取三市。他们明确表示，莫斯科希望中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国、美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

4 月 14 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迅速向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中共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于 19 日将该城完全占领。毛泽东得讯后非常高兴，当即通电嘉奖有功部队，并电告东北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中心地区的工作，确保四平、海龙以北在我控制之下，"做长期保持计划"，并考虑迅速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1]

八、毛泽东极机密地要求苏军援助，苏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

要想实现控制长、哈两市及整个中东路的目的，关键在于守住长春路要衢四平街。毛泽东还在长春占领前夕即明确指示林彪等："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并要求林彪坚决克服党内任何动摇情绪，"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2] 长春占领后，毛泽东更是力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一切决定于打胜仗"，至少歼敌三四个师，要东北民主联军"全

[1] 《中央关于占领长春后东北军政部署的指示》（1946 年 4 月 19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71 页；《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往长春的指示》（1946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132—135 页。

[2] 《中央关于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的指示》（1946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59 页。

力争取之”。[1]

在最初的作战中，由于得到大量苏军提供的武器弹药，林彪指挥民主联军打得较为顺利，在四平以南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多师。根据部队伤亡情况，林彪建议“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而毛泽东计算了一月以来国民党在东北被歼兵力的数量，相信“国方兵力不够，如不增兵，决无力于最近打到长春”。

但事实上，由于这时中共在东北所占面广，兵力分散，再加上新兵较多，而国民党所占点少，兵力相对集中，装备又相当精良，因此，从 4 月 18 日开始，国民党不仅仍旧集中了将近七个较精锐的师猛攻四平，而且使民主联军很快就陷入苦战。

保卫四平，对能否保住在东北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毛泽东认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因此，他明确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2] 当然，他也不失时机地主张“力求迅速停战”了。周恩来受命在谈判中提出：苏军已撤，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国民党应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3]

对四平之战，苏方极为关注，评价甚高，再三建议集中主力死守，并保证满足中共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称可以从北朝鲜急运，那里的苏军有大

[1] 《中央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在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的指示》（1946 年 4 月 19 日），《中央关于全力争取四平公主岭地区作战的胜利的指示》（1946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73、175 页。

[2] 《毛泽东关于在四平本溪坚持奋战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的指示》（1946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95 页。

[3] FRUS，1946，Vol, 9, pp.811–812.

量军火，“要多少有多少”。对于毛泽东来说，苏方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大概莫过于“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的主张了。

5月上旬，民主联军在四平的抵抗陷入严重被动之中，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和要不要“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来整补军队”的问题了。5月19日，即占领长春整整一个月后，毛泽东建议林彪于“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从而变被动为主动。[1]

放弃四平，自然也就是要放弃长春。问题是，放弃长春，能否确保实现和平？毛泽东为此要求周恩来向美蒋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但蒋介石刚刚打出些威风来，他断然拒绝了中共方面的提议，必欲打下长春，夺取全东北。

战局如此，毛泽东断定，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所难免。他愤怒地表示：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但与此同时，他确实深感形势危急，如果蒋军一气打到哈尔滨，二十万民主联军势将难以立足，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如何实现？逼不得已，他不得不极机密地要东北局吁请苏方，在蒋军进至北满时，出动部队，到哈尔滨等处协助我军，打击国民党。

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两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西安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毛泽东毅然决然，乘着蒋介石无暇顾及关内之际，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了关内，于6月上旬开始先后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乘蒋军全力向北之际，在关内大打，实施“报复作战”。

这是一着险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着极富想象力的妙棋。蒋介石因

[1] 《中央关于坚守四平不可能时应主动放弃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4页。

此兵不敷用了。打到长春的国民党军原本就兵力不足，南满和东满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军队在牵制作战，又要留下大批部队分守刚刚占据的各战略要点、城市和交通要道，蒋介石这时已无力大举追过松花江了。关内战火再燃，蒋就更是捉襟见肘。结果，毛泽东也用不着请求苏军干预，就在北满建立起了巩固的根据地。由于背靠苏联和驻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而关内的中共部队，特别是投入报复作战的山东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自 5 月起，也从海路陆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其战斗力也明显增强。[1]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

[1]　已知 5 月至 6 月间已从东北秘密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以后每月均有相当数量的军火由东北南运关内，已知 7 月仅一次就运往山东一百余车皮的弹药。

第九章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苏方联络员密告：毛泽东早已买好了皮鞋和呢子大衣，准备秘密访苏，而苏方却再三拖延，使他深感困惑；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力劝毛泽东尽快占领上海、南京，建立新政府；毛泽东告诉苏方，所有原来配备苏制和捷克造武器的部队，入关时都改换了美式装备；斯大林怀疑，美国政府拒绝和谈方案是因为中共泄露了苏方意图……

1948年夏天，中共曾经派出过一个青年代表团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组织的会议，团长是蒋南翔。当时共产党情报局已经宣布开除南斯拉夫，中共中央专门就此发表了支持情报局的文件。但是，让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几乎所有与会的代表都对中国代表避之唯恐不及，大会上代表们起立欢呼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斯大林一直到胡志明，唯独不提铁托和毛泽东。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期间，甚至还受到严密的监视，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的一个喷嚏会把“富农路线”的细菌传播到苏联去。[1]

这个时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踏步走向全国胜利的时候；如果照南斯拉夫人的说法，也是斯大林刚刚承认他不该干涉中国革命几个月之后。[2]照理说，俄国人这个时候应该对中国人欢迎有加才是。想不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铁托的不驯服而引起的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斗争，竟然导致俄国人对与铁托有着极其相似的起家背景的毛泽东也倍生猜疑。关于“半个铁托”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严格说起来，毛泽东“太岁头上动土”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铁托。毕竟，当年毛泽东婉拒莫斯科援助请求的时候，铁托的游击队还在向苏联求援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俄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的说法，相信与斯大林后来扣给铁托的“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帽子相比，没有多大差别。反南共连带着在内部批中共，在俄国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

问题在于，毛泽东对此始终想不通。当年弄不明白，后来仍然弄不明白：凡事当以成败论英雄。中国革命如此成功，在反南问题上的表现也绝不输于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斯大林当年对自己为什么还总是不冷不热，疑心重重？

---

[1] 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年7月）。

[2] 据德热拉斯回忆，1948年2月斯大林曾当面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承认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干涉中国革命是犯了错误。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454—455页。

一、毛泽东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重要

1947 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据此，他一面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一面开始设想取得苏联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计划亲自去一趟莫斯科，既可以当面解释误会，消除隔阂，又需要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

关于毛泽东最早开始考虑赴苏访问的时间，据毛泽东当年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应在这一年七八月间。当时斯大林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批中共将领被俘的消息，曾急忙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暂避苏联。毛泽东访苏问题即由此而起。而据来自俄国的档案则显示，还在师哲所说的大约一两个月前，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 月 15 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说明：“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与此同时，斯大林强调说：“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做声张。”[1]

毛泽东提出访苏要求之际，正值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关系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之时。就在斯大林复电同意毛泽东来访的数天前，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项著名的演说，明确宣布要承担“欧洲复兴”的责任。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政府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国家因渴望美援而成为美国的附属国。想不到，会议只开了几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发现，“马歇尔计划”不仅旨在从政治

---

[1] 参见转见 A. 列多夫斯基编著，彭卓吾译：《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本章主要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不另注）。

上影响各被援助国，而且其目标还瞄向了东欧各国。为避免东欧国家被纳入到“马歇尔计划”之中，苏联代表团不得不宣布退出会议。欧洲国家因此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自 7 月初至 8 月底，苏联依照“马歇尔计划”的方式，接连同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以切断东欧各国同美国及西欧各国之间的主要经贸联系。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活动，苏联与东欧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9 月下旬在波兰举行会议，并于 10 月 5 日宣布组成“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从而拉开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序幕。在这样一种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莫斯科确实很难接待毛泽东。只是，斯大林在得知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的消息之后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并没有告诉毛他在欧洲所遇到的严峻局势，只是委婉地表示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还是推迟毛泽东的访问为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又发生在 1948 年 4—5 月间。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况看起来复杂了许多。本来，由于中共在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和冷战局面的形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寄予厚望。这表现在 1948 年 2 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坦率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这一年 3 月，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已明确指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特别是“中国解放运动”的斗争。因为，“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1] 而为了便于援助中共，这一年 4 月，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专门约见了中共东北局领导人，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

---

[1] Brian Murray, *Stalin, the Cold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

以便于苏联承认和向中共提供援助。[1] 不久之后，斯大林还专门召见了即将带领技术人员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铁道部部长柯瓦廖夫，告诉他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那样我们就不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了。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2]。因此，毛泽东这个时候提出的访苏要求，斯大林理当会表示热情的欢迎态度。双方商定，毛泽东可以在1948年7月访问莫斯科。

但是，随着华北大部以及整个东北正在落入自己手中，毛泽东对去苏联访问的心情变得十分迫切。还在4月中旬，毛泽东就已经与中共中央商定，他要尽快前往莫斯科。4月26日，毛泽东正式通知斯大林说：“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或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为表示自己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他甚至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三天后，即29日，斯大林打来电报，答复得很痛快，说：“您4月26日的信收悉。您认为需要带谁，带几个人，都可以。两名俄国医生应当陪同您。他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我们面谈。”

可随后接连发生两件事却再度使斯大林对接待毛泽东迟疑不决起来。

一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苏共中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明确认为铁托的反抗，实际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种结果。为此，苏共中央于5月4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南共中央，特别提

---

[1] 《高岗致毛泽东、刘少奇电》（1948年4月25日）。转见沈志华：《历史考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对中苏经济关系的初步研究（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版。

[2]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г.No.1–3, л.77, 同上引注。

到农民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显然，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招待毛泽东，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因为，铁托问题很容易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俄共领导人联想起毛泽东当年拒绝对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那段历史。他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认为，毛泽东与其说代表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像铁托一样代表农民，说得准确点是代表“富农”。正因为如此，当6月底情报局正式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之后，蒋南翔率团前往莫斯科与东欧时，不仅备受冷遇，而且吃惊地发现，那里的共产党人竟然把毛泽东同铁托同等看待。

另一件事也同样发生在5月4日。那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向莫洛托夫提出的一项政策声明。据这位大使表示，美国不喜欢欧洲分成两个对立集团的情况，美国也毫无反对苏联的意图，问题是俄国的扩张政策和对“马歇尔计划”毫无理由的反对，造成了两国关系目前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但对于美国来说，“充分讨论和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的”。很显然，在苏联方面看来，大使的这种主动意味着美国希望开始谋求缓和的双方会谈。于是，莫洛托夫很快于9日同美国大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同意举行谈判。两天后，莫斯科的广播电台干脆广播了莫洛托夫与美国大使两次谈话的内容。其希望缓和的心态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争高下的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似乎也不那么合适。

因此，5月10日，斯大林再度从“关心”毛泽东安全和为中国革命着想的角度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求毛泽东推迟出发时间，说：“鉴于您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傅作义军队对冯玉祥（原文如此——引者）发动的进攻，也就是对您来我们这里所要经过的三个地区发动的进攻，我们担心，您离开岗位是否会对事态发展进程有影响，以及您经过这三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安全保证。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是否应把来访时间推迟一些。”

斯大林大概自己也知道再度使用这样的借口有些牵强，只好在电报结尾处十分勉强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您决定不推迟起程时间，请告知，

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毛泽东当然不好强人所难。他当天就答复斯大林说:"在目前形势下，把我到您那里去的时间还是稍作推迟为好。"

又等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于7月4日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我决定在最近到您那里去。""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原文如此——引者)。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时，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又正在为柏林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接待毛泽东的适当时机。且七八月也正是苏联夏粮收获和征购的季节，苏联的粮食问题长期紧张，事关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每逢粮食收获季节政治局成员大都必须要分赴各地坐阵监督把粮食收上来。故斯大林不能不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接到这封电报的当天，负责电台联络的阿洛夫医生就立即把电报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看过电报内容之后，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了。他一面平静地口述了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表示同意把访问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他的疑问："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对此，就连苏方联络员阿洛夫也颇感不安。他在回电中专门说明了毛泽东对访苏重视的程度。他写道："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他以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毛泽东的箱子已经装好，甚至买了皮鞋（他像这里的所有人一样，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不仅是访问本身问题，而且连访问日期问题，他们都已经定了。只剩下怎么走的问题了。"因为时至于此，无论是安全还是战争，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毛泽东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拒绝。他只是"表面上很平静，很礼貌，也很殷勤，

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其实，他不止一次地提出疑问：苏联领导人怎么会这么重视粮食征购工作？

二、毛泽东急于向斯大林“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中共中央直到7月下旬才得知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并且，这一消息也并非直接来自莫斯科，而是中共东北局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那里听说的。当东北局把这个消息转报中央，提议组织学习情报局这一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同意。8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情报局的这一决定，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努力与苏联保持一致，这是中共中央在准备成立新中国之前考虑最多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核心目的之一。阿洛夫在8月28日的一封电报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阿洛夫向斯大林转告说：毛泽东表示，他所以急于访问莫斯科，是因为解放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他着重想谈的问题是：

（一）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二）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三）关于同美国及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

（五）关于三千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

（六）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

毛泽东强调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

与苏联取得一致的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中国的新政府需要强大苏联的有力支持和援助；一是考虑到未来新中国可能面临的

种种压力和困难，毛泽东亟须参考和汲取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建国的经验。目前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封向斯大林咨询的电报，就是有关建国方策的问题。那还是1947年11月30日的事。毛泽东这一天打电报给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打倒蒋介石的宣言时，还公开宣布，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 为什么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中共的想法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呢？这也就难怪不少国内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对此一文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了。[2]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共产党阶级政策的目标，熟悉其奋斗历程中对资产阶级政策几经反复的经过，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这时的统战政策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3]

其实，就在10月27日，毛泽东就为周恩来起草的一份中央文件加写了一条内容。毛当时写道：“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4] 在继续保持统战关系的情况下，要准备一步一步地抛弃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这其实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在相信国民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后，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高度防范

[1]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1235、1237页。

[2] 见发表米高扬报告的《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91页）的编者在这段引文之后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注，说明这段文字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主张，并且与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2月25日《关于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全不符。

[3] 关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几经变动的情况，可参见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4]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领导权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

心理。而就在这一天，国民党政府恰好宣告中国最大的民主党派即民主同盟为非法，随即民盟也迫于压力被迫宣告解散，这自然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避免与下一阶段革命敌人建立联合政府的重要机会。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 11 月 30 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想法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在电文中实际上也解释了他的这一想法。他说：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香港的李济深和在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1]

斯大林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电，不知为何一直拖到 1948 年的 4 月 20 日。在目前俄国方面公开的这封回电中，斯大林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

[1] 南斯拉夫建国后取缔了所有政党，只有共产党保留着单独的组织（后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但同时保留着一个战前建立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包含着原属其他政党又愿意和新政权合作的各种非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参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斯大林在这里强调了革命的阶段性和争取民众的斗争策略，关于这一点，其实与毛泽东的主张严格说也并无本质的分歧。事实上，随着 1948 年 1 月民盟在香港重新宣告恢复活动，中共中央也立即恢复了原本的统战政策。但是，有一个问题显然并没有解决，那就是，共产党长期以来久已习惯了自己来决定一切，突然要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合政府，通过协商来决定国家的各项事务，他们还是不能不感到某种担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接到斯大林的来电，毛泽东依旧在 8 月 28 日的电报中把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列为到莫斯科需要讨论的第一重要的问题。

共产党人之所以会对民主党派如此担心，根本原因就在于，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紧接着民主革命之后，必然会是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当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资产阶级就要成为共产党最主要的敌人了。这一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他们明确肯定：一旦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阶段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不复存在，“则主要矛盾就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为此，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有清醒头脑，暂

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它叛变的可能。[1] 但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保持这种暂时的合作，什么时候应当抛弃并打倒资产阶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既缺少全面的理论上的思考，更缺少实践上的经验。他们只是通过对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表，相信这一过程在中国至少应当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为了获得更确切的认识，9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不能不再度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的要求，说明他需要亲自就一些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同志做出报告，衷心希望得到他们的指示。

按照新约定的时间，毛泽东应当在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也在紧张部署之中。11月11日，他宣布：只须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2] 鉴于战争进程发展迅速，毛泽东无法按照预定时间动身赴莫。21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莫时间推迟到12月底。想不到的是，这回斯大林再度婉拒。只是，这回的理由看起来比较合乎情理了。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回电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14日，斯大林又再度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考虑到国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复电表示赞同，并提出，苏共中央的代表最好能够经旅顺飞石家庄，再转往中共中央目前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斯大林当即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中国会晤毛泽东。

不过，就米高扬来华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斯大林在电报中没有说明的。

[1] 参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

[2] 毛泽东：《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93—194页。

三、斯大林劝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疑心苏有意搞“南北朝”

这个时候的国内形势异常复杂微妙。让毛泽东最不放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和平阴谋”。

这时，不光东北，就连华北以及整个黄淮流域都已成共产党囊中之物，蒋介石数百万军队所剩无几，国民党军事上败局已定，南京方面谋和之声陡然高涨，美国人甚至考虑用换马术来改善国民党的政治形象，尽可能使国民政府不致被迅速推翻。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和平”前景。为此，他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并警告说，凡是试图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

毛泽东没有想到，正当他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即中共能够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并征得中共对苏联居中

[1]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1382—1384页；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

调解的同意。”“如果问及您的意见，您大体上可以这样答复：中共一向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并且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1]

斯大林这封电报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对四年前抗战结束时几乎同样的情景刻骨铭心。当时，国民党主力远在边远的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东、华中以至华南敌后地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毛泽东早就估计，这是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极好时机，并相信战后苏联必会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没想到，这边日本宣告投降，那边斯大林一纸电报严厉督促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和平民主”，说是再打仗必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毛泽东当时气得两天没出门，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必定痛责斯大林“不许革命”。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再度让毛泽东想起了那件往事，因而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1949 年的毛泽东已经用不着像 1945 年那样委曲求全了。斯大林电报到时，淮海战役也已结束，解放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平津之敌也正处于最后解决的过程之中，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因此，毛泽东几乎在得到电报的当天就明确答复斯大林说：好像我们现在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了。在目前形势下，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 1 月 10 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诬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今天，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

---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 年 1 月 10 日），APRF，45/1/330/95—96，转见 Odd Arne Westad,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民党政府也十分不利，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进攻南京了。[1]

1948年2月，斯大林在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经出人意料地提起过自己在抗战结束后干预中国革命那件事，并承认自己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在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很难想象斯大林会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事实上，斯大林的电报的确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而斯大林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10日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又连忙发出了一封补充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特别解释说：他起草的那个答复南京政府的意见，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建议的和平谈判。而国民党也绝不会同意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的谈判。同样，国民党也不会同意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他估计，国民党一定会拒绝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条件。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国民党反而因为拒绝和平谈判受到谴责。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阴谋将被挫败，你们就能够继续你们胜利的解放战争了。[2]

还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之间就如何应付南京政府的和平提议一事交换意见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人意料地于13日向南京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拒绝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一消息无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还是在克里姆林宫，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本来，人们估计南京的和平动议是美国人的主意，如今美国人却如此迅速地做出了消极反应，这让俄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1月14日，斯大林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局势。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一定是中共方面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由于无法判断美国意欲何为，斯大林更加确信，公开拒绝和平谈判是不可取的，必须劝说毛泽东接过和平谈判的旗帜。

斯大林当天发出的电报告诉毛泽东说，他完全清楚我们不能上国民党和

[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年1月13日），APRF，45/1/330/100—103，同上。
[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1日），APRF，45/1/330/97—99，同上。

平阴谋的当，因为它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停战来恢复其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它在长江南岸的防线，进一步从美国得到装备和援助，然后反过来给人民解放军一个猛扑。对此，我们确实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地公开拒绝南京的建议，宣布继续战争，但这意味着你们把自己的底牌摊在桌面上，拱手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和平的旗帜——给国民党，从而便利于美国公开造谣中共反对和平，和组织大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调：直接和坦率地回答问题，对于诚实的人们是必要的，但在与政治骗子即与南京国民党这样的人打交道时，这样回答问题就可能具有危险性。

他相信，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答复南京才是最有利的。那就是，中共应当声明，他们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谈判只能在没有外国调停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国民党只能以一个党派的身份，而不能继续以负有内战责任、早已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的名义参加谈判。即使国民党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斯大林补充说，那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在谈判时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五分之三，在联合政府中占有三分之二的位子，要求政府主席、国务总理、军队总司令都应由共产党人担任，任何拒绝忠实于这个政府的军队都将被取缔。在他看来，南京政府几乎不可能同意这些办法，结果它将被完全孤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南京国民党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政府了。

当然，斯大林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他在电报中特别声明，他的意见只提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丝毫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它，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关系。[1] 而毛泽东这边实际上也认识到斯大林的建议有其宣传的价值，因而于14日当天发出《关于时局的声明》，公开表示，只要南京当局同意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中共可以与南京进行和平谈判。[2] 随即，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阻挠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4日），APRF，45/1/330/110—113，同上。
[2] 《毛泽东选集》，第1394页。

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1]。

不过，事情虽然就此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在莫斯科一方，还是在西柏坡一方，双方之间仍旧因为这件事引起了一定的误解。毛泽东确信斯大林最初是有过让战争停下来的想法的。斯大林则怀疑中共中央泄漏了机密。他 14 日电报中所以提出毛泽东应当再度推迟访莫，并决心派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国，看来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 1 月 1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让毛泽东现在来莫斯科未必是明智之举。他毕竟还是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尽管双方已经商定让毛泽东秘密来访，但目前看他此行绝难不走漏风声。一旦被西方知道，一定会就此大做文章，说他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不仅会损害中共的声誉，使中国形势复杂化，而且对苏联也不利。

四、莫斯科主张速占宁沪成立政府，毛强调 4 月过江，拖半年再说

米高扬 1 月 26 日从莫斯科动身，一路飞到旅顺口，再飞到石家庄。1 月 30 日凌晨，他和两位科瓦廖夫，一位是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前交通部长，一位是中文翻译，一同受到朱德和任弼时的欢迎。他们随即乘坐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赶了将近一百七十公里的路，来到了中共中央这时所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2]

来到西柏坡的当天，毛泽东就和米高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谈话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以谦虚的口吻表示：“中国远远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一些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很多错误，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3]

---

[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 年 1 月 14 日)，APRF，45/1/330/104—105，同上。

[2] 前引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372—373 页。

[3] 以下引述转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访华（1949 年 1—2 月）》，见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87 页。不另注。

米高扬急忙回答说："这些话多半只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我不能同意。作为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在中国领导二十年的内战并取得胜利的。"

在一番自谦之后，毛泽东随后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您看看，"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就说王明吧，他起过很坏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把他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他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因为，我们一贯主张：在党内要宽容，不应该因为有分歧就把人开除出党，更不应该迫害人。

还在来中国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就具体讨论研究过米高扬此行的使命。王明问题早被列为尽量回避讨论的话题之一。当然，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讨论仍旧是十分热烈的。从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日起，双方就开始了直接交换意见的过程。考虑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关心人民解放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目标和中共中央目前的政治行动方案。米高扬很快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米高扬首先询问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准备什么时候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和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这大概要到 4 月份以后。因为要确保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部队从北平派往南方和西南，以遏制那里的国民党军队，使它不能调兵增援南京、上海一带。而目前情况下，北平问题还未最后解决，另外部队还需要解决教育数万俘虏、加强后勤、补充枪炮弹药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致力于夺取广大的乡村，避免攻占大城市。这是因为中共的基本成分是农民，管理像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相当多的干部。再加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靠外地的原料和燃料维持的，那里粮食本来就十分紧缺，拿下上海，

这方面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工业就会停滞，失业就会蔓延，人民的境遇就会恶化。因此，我们并不急于占领上海。

米高扬显然不大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根据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占领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应当是越快越好。这除了可以剥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以外，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斯大林对中共长期活动在乡村，党员主要是农民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中共的阶级性质也颇多怀疑。因此，当他得知中共正在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必要推动中共加快占领大城市的步伐。米高扬据此明确表示：占领大城市一事，越快越好。干部也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上海的食品和原料问题总有一天要出现，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们推迟进攻的理由。而占领上海的好处要多得多。它不仅会严重削弱蒋介石的力量，而且能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成立革命政府的问题。在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中共继续以反叛的游击队形象出现是不策略的。早日拿下南京、上海，早日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应当是革命的当务之急。这样做对内对外都有好处，也便利于根本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确信：没有政府对中共目前要更有利些。因为如果有了政府，就要搞联合，结果中共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其他党派负责。那样势必使问题复杂化。米高扬争辩说：推迟建立政府，其实只会削弱革命力量。毛泽东则坚持：即使4月份以后打下南京、上海，也不急于成立政府，至少要拖到六七月以后再说。

双方的这段讨论显示，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以及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上，苏联方面这时似乎比中共中央还急。

2月1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参加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是朱德和周恩来。据周恩来介绍，人民解放军这时只有一百五十门反坦克炮，坦克也不行，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十五吨，在徐州战役

中缴获了七十辆坦克，大部还被损坏了。同时，在军工生产方面，中共现在缺少军工原料，包括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希望苏联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错弟尔、钢材、汽油、近三千辆汽车以及其他武器生产的必要设备，并派一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米高扬当场答复说：他将呈请苏联政府考虑这些要求。原则上苏共中央已经同意帮助中共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具体到提供武器和物资等问题则必须进一步具体研究。

2月1日的会谈中，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这就是：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当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处于同样情况中的美英大使为什么可以不这样做，罗申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共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做任何说明。

2月2日的会谈继续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说："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一) 苏中经济联合体；(二) 苏联贷款；(三) 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一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

合作开发或组办专门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五百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一) 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二) 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三) 向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当然，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将会更快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这次讨论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要等上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五、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涉及了更多的与双边关系有关的问题。

3 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

毛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但毛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头一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从 1948 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中国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

就加强同苏联的联系问题，毛泽东再度强调了苏共经验和指导的重要性。

他特别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 1927 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非常具有启发性。据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中共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派遣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顾问；另一方面未来新中国需要考虑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他建议派王稼祥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则进一步提出，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接触，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可能需要到莫斯科去解决。

在 4、5 两日的会谈中触及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米高扬在 4 日晚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明："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欣赏这项建议。"但 5 日的谈话显示，毛泽东多少有些怀疑中国北部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与苏联的支持有关。他提出，新疆伊犁地区正在发生独立运动，在那里搞独立的并不是乌鲁木齐的政府，而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而 1945 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见面时，白曾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

米高扬马上解释说：苏联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搞独立运动，苏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新疆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呢？毛泽东问。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

毛泽东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米高扬当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了，恐怕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那结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

任弼时这时插话说:可是，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

得到米高扬电报的斯大林当晚不能不打来电报，明确告诫毛泽东不要设想把外蒙古重新归入中国的版图。电报说："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

这两天讨论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据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介绍说，他说明苏联方面对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铁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他解释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听了米高扬的话之后，都颇感惊讶。他们纷纷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毛泽东并非无意地提出，有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找过他，向他

提出：革命政府成立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持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他认为，这位女性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但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进行压迫，苏联在旅顺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这块基地了。

注意到毛泽东说明的情况，斯大林在 2 月 5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不能不进一步重申了米高扬说过的那些基本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六、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极力称赞中国革命经验

毛泽东继续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 6 日和 7 日的会谈。会谈又回到了苏联援助的话题。在前一天，毛泽东曾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入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了，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6 日的谈话中，他在提到中共需要三亿美元贷款、三千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时，又再度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而现在，“我们需要三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提供这个数目，是少还是多。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 1949 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

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关于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有明确的说明。他指出：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肯定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

当然，毛泽东同时表示：仅仅依靠外部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包括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工业。他提出，在现阶段，允许国内市场自由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发展落后，就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不能性急。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就不能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可能失去对农民的领导。而农民是中国居民中的主要成分。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在谈到中国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显得格外满意，他告诉米高扬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是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高得多”。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7日晚上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总结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他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甚至特别提出：为什么在中共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没有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同意毛泽东自谦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创造。他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八天的谈话之后，也发觉：“他们对

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因此，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更具体的资料，说明需要，写明准备从苏联方面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双方为此商定，过一段时间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到苏联去，与苏联具体讨论各项重大政策问题以及建国前必然要遇到的其他问题，同时签订贷款协议。

从俄国目前公布的米高扬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米高扬的这次访问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是减少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疑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结束了这次访问，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了莫斯科。这次可以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米高扬明显地对毛泽东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进一步的了解，这同样也会对斯大林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米高扬的这次秘访，对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接近，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章

莫斯科祝寿风波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斯大林不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痛骂了科瓦廖夫，就是要让他去告诉斯大林；而照料毛泽东起居的俄国人当时却报告说，那些天毛泽东的情绪很好，有说有笑；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毛泽东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围绕着对美国国务卿的声明问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

毛泽东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去莫斯科，另一次还是去莫斯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1956 年，当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这件事，告诉苏联大使说，我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斯大林却不想签，故意回避我，不见我。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这样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呆在别墅里。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谈话，话不投机，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去观光。我坚决拒绝，回答说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1]

1957 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当时斯大林还在你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他对第一访苏的说法也进一步增加了火药味，说那次与斯大林吵了几架，斯大林火了。有一次打电话时吵了起来，斯大林当时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为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就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恨透了我”。但“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想转个弯”。他甚至总结出经验来了，说是“跟斯大林这样的人就要斗，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2]。

毛泽东和斯大林究竟怎么了？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渴望到苏联去。1920 年初，当他的大部分同乡都热衷于留法勤工俭学时，他就明确表示说：我们这辈人都应当过一回“‘出洋’

[1] 尤金记，李玉贞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 年 3 月 31 日），转见《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 年第 2 期。

[2] 《毛泽东与波兰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20 日）。

的瘾"，但"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以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1]

由于毛泽东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再没有遇到过合适的赴苏机会。以后中共中央虽然也考虑过把他送去苏联学习或养病，却多半并非出自毛泽东的自愿，当然最后也都没有成行。1947 年以后毛泽东认为访苏的时机适宜了，莫斯科方面又推三阻四。联系到毛泽东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种种不满，可知 1949 年这次他虽然总算是可以过那个"'出洋'的瘾"了，但他是不是还有年轻时那种"朝圣"的真诚愿望，就难说了。他那段"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的开场白，多少反映了他这时的复杂心情。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即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六小时以后，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双方当即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经过一段简短的问答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不是祝寿，而是提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也很痛快，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应该保留 1945 年苏联政府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暂时不动它，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抑或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双方有关这一条约的交涉情况略作回顾。

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 1949 年 2 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自己主动提出，1945 年 8 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尽管，米高扬根据斯大林的电报指明了这主要是针对中苏关于旅顺港将由苏军防务的那个具体的协定。他说："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米高扬同时还提到中长铁路条约，说关于中苏联合组织长春铁路公司，共同经营和管理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协议，可能没有完全执行平等原则，将来可以讨

[1] 《毛泽东给陶毅信》（1920 年 2 月），《毛泽东给周世钊信》（1920 年 3 月 14 日），《新民学会资料》，第 61、65 页。

论修订，但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其实应该是中东铁路——引者）主要是用俄国资金修筑的”[1]。

这个时候，当务之急还是彻底打倒蒋介石，同时完成千头万绪的建国准备，中共中央对重订中苏条约问题尚无考虑，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中苏条约对中共是有利的，目前谈不到苏军撤出和修改条约的问题，一切等到我们巩固的时候。那时，“你们撤出中国，我们要签订一个类似于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2]。

1949 年 7 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对重订条约问题仍无全面的考虑和研究，因此，刘少奇就中苏条约问题提出的建议仍旧比较委婉，有些模棱两可。他提出：新中国政府“完全愿意继承”旧条约，但可考虑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加以处理：即（一）不加任何修改；（二）在原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对此，斯大林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建议“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3]。

毛泽东明显倾向于签订新条约的情况，发生在共产党的新政府成立以后。因为新政府成立，中苏正式建交，虽然中共中央为保持中苏旧约问题留有余地，[4] 但毛泽东准备实行的是“另起炉灶”，即废除一切旧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及协定，另定新条约新协定，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对外新政策，如果对美国是一个样子，对苏联是另一个样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更何况，这个条约还附带着苏联租用旅顺港三十年这种早就备受国人抨击的不平等协定呢？

11 月上旬，毛泽东即通过斯大林派在他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向斯

[1] 前引《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

[2] 同上引注。

[3] 前引《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信》。

[4] 周恩来在 1949 年 4 月曾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1 页。

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他在谈到访苏目的时明确提出，希望访问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以便签署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东欧访问，一个月的时间去苏联南方养病。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并特意再度提到了条约问题。由于米高扬主动地提出过重订条约的问题，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因此，毛泽东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当然，出于礼貌，他还是在电报中委婉地提出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签字。10日，他又专门委托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罗申，一方面进一步请罗申将他想要拜会斯大林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此行想要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1]

由于没有得到苏方的及时反应，为了促使斯大林尽快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一周以后，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并担负着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任务的李克农，并非无意地对苏联外交人员提到，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他解释说，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2]

然而，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另订新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肯定答复。这显而易见使格外敏感的毛泽东尚未成行就已经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毛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又是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却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出行仪式，就悄然去了莫斯科，就很足以体会到毛此时内心忐忑的程度了。

斯大林不可能不重视作为东方人口大国和领土大国，同时又与苏联有着

[1] 前引科瓦廖夫口述，冈察洛夫整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转见（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

[2] 《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沈志华提供：《苏中关系资料》。

几千公里边界接壤的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它的重要性。更何况这个时候美苏正处于高度紧张的形势下，对中国的争夺就更加举足轻重。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他拒绝毛泽东要求签订新约的提议，可能会给两国关系乃至于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种对毛泽东具有伤害性的做法。有学者推测斯大林一定收到了来自科瓦廖夫或其他渠道的对中共领导人不利的报告，因而使他对重订条约的意义发生了怀疑。[1]但更大的可能是，斯大林这时考虑到了废除旧条约可能给苏联带来的影响问题。从他这时专门请了国际法专家，来研究修订或重订中苏条约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种影响曾经是何等的担心。事实上，考虑到美苏冷战的严重背景，这些俄国专家几乎都认为，与中共重订条约，美、英不是没有可能要求苏联放弃它从《雅尔塔协定》中所获得的其他利益，比如千岛群岛乃至南库页岛等。有了这样的理由，再加上对毛泽东的不了解与不能完全放心，斯大林希望不要急于重订中苏条约，就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了。

在12月16日当天的谈话当中，斯大林对毛泽东解释说：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2]。

---

[1] 保罗·温哥罗夫著，张卫东译：《毛泽东在莫斯科（1949—1950）：新的档案证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2]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提到这些顾虑缺少心理准备，因而变得进退两难。他坚信他此行有必要带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振奋人心的平等条约回去，但他从没有想到收回自己的利权，会给苏联造成领土上的损失。这显然有违毛泽东的初衷。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为什么不必马上改变旅顺港的现状问题，毛泽东早在与米高扬谈话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是因为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毛泽东甚至明确讲："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1]

对此，斯大林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旧条约改不改目前倒不甚重要，最能反映旧条约不平等的实质性内容的，就是苏联通过租借旅顺港在中国驻军的相关协定。毛泽东此行若能在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真正为共产党获得了声望。他解释说：因为"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因此，撤军不仅符合两国关系的平等原则，"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2]。

既然毛泽东行前已经明确表示，签订新约是他此行主要目的，可知第一次见斯大林就被迫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会多么扫兴。因此，他最后还是心犹不甘地提了一句："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

[1] 前引《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2] 同上引注。

题呢？”看起来，他嘴上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条约”，心里却多少仍旧在想，对旧条约是否还有可能做些必要的处理呢？[1]

对此，占尽上风的斯大林当即把毛泽东的话堵了回去。他在强调“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的同时，特别订正毛说：“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这意思很清楚，既然您已经同意不必修改条约了，那么周恩来即便来，也不能说是来解决条约问题的。

二、毛泽东真的曾大发脾气，拒不出门，在别墅里睡大觉吗？

不少文章和书都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大为渲染，给人印象，“毛泽东很不满意”。但从接连应酬之后，毛泽东 18 日给刘少奇去的电报中看，情况似乎并不尽然。他这时语气平和，心情愉快，感觉不错。

电报称：（一）16 日到莫斯科，下午 10 时（北京时间）与斯大林谈两小时，情意恳切。谈了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问题。（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而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四）斯大林说，

[1] 前引《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签个声明，外长不必飞来。我说，我考虑一下，想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总理还是去。条约问题如何解决请政治局讨论并提意见。[1]

从电报中，我们看不出毛泽东有任何明显不满的情况。相反，他认为与斯大林谈得很好，“情意恳切”。斯大林所谈各项问题，包括对是否签订新条约的解释，毛泽东也很能理解，特别强调斯大林说两年以后即可做相当大的修改。唯独对周恩来赴莫事，毛还有些不同意见。毛泽东隔了一天之后发出的这封电报，是否反映的是他真实的感受，颇令人生疑。以毛异常敏感的性格，和第一次代表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出访，就不能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心理落差，足以想象他与斯大林谈话后内心当不会太好受。如果这一点能够确定，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毛泽东在电报中对这次谈话评价如此之好，其意也不过是出于政治上和自身形象上的考虑罢了。也正因为对自身政治形象上的高度重视，他才会特别坚持一定要让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前来莫斯科签订一揽子协定，以示隆重。想不到，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这种心情并未理解，以致想法与毛相差甚远。

21 日，刘少奇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称：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2] 毛泽东的电报明明讲，考虑周还是去，“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政治局却认定斯大林就是想签个声明，“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因此认为周去无益。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局得到毛泽东电报后的观感较毛要差得多。

好在这一天毛泽东阴郁的心情在斯大林的精心安排下，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21 日晚，毛泽东应邀出席了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在苏联

[1]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18 页。

[2] 裴坚章前引书，第 18 页。

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斯大林特地陪同毛泽东一道步出会场，接受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毛泽东并且被特意安排与斯大林并排就坐在主席台正中央，并被安排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国家元首。其规格之高，引人注目。但很显然，这一天的毛泽东，心情仍不是很好。在各种已见报的照片中，他的眉头始终紧锁，未见一丝笑意。

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毛泽东以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不仅就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而且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就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活动这时可谓达到了高潮。而这一天毛泽东的面容明显地松弛了许多。这也就难怪他在这一天的活动之后，马上就拍发了电报，专门告诉中共中央说：已经与斯大林约好23日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就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了。他同时特别提道：“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他显然十分欣赏苏联塔斯社就此所做出的报道，为此专门要求新华社发消息时要用塔斯社的新闻稿。[1]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记录至今未见披露，能够看到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来往电报的中国外交部研究室，在集体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一书中谈到这次会谈的内容时，只有一句话，即“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2]。

不过，毛泽东在1956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时，却持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当时“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

---

[1] 裴坚章前引书，第1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2] 裴坚章前引书，第18页。

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1]。

究竟是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还是毛泽东旧话重提被斯大林当场拒绝了呢？在这里，科瓦廖夫保存的一份文献似乎不应该被忽略。科瓦廖夫说，12 月 22 日，毛泽东请科瓦廖夫到他住的地方去进行了谈话。科瓦廖夫随后把谈话整理成记录送给了斯大林。记录中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想在 12 月 23—24 日有一次依次进行的会见。"毛泽东打算提出两个进一步谈判的方案，由斯大林来做选择。"第一个方案规定要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交通协定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打算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办理签订各种协定的手续。""第二个方案规定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与第一个方案中的相同，但是没有要对一些协定办理有关的手续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没有必要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2]

对上述资料加以分析的结果，是毛泽东的说法和《外交史》一书中的说法理当都有一定的根据。鉴于毛泽东事先已经明确地向斯大林提出了想要解决条约和协定的问题，两人这次会谈照理不可能不涉及这一话题。一种可能是斯大林在 24 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一上来就回绝了毛泽东的第一个方案，两人完全没有能够就此展开讨论，因而毛或因不满，或因无话好讲，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干脆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毛泽东 22 日晚已经告诉刘少奇等，他和斯大林 23—24 日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并会有所结果，他在电报中一句不提似乎很少可能性。因此，很可能还存在着我们所不了解的另一次会谈或另一封电报。即毛泽东和斯大林可能正像毛泽东提议的那样，在 23—24 日依次进行了两次会谈，或《外交史》的作者只看到了毛

[1] 前引《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2] 前引《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

说明24日会谈中讨论兄弟党问题的电报，而没有看到毛的另一封介绍讨论如何处理协定问题的电报，因此才会误认为斯大林这时根本未提及条约或协定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非常希望周恩来能够到莫斯科来。在通过第一次会谈了解到斯大林的想法之后，毛泽东显然并不指望能够另订新约，但即使在保留旧约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一个如何缔结新的贷款、贸易、交通等协定以及如何使新的协定与旧约相协调的问题，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何况，毛泽东也不愿意自己来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如果周恩来能够来莫，并且与苏方达成妥协，最终将条约一一签订下来，毛泽东此行也会显得有成就一些。想不到，看来斯大林连毛泽东的这一点起码的要求都没有能够痛痛快快地接受，难怪会惹得毛泽东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用一些文章中的说法是，毛泽东会谈后即大发脾气，闭门不出。

斯大林为什么在16日的会谈中还同意说“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而24日会谈时却对周恩来前来签约一事也没能痛快地答应毛泽东呢？关于这一点，因为我们目前缺少相关的文献，因此也还只能进行某种推测。这里面可能有科瓦廖夫秘密报告影响的作用，但更大可能还是斯大林太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习惯。

就前者而言，科瓦廖夫恰好在24日当天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个有关中共中央内部情况和政策倾向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报告认为中共中央在许多事情上都没有听取斯大林的建议，并且始终对英美两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幻想，而为了不激怒美英两国，刘少奇、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受英美集团支配或从属于英美集团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集中了美英两国巨大经济利益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1]一向多疑的斯大林未必不会受到

[1] 《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报告》，转见列多夫斯基编，马贵凡译：《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的十二点建议》，《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这个报告中的一些说法的影响，比如对周恩来心存疑虑之类。就后者而言，俄国人显然不了解中国历来的习惯是，像具体谈判签约之类的事情，只能是由掌管事务的官员，而不应该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来进行的。最高领导人亲临签字现场，不过是显示隆重而已。何况毛泽东本人一向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甚至讨厌。斯大林显然不了解这种情况，他多半是认为这些协定只要苏方起草好，毛泽东自己看看，提出修改意见，最后自己签字即可，周恩来来不来已两可。[1]

无论如何，这一次的会谈肯定是毛泽东的心情再度由晴转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据他回忆说，他当时决定哪儿也不去，“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对此至少有过两种解释，一是说柯瓦廖夫和费德林找上门来，转达斯大林的邀请，请毛去苏联全国游览，而他拒绝了，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一是说他发觉斯大林有意避而不见，便给斯大林的住所打电话，对方竟答复说斯大林不在家，要他去找米高扬。他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2]

研究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固然重要，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何况多年之后，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回忆本身难免存在太多主观的东西，甚至这次的回忆与上次的回忆就大相径庭。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别墅里“睡大觉”日子，看来并非是他最不高兴的时候。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在莫斯科别墅里睡大觉呢？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显然不是24日会谈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并非因为斯大林的拒绝就立即宣告闭门不出。同样，斯大林也并非有意避而不见。

据汪东兴的“日记”记载，24日会谈后的次日，即25日，斯大林还曾来电话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两天里，毛泽东还与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

[1] 师哲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是他认为斯大林是部长会议主席，要亲自签字，因此认为有毛泽东签字才算门当户对。

[2] 前引《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过会谈。[1] 这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有过在别墅里睡大觉的时候，但绝不是 24 日会谈一结束的事情。据查，事情应该是发生在 28—31 日这最后的四天时间里。因为这一段只有这四天时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没有同毛泽东晤谈。

那么，为什么 24 日会谈之后毛泽东没有马上闭门不出，反而是几天之后才关起门来睡大觉呢？有书上说，这是斯大林故意不理睬毛泽东，原因是他仍然不信任毛泽东，又得到了科瓦廖夫指责中共领导人亲美的秘密报告，故意拖而不谈，"静观毛泽东所持立场的变化"。但这种解释有些不合情理。既然斯大林在祝寿活动中刻意突出毛泽东，并给了毛以最高的礼遇，24 日双方进行了会谈，[2] 且还亲自打电话问候毛泽东，26、27 两日苏联领导人还相继同毛晤谈，何以 28 日起就故意冷落毛，造成毛泽东的恶感？难道是 27 日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并不十分重要的会谈惹了麻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毛泽东提到过类似的情况，他所报抱怨的只是斯大林而已。至于说拖着不谈，可以静观毛泽东立场的变化，更是毫无道理。毛既不知道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也没有和斯大林就类似的问题交换过看法，他如何会知道需要变化什么立场？何况拖着不理毛泽东，只会加强毛泽东的逆反心理，又如何能够促使毛泽东的立场变化？

苏联人有文章认为，毛泽东当初说过，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休息和治病，因此，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只是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泽东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但是，毛泽东 16 日抵莫，只在当晚见了一次斯大林，就被放在"坐落于乌索夫的斯大林一个远处的别墅里""苦熬了好几天"，很难认为没有冷落之嫌。[3] 而且，刚刚

---

[1]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5—170 页。注：汪东兴的这份"日记"固有日记的成份，但因其有颇多讹误或不准确之处，故许多内容恐怕只可作为回忆看待。

[2]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判》，《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 73 页。

[3] 连科瓦廖夫当时都认为这种做法太过冷淡。见科瓦廖夫前引文。

进行过两次会谈，双方连一个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搞出来，就让毛泽东去休息和治病，也于理不通。毛泽东来莫前就讲得很清楚，即使休养，也是访问的最后一个节目。况且，斯大林就是有理由要求毛泽东早日休养，他也不可能不和毛泽东商量一下，就把毛晾在那里，故意去惹起毛的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这时因受冷落而情绪低落、大发脾气的情况不同，目前存在着一些完全相反的记录。比如，我们从《汪东兴日记》中，就看不出毛泽东这几天的情绪有任何异常的现象。[1] 而负责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苏方负责人卡尔斯基 1950 年 1 月 1 日讲得更具体。据他说，毛泽东这几天心情不仅没有变坏，反而是变好了。他告诉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说："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2]

比较上述各种说法与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睡大觉"这几天反而是心情较好的几天。1950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对罗申谈话时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只不过，他所说的不是"三天以来"，而是"最近四天"，说"最近四天，我每天睡八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感觉很好。这在一直为失眠烦恼，并准备来苏联最后一个月彻底休息、医治失眠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如果他心情恶劣，烦闷异常，他肯定会加重失眠，绝不会感觉很好，连安眠药都不用吃了。

毛泽东向来不是一个感情隐而不露的人。很难相信他这时所谈所做都是假的，心里不高兴，却故意做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来。何况，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要想让斯大林让步，就得和斯大林斗，比如把斯大林的私人代表骂上一顿之类，而不能采取假意迎和的样子。因此，多半可以推断，毛泽东在别墅里睡大觉的几天，并非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

[1] 前引《汪东兴日记》，第 168—170 页。
[2] 《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纪要》（1950 年 1 月 1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三、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什么时候心情最不好?

依据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估计应该是在 24 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只不过，它并没有马上发展成像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破口大骂，闭门不出，“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后来为什么睡大觉，也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故意避而不见，而是毛泽东自我感觉睡眠严重不足，主动提出想要静养几天。这从他 1950 年 1 月 1 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需要考虑到的是，造成毛泽东睡不着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本来在睡眠上就有严重问题，此其一。向来不曾出过国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差问题，到莫斯科之后又一直都在按照当地时间参加活动和进行会谈，使他本来就不正常的睡眠习惯很难适应时差所造成的困扰，此其二。同时，对 24 日的会谈结果，毛泽东无疑也颇感不满。尽管 25 日斯大林仍来电话问候，26、27 日他仍不得不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他心情不好应该是肯定的。如果说他曾经有过大发脾气的情况，相信也应该是在这几天里。

不论毛泽东在 1949 年最后一周的感觉如何，到了 1950 年元旦这一天，他的心态已经相当平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见到毛时，发现他态度祥和热情。他首先通报了缅甸和印度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属英联邦的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也“有消息”将要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的情况。他请罗申告诉斯大林等：他这几天感觉很好，“最近四天，我每天睡八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只是外出散步时，在冷空气中逗留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头晕。因此，他还想静养一个多星期，以便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可以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以外，与其他苏联领导人见面只采取礼节式的漫谈方式，不讨论工作问题。谈话中，毛泽东一句也没有提到重订条约的问题，甚至也没有再提到周恩来来莫斯科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时，

的确没有同意让周恩来来。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对到公开场合去活动变得毫无兴趣的原因吧。他明确表示："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不想在苏联旅游了"。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以前即回到国内去。[1]

但是，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毛泽东在多年后两度讲到：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2]。在1月2日一早即见报的这篇《答塔斯社记者问》当中，斯大林明确写道："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3]上述文字很容易使毛得出这样的印象，斯大林不仅准备同他签订有关贷款、通商等项协定，而且首先就准备讨论中苏条约问题。和斯大林此前的态度相比，这的确很出乎毛泽东意外。

有关这个谈话稿究竟由谁起草的问题，在学者中明显地存在着争论。毛泽东在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和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两度提到该谈话稿是斯大林起草和签署后给他的。进一步可以印证毛的说法的，是科瓦廖夫1月2日给斯大林的一份与毛泽东前一日谈话的纪要。纪要说明了这份谈话稿是他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毛阅后表示："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4]不同的说法来自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他们认为发表这样一个答记

[1] 前引《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纪要》。

[2] 前引《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3]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6页。

[4] 如果此文是毛泽东自己起草，毛自不会讲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这类话。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者问，是出于王稼祥的建议。原因是毛泽东一连几天没有出门，因而在公开的报道中不见了踪影，引起了外界的猜测，故王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作者，到一般研究中国外交史，乃至系统地研究中苏关系史的作者，多数看来都相信师哲和汪东兴的说法。因为他们相信这理应是毛泽东计划中的一部分，即用来向斯大林施压或要挟斯大林在签约问题上让步的一种策略手法。但是，笔者宁愿相信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因为一般说来，与此事的当事人毛泽东和科瓦廖夫的说法相比，作为随从人员的师哲和汪东兴的说法并不具有权威性，而且两人的回忆本身也明显有记忆讹误之处。[2]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历史，不能忽略历史人物的经历、性格和行事风格。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在外交事务上无疑还是一个新手。何况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在另订新约问题上已经几度受挫的情况下，说毛还会再去搞一个文字的东西，声明自己此行首要目的就是要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以此来逼斯大林让步，也不合情理。斯大林已经两三度回绝了毛泽东的试探和要求，毛泽东有什么根据相信再试一次就会起作用？如果斯大林仍不让步，以毛的性格，岂不等于是自找其辱？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并且采取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呢？在这个问题上，多数中国学者显然又很相信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了。因为毛说过：多半是“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3]。但

---

[1]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38—439 页；《汪东兴日记》，第 169—172 页。

[2] 两人的回忆虽大致相同，但两人的表述都明显不准确，师哲宣称毛 1 月 1 日决定发表这个文件，2 日即见报，显然不实，因为毛作为一个外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是无权决定自己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什么的。且师哲最初的回忆录中并无此项内容，是后来整理者帮助下增加进去的。至于汪东兴的“日记”，原本就有加工之嫌，它又出版在师哲回忆之后，更难作为可靠的依据。其中所谓王稼祥说一个星期未见报道毛的活动的说法就不准确，因为莫斯科的报纸最后一次报道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会晤的时间是 1949 年 12 月 28 日，距离 1950 年 1 月 1 日才不过三四天时间，身为大使的王稼祥不可能不知道。而“日记”所记 1 月 1 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访事，对照俄国档案，似也是对 2 日晚两人来访的误记。

[3] 前引《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是，这种看法似乎还是不大能够成立。一来，连毛泽东本人自己都认为这只是一种“可能”，如何能做根据？二来，如前所述，关于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还在1949年12月22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就已经提到了，它丝毫没有影响到斯大林的态度。说1950年1月1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中进一步提到印度准备承认中国，斯大林会受到很大刺激，显然不合逻辑。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在这一天向罗申提及印度和英国的外交承认问题存有向斯大林炫耀甚至是示威的意图，因为毛后来怀疑“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的说法，显示他对此确实看得较重。但毛泽东自己的想法是一回事，斯大林因何转变态度却是另一回事。

说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刺激了斯大林，促使斯大林转变态度难以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罗申与毛泽东的谈话和斯大林转变态度，两者前后至多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罗申是在毛泽东处吃了饭以后回去的，毛的住处距离城里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回去后还要将谈话整理出来打印成文，经过相关手续报到克里姆林宫，即使斯大林当天下午没有其他安排，他看到罗申的谈话纪要，也要到晚上了。而斯大林派科瓦廖夫去送显示其转变态度的答记者问文稿，却是当天下午到傍晚之前这段时间，即使我们认为科瓦廖夫是在傍晚前赶到毛的住处的，算上车程，科瓦廖夫也要下午从克里姆林宫动身才赶得及。显然，从时间上来说，斯大林是不可能在看了罗申的谈话纪要之后再来做此反应的。何况匆匆忙忙地改变策略，也不合一向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的行事风格。

原因之二，是说斯大林会因为缅甸、印度以及英国等承认中国的消息而备受刺激，进而急忙改变态度，此说法太低估了苏联获取外交情报的能力。有关英国可能会承认新中国的消息，早在半个多月前的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周恩来就已经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了。两天后周恩来就已复电缅甸政府，同意在缅甸当局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

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此后英联邦国家内部，乃至于英美之间，有关要不要承认新中国政府的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苏联方面不可能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何况斯大林自1949年春天起，就始终主张新中国要主动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和保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毛泽东通报缅甸、印度这样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斯大林不可能是什么重大新闻。即使是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可能有所调整，说会对斯大林形成较大的刺激，也很难想象。[2]

那么，斯大林到底是因为什么改变了原先的决定呢？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斯大林这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了毛泽东极度失望的情绪，[3]并且恰好从中国新闻总署的通报中得知了中国国内一些阶层对毛泽东此行的批评和讥讽。与毛泽东的接触和讨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化解了斯大林对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严重猜疑和顾虑，这一点曾经极大地妨碍斯大林下决心与中国结盟。仔细权衡了与新中国另订新约英美反应可能带来的损害和保留旧约使新中国迅速远离苏联两者的利害得失之后，他最终决心改变态度，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有力盟友。至于他为何会选择通过毛答记者问这种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态度变动这一信息？这恰恰反映出斯大林处事之老谋深算。在多次拒绝毛泽东的这一要求之后，斯大林改变态度显然需要找一个台阶，以避免尴尬。代毛泽东起草一个答记者问，既可以平息外界的猜测，又从侧面转达了自己态度转变的信息，这正是斯大林用心巧妙之处。

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已估计到斯大林态度有变，但一时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 斯大林在1949年4月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讲："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官方关系。""你们不应该拒绝在一定条件下向外国借债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转见科瓦廖夫前引文。

[3] 在这方面也许不应忽视赫鲁晓夫的说法，即斯大林这时在毛泽东的住所安装了窃听器。

摸不着头脑，反应谨慎。他表示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当然，也可以考虑另外两种办法，一是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二是签署一个声明，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这样，周恩来即可不来。

据毛泽东当晚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前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尽管头一天毛泽东就已经从《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稿中发现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但这时他还是有点不太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又追问了一遍：“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然后便自顾自地计算起周恩来来莫及签订条约可能需要的时间了。显而易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受斯大林指派，有备而来的。[1]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这时还搞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小把戏。他做出一副毫无芥蒂的样子，把科瓦廖夫那个秘密报告当面交给了毛泽东，并且评论说：科瓦廖夫是个搞技术的，根本不懂政治，不该卷入到这种事情当中来。[2] 在这个时候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一方面固然意在争取毛泽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未必不是在暗示毛泽东，他之所以在另订新约问题上态度犹豫，与科瓦廖夫提到的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3]

斯大林虽然最终下决心与毛泽东另订新约，其他苏联领导人当中的顾虑却不会那么快地消除。1 月 6 日，当毛泽东颇有些得意地向来访的苏联外

[1]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 年 1 月 2、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11—212 页。

[2] 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348 页。

[3] 列多夫斯基也有近似的看法。见前引《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的十二点建议》。

长维辛斯基解释，为什么需要“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并“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维辛斯基的答复很清楚地显示了其他苏联领导人对此其实并不十分认同。他坚持认为：“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1]

有了斯大林的承诺，毛泽东对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态度自然可以一笑置之。但是，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方坚定的亲苏态度，他还是很快于1月13日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毛泽东随后特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2]。

与此同时，得知斯大林高度肯定中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为此专门组织文章批评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和平革命”和“议会道路”的主张后，毛泽东也积极地加入到批评自己的老朋友、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的行列之中。毛泽东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批判，而后还特意让人将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3]

毛泽东访苏之旅刚刚进入佳境，突然又发生一件让毛泽东倍感不快的事情。多年之后，他甚至演绎出一段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开会批判他“民族共产主义”的故事来。

事情是这样的。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毛泽东会谈时，

---

[1]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1950年1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2] 毛泽东：《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1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35页。

[3] 毛泽东：《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950年1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37、245页。

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出："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国务卿就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讲话，那么，声明就不应由通迅社来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

毛泽东同意，只是又提出：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莫洛托夫认为：艾奇逊声明主要目的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中苏关系方面造成误解。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台湾的计划。

毛泽东同意莫洛托夫的看法，表示要坚决驳斥艾奇逊的反苏诽谤，并答应第二天就起草声明草案，将草稿交苏方征求意见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在京的外交部副部长正式公布。[1]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后来按照他说明的过程向苏方送交过声明草稿，至少他没有以他同意的外交部声明的方式来发表声明。他于18日起草的仍旧是一个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19日一早即电告北京刘少奇斟酌发表。[2]

有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为表现自己的独立自主，故意做给俄国人看的。但是，在刚刚取得了重要的外交进展，新的条约谈判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有什么必要用这种方式去激怒俄国人呢？

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行我素惯了的毛泽东，认为用八股式的外交部声明不足以表达他对美国政府的厌恶，斟酌再三还是采用了他更熟悉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像谈话稿当中那些"艾奇逊低能演说"、"赏了艾奇逊

---

[1]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7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2] 毛泽东：《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950年1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45页。

一个清脆的耳光"、"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以及"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之类的字眼儿，毫无疑问是很难使用在正式的外交声明当中的。[1]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好心会引起注重形式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不快，反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顿，自然惹得他大为窝火。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胡乔木的谈话发表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把毛泽东找去，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并强调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有力量"。[2]

毛泽东也谈到过斯大林召集的一次批评他的会，说是因为斯大林恨透了他，因此搞了一次攻击他的大会，什么民族共产主义，半个铁托。他说：当时"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点也不声辩，什么中国有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等，我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3]。从已经披露的文献资料和整个日程的情况，以及可以做出的逻辑分析，我们找不出，也想象不出斯大林还有召集会议批评一个他并不十分熟悉的新中国领袖的任何其他理由和机会。毛泽东描述的多半就是这次会议。只不过，依据他的性格，再加上事过多年，他的话里有了一些演绎的成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深感受到屈辱，极端不满，以致耿耿于怀。因此，师哲下面的回忆可能是属实的。

师哲回忆说，由于毛泽东受到指责，憋了一肚子气。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时，始终一言不发。为了缓和局面，师哲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敏感的毛泽东当时就猜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命令

[1] 毛泽东：《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950年1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46—247页。
[2] 师哲前引书，第456页。
[3] 前引《毛泽东与波兰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1] 这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的个性。

四、不论毛、周当时如何努力，还是没争取到中苏之间完全平等

1945 年的《中苏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感到最不平等之处有三：第一，是强使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第二，是迫使中方同意其在旅顺港驻军；第三，是把在 1935 年已经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迫使中方同意在各占百分之五十资产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又为苏方所有。但就第一点而言，还在 1949 年初中共中央就已经注意到其改变之不可能。对于第三点，新政府自成立之前，即已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财产和经营，再加上苏联方面一再强调认为该协定并无特别明显的不平等之处，因此中方始终尽量回避不提。双方此前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旅顺港驻军的协定。由于双方都认为该协定为不平等协定，修订旧约，苏联租用旅顺港协定无疑是必须要触及的。但具体到如何修改这一协定，则又由于新中国尚无海军，面对来自美日可能的威胁，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前，中方也屡屡表示不急。

1950 年 1 月 20 日，即在毛泽东以胡乔木的名义在北京公开发表了针对艾奇逊谈话的当天，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22 日，即在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正式发表反驳艾奇逊的外交声明的当天，斯大林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了会谈。从这次会谈的气氛看，双方的态度相当积极，看不出有受到毛泽东自行其是地发表胡乔木谈话稿影响的阴影。

这次会谈的主题自然是讨论新条约的内容。实际上，中方虽然一直在提议另订新约，但由于始终不清楚苏方的真实态度，故一直未做具体的文案工作。相反，从斯大林决定同意另订新约之日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

[1] 师哲前引书，第 457 页。

条法司就在积极准备，1 月 5 日已起草出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到 1 月 16 日止，这个草案文本已是六易其稿了。[1] 到双方开始正式会谈之前，该文本已正式定稿，并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名称已确定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新条约和旧条约相比，主要是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两国同盟互助的关系，关系到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仍旧体现在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和有关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上。第一稿明确主张：“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至第六稿才改为：“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2—3 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 1950 年开始。”[2] 俄国人不想根本变动旧协定实质内容的态度，自然与毛泽东关于暂时可以不必变动这两个协定的多次表态有些关系，但很明显，根本上还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始终相信，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以及旅顺港，对苏联不仅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他们非常想保留他们在那里的特殊权益。具体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大连港的问题，其最后由苏联部长会议内定的修改部分，除了中长铁路管理层的领导职务采取中苏两国轮换制，旅顺口苏军从 1950 年开始撤退，条约生效后两三年内撤完外，其他与旧条约比几乎没有多少改变。[3]

与毛泽东相比，直接负责政务院的周恩来，因为天天与民主党派在一

---

[1] 有关《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初稿的起草情况，中苏双方记载有所不同。前引《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1950 年 1 月 24 日条称周“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2 页也记述为：22 日会谈后，“在苏方提议下，由中方周恩来主持起草新条约的文本……苏方同意中方的草案本”。但俄国公布的草案文本第六稿显示，还在周恩来到莫斯科之前，苏联方面就已经将条约草案起草并修改定稿了，标题也已经增加了“互助”二字。从谈判记录看，中方对苏方起草的条约稿也没有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周恩来起草的，是新订的有关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见张木生译、沈志华编：《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 67 辑，1998 年 9 月，第 201—207 页。

[2] 前引《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档案文献》，第 201—207 页。

[3] 同上，第 208—217 页。

起共事并处理各种内外事件，感受到的民族主义压力要直接得多。[1] 他除了清楚地了解旅顺港驻军问题必须解决外，对有关中长铁路的现状，亦知道国内各界多不能接受，如不加以修改，甚或予以收回，势难取得国人的认同。而解决这一问题之关键，除必须缩短过去协定的有效期外，尤其要使过去由苏方拥有管理权变为由中方拥有管理权。要说服国内各界接受苏联继续在中长铁路问题上保留一定的权益，至少也要将原先各占50%资产的规定，改为中方占51%，苏方占49%，才能体现中方的主权及主导地位。毛泽东显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在会谈中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看法，提出新协定应考虑缩短原来的时限，重新规定双方的资产占有比例，并写明中方在管理中起主要作用。周恩来随即补充说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新协定应规定成立铁路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事务，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都要由中方担任。双方占有资产比例，也应由过去的各占50%，改为中方占51%，苏方占49%。对此，斯大林当场表示，愿意缩短年限，但坚持只要规定今后双方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即不存在不平等。如果改变双方资产占有比例，结果反而与双方追求的均等原则相互抵触。对于苏方的解释，毛泽东、周恩来虽表示愿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再做研究，但双方看法存在分歧显而易见。[2] 而在这个问题上，国内中共中央这时亦有电报，表现相当坚持。

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4日，经过一天紧张的内部讨论，当天午夜，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受命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修改后的草案交还给苏方。中

---

[1] 最典型的就是新闻总署这时发出的一份通报，其中介绍说："一些人尖刻地讽刺说，毛泽东是去'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的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中共中央新闻总署通报（№ 50）：《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1950年1月1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2] 同上引注。

方对条约内容未做重要的修改。[1] 但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即根据刘少奇关于中长铁路问题的来电精神和与毛泽东讨论的结果，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意见。一是中长铁路历史上已经过六次波折，[2] 照目前经营的现状和中国民众反映的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而这样才对中苏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二是如果对日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铁路归还中国。三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和租借的企业由中国政府接收。这三项要求大大突破了苏方原定的方案，自然引起苏方领导人的极大不安。可是，既然下决心加强中苏关系，注意到周恩来所强调的中国国内舆论与民众的情绪，斯大林不得不重做考量。经过联共（布）政治局紧张讨论之后，斯大林最终表态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但是，1 月 26 日，在斯大林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大连港的所有权利的情况下，苏方代表突然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等。[3]

鉴于这种情况，也是考虑到旧协定要修改的内容较多，周恩来显然主张顺势对两个协定做根本性的改订。经过与毛泽东商议后，周恩来花了两天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事实上否定了前此双方商定的关于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成议。不仅如此，草案明确提出：(一) 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

---

[1] 参见《苏中关系资料》;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7 页。另据周恩来 2 月 8 日电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 此一说法与目前已公布之俄国档案明显存在矛盾，注意到俄档保存有完整的过程文件，而中方在谈判过程中明显地对平等及是否自主问题极为敏感，估计周此说实为应付国内，故这里暂依俄档。

[2] 所谓六次波折，主要是指在 1904 年日俄战争、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谈判、1929 年中东路事件、1935 年苏联让售日满以及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中长铁路问题始终成为制肘中苏关系中的一个负面因素。

[3] 前引《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第 216—217 页。

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同时声明将这些权利和义务归还给中国；（二）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应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这样一来，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

周恩来的草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斯大林最初批阅中方的草案时，差不多把中方草案中的内容全都划掉了。但考虑到中方已决定不再延续旧的协定，苏方最终决定做出重要让步，1 月 28 日苏方通过师哲转交给中方的协定修改稿，实际上接受了中方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同时不仅肯定“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而且规定自协定生效后，中苏将具体讨论苏联方面将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问题。[1]

1 月 31 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方针对苏方草案对有关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及议定书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正案。从这一天一直到 2 月 2 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的结果，对条约文本两国代表只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对于各项协定的内容也没有产生原则性的分歧。只是在讨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议定书的时候，中苏双方首次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

在中苏双方以前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为说服苏方同意马上放弃对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考虑到苏方的利益和旅顺口暂时还要驻军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曾表示苏联在将中长铁路移交给中国后，可以继续沿这条铁路调运军队。据此，苏方在送交给中方的议定书草案中，正式写下了“苏联军队

---

[1] 前引《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第 218—219 页。

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的文字。但在审议苏方草案的过程中，周恩来突然提出：第一，这种调动必须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第二，议定书中还应加上一条，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双方权利平等。[1]

增加这样一种对等的条款，在周恩来纯粹是从形式上来考虑的。他明确讲："如果中国不同时拥有通过苏联领土的运输权，文件中的这种内容将不会……在中国得到理解。"[2] 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和维辛斯同意在调动军队一条中增加受到战争威胁这一前提条件，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明明是周恩来自己提出苏联可以利用中长铁路调动军队的，"现在，当我们同意将中长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3]

争执的结果，苏方决定中方不做让步就不放弃中长铁路的权利。米高扬提出：要么按照苏方建议达成协议，要么就把协定中已经缩短的归还中长铁路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4] 也就是说，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日期要延期到 1962 年。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对此，苏方算是勉强接受了。

由于对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也出于对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担心，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格外注意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所表现的中方主权和平等权利问题。但实际上，不论周恩来如

---

[1]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2] 保罗 · 温哥罗夫前引文。

[3]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3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4] 同上引注。

何努力，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苏联专家以援助中国建设的名义到中国工作，而苏方规定中方付给每个专家的月工资应达到两千至四千卢布（后经周恩来争取减为一千五百至三千卢布），这相当于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月收入的三至五倍之多，相当于中国当时一般工作人员月收入十倍以上。

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 1950 年到 1963 年的十四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当然，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毛泽东并没有对上述不平等的情况做出像他后来那样激烈的反应。双方没有公布那些可能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协定。1950 年 2 月 14 日晚 6 时，中苏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1] 此举宣告毛泽东访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竟，斯大林曾经不想另订新约，曾经不想废除中东铁路以及旅顺港的协定，毛泽东和周恩来迫使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根据新订的条约和协定，苏联截止到 1952 年末，将交还所有它通过《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权益，并承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援助。那时候，所有曾经让斯大林感到满意、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将废除了。无论是大连、旅顺，还是中长铁路，都将回归中国。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其他问题无疑都是次要的了。

[1] 见《中苏友好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1—104 页。

五、四个合营公司的协定让毛泽东高兴了一阵子，后悔了好几年

1950年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动身回国了。此行迫使斯大林同意改订新约，无条件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其收获之大，不仅超出毛泽东最初动身时的想象，与毛初到莫斯科时所陷入的困境相比，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带着这样一种成就感返回北京，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在毛、周以及中共中央这时发表的各种谈话和相关社论中，都可以清楚了解到他们对中苏条约及其相关协定的高度肯定态度。[1] 但也正是这种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当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了解到毛泽东在莫斯科大起大落的谈判经过之后，不仅对斯大林最初拒绝毛泽东重订新约的态度感到难以接受，苏联方面坚持要签订一个限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新疆的补充协定的做法，也逐渐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加上西方一些舆论也借机指责苏联搞"经济帝国主义"[2]，毛泽东此行的成就感竟渐渐地开始打起了折扣。中苏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是否都做到了完全平等也成了一个疑问。而最让毛泽东疑惑的，一个是补充协定的问题，一个则是合营公司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说法，对苏联提出的补充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即表示异议，只是由于斯大林一再坚持，"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3]。事实上，苏联这个限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新疆的提议，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适合新中国巩固自身安全的现实需要的，特别是适应了中共中央当时对美、英、日等帝国主义高度防范与戒备的心理。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由于交通不便，少数民族杂居，周边环境复杂，境外敌对政治势力和民族

---

[1]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东北局的讲话》（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0—29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等等。

[2]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0年4月1日。

[3] 参见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5页；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446页。

分裂势力在境内十分活跃，苏联如果愿意协助中国有效控制边境地区，禁止第三国势力进入，对新中国政府巩固新疆安全自属有利。对此，当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邓力群就有很肯定的说法。[1] 也正因为中方有这样的利益需要，再加上苏方又主动加上对等权利的内容，毛、周当时十分痛快地同意了这个协定，只在文字上做了个别的修改。[2] 周恩来随后之所以很快将这一补充协定报告国内，并明确通知苏方准备公开发表所有协定，显然也是因为他和毛泽东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存在着有损自身利益和形象的内容。否则的话，周恩来也不会告诉苏联领导人说：这些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3]

当然，以如此方式划定范围排斥第三国的做法，国内那些本来就不愿意看到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或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力主中国不应受人摆布的民主人士，却很难理解。由此而引发的议论也促使毛对这一协定所带有的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性质有所警觉。因为这种议论很容易让毛泽东联想起自己早先的言论。比如 1946 年底，他对当时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就有过类似的批评。当时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人激烈批评形式上双方权利完全平等的《中美商约》感到不解，问毛：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中美商约》？毛回答说：因为《中美商约》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随便购置房屋、地产，建工厂，开商店，美国船只可以到中国内河航行。记者对此表示疑惑，说：英国内河也允许美国船只去，商约同样规定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买房屋、开工厂，为什么说《中美商约》不平等？毛的解释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资本去外国开工厂、买房屋，还没有船舶到

---

[1] 沈志华对邓力群的访问记录。

[2] 苏方 2 月 10 日提出补充协定草案，毛只是把文中“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见《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2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3]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杨、李、乔木》(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1950 年 2 月 13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外国去。言外之意，条约上虽然写上了对等的条件，中国没有实行的可能与必要，就等于是单方面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平等。[1] 无论后来的人们对这种解释存在着怎样的争议，毛泽东事实上很容易发现补充协定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苏联方面虽然在补充协定上也写上了相应的权利，但中国没有必要，也很少可能去苏联远东及中亚各共和国实行这些权利。何况，依据苏联要求，而非首先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自己边境地区划定范围禁止第三国人员存在，这对毛泽东所理解的中国自主地位也在情感上形成了某种伤害。可以想见，正是由于受到国内强烈的民族情绪影响，毛泽东才逐渐意识到协定的问题所在，进而改变看法，直至把补充协定等同于苏联在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

如果说毛泽东对补充协定看法的改变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因素，还难以简单地从他们自身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中苏合营公司看法的改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心态的渐趋高涨了。

中苏合营公司，指的是中苏之间这时“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成立这样一些合营公司的最初建议，实际上是中方提出的，并非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2]。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明：“此次由彭德怀同志带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在新疆设立金属与石油两股份公司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议定大体同样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在具体说明了原草案资本各半、净利平分等内容之后，提出：“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一半的利益。但期限似乎定得太长（原草案规定公司经营期为四十五年——引者），以定为廿年或廿五年为宜。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负责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谈一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

[1] 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194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文集》，第 205 页。
[2]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又，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1]

从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基于建国初始，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缺口甚大，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利用外国资本开发富源、发展生产态度积极。而考虑到政权在手，刘等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可能要求来办类似合营工厂和企业也无意反对。接电后，毛、周显然也同意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苏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国民族经济。周恩来到后，在毛、周与斯大林首次会谈中，毛即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2]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更进一步提出了双方合组几个合营公司的具体设想。[3]苏方同意后，双方就此一一达成协议，在毛、周回国后陆续完成了签字手续。而中共中央为此也曾专门表示过充分肯定的态度。《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社论还特别叙述了苏联实行租让制的历史和当前经济恢复时期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极端必要性，强调这种合作方式是充分尊重我国主权的，在公司内部也是完全平等的，这是苏联方面向我所作的“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的重要投资”[4]。但是，《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并特别强调主权问题，清楚地显示国内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

果然，随着斯大林以后接连建议由苏联出资在中国建罐头厂、建橡胶园，毛泽东逐渐开始怀疑俄国人这是在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因而

---

[1] 刘少奇：《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0页。

[2]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4] 《欢迎有利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社论），《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

在不便拒绝的情况下，坚持要搞就必须归中国。[1]罐头厂和橡胶园的话题意外引起毛的不快，难免会促使他对资本各半的中苏合营企业的属性也产生疑惑。在赶走了所有外国在华资本之后，中国上百年来第一次完全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苏联资本的存在以及苏联方面某些损害中方权益的做法，自然会让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越来越觉得有寄人篱下之感。很快，取消这几个合营公司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不仅如此，毛泽东从此对以任何方式利用外资都持坚决排斥态度。从几年后毛尖刻批评建立这几家合营公司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实际上更多地还是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他告诉俄国人说：当年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搞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为什么坚持要搞这四个"合作社"，还不是因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但只要搞"合作社",就涉及所有权问题。为什么要各占百分之五十,还不是要控制，要租借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2]

从最初以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基点，主动提议、积极支持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到把建立合营公司同民族歧视和侵害主权相提并论，甚至声称是斯大林强迫所致，这再典型不过地折射出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人民族情感发展变化的轨迹。对一个历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却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而言，它的复兴与崛起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主义的革命结为一体。而任何引导革命成功的革命党及其领导人，都必然会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特别是在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等重要革命指标渐次达到，整个民族完全摆脱被侵略、被欺侮的悲惨地位，开始以崭新的独立自主姿态展现于世界面前之际，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感自然会表现得异常亢奋。但是，上百年的屈辱历史和国家贫弱落后的现状，毕竟是深深

[1] 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6 页；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2]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地嵌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道依然在流血的伤口。越是自尊和自信，其心态上也就越是容易转向敏感，对一些问题做出过度的反应。赫鲁晓夫讲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 1954 年他在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曾提议利用中国多余的劳动力帮助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不满，指出赫鲁晓夫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在侮辱中国人民，因为西方列强多少年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落后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1] 实际上，后来中国方面再三考虑后，还是接受了苏联的建议，派出了数十万民工到西伯利亚去帮助开发，因为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益无损，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事实上也并无损害。毛之所以会对这样一个提议如此敏感，显然与其越来越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

[1]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387 页。

第十一章

夺取台湾计划搁浅之谜

毛泽东两度向苏联求援，只为借用一些飞行员来打台湾，却被斯大林婉言相拒；毛泽东安排好进攻的时间表，全力准备，不想半路杀出一个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中共中央被迫无限期推迟了夺取台湾岛的时间表；尽管近百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地用军事手段把列强逼到了谈判桌上，但考虑到中国统一大业严重受阻的代价，毛泽东还是怀疑：这场战争恐怕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中国革命的胜利，最让毛泽东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还在1943年整风运动期间，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世界上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最好的榜样。[1] 随着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再度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新中国诞生不过一个多月之后，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呼吁“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学习中国革命的榜样，“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2]。刘少奇的说法随即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肯定，莫斯科甚至很快开始要求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共产党放弃“和平革命”的幻想，转而学习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到中国来要求中共中央支持他们按照中国革命的方式来保卫和解放自己祖国的，却是一直在苏军占领下，理应由莫斯科为之决策的北朝鲜。

金日成的代表到中国来的时候，距离朝鲜战争爆发还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刚刚渡过长江，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揽入怀中。但是，可以想见，正在为自己的革命经验感到无比自豪的毛泽东，当然愿意看到朝鲜人也能够走上同样的成功之路。他们唯一的想法，只是希望这件事能够在他们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之后再来解决。他们万万没

[1] 参见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8、13日，等等。

[2]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30—138页。

有想到的是，当一年以后金日成带着斯大林批准的计划再度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不仅还没有能够最后完成自己的统一事业，而且对隔海相望的台湾岛，连最基本的技术手段都还没有具备。十分明显，斯大林丢给了毛泽东一个烫手的山芋。不同意吧，莫斯科已经批准，自己岂能去扮演当年那个“不许革命”的角色？同意吧，朝鲜战争一旦打响，中国自然备受压力，无法按计划完成进攻台湾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不会去做斯大林当年对中共做过的那种事的。但他显然也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战争刚一打响，最直接地就影响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美国政府不仅一改此前的政策，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且还派出了它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可能的攻台行动。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由此被迫搁浅，而且一搁就是几十年。

有人怀疑，斯大林在明知毛泽东急于实施进攻台湾的行动之际，率先批准北朝鲜采取统一行动，根本就是不想让毛泽东顺利地完成解放台湾的计划，并且造成中国不得不出兵援朝的结果，以便造成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对立，使中共更加离不开苏联。这样一种猜测，至少我们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而且逻辑上斯大林也未必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美国人一定会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更不要说他会拿北朝鲜做牺牲，故意让朝鲜遭受失败，诱使中国出兵。斯大林何尝能确定中国就一定能够顶住美国人，他不能不考虑，以中国人的作战条件和能力万一顶不住，丢了朝鲜不说，中国东北也会陷入战火，那岂不把与中国缔结了互助同盟关系的苏联也拖下水去了吗？让美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这个险斯大林是冒不起的。

但是，斯大林知道当时朝鲜和中国都指望苏联支持他们完成自己国家的统一事业，最终选择了让北朝鲜率先采取行动，这无疑是一个事实。对此，很难认为毛泽东内心里不会有意见。尽管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多次提到过这件事，表示了批评的态度，但这也足以证明他对斯大林的这一决策其实一直就相当不满。毕竟，正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一决定，使台湾问题变成中共一个长期的麻烦。

一、毛泽东保证，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就援助朝鲜的解放事业

1945 年 8 月，苏军解放了北朝鲜。而后，金日成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在北朝鲜建立了劳动党领导下的政府。由于在美军占领下的南朝鲜也建立了反共的李承晚政权，南北朝鲜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948 年底，为迫使美军撤离，苏军首先撤出了北朝鲜。然而，苏军撤走之后半岛的局势却变得日趋紧张，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到 4 月 15 日，南朝鲜军队就在三八线挑起军事摩擦达 37 次，并且秘密向三八线附近调集了多达 41000 人的军队。北朝鲜政府压力极大。[1]

出于安全的需要，还在 1948 年 12 月和 1949 年 1 月，金日成就两次向苏联方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和提供武器援助。考虑到美国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攻击苏联有意永久分裂朝鲜，苏联没有同意金日成关于迅速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提议。[2] 但根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的报告，斯大林批准了由苏联远东军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只不过，这一援助主要还只是些轻型武器。[3]

1949 年 3 月，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与斯大林直接讨论了有关北朝鲜的安全问题。对此，根据苏联大使和在朝鲜的军事人员的报告，斯大林明确表示：加强北朝鲜的军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4]

然而，1949 年 4 月中旬，即金日成回国之后，一份来自苏联情报部门的情报显示，美军准备在 5 月全部撤出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已在边界地区

[1] 直到 1949 年 4 月 15 日为止，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始终认为南朝鲜没有马上进攻北朝鲜的可能。分别见什特科夫 1949 年 1—3 月间致莫洛托夫等的电报；并见《华西列夫斯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4 月 20 日，APRF, fond 3, Opis 65, Delo 839, Listy 3—14 页（以下略写）。

[2]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1 月 19 日），APRF3，245/m/arf/33—35。

[3] 根据比留佐夫将军 1949 年 2 月 4 日给什特科夫的电报，苏联太平洋舰队已运送 250 万发步枪子弹、320 万发轻机枪子弹、15000 发迫击炮弹、1500 支步枪、1200 支冲锋枪、400 挺轻机枪、100 托重机枪和 40 门迫击炮给北朝鲜。

[4] 《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49 年 3 月 5 日），APRF，45/1/346/13—23。

集结了数万兵力，准备一旦美军撤出，就于6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两个月消灭北方军队，结束战斗。[1] 为此，斯大林非常担心，毕竟金日成这时只有三个步兵师，武器装备还十分欠缺，而李承晚则有六个全部经过美军训练的全副武装的师。因此，苏联方面提议，与北京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据此，金日成一方面向斯大林求援，要求苏联方面于5月底之前帮助朝鲜人民军实现机械化，于9月底以前转让航空技术；一方面向刚刚打过长江的中国共产党请求在兵员上提供帮助。[2]

4月28日，金日成的特使，中央委员兼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离开平壤，秘密访问了中国东北局所在地沈阳和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他特别向毛泽东说明了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突出强调了南北朝鲜难以并存，朝鲜问题只能靠武力解决的情况，要求中共中央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师转交给北朝鲜。他同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毛泽东显然赞同平壤的看法。他承认，南北朝鲜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既可能是闪电战，也可能是持久战。对你们来说，持久战是不利的，因为到时候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援助”。但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苏联和中国都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你们并肩作战，“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他强调，金日成应当坚定不移地争取实现统一朝鲜的目标，但近期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国际形势还不利，而且目前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有效地和大规模地支援北朝鲜。即使在“美军撤退后，如果日军不进来，也不要进行向南方的进攻”，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时机”。而一旦中共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情况就不同了。[3]

北朝鲜人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中共领导人赞同朝鲜半岛的统一

[1] 《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APRF，245/m/arf/25。
[2] 《什特科夫转金日成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日），APRF，245/m/arf/37—40。
[3] 《俄罗斯外交部文件》，第7—8页，转见朴明林：《朝鲜战争决定的过程》。

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的看法，和在北朝鲜受到进攻时将给予实际援助的具体保证。毛泽东还很痛快地承诺，布防在东北地区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很快编入北朝鲜的人民军，一旦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告一段落，人民解放军中的另一个朝鲜族师，也可以编入人民军，以便加强北朝鲜军队的实力。[1]

随着美军将要撤出，韩国李承晚政府对北朝鲜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敌视态度，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双方之间边界冲突的次数到6月间更加频繁。6月11日，李承晚甚至公开宣布，南朝鲜人正在准备给共产党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7月中旬，韩国军队的俘虏供认，南方的军队已做好先发制人的准备，三八线附近的居民已被强迫撤退。8月间，更有消息显示，蒋介石与李承晚进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了对美苏军事冲突的期待。而且还有消息显示李承晚政府有意要把苏联拖入战争，因为李承晚声称：一旦韩国军队占领了北朝鲜的清津，苏联未必能够继续保持中立。[2]

在这种情况下，平壤的不安情绪更加明显，苏联方面也高度警惕，并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了。他们一方面坚持平壤应当极力发动和平统一攻势，另一方面则认为，在应付南方进攻的同时，北朝鲜人有必要做反攻的准备。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大批苏联军事装备运抵北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九万人，北朝鲜领导人第一次开始提出，应当对李承晚政府的挑衅采取进攻行动，比如夺取瓮津半岛以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地区，以缩短防线。据苏联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说，在金日成看来，如果国际形势允许，“他们能够在两个星期

[1] 《什特科夫转报金日成关于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APRF，245/m/arf/45—48；《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内容致菲利波夫电》（1949年5月18日），APRF，45/1/331/59—61。

[2] 《什特科夫给维辛斯基的电报》（1949年7月13日），APRF，245/m/arf/83—85；《顿金代办给莫斯科的电报》（1949年8月29日），APRF，102/1/10/24—25。

之内占领南朝鲜，最多是两个月”。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的支持。[1]他们不了解的是，还在他们之前两个月，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请斯大林帮助解放台湾了。

二、毛泽东提出 ：“我们的将领一直建议请苏联帮助夺取台湾”

1949 年 4 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跨过长江天险，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企图盘踞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是，由于解放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诸岛一时还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蒋介石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早早就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要完成统一中国的计划，就不能不考虑进攻台湾的问题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优势，使毛泽东最初对进攻台湾的艰巨性缺少足够的估计。虽然从常识的角度看，进攻台湾必须跨海作战，没有海军困难极大，但他却相信，进攻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海军的问题不很关键。即使是空军，虽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六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来组成一支攻击部队，但“我军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由于毛泽东计划在 1950 年即应完成夺取台湾的作战，因此他这时并没有把跨海作战的难度和对海空军事力量的需要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考虑。既然自己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即使没有海军，他靠步兵和渔船也能占领台湾，长江天堑不就是这么渡过来的么？当然，毛泽东表示，如果到时候自己的空军能够初步形成，有空军掩护陆军并协助攻击，则“把握更大”。[2]

---

[1] 《顿金转报金日成通报给维辛斯基的电报》（1949 年 9 月 3 日），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FPRF），059a/5a/4/11/136—138。

[2]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1949 年 7 月 10 日）。

6月下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准备秘密访苏。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中共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的问题。7月25日，即在刘少奇一行访苏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的建议，致电刘少奇和斯大林，说明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从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至少已经倾向于认为，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是不可能的。据此，毛泽东写道："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并且，毛泽东明确要求刘少奇询问斯大林："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1]

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毛泽东关于提供飞机及培训飞行员的请求，而对于毛泽东关于请苏联在中国军队对台湾的进攻中派遣苏联飞行员参加作战的要求，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赞同，说是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而苏联人民刚刚遭受过巨大的战争灾难，他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2]

毛泽东能够理解斯大林的顾虑，更何况他在与苏联的关系上始终强调"有借有还"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愿意去求人，因此他从内心里其实并不十分希望靠苏联的援助来解决进攻台湾的问题。但是，由于金门之战的失利，毛泽东很快就不能不重新再向莫斯科求援了。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在

[1]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2] 科瓦廖夫前引文。

10 月 24 晚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的作战，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没有侦察清楚敌情且不熟悉海洋作战的天候、水文、潮汐等地理条件，甚至船只都未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前线指挥官就贸然下令发动了进攻。结果因守岛国民党军队远远超过预估兵力，返航的船只因退潮搁浅，后续部队无法跟进，登岛部队全军覆没，一战损失三个整团共九千多人。紧接着，同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二十二军六十一师以一八二团全部、一八三团一营为第一梯队，一八三团三营和二营的一个连为预备队，于 11 月初发动了夺取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同样因为不熟悉海洋作战条件，缺乏海空掩护和支援，招致失利，损失亦在千人以上。跨海作战的难度终于使毛泽东了解到准备技术条件的极端必要性。很显然，沿海近岛作战尚且如此，跨海攻击台湾焉能想象？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的第一天，即 16 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1]

对于中共领导人再度提出的援助请求，斯大林还是坚持先前的态度，即："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但是，斯大林这次同意可以派出部分军事人事予以协助，说："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2]

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即使是只用志愿人员和只出动潜艇来帮助中共跨海作战，都难免会被美国人发现，结果是可以想象的。联想到斯大林这时因为担心美、英借机废弃《雅尔塔协定》，甚至连对是否应当根本废除旧

[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
[2] 同上引注。

的中苏条约，另定新条约一事都犹豫不决，可知他这时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提供飞机和军舰这种直接的援助的。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1]

根据苏联方面可能提供的援助情况和规模，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了过去决定的准备在 1950 年发动进攻的设想，决定到 1951 年春天前后，即在中国的空军基本建成之际再来发动夺取台湾的战役。

几乎就在中国方面重新开始考虑进攻台湾的军事准备的同时，1950 年 1 月 5 日和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就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范围发表了声明和讲话。他们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2] 美国政府的这一公开声明无疑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但是，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国务委员会 1 月 6 日会议内容的报告也证实了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报告称，会议明确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南朝鲜将不能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并且，美国也不会为防御台湾而帮助蒋介石。[3] 苏军情报部门随后也截获并破译了麦克阿瑟给华盛顿的电报，麦克阿瑟在电报中也明确表示，南北朝鲜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不要进行干涉。[4] 种种消息和情报的证实，不由得斯大林不信了。

鉴于美国自己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斯大林对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自然也变得相对积极起来。他不仅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三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而且很快批准拥有战斗机一百二十架、雷达十二部、

[1] 前引《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2] Department of States Bulletin, Vol.22, No.551, pp.111—118；并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 页。
[3] 见《什特科夫给维辛斯基的电报》（1950 年 1 月 28 日）。
[4] 转见《毛泽东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 年 9 月 23 日）。

探照灯七十二部的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的苏联空军部队进驻中国上海地区，直接参加上海的空防作战。[1]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同意直接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

苏联人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包括军事技术人员）协助中国夺取台湾，这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足够了。所以，“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人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的和技术的改进工作，新中国的空军和海军的建设迅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然，美国防御政策改变的最直接的后果，并非表现在中国的问题上，而是表现在朝鲜的问题上。只是中国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罢了。

三、斯大林赞同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他坚持必须得到中国同意

与长期同莫斯科存在隔阂，且从未到过苏联的毛泽东比较起来，金日成和相当一批北朝鲜领导人在苏联远东的军营中度过了相当多的日子，他们与苏联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比中朝两党领导人，斯大林显然会更加相信北朝鲜人。但是，与在进攻台湾的问题上一样，斯大林对可能把苏联卷入战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采取格外谨慎的态度，绝不会轻易为任何人拿苏联的安全去冒险。1949年6月，美国军队开始撤出它所占领的三八线以南地区。三个月后，即9月，金日成针对当时南北分界线一带军事形势紧张的情况，明确提出想要发动一场进攻，以占领瓮津半岛，必

[1] 由于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利用其空军对东南沿海城市，特别是对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造成了严重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重点轰炸了发电厂，造成整个生产停顿，并使百姓死伤千人以上，迫使中共中央转而向苏联求助。斯大林迅速批准派出苏联空军进行援助。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参见网页：www.shenzhihua.net。

要时不惜夺取南朝鲜的设想。对此，苏联方面同样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苏共中央担心的还是美国的介入问题。它明确答复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之后，可能会比在中国更直接地干预朝鲜事务。"更何况北方的军队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南方发动一场成功的速决战的程度。战争一旦形成相持局面，"就给美国提供了在各方面干涉朝鲜事务的理由"[1]。

然而，金日成不会放弃统一朝鲜的设想。南北朝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在金日成看来，要根本消除战争阴云就必须夺取南朝鲜。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作为朝鲜共产党人，必须以解放全民族为己任，眼看着毛泽东一举统一了中国，而朝鲜还有半壁江山和一多半人民没有解放，他就焦心如焚。因此，艾奇逊声明刚刚发表了五天，金日成就不失时机地再度向苏联外交官提出了加速统一南北朝鲜的问题。

1 月 17 日，在为北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赴任举行的午餐会上，金日成拿着酒杯走到苏联驻朝鲜大使馆顾问的跟前，有些激动地说：目前中国正在完成它的解放事业，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完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了。他宣称：毛泽东已经保证过，当中国统一完成之后，朝鲜统一就是最迫切的任务，中共将支持他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也曾经亲口答应他，一旦南朝鲜发动进攻，他可以进行反攻，结果，南朝鲜没有进攻，朝鲜的统一问题就这样拖延下来了。金日成说："一想到不应辜负人民的热切希望，我就夜不能寐。"他明确要求再次会晤斯大林，以便说明局势。[2]

斯大林最担心美国干涉。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没有干涉毛泽东统一中国？如果连中国大陆都不愿干涉的话，美国会不会去干涉一个小小的朝鲜呢？基于日本与俄国之间几十年的历史恩怨和历史上对苏联

---

[1] 《莫洛托夫关于答复金日成给什特科夫的电报》(1949 年 9 月 15 日)，APRF，3/65/776/33—38；《苏共中央政治局第 71 次会议关于批准给什特科夫指示的决议》(1949 年 9 月 24 日)，APRF，3/65/776/30—32。

[2] 《什特科夫转报金日成谈话给维辛斯基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9 日)，AFPRF，059a/5a/3/11/89—91。

远东地区的威胁情况，斯大林战后在远东最希望能够像占领德国那样，也能和美国共同占领日本。为此，苏联在完全可以单独占领朝鲜半岛的情况下，让出了南朝鲜给美军，希望以此交换美国同意苏军进占日本的北海道。不想，美军进占了南朝鲜，却拒绝苏军参加对日本的占领。这件事无疑对斯大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美国明显扶植战败国日本的种种举动，苏联不可避免地会担心日本可能重新成为自己在远东的最直接的威胁。为了取得威慑日本的条件，把南部朝鲜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自然是一种最好不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能够以南部朝鲜沿海的港口作为军事基地，它甚至比容易遭到海上封锁的中国的旅顺港对苏联更具战略意义。美国政府 1950 年 1 月上中旬关于其在太平洋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的政策宣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战略考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正是为什么苏联方面原本不愿意修改旧的有关中东铁路和旅顺港问题的协定，却突然于 1 月 28 日改变了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天之后，即 1 月 30 日，斯大林突然打电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明确表示："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懂得，诸如他想要着手解决的关于南朝鲜这样一件大事，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事情必须要组织得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要与我讨论这件事，那么我将随时准备接见他，并与他进行讨论。把这些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我准备在这件事上帮助他。"[1]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决心要帮助金日成了。一方面同意修改关系到苏联在中国东北权益和战略利益的旧协定，承诺 1952 年以前将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等全部交还中国政府，一方面准备帮助金日成完成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这理应不是一种巧合。此后，尽管毛泽东还在莫斯科，中苏双方围绕着新协定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紧张交涉，但曾经明确地表示过怀疑中共中央不能严守秘密的斯大林，却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半个字。斯大林只是在毛泽东向其说明，中共中央 1950 年按照 1949

---

[1] 《斯大林给什特科夫的电报》（1950 年 1 月 31 日），AFPRF，059a/5a/3/11/92。

年4月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承诺，决定把人民解放军中其余一万两千名朝鲜族官兵连同配备的武器全部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时，才涉及了朝鲜问题。[1]不难想象，斯大林是不会拿他将要首先帮助朝鲜统一这样的话题，来刺激一心想要早日夺取台湾的毛泽东的。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方面很快就与金日成商定，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将采取有偿的方式来进行。北朝鲜以九吨黄金、四十吨白银和一万五千吨其他矿石来换取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卢布的足够装备三个师的苏联的武器弹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苏方还同意，北朝鲜可以提前使用原定要于1951年才提供的七千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备自己的军队。[2]

在北朝鲜为统一事业加速装备军队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在为解放台湾做积极准备。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只不过，毛泽东不了解，在比较了从地面进攻和跨海进攻的两种风险以及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何者更为直接之后，斯大林已经毫不犹豫地把目光投向了金日成。

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李承晚不时地发出战争叫嚣，北朝鲜经常有南朝鲜计划进攻北方的情报。这些情况，无论莫斯科还是北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何况，毛泽东就是以武力方式统一中国的。因此，金日成确信毛泽东不会反对他的计划。在他出访莫斯科之前，他通过北朝鲜驻中国大使通知毛泽东说，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对中国进行一次访问，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表示同意。他告诉朝鲜大使说，他欢迎金日成的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由于这

[1] 有关这次移交部队的人数及装备情况，可见刘少奇1950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电。电称："在四野之朝鲜籍战士和干部共14000余人，金日成已派其作战局长等三人来接受。他们要求将该部队战士编成一个师及其直属部队。要求随带全部武器，数目如下：步枪12000支，轻机440，重机180，手枪120，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一〇五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除告林彪准备酌拨外，可否，请主席复示。"《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2] 《什特科夫转发朝鲜政府照会给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9日），AFPRF，059a/5a/3/11/149—150。

时北京在平壤既没有大使，也没有军事观察人员，因此，毛泽东丝毫也不了解北朝鲜统一工作的计划与进程。他一面肯定以武力统一南方的必要性，一面仍旧提醒北朝鲜应当加强警惕，说北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1]

3 月 30 日，金日成等人秘密访问了莫斯科。这次访问一直持续到 4 月 25 日才结束。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介绍说，由于苏联的帮助，朝鲜人民军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对南朝鲜的优势，再加上南朝鲜共产党、游击队和人民的支持，即使美国有干涉的可能，他也完全可以在美国军队尚未做好干涉准备之前就迅速拿下整个南朝鲜，因此，现在应当说统一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 由于苏联情报系统这时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给华盛顿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主张美国不要干预南北朝鲜之间发生的冲突，因此，斯大林也对形势感到乐观。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对金日成的统一计划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并称，如果说他在一年以前认为金日成的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计划就是可行的了。因为无论是朝鲜国内还是整个国际的局势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帝国主义目前不会对朝鲜内部的冲突问题进行直接的干涉。当然，他仍旧强调说，统一朝鲜的作战应当建立在对南朝鲜的进攻发动反攻的形式上。他最后还特别提醒金日成说，北朝鲜方面的这一计划必须通报给毛泽东同志，如果毛泽东也同意的话，他不会有反对意见。[3]

斯大林之所以始终向毛泽东封锁消息，直到最后才要求金日成去征求毛泽东的同意，除了他一向谨慎的行事风格外，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顾虑到中国人可能的反应。毕竟，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了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的

---

[1] 《伊格纳季耶夫转报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内容给维辛斯基电》（1950 年 4 月 10 日），AFPRF，059a/5a/3/11/113—114。

[2]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 年 8 月 9 日），RCPSDMH，5/58/266/122—131。

[3]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43–145.

要求，毛泽东还亲自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过请求，不难想象，在还没有能够与金日成最后确定行动方针之前，过早地拿这件事情去和中国人讨论，难免不会引起中国人的顾虑。如今，在与金日成等人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天的多方面讨论研究，最后确定了行动方针之后，再由金日成当面去告诉毛泽东，既表示了对中国人的尊重，也避免了直接与中国人发生孰轻孰重之类的争执。更何况，朝鲜半岛的动荡不仅会影响到苏联的安全，它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一旦发生任何问题，都必须要到得中国方面的谅解和支持才行。鉴于毛泽东早就向金日成就此做过承诺，因此，这件事也非得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不可。

四、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进行干涉，我们一定会打过去"

5 月 13 日，金日成和朴永宪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在当晚的会谈中，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他解释说，南朝鲜的侵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南北朝鲜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南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也明确给予了肯定，并认为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只是，斯大林同志强调，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这就是他此行访问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此前明确表示欢迎金日成带着他的统一计划到北京来，因此，可以想象他对金日成有一个统一计划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但是，事到临头，他还是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因为，在斯大林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项先期工作也已经按部就班地迅速展开的情况下，他怎么也想不到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

毛泽东很委婉地对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大使已经几次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则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

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金日成，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中止了会谈，紧急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大使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十分明显，毛泽东虽然答应过金日成，将会赞助朝鲜半岛的统一事业，但其前提是中国先要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即使他估计到金日成会带来他的统一计划，他多半也相信他能够劝说金日成在中国很快完成了自己夺取台湾的作战之后，再来着手于朝鲜的统一工作。金日成拿出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无疑让毛深感被动。

第二天晚上，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 毛泽东同志！
>
>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使用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了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实现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述。[1]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自然无法持反对态度。他对苏联大使说，他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了朝鲜的南方，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他认为，恐怕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显然对金日成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担心，因此相信中国需要为直接援助北朝鲜做好准备。

---

[1]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0 年 5 月 14 日），APRF，45/1/331/55。

在与苏联大使会晤后，毛泽东立即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周恩来等中共政治局在京的重要领导人开了会，讨论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和金日成没有事先与他商量这件事感到不满。几年之后，他在与苏联大使以及与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人的谈话中，曾经多次重提了这件事。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被蒙在鼓里，直到金日成跑来告诉他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论他是不是感到窝火，中共中央这时却再也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这是因为，斯大林1945年以来几度干预中共，“不许革命”曾经引起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外来干预是极其错误的。何况这已经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商量决定了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没有可能再去同斯大林进行讨论，必须直接面对金日成，他又怎么能够当面扮演斯大林过去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呢？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只好决定接受既成事实。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三阶段计划：第一步进一步加强兵力；第二步公开向南方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和平统一方案遭到南朝鲜拒绝后则准备斥诸武力。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强调，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过，毛泽东还是对美国驱使日本军队或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他告诉金日成，一旦有两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他相信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因为到那时，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它受到与美国签订的协定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条约约束。

金日成相信，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上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人民军的士兵将战斗得更加坚决。至于美国参战

的可能性，他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在5月16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表示同意毛泽东所提议的中朝缔结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建议，只是，电报强调：这不应当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1]由此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时对朝鲜战争的胜利似乎颇有把握。

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金日成此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鉴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势必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的沮丧也不言而喻。几乎就在金日成访苏之前不久，中共还特别与苏联军事当局就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的作战设想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而由于中共这时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正在陆续到达，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问题正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逐渐得到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已经重新开始有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台湾的决心，并初步考虑在1951年条件基本具备后选择适当时机实施作战行动。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朝鲜战争会排在了他夺取台湾行动的前面。他最担心的显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会不会导致美国政府突然改变对中国内战的政策，从而使他夺取台湾的计划面临巨大的困难？

五、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毛泽东抱怨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5月29日，金日成通知苏联大使，他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答应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的主要部分。30日，金日成进一步通知苏联大使，总参谋长和苏

[1] 俄罗斯外交部：《韩战秘密文件》（1994年）。

联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中将一起，已经制定出进攻计划，并提议6月底开始进攻。6月10日前部队将全部集中到预定的进攻地点。斯大林当即批准了这个计划。[1]

随着按照既定方案北朝鲜提出的和平统一主张在6月11日遭到南朝鲜当局的拒绝，第三阶段即军事进攻阶段开始进入了倒计时。根据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制定的这个“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人民军应当在22—27天内分三个阶段实现解放南朝鲜的作战。[2] 6月18日，作战计划下达到人民军部署在三八线的各个部队。

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加紧部署的同时，三八线上的军事摩擦依然持续不断。但是，平壤和莫斯科显然都不相信南朝鲜真的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据统计，这时南北朝鲜的军力对比为：军队人数1∶2，步枪1∶2，机关枪1∶7，冲锋枪1∶13，坦克1∶6，飞机1∶6。[3] 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倒向北朝鲜一边了。

25日，受命参加进攻的七个师以反击南方军队武装挑衅的理由，大举越过了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了。出现在第二天平壤和莫斯科的报纸上的消息是这样说的：6月25日，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他们成功地迫使边防部队退却，并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1—2公里。朝鲜政府立即命令反击侵略者，并粉碎了其主力部队。[4]

面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领导人的心可以说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焦虑地注视着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随之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

---

[1] 《什特科夫给莫斯科的电报》（1950年5月30日），APRF，45/1/346/94。

[2] 见《朝鲜日报》1992年9月12日专题报道《俄国学者公布了金日成针对南韩的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

[3] 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

[4] 转见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当惧怕吗？——朝鲜战争内幕》，转见（俄）《星火》第25—26期，1993年6月，第29页。

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对美国高层决策缺乏有力的情报来源，苏、朝、中三国领导人都不知道美国关于太平洋防御范围的战略决策在1950年4月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美国军方已经调整了年初宣布过的防御范围，把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又包括在内了。随后，这一计划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国政府新的防御政策也已内定，其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对于美国的行动，毛泽东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但在内部指示中，中共中央则不能不承认：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2]与此同时，由于6月27日美国总统也同时宣布美国将出兵南朝鲜，中国东北边防以及可能的增援朝鲜问题日益紧迫，中共中央的战略重点也被迫转向东北地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这一作战计划。

这是一件让毛泽东感到极其不满的事情。7月2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在讨论如何应付联合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外交问题后，他告诉大使说：早在5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就已经提醒金日成美国可能干涉的问题，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对的。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给苏联方面的一份综合反映外国人对朝鲜战争的看法的情报，中共领导人也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苏联选择这个时候支持统一朝鲜行动的疑惑。在报告中，他们写道，一位英国代表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鼓励朝鲜内战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23页。
[2] 转见《肖劲光回忆录》（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台湾。[1]

毛泽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而且，他始终认为，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实际上还很少经受真正的全过程的战争考验，因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熟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统一朝鲜的速决战，更不可能对付可能直接参战的优势的美国军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只是，斯大林的支持使他失去了反对的可能。等到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进攻的主力部队以后，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了。但越如此，他也就越是感到遗憾。所以，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过不满。

当然，毛泽东的批评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强调自身的决策犯了错误。比如，他在内部就讲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另一方面，他肯定地说：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2] 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当初斯大林不是轻率地支持在朝鲜采取行动，那么不仅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不会“给朝鲜人民带来那么严重的灾难和痛苦”，而且也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

---

[1] Evgueni 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88–89.

[2] 参见《毛泽东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23日）。

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幕后

斯大林估计不足，毛泽东未雨绸缪，强调对朝不能不帮；釜山遇阻，仁川遭难，苏联顾问报告：人民军损失了几乎所有的坦克和大炮；金日成求援，毛泽东拟就出兵电报压下未发，何因？出兵决定刚刚形成，为何斯大林、周恩来又联名提议让金日成撤到东北？毛泽东一纸电报，斯大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1950 年的朝鲜战争不是毛泽东想要打的，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自抗战以来一直存在着某种猜忌和不信任的中苏两党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却是事实。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 141 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 换言之，仅仅几个月前，即 1950 年 2 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同盟互助条约，结为军事同盟之际，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对中国党也还是不放心的。正是因为几个月后，当朝鲜陷于危难，苏联束手无策之时，毛泽东不避艰险，力排众议，力主出兵，才彻底打动了斯大林。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到此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一、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斯大林许诺提供空中掩护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政府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很快开始派遣海、空、陆三军援助南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 27 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从军事上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还将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可能的进攻。

美国的激烈反应本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真的会大举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而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太过相信美国不会卷入的情报，斯大林甚至早在几个月前就以联合国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人的代表为由，拒绝继续派代表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结果，不仅美国出兵朝鲜，而且联合国也在美国的

---

[1]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 页。

推动下，很快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案。这不仅使美国的干预变成了联合国的集体干预，而且使北朝鲜处在了十分不利的位置上。

7月2日，在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讨论之后，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声明将采取坚定的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说，毛泽东在与北朝鲜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可惜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美国的军事干涉看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干涉，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能够加强他们在仁川地区的防御线，因为美国人可能会在那里登陆，当然，这种登陆战也可能发生在半岛的其他地方。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防备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九个师的兵力，美国军队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周恩来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对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对美国干涉可能造成的严重情况，看上去似乎不像中国方面那样担心。还在7月1日，斯大林就非常坚决地要求他在朝鲜的大使转告北朝鲜领导人：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不要停止推进，苏联将迅速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1] 很显然，尽管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斯大林还是硬着头皮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战争就此停下来，不仅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而且美国人很可能会乘机打过三八线。即使美国军队不准备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也必定会以此为理由重新驻守到朝鲜南部来，这对苏联的远东无疑将构成长期的威胁。因此，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坚持把战争打下去。在他看来，美国人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如果北朝鲜人民军能够一鼓作气，全速推进，美国政

[1] 《冯西（斯大林化名）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1日），APRF，45/1/346/104。

府只靠抽调驻守在日本的军队赴朝参战，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朝鲜方面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只要能乘着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来不及组织更多的兵力进行增援的时候，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国人到时候即使调集了足够的兵力，也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人民军是否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斯大林并非不了解人民军自身的弱点，事实上，在正面战场投入了绝大部分兵力之后，即使是金日成也已经看出“美国人在部队后方或在北朝鲜各港口派陆战队或空降部队登陆的危险性”了，他为此已经在呼吁苏联紧急援建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毛泽东以及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担心。不过，斯大林这时最担心的还是军事指挥和军事组织的决心与效力。他特别关心的是，北朝鲜领导人有没有被美国人的干涉和轰炸吓坏了，还能不能组织起顽强的抵抗和进攻，部队能不能得到充足的兵源的补充等等。至于北朝鲜人所提出的各种装备和弹药的需求，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满足。

当然，斯大林还是非常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成为北朝鲜在军事上的后盾的。在得知中国政府主动表示愿意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军事保障之后，他很快就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肯定这种准备的意义。他明确表示：“我们认为，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 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方面迟迟没有向朝鲜派出自己的代表一事颇感不解，要求罗申转告毛泽东：“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他在电报的最后还不无埋怨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2] 他显然不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朝鲜方面对中国人可能的介入颇怀戒心，因而态度消极，中国党对此亦颇不理解。

一方面着手做万一的准备，一方面继续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充分

---

[1] 《菲利波夫致苏联大使转告周恩来电》（1950 年 7 月 5 日），APRF，45/1/331/79。

[2] 《菲利波夫致罗申电》（1950 年 7 月 8 日），APRF，45/1/331/82。

显示斯大林这个时候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这时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外交的行动紧急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相反，眼看美国代表在推动联合国谴责朝鲜侵略成功之后，进一步积极鼓动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斯大林还是没有及时地做出反应，马上派他的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结果，7 月 7 日，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美国代表轻而易举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北朝鲜乃至于苏联，在外交上都明显地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斯大林所以这个时候坚持不改变既定的方针，除了难以接受停战的后果以外，最主要的显然还是因为朝鲜人民军这时在战场上在处于节节胜利的顺利形势之下，美国以及联合国的军事干涉，一时还难以看到可怕的后果。因此，当英国人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委婉地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联能够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很坚决地打电报给中国和北朝鲜政府称：“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礼的和不能接受的。”[1] 与此同时，他再一次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在中朝边境部署九个师的部队。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九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他甚至慷慨地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2]

很显然，斯大林不是完全没有担心。但是，他渴望这场战争能够顺利地打下去。

---

[1] 《斯大林关于驳回英国建议给什特科夫电》（1950 年 7 月 1 日），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第 449 页。

[2] 《菲利波夫致苏联大使转告周恩来、毛泽东电》（1950 年 7 月 13 日），APRF，45/1/331/85。

二、毛泽东表示，中国能够成为朝鲜强大后盾，不怕与美军作战

在得到斯大林对立即着手部署九个师的东北边防军以防万一的积极答复之后，受毛泽东的委托，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加以研究落实。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作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及其所辖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和已经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等部，共二十五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1] 会议同时高度重视空军问题，授权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改装、训练和接收苏联飞机，迅速组建中国空军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建设空军问题一直十分重视，但空军装备以及空地人员的训练限制着空军组建工作的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只有一个空军第四混成旅，组成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到与美国军队作战的可能性，军队领导人都格外重视空中掩护问题。因此，受到斯大林提议的鼓舞，参加国防会议的领导人都一致主张乘机加速空军的建设。因此，周恩来很快两度约见苏联大使罗申，一方面请他向斯大林表示感谢，一方面要求苏联派遣防空和空军专家前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一封由毛泽东署名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中国政府还就苏联飞行师在中国东北的配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主张："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将其他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2] 对于中国方面的所有这些要求，斯大林和苏联武装力量部相当痛快地予以了满足。

---

[1]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60—561页。

[2] 《罗申转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7月22日），转见《世界史研究》（年刊）总第三期，1997年11月，第261页。

一直到8月中旬为止，朝鲜人民军的作战都还比较顺利。7月底，人民军已经进抵洛东江，整个南朝鲜军队只剩下几万人，连同前来增援的近十万美军，被围困在了朝鲜最南端的釜山港一带狭小的范围里，眼看统一朝鲜的战斗即将进入尾声了。8月中旬，人民军大举突破了由美军第八集团军沿着洛东江建立的坚固防线，金日成公开通过平壤电台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将士务必在8月底之前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

朝鲜人民军的节节胜利，也使中国领导人深受鼓舞。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谈到朝鲜战局时与会者多数表示乐观，特别是注意到人民军能够对美军直接作战并且在向前推进的情况，许多与会者都相信，美国军队的战斗力要弱于当年他们与之作战过的日本军队。不过，美国在国内国外做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之后，是否会轻易地承认失败、放弃朝鲜，毛泽东等人显然有所怀疑。毛泽东再度强调了美国在朝鲜腹背发动登陆战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基于这样一种估计，他明确讲，美帝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要准备美帝大举进攻北朝鲜，“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因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周恩来也肯定地说：朝鲜战争要取得彻底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才) 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1]。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与苏联大使、专家以及军事顾问的谈话中，都不止一次地说明，中国有决心成为北朝鲜的坚强后盾，解放军不怕与美国军队作战。

朝鲜战局的进展，明显地影响着中共中央对援助朝鲜问题紧迫性的估计。8月4日会议召开时，人民军的作战有很快结束的可能，毛泽东估计美军出于报复目的，可能很快转而在人民军侧后发动登陆战。因此，他明确提出，东北边防军“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页。

务“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而8月中旬，得知部队各项准备工作及装备均有不足，人民军夺取釜山港的作战因美军顽强抵抗最早也只能在8月底才能结束，毛泽东相信，釜山战役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军队一时还难以另外调集新的足够发动登陆战的部队，即使开始新的进攻，也要到9月以后才有可能。因此，他又指示东北边防军：“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1]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已经看出，照目前的情况拖下去，靠北朝鲜人自己恐怕是赶不走美国人了。

8月底，眼看人民军进攻釜山的作战严重受阻，美军已在釜山地区构筑成坚固的防御线，有可能抽调足够的机动部队来发动对人民军的反击，毛泽东开始感到形势的严峻。为此，他不能不一面提醒苏联人战争即将长期化，一面发布指示，要求军委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战争，“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2]。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啃不动釜山这块小骨头，也让斯大林感到事情有点儿不妙。来自朝鲜的种种情报显示，面对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大队美国攻击机和美国陆军在火力方面的优势，人民军的士气受到明显的影响。当然，斯大林并没有感到绝望，他寄希望于最后五分钟的努力。他8月28日在电报中还在继续给金日成鼓气，说：“苏共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会很快地被赶出朝鲜”；“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不要因为推进中进攻受阻，或因某些局部的失败而沮丧。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要知道，“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坏

[1] 毛泽东：《军委关于东北边防军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给高岗的电报》（1950年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给高岗的电报》（1950年8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54、469页。

[2] 毛泽东：《关于集中十二个军以应付时局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1950年8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85页。

得多”；“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他的盟友现在和将来都会支持他”；为了尽可能保护人民军不受敌机的攻击，“我们可以补充提供攻击机和歼击机给朝鲜空军”。[1]

斯大林的鼓励使金日成备受鼓舞，他一面复电斯大林，说“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感谢”，一面下令对釜山的敌人发动最猛烈的攻势，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人赶下海去。[2]

据美国人记述，“9 月 1 日，一声爆炸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北朝鲜人至少向釜山防御圈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一波又一波地一连持续了一周时间。美国人“付出了战争中最惨重的代价”。仅 9 月 5 日一天，美国陆军就有 102 名士兵阵亡，420 人受伤，587 人失踪，陆战队阵亡 35 人，伤 91 人，伤亡总数达 1245 人。[3] 但是，美国人顶住了人民军的拼死进攻。进入 9 月中旬，上万名美国陆战队员撤离了釜山前线。只可惜，他们不是被赶下海去的，在釜山港口列队登船的陆战队员们被告知，他们要去从侧后对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一场登陆战。

三、斯大林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同志求援，但叮嘱“不要提莫斯科”

朝鲜半岛呈狭长形，长 800—900 公里，拦腰最窄的两处，一处在平壤附近，一处在汉城附近，仅 100 公里左右。人民军由北向南长驱直下，部队大部分集中在最南端，其补给线达 400 多公里，很容易被拦腰切断。麦克阿瑟将军在战争爆发第五天前往朝鲜进行战地视察时，就已经产生了在汉城附近实施两栖登陆，对人民军拦腰一击的想法。7 月 4 日，麦克阿瑟就指示他的参谋人员制定登陆作战计划。10 日，以汉城附近的仁川作为登陆点的“蓝

[1] 《冯西致苏联大使转告金日成电》(1950 年 8 月 28 日)，APRF，/45/1/347/10—11。
[2] 《什特科夫转呈金日成致斯大林电》(1950 年 8 月 31 日)，APRF，45/1/347/14—15。
[3] 约瑟夫 · 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8—199 页。

心行动”计划已经出笼。计划提出，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应于7月22日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港发起登陆战。仅仅是由于后勤准备不足和缺少熟悉两栖作战的部队，这一计划被放弃了。但7月23日，新的名为“铬铁行动”计划再度提出了从仁川登陆的作战方案，只是这一计划的实施时间被推迟到了9月中旬。麦克阿瑟坚信，这是“以极少的部队包围并消灭其主力部队”的最好方案。[1]

9月15日，经过周密准备的仁川登陆战果然一举成功。首批18000名美军占领了仁川港，不仅汉城受到威胁，而且整个人民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半岛南端的第一、二集团军都有可能全军覆灭。莫斯科显然注意到这种危险性。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之后，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订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为确保整个战线的稳固，不使美国人的阴谋得逞，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2]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美军在仁川的登陆。对于美军可能会利用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从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这一点，毛泽东等人也早就有所担心。但是，由于金日成一直不希望中国方面太多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因此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就这个问题与金日成交换意见。不仅如此，尽管在斯大林的催促下，中国方面得以向平壤派出了自己的大使，却还是得不到详细的战况情报。因此，美军仁川登陆三天后，周恩来不得不约见苏联大使，要求苏联政府能够迅速提供有关朝鲜战局的更加准确的

[1] 前引《朝鲜战争》，第200—201页。

[2] 参见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mber 16—October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95—96。

和及时的情报，并且提出建议说：朝鲜人民军应当集中全部预备队消灭仁川登陆之敌，如果缺少这样的部队，务必从南方将主力部队撤下来。

实际上，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出中国非出兵不行了。几乎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力争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以便勘察地形，做好出兵作战的准备。毛泽东同时更通知东北局负责人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急准备。"[1] 对此，斯大林也看得同样清楚。为了避免中朝之间发生误会，他专门复电为金日成解释说，未能向中国方面提供军事情报，是因为金日成与前线司令部的联系有困难，包括他本人得到的有关情报，也多是来自苏联大使，而不是金日成。他表示，人民军是一支很年轻的部队，指挥系统不完善，干部也不得力，要指望人民军在后方的少数预备队抗击仁川登陆的美军，是不可能的，他同意必须从前线撤出主力部队来建立巩固的防线。[2]

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显然寄希望于能够用最后的全力把美国人赶下海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北朝鲜这时能够很快从南部前线撤下来几个师，要想马上组织起对具有海空优势的美军的有效防线，在时间上也是极其困难的。何况，据苏联军事顾问报告，人民军从上到下部队指挥组织得很差，有线通信被敌机的轰炸所破坏，无线电通信既缺少熟练的报务员，也无法保障燃料的供应，人力通信几乎不采用，斯大林又不允许苏联顾问随军行动，因此，后方对整个前线的情况也只有断断续续的报告，指挥都很困难。[3]

9月25日，即美军实施登陆作战第十天，汉城即告陷落。美军并且占领了尚州、安东，并已向清州方向发展。而人民军围攻釜山的作战也因腹背受敌而告失利，釜山方向的美军已开始大举北进，其狂轰滥炸更是使人

---

[1]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 同前，第148—149页。

[3] 《马特维耶夫（苏联赴朝特别代表团团长）致冯西电》（1950年9月26日），APRF，3/ 65 / 827/103—106。

民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集中在南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苏联顾问这时报告说："人民军部队主要由于敌人空军而遭到巨大损失，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形势异常严峻。带着斯大林的撤退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马上请中国朋友派遣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以便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1]但是，由于金日成不同意向中国求援，始终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因而朝鲜方面迟迟没有向中国提出求援的请求。

这回是斯大林相信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27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斯大林严厉批评朝鲜人民军各级指挥机关在指挥和战术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并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必须对这些错误负直接责任，特别是拖延了撤退的时间。鉴于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当然，所有这些工作绝不能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被俘。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斯大林还试图从外交上找到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进而缓解这一局势的办法，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他虽然也同意马特维耶夫的提议，但也还只是局限在同意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到朝鲜来。显然，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这场战争遭遇如此结果，甚至使斯大林对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党求援一事都颇觉脸上无光。故他特别告诫说：切记让金日成"不要提莫斯科"[2]。

28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战局的办法。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

---

[1] 前引《马特维耶夫致冯西电》。

[2] 《冯西致马特维耶夫和什特科夫电》（1950年9月27日），《常福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年9月30日），APRF，3/65/827/90—93、100—101。

后已无法阻止具有巨大优势的美国军队占据南部朝鲜了。而美军一旦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势必会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的。因此，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向苏联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苏联不便援助，至少也要促使曾经许诺帮助自己的中国方面直接予以军事援助。向中国方面提出这种请求固然是令人沮丧的，因此，在起草了求援信之后，金日成于29日晚还向苏联大使询问美国是否真的会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他表示，他还是想用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但他不清楚敌人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因为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无法组织起新的部队，也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敌人。[1] 对此，苏联大使当然不能提供任何肯定的意见。

四、两封电报，一个要出兵，一个不要出兵，哪个电报是真的？

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2]。

斯大林这时已经很清楚，这是挽救北朝鲜的最后一着了。根据档案记录看，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不过十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当然知道把中国人推到前面去抵挡自己捅

[1]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APRF，45/1/347/46—47。
[2] 《什特科夫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APRF，45/1/347/41—45。

出来的这个马蜂窝，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为了不让中国方面感到有任何被强加于己的感觉，他特意在电报的结尾处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1] 言外之意，他不过是因为看到平壤方面陷入生死存亡关头，因而背着平壤请求中国朋友给予帮助罢了。

由于时差及中转等原因，斯大林的电报经过苏联大使罗申送到毛泽东手中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这个时候，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也带着求援信到了中南海。在读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来电和来信，听取了朴一禹对朝鲜战况的介绍之后，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要援助北朝鲜，这个方针无疑是早就确定了的。不仅一年多以前毛泽东就表示过这种看法，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这种态度。因此，9 月 27 日，即金日成还在犹豫要不要向中国方面请求援助之际，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已经授命向力图调停的印度政府转达了中国方面的强硬姿态，威胁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2] 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美军在釜山的有效抵抗、实施仁川登陆大举围歼朝鲜人民军主力以及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要管，就要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要能够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问题是，几乎全部由苏联装备起来的朝鲜人民军都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纯粹靠抗日

[1] 《菲利波夫致苏联大使转告毛泽东、周恩来电》(1950 年 10 月 1 日)，APRF，45/1/334/97--98。
[2] 转见柴成文、赵勇田前引书，第 74 页。

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敌人五花八门的各种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就能够达到歼灭和驱逐美国人的目的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可知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火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1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性，因此也就不能不准备美国至少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海军，包括鼓动台湾国民党进犯中国沿海地区。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也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政治的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也顾虑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在于打得怎样。而打得怎么样，说来说去其实只是一个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苏联的援助来解决。既然斯大林能够大举援助朝鲜人民军，当然也能够帮助中国军队解决目前装备上的不足。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与此相反，如果不出兵，让美国人压到鸭绿江边来，直接威胁中国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国家安全，麻烦将会更大。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看起来当天晚上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否则，毛泽东不会在准备

第二天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马上起草了准备出兵的电报。

会散之后，毛泽东当即起草了这样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如果在朝鲜打胜了，那么，即使美国已向中国公开宣战，这个战争也打不长打不大。而中国军队能否打败美国军队，则取决于苏联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他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五百至六百门火炮。但是，他并不打算因此就延迟出兵的时间。他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1]

毛泽东所以会在 10 月 2 日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连夜起草这封给斯大林的电报，一方面显示毛泽东深感事态紧急，另一方面也显示他估计政治局多数领导人不会反对。毕竟在此前举行的几次有关会议上，多数领导人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但是，在这一天下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

[1]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39—541 页。

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毛泽东最为倚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尤其表示悲观。[1]

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眼见多数同志意见相左，毛泽东不能不放弃了马上通过出兵决定的想法。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由于彭德怀一向性格豪爽，敢作敢为，因此毛泽东还是希望等彭德怀来，听一听他的意见，再做最后决定。

2 日会后，毛泽东深夜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授了一封电报[2]，向斯大林说明了当天会议形成的看法。电报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想法，他在电报的最后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3]

由于 10 月 2 日出现了两封对出兵态度截然不同的电报，中外学者中间曾经出现过尖锐的争论。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同一天毛泽东会给斯大林发出两封态度完全相反的电报，因此，最初的争执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何

[1] 聂荣臻前引书（下），第 736 页。
[2] 毛泽东此一电文落款日期为 10 月 2 日，莫斯科收到时间为北京时间 10 月 3 日中午 12 时 15 分。
[3] 《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10 月 3 日)，APRF，45/1/334/105—106。

者为真何者为假的问题上去了。因为中方最初公布电报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也没有公开原件,只标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1]字样，结果，在莫斯科总统档案馆取得了第二封电报原件的俄国学者自然有理由怀疑中方公布的是一封伪电报。[2]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档案馆合力调查和考证，最终证明了当初公布这封电报时确有疏忽，未能指出该电报虽有手稿,却并未发出这一事实,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但是，如何解释第二封电报呢？这仍然是一个让不少早已习惯了传统说法的中国学者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很显然，他们多半不相信一向习惯于独断独行的毛泽东，会在出兵问题上发生这样大的犹豫和反复。因此，基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和谐的关系，他们宁愿相信第二封电报所以会有那样的说法，“只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出于策略上的一种考虑，一方面，是强调中国出兵困难，特别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极差，以引起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从而为中国出兵援朝提供武器和空中掩护……另一方面，也有探测一旦战争将苏联拖进去时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的意思”[3]。

仅仅为说明自己装备太差，要求武器援助，有必要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吗？如果说真是为了强调中国出兵困难，装备太差，想要争取援助的话，毛泽东 10 月 2 日凌晨的第一封电报转达的信息不是更清楚更明白吗？那封电报不仅说明了装备太差的问题，并且还具体提出了要求援助的类型和数量，如果真是为了要求援助，有什么必要停发第一封电报，反而要发一封语意隐晦而且只能让人产生中国不想出兵的看法的电报呢？

至于说第二封电报有所谓要想“探测”苏联能否参战的意思在内，就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早在与金日成的谈话当中，毛泽东就很明白地告

[1]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108 页。

[2] Mansourov 前引文。有关的辨证文章，可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 10 月 2 日的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2 期。

[3] 参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谈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诉金日成说，一旦战争打起来，苏联由于受到《雅尔塔协定》的限制，不能也不适于出兵援助北朝鲜。既然早就有此见地，有什么必要现在又来多此一举？而且，如果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心出兵，它又有什么必要采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再去“探测”苏联的参战意向？如果毛泽东对出兵如此没有信心，他还会坚持出兵吗？

强调中国出兵朝鲜是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这没有错。但因此否认中共中央内部在讨论出兵过程中有过意见不一和难下决心的情况，甚至把明明是表达党内意见不一、决心难下的电报，也要说成是毛泽东工于心计的一种“探测”，这就未免太过牵强了。可以肯定，毛泽东在第一封电报当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特别开列了必须得到的武器清单，他完全没有采取相反的态度来“探测”苏联援助意图的必要。何况此举只能给人以出尔反尔的印象，造成误解，丝毫不能使苏联方面正确理解中方的求援要求。以后发生的实际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在做出出兵决定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反复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录其实都回忆到当时党内多数同志对出兵表示怀疑的情况。毛泽东突然改变出兵决定，就是因为多数领导人的犹豫和反对。但即使存在着这样的犹豫和反对，也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报中实际上也很委婉地谈到了，他一方面讲：“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说得很明白：“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

五、毛泽东说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斯大林从此改变对中共的看法

苏联人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毛泽东的电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人的误解，认为中国人缩回去了。

毛泽东 10 月 2 日的答复首先就让苏联大使罗申深感意外。他在毛泽东

的电文后面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的复电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先前的立场。这与毛泽东同尤金、克斯托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谈话中表示过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相信，中国人不仅能够派出军队，而且完全能够派出比几个师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唯一的问题只是需要援助他们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而已。[1]

毛泽东2日的复电自然也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就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美国抓住苏联卷入了这一事件的把柄。不管苏联实际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要不被美国人抓住，这把火就烧不到自己身上来。但是，推动朝鲜战争，说到底是因为它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利益极大。如果因此反而连北朝鲜也丢了，让美国人压到苏联远东边境线上来，那对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无疑会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所以，即使苏联不能出面支援北朝鲜，斯大林也必须要设法推动中国出兵挡住美军，不能让美军站到苏联和中国的边境上来。何况，中国人当初也是自己主动承诺要援助北朝鲜的。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中国改变态度。因为，那样不仅整个朝鲜要落入美国人之手，苏联远东今后也再无太平日子可过了。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又再度讨论了朝鲜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但是，真的能够放弃北朝鲜吗？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

[1] 前引《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10月3日)。

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1]！

不论毛泽东是何时收到斯大林这封慷慨激昂的电报的，他并没有放弃出兵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如何，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

4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的话，彭德怀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但是，在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的问题后，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显然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站在毛泽东一边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2] 据此，毛泽东提议，一方面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得失，具体落实空军掩护及武器援助问题，并最后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于6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以便统一军队领导人的意见，并集中军方领导人对入朝作战具体困难和所需装备的看法。在取得了军队领导人的一致意见之后，毛泽东在6日晚再度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

[1] 转见《冯西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APRF，45/1/347/65—67。

[2] 参见王焰等著：《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403页。

备过一些时候派九个师入朝作战，只是中国军队装备实在落后，尤其是没有空中掩护，因此还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详细的讨论。[1]两天后，毛泽东已经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且当即就同时通知了罗申大使和金日成。[2]

8日，即在毛泽东发布组成志愿军命令的当天，周恩来与林彪飞抵莫斯科，然后于次日转往斯大林在黑海附近的疗养所。中苏领导人很快展开谈判。有关谈判的记录目前尚未发现，可以肯定的只是，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当时带去的事实上还是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但很显然，由于斯大林此前几度表示过愿意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最初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可能产生疑问的多半只是空中掩护和武器援助的满意程度而已。让周恩来感到意外的是，他在谈判中很快发觉，苏方似乎并不打算马上提供空中掩护。

空中掩护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最重视的问题，也是军方领导人同意出兵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几乎与此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在电询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领导人多半认为，"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3]。

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苏方不能对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在周恩来和林彪看来，马上出兵朝鲜几乎不可能。因此，他们的谈话自然比较多地转向了出兵困难的一面，特别是对没有空中掩护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明确表示怀疑。斯大林虽再三强调出兵的好处，却无法说服周恩来和林彪。这让

---

[1] 前引《冯西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的信》。

[2] 毛泽东：《关于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1950年10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45页。

[3] 王焰等：《彭德怀传》，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斯大林倍感沮丧与不满。他渐渐地变得激动起来，甚至大声说："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1]

10 日和 11 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将近两天的会谈。斯大林关于空中掩护问题的答复始终不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虽然最后同意提供十六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但仍旧对立即出动空军掩护表示困难，声明苏联远东空军准备不足，至少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因此，斯大林更多的还是主张向中方提供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则一再告诉斯大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仅中方接运困难，而且也没有飞行人员可以利用，何况还有一个由中方付款的问题，这在财政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必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讨论来讨论去，双方最后只好决定准备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

在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中，说明："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一）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二）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三）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在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一）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二）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三）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

[1] Mansourov 前引文。

(四) 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地调入满洲，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五) 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1]

在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说明已经命令部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据此，斯大林于13日通过驻朝鲜大使正式电告金日成说：“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两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要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也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鉴于这些情况，由中苏双方的中央代表召开的这次会议建议：立即开始对平壤等重点据点进行疏散，不要惊慌；朝鲜人民军边作战边向北方撤离，牵制敌军，防止它迅速向北方深入；一部分军队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山区集结，在那里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另一部分军队要组成小分队进入敌后打游击；为组建新的后备师而应征入伍的朝鲜人要分批经中国边境进入满洲，在那里组建师团（中国同志对此表示同意）；利用已到货的、朝鲜军队尚未使用的苏联武器来装备在满洲组建的朝鲜师团。”[2] 14日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3]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就根本改变了想要

[1] 转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http://www.coldwarchina.com/vjyj/cxzz/002360_4.html。

[2] 同上引注。

[3] 参见 Mansourov 前引文；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APRF，45/1/335/31。

出兵的意图。在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和决定暂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泽东一边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原定计划，一边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13日彭德怀、高岗到京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讨论这一新的形势。显然，与会者都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援感到意外和不满，但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边境上来的前景，也不是与会者愿意看到的。在反复讨论了这种情况之后，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毛泽东于会议当天和次日接连三电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可以等到苏联的装备到了，等到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故请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继续与斯大林商议：第一，请苏联用租借办法援助中国作战装备；第二，要苏联保证在两个月内至迟不超过两个半月出动志愿空军帮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同时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1]

13日，苏联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的决定紧急通报给了斯大林。毛泽东告诉罗申说：过去我们的同志所以举棋不定，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形势、苏联的军事援助、空中掩护等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的领导同志认识到，如果美国军队推进到中国边境上来，那么，朝鲜就将成为一个对我们极有危险的地区，东北就将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出兵。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有了前面的经验，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但他还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日成，要金日成

[1] 毛泽东：《关于我军应当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56页。

暂缓执行他昨天发出的要人民军立即北撤的电报，因为自己“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他通报说，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1]。

14 日，斯大林又进一步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他当即做出决定，以最快速度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中间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周恩来在进一步的谈判中突然发现，斯大林许诺的提供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害怕被美军俘获苏联飞行员，暴露苏军参战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因此，苏方并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的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而已。因此，得知这一消息的毛泽东 17 日再度紧急将彭德怀和高岗召回北京，并推迟了部队入朝时间。当然，事至于此，毛泽东最终还是和彭德怀等达成了一致。次日，毛泽东电告志愿军总部：“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2]

志愿军出兵朝鲜，使苏联终于避免了被美国军队陈兵边境的可怕后果。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得知中国志愿军出兵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不管斯大林是否真的被感动得落泪，他显然是十分兴奋地正式通知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3]

[1]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和我军入朝参战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58—560 页；《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APRF，45/1/335/1—2；《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APRF，45/1/347/74—75。

[2]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去时间给彭德怀、高岗等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入朝作战给邓华等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67、568 页。

[3] 《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 年 10 月 14 日），APRF，45/1/347/77。

第十三章

迟到的合作

毛泽东打出了信心，主张一役消灭美军四五个师；联合国高度紧张，提议停战，斯大林支持毛泽东越过三八线；四次战役，全线后退，斯大林紧急驰援；毛泽东赞同停战，斯大林提醒说：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我们过去几乎不知道，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否有过任何可以让他们在感情上相互接近的经历。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差不多都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和怨言。因此，我们曾经很难理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为什么得不到毛泽东的赞同。明明斯大林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为什么毛泽东还坚持要“三七开”，说斯大林功大于过？

俄国档案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复杂心态的了解。至少，我们如今知道，毛泽东与斯大林并非从来没有过可以让他们真心感谢对方的合作经历。朝鲜战争，毫无疑问是对那个时候的中苏同盟，也即是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大领袖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仔细翻阅和研究这些档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人在领导作风乃至思维方式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特别是两个人对于革命与战争的理解，确实让人感到是那么相似，配合上自然也就颇为默契。

因此，不论毛泽东过去对斯大林有过多少怨言，通过这场战争，他明显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存在的意义。很可能，他是对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唯一深感遗憾与不安的人。

一、斯大林通知：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讨论朝鲜问题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 7 月 7 日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援助南朝鲜，美国出兵干涉朝鲜的战争行动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幕后支持北朝鲜进攻的苏联因此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从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战争形势看，美国以及联合国军的加入似乎并不足以阻挡人民军的进攻。因此，斯大林最初仍旧全力支持北朝鲜把战争进行下去。但是，美军的介入毕竟使朝鲜战争出现了一个不可知的变数，因此，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

战争发生意外时可以迅速“入朝作战”[1]；一方面也开始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设法牵制美国，并努力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

7 月 13 日，当印度驻苏联大使提议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时，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葛罗米柯最感兴趣的是，印度大使不仅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而且主张一切美国军队要撤出朝鲜，但却没有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去。这恰恰是苏联所希望的。因此，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2] 基于这种情况，斯大林相信有必要让他的代表立刻返回联合国了。他正式通知中国领导人说，苏联代表要利用 8 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

8 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明确表示支持讨论朝鲜停战问题的建议，但前提是：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同时，他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做出的各项决议。而中国政府这时也对利用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很感兴趣。8 月 18 日，周恩来就曾明确向莫斯科建议：可否考虑在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台湾国民党代表的问题？紧接着，周恩来直接致电联合国领导人，要求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并要求联合国谴责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及袭击其东北地区。[3]

不难想象，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

[1] APRF，45/1/331/79.
[2] 《葛罗米柯与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的谈话备忘录》（1950 年 7 月 13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 446—448 页。
[3]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1 页。

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苏联代表就上述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议案，在安理会和9月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均遭到了否决。这期间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一项议案。[1] 但是，这个时候，由于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战场的局势已经全面恶化了。斯大林不得不一面全力劝说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一面秘密指示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要他设法在提出和平方案的同时，通过私下的接触了解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当然，斯大林很清楚，在美国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之后，它是不会满足于把它的攻势停止在三八线上的。他并不真的指望美国人会要求停战。因此，苏联政府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提出的主张是：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莫斯科，斯大林明白地告诉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2] 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预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而更让全世界和苏联人感到震惊的是，经过两个月的鏖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苏联装备，甚至完全没有空中掩护的志愿军，竟然把口口声声地叫嚷着要到鸭绿江边过圣诞节的几乎是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又赶回到三八线上去了。

---

[1]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45页。

[2] 师哲前引书，第496—498页。

二、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毛泽东下令志愿军打过三八线

从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把南朝鲜军队残部连同增援的美军赶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到美国在三八线附近的仁川实施登陆作战，一举歼灭人民军主力，把金日成的余部赶到鸭绿江边；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把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重又赶回到三八线上来，朝鲜战争战罢一个回合。这一个回合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因为南北朝鲜军力上的损失已不相上下，站在南朝鲜一边的联合国军与站在北朝鲜一边的志愿军的损失也差不了多少，而战线却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上来了。显然，朝鲜战争再度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是要继续打下去，还是乘势把战争停下来？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十一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已经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1]

事实上，还在得到印度等国停战呼吁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就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印度等国的呼吁，而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有消息说，维辛斯基也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

12月5日，王稼祥在与葛罗米柯的谈话中委婉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1]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70—672页。

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趁热打铁”[1]。紧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2]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他是希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一向不曾与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部队的装备和空军的掩护一时又到不了位，他最初对同美军作战很谨慎。而战斗展开之后，当他发现美国军队装备虽好，其实作战远不像当年日本兵那样顽强时，他已经没有了这种顾虑，歼敌的胃口也越来越大。11 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他已开始提出半个月内歼灭美军四五个整师的战役设想来了。到 11 月中旬他给斯大林打电报时，更是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再给敌人一两个较大的打击，我方就能够由防御转入进攻了。[3]当然，毛泽东也设想过“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但现在谈判似乎太早了点儿，因为他所希望的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停战问题。

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 12 月 7 日凌晨 3 点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与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1] APRF，3/65/371/35–37.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停战问题指示的决议》（1950 年 12 月 7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643 页。

[3] 毛泽东：《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2 日），毛泽东：《朝鲜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950 年 11 月 1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40、658 页。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

在这里，中国方面想要进行什么样的谈判，通过这种谈判想要得到些什么，可以说一目了然。

上述条件可以说也是苏联所希望的。斯大林巴不得能够按照中国方面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他很清楚，现在恐怕还不是发布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时候。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被打败，它怎么会接受中国人如此高的要价呢？斯大林在运用策略的问题上显然要老道得多。与其和盘托出自己的愿望，不如策略一些，做出愿意和解的样子，迫使美国暴露其战争罪魁的真相。因此，斯大林在转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是，至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因为这很可能被美国利用来打那些与美国有矛盾的中立国家的耳光，并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为什么不接过和平的旗帜，逼美国出来表态呢？他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但要求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把球踢回去。[2]

12 月 9 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备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 1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

[1] APRF，3/65/336/17–19.

[2] AFVRF，059a/5a/3/11/196-197.

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要越过三八线。考虑到目前军事上已经出现的困难，这应该不失为一种策略。在8日，即志愿军占领平壤两天之后，彭德怀就曾致电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因为第二次战役部队减员甚大，汽车损失严重，兵员及物资补充都极端困难。苏联驻朝大使强烈主张继续南进，而他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后，来年春天再战。

这个时候，不要说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就是像彭德怀那样提出暂时把攻势停在三八线上，都是相当困难的。北朝鲜人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这时的目标也都是要把美国从朝鲜半岛赶出去。只要停下来，哪怕只是暂时的，都会使自己受到盟友的指责。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态度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更何况三八线本来就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在三八线停下来，难免会加强国际上把三八线视为固定分界线的看法，过了几个月再来突破它，政治上的影响可能更不佳。既然已经打到这一步，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再困难，也还是先过了三八线的好。

正在这时，毛泽东得知，美国正试图把中国干涉朝鲜案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意欲把中国推上被告席，这使得本来就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的毛泽东，更加怀疑有没有必要用停止进攻来显示自己的和平姿态。恰好这时又有情报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到日本和朝鲜前线视后，认定美军没有组织长期防御的可能，因而已经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军做撤退准备，这无疑更激励了他要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决心。[1]而斯大林这时发来的电报也坚定了他的信心。在这封电报里，斯大林在尖锐批评苏联大使的意见，支持彭德怀的军事部署的同时，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看法的正确性，同意说现在越过三八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议为志愿军再提供两千辆汽车，以便解除彭德怀的后顾之忧。

---

[1] 《毛泽东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19页。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打一仗，越过三八线。他告诉彭德怀等："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为"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到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为了表明自己毫不妥协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公开昭示自己的斗争目标。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2]

三、联合国通过停火提议，毛泽东决心再打一仗，根本解决问题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一百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3]，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做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

[1] 前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页。

[2]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2日。

[3] APRF，3/1/336/88–89.

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做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1]。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 立即实现停火；(二) 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 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 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 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人不可能会接受这个五步方案。但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自吹自擂，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

有人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想真的停火，就不存在谈判的时机，中国不接受五步方案也就是理所当然的。[2] 但这无疑是说不通的。美国不想谈判，但又不得不接受联合国多数国家的谈判方案，这本身就表明美国在外交上已极端被动。美国国务卿的表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美国变被动为主动的希望，恰恰就是寄托在中国的拒绝上面的。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

[1]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81 页。

[2]　齐德学前引文。

合国的这一提议，即使只是出于策略的目的，那么美国的企图就不能得逞，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因为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只会更加被动，它的任何军事进攻的企图都必然造成联合国军内部的尖锐分歧，从而使它从战争初期的一呼百应迅速跌落到严重孤立的境地。这对中国并无坏处。何况，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承认它本身在美国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败。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时入朝的约四十万志愿军作战部队，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近十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五百公里，有四百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美国在它所赞同的联合国决议的压力下，自然不能不暂时停止进攻，这不仅可以把停火线暂时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对志愿军至少在策略上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然而，中、苏、朝三方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此时停火的好处。与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停战也搞了不止一次，打了停，停了打，兵不厌诈嘛。问题是，敌人是不是还有还手之力？注意到第三次战役期间敌军撤退之迅速，他深信此前关于美军即将撤出朝鲜半岛的情报是准确的。在他看来，敌军已无还手之力，其下一步或者是“进行微弱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者是“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既然如此，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是否还有必要与美国人就朝鲜的政治解决讨价还价？何况，在毛泽东看来，联合国的五步方案固然对中国有利，但承认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以及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对北朝鲜却未必有利。联系到几天前因为彭德怀下令部队停止南追，北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大使就与彭德怀争执了几乎一天一夜，最后还是斯

大林来电肯定了彭德怀决定的正确，才结束了这场争执的情况，毛泽东很容易想到，一旦中国提出接受联合国停火方案，在中朝之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局面。因此，即使从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他也很难下决心接受这个停火方案。

毛泽东的想法，正符合斯大林的看法。志愿军没有取得苏联装备就获得如此出人意料的胜绩，如今苏联装备陆续运抵中朝边界，斯大林自然会重新燃起把美国人赶出朝鲜的强烈愿望。他理所当然地要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了。

基于这种情况，周恩来于 1 月 17 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

不论中国政府的主张中是否包括部分承认五步方案的内容，中国方面的拒绝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尽管印度等中立国家看出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仍有某些可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行敷衍了。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而与此同时，朝鲜美军也转而由退却转入大规模进攻。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发生逆转。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18—119 页。

四、美军全线反击，志愿军被迫后撤，毛泽东估计战争已长期化

第三次战役是1951年1月上旬结束的，经过彭德怀的极力争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连续作战三个月之久的志愿军终于得到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于1月25日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反攻。仅仅两周时间的休整补充，对历经苦战的志愿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彭德怀当即提出：可否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已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但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他于第二天电告彭德怀说："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同时询问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也立即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1]。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连续作战能力不超过一个礼拜，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进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虽然志愿军各部队打得十分顽强，战役组织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但这一仗打下来部队不仅损失了五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一百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

---

[1] 王焰前引书，第446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APRF，45/1/337/41—43；《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0日），45/1/337/43—44。

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前此对朝鲜战局前景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了。1951 年 3 月 1 日，即在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之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到对美军作战的极端艰难了。鉴于斯大林对志愿军放弃汉城十分不满，他专门去电解释说：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九个军减员十余万人，三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六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已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1]。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特别表示希望不要放弃仁川和汉城。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空中掩护的效果也不理想。[2] 结果是，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因为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开始几仗美国人晕头转向，不习惯志愿军的作战方式，被打得丢盔卸甲，连连败退，几仗过后已经明白过来，掌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士兵身上只能背一个礼拜的粮食弹药）和"月夜攻势"（只能在有月亮的夜晚组织进攻）的规律，并且知道志愿军的武器装备难以压制其强大火力和攻破其装甲防线，因而

[1]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1951 年 3 月 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151—153 页；并见 APRF，45/1/337/78—82。

[2] 乔恩·哈利迪：《朝鲜空战：苏联方面的故事》，转见齐德学、沈志华、杨奎松编译：《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观点》，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战史部 1998 年版，第 210 页。

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明确提出，苏联空军应当把它们的机场移到朝鲜境内来，至少能够做到掩护平壤—元山线以北的后方补给线，否则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中国的空军训练好了，能够参战，因为在朝鲜境内没有空军掩护，机场随时修随时炸，也没有办法飞到前线来协同步兵作战。

斯大林很清楚空中掩护的重要意义。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接连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

（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

（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的空防任务；

（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

（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飞行员配备 10 个后备的飞行员；

（五）无偿为中国提供 372 架最新型的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 6 个米格－9 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 10 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最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

关于最后一点，斯大林甚至坦率地承认，原先他们估计米格－9 歼击机的性能比得过美英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在苏联空军与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交手后，他们发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 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 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至于已经提供给你们的米格－9 歼击机，“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用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也留给你们……以作为我们对你们

所给予的援助的回报”。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六千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1] 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这时确实对志愿军的作战倾注了相当高的热情。

根据3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可知，他在谈到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的问题时，主要看到的是志愿军运力薄弱、前线兵力不足以及敌人火力上占有优势。而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在苏联的帮助下，这几个问题看起来还都有迅速改观的可能。比如，由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和进一步提供六千辆汽车，运输补给问题有望得到改善。由于第三、第十九兵团等先后入朝，第二次战役中严重减员的第九兵团业已补充休整完毕，可以替换前线那些过于疲惫的部队，兵力上的不足也有望解决。由于苏联援助的三十七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的部队多已换上较先进的苏式装备，再加上用苏联火炮组建的四个炮兵师和四个高射炮师均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六千多门，火力上的劣势似乎也不成为太大的问题了。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仍旧抱定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并据此方针决心用战争解决问题。甚至，由于注意到各方面条件正在改观，虽然4月初斯大林进一步来电提出愿意为中国追加1951年军事贷款额度和提供更多装备，毛泽东也不那么重视了。毛泽东明显地存在希望一战决定朝鲜战争长短的心理。因此，尽管他已经肯定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这时的指示却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他不仅决定要再打第五次战役，而且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时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已经很不理想，战役4月21日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马上就从4月22日开始打响了。战役发动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

---

[1] APRF，45/1/337/118，45/1/338/87、91.

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但也改以解放战争初期打蒋介石的例子，去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对美军每次的作战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对战场的选择，也特别提出，出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设法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北面来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1]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运动作战，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战法，也是他打败蒋介石的法宝。但是，有了人民军失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刚刚从志愿军的胜利中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信心，人们很难接受志愿军后撤的现实。无论它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何况，志愿军再退一步，背后就是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因此，一得知毛泽东的计划，心存疑惧的斯大林也不能不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了。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人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线来。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志愿军转入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2]

斯大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志愿军在前线后方确实没有构筑强固的纵深防御阵地，一旦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插入后方将十分危险，毛泽东转而致电彭德怀，要他务必要在守住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的防线的基础上来打小歼灭战，同时要加紧在这条防线以北另外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

---

[1] 毛泽东：《关于我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1951 年 5 月 26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331—332 页。

[2] APRF，45/1/338/98–99.

以防万一。

但是，志愿军还没有来得及抽调预备队构筑后方的防线，美军就已经开始了大举反击。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 40 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整个战役明显地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多数部队虽然成功逃脱，但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三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未能归还建制而遭歼灭。仅此一个战役，志愿军就有 17000 人被俘，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 80% 还多。

五、毛泽东赞同停战，斯大林断言，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帮助北朝鲜实现它的统一计划。5 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原想靠出奇兵制胜，虽然把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因装备及火力相差悬殊，没有达到大批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而且因为战线拉长，空防欠缺，后勤补给跟不上，使前线作战日益艰难。随后想以多兵取胜，结果一百三十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实际作战力量并没有加强，补给更加困难。再加上战场越来越小，道路狭窄，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到处挤成一团，成了敌人飞机和大炮轰击的靶子，徒然增加伤亡。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因为多数人已经看出，再打下去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长期拖下去财政也承受不起了。

6 月 2 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 5 月 31 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

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1] 显然，美国人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进展，但自身也有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不管美国人此举是否包含阴谋，毛泽东还是不能不予以考虑了。当然，在尚未得知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之前，他这时对是否应当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还有些踌躇。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2]

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鼓励毛泽东说，你们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感到奇怪的是：您来电抱怨大炮和反坦克武器少，而两个月前我就已经通知您，我们今年可以提供给您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为什么始终没有收到您的订单？在他看来，目前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他确信，只有努力再打好一仗才可以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并为志愿军下一步实行有效的消耗战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3]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有意谈判的情况通报。经过这两次战役，他已看出短期内再不存在解放南朝鲜的可能性，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

---

[1] 参见 FRUS，1951，Vol.7, pp.483—486、501—511。
[2] APRF，45/1/339/4–6.
[3] APRF，45/1/339/17–18.

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了。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1]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十分不安。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2]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

---

[1]　APRF，45/1/339/23、28–29.

[2]　APRF，45/1/339/31–32.

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一) 等待敌方提出；(二) 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1]。毛泽东显然主张苏联利用这个机会促成谈判。

严格地说，美国确定谋求朝鲜停战的方针要早于中国方面。还在2月2日，美军刚刚在朝鲜展开攻势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已经提出，目前已经到了停战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发表声明，主张政治解决朝鲜问题，使朝鲜半岛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2] 这一主张因军方反对未能通过。但3月中旬，美军重新夺回汉城，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之后，军方的态度也开始改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且得出结论说："'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它授权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将地面行动控制在三八线附近，不能过多地越过这条战线。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做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李奇微，要求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3]。凯南会见马立克就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4]。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

[1] AFVRF，059a/5a/5/11/35–37.

[2] FRUS, 1951, Vol.7, pp.188–189.

[3] FRUS, 1951, Vol.7, pp.246–247、251、253–262.

[4]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511页。

六、停战谈判受阻，斯大林老谋深算，反对示弱，坚持强硬路线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技巧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地与斯大林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具体对策的看法，甚至明确主张由斯大林“亲自主持谈判”，但斯大林拒绝了，声称：“这是不可想象的和没有必要的。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

根据协商，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十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三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三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四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1]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从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因为还在凯南与马立克会谈时，他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反对将这些问题列入谈判内容的立场。而现实的军事形势，也不容许中国为此与美国讨价还价。比较 1951 年 1 月 13 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它。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

[1] APRF，45/1/340/19–20.

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做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十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1]

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因此，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他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这时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2] 结果，停战谈判终于在 8 月 23 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在战场上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美国人也意识到没有办法坚持它的所谓"海军补偿论"了。因此，新的一轮谈判于 10 月 25 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

---

[1] APRF，45/1/340/93–94.

[2] APRF，45/1/340/89.

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由于美方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中朝方面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谈判开始取得进展。虽然斯大林仍不断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他实际上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了。[1] 终于，谈判双方在 11 月 27 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2]

七、斯大林突然去世，毛泽东痛失有力支持，停战结果不尽如人意

随后的谈判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了。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3] 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 112000 人，俘虏中国籍战俘 20800 人；而中朝方面因缺乏国际战争的经验，俘虏的战俘，或在战场上放掉以软化对手，或直接用来补充兵源，结果，战争结束时只有美英籍战俘 4417 人，南朝鲜战俘 7142 人，相差有十倍之多。

由于在以往的谈判中，美国方面实际上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因此，它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而李承晚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中，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使谈判复杂化并且

---

[1] APRF，45/1/342/100.

[2] 《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第 406—407 页。

[3] APRF,45/1/342/16–19,100.

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由于战争没有结束,尽管美军在地面上的进攻屡屡受挫,只好维持僵持局面，其空军却仍旧可以对北朝鲜施行狂轰滥炸，这种情况给了北朝鲜方面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当谈判拖延到 1952 年夏天，当 7 月 13 日美国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 70000 人增加到 83000 万人之后，中、朝、苏三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磋商。

7 月 14 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明确讲，因为几万名战俘，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 7 月 11 日到 12 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 6000 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的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1]。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 8 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 83000 人中，76000 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 6400 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战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2]

对此，斯大林再度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

---

[1] APRF，45/1/343/72–75.
[2] APRF，45/1/329/54–72.

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二十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建议：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1]

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1953年2月22日，美国方面首先做出姿态，打算恢复谈判。这一天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发表声明，建议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但对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并不认为重新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告诉志愿军谈判代表说：“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结果，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在苏联政府的态度首先改变之后，中国方面的态度才得以改变。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

---

[1] APRF, 45/1/329/54–72.

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1]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既然苏联也持如此态度，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6月8日达成妥协。战俘问题基本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到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总算是结束了。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他明确讲：“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几十年后彭德怀也谈到这一点，他颇为惋惜地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2]

必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和彭德怀所表示的这种遗憾，并不是说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决出胜负，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其实就是战俘问题，这不

[1] APRF，3/65/830/66–71.

[2] 《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仅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 7110 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000 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当然，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位长期让他怀疑的盟友。毛泽东后来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件事，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斯大林才最终相信他是国际主义者了。很显然，毛泽东对此颇感欣慰。

第十四章

马、恩、列、斯—毛？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问题，中国不能摘掉斯大林的画像；毛泽东一度也在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比如提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只剩下百分之十了；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怀疑事情不那样简单，断定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注意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毛泽东说：应该学列宁，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一、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1] 二是斯大林的国

[1] 梅德韦杰夫著，刘力译：《斯大林去世之谜》，原载（俄）《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转见《国际冷战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研究中心2002年版。

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 年 10 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1] 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 156 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

[1] 康·伊·科瓦利：《苏联领导人确定对华援助问题的内幕》，原载（苏）《近代史和现代史》1989 年第 5 期。

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1]。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1] 维托里奥·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2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俄国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死亡之谜》一文对当时斯大林最亲信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有意拖延抢救时间的情况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考察。（俄）《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转见《国际冷战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辑。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 1934 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 1934 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 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 1937—1938 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 383 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 4.5 万人。[1]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2]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

---

[1] 《尼·赫鲁晓夫的报告》，转见布兰科·拉齐奇著，夏平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125 页。4.5 万人的数字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71 页。

[2] 德·沃尔科戈诺夫著，苏群译：《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0 页。

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1]

28 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2]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 3 月 17 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

[1]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 页。
[2]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著，彭卓吾译：《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 3 月 16 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 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 日和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2]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

[1]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以下简略为吴冷西前引书2），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吴冷西的回忆录似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仅 3 月 17 日会议一段，就有数处不实。比如，回忆称《纽约时报》3 月 10 日发表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新华社译出后分送中央负责同志，17 日会即是中央领导人在看过新华社印发的这一资料后召开的，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邓小平、毛泽东都特别谈到，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因此我们也要表态，等等，均与当时的事实相差较多。据查，《纽约时报》披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消息已是 3 月 16 日了，且只是一个新闻报道，内容简要，且不准确。纽约的 16 日是北京的 17 日，也就是说中央召开会议的时间正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当天，新华社自然没有可能编译印发此一消息报道供与会者事先研究参考，世界各国当时也不可能马上有舆论跟出，因此自然也就不存在全世界都在议论的问题。说许多兄弟党这时都已表示了态度，更不可能。实际上，各国党纷纷就此公开表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6 月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更是错误，因为这时朱德还在东欧访问，直到 4 月 2 日才回到北京，这一天根本不可能出席会议。并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3 月）。

[2] 据新华社《内部参考》这时报道称，社会各界均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感到吃惊和迷惑，普遍要求中共中央予以解释和澄清。

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

---

[1] 参见吴冷西前引书（2），第5—7页。这里的回忆中似仍有问题，如提到周恩来参加了这两天的会议，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述，周并未参加这两次会议。

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1]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2]。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二、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

---

[1] 前引《与毛泽东谈话记录》。关于江西"富田事变"和延安"抢救运运"的教训，毛泽东在随后与外国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毛泽东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2日)。

[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02页；《毛泽东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9日)。

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1]。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2]。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3]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

[1] 前引《尼·赫鲁晓夫的报告》。
[2]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载1956年7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见《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插话》（1956年11月）；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未刊稿）（1957年2月27日）。

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1] 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2]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

[1] 从记录看，在谈话中，只有尤金最后强调了一下莫斯科的这种意见，毛泽东多半只是出于客套点了点头，但没有讲话。参见前引《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4 页。

[3]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 4 月 5 日），转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学习文件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17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0—67 页。

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1]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

[1]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答记者问》（1956 年 6 月 17 日），《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1956 年 6 月 19 日），《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的声明》（1956 年 6 月 22 日），《美国共产党关于苏联批评斯大林的声明》（1956 年 6 月 25 日），转见《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 1 辑，第 16—17、41、49—50、55 页。

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1] 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

[1] 有关这一数字目前说法不尽一致。西方学者的数字较高，俄国学者的数字略少，沃尔科戈诺夫估计大约有350万至450万人在1937—1938年间遭到镇压，其中60万至80万被判处死刑，其他相当多的人死在劳改营或监狱里。麦德维杰夫估计1936—1939年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至少50万被很快枪决，其余被长期关押。1988年苏联报刊透露，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全国共有7400万人遭受迫害，但未提及死亡数字。俄国政府1990年调查公布的数字称，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在378万左右，其中将近79万人当即被处以极刑。1991年进一步调查后又公布说，1920—1953年间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间被杀害的，光是现在已经查到的被枪决者的大型集体坟场，就有100多个之多。参见姜长斌等编著：《斯大林政治评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546页。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1]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

[1] 见贝拉迪·拉思洛、克劳斯·塔马沙：《斯大林——历史概述》，（苏）《近代史和现代史》1989年第6期，转见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630页。有关斯大林杀害苏联党政军团及文艺、科学界重要人物的情况，可详见麦德维杰夫前引书（上）第五——七章；德·沃尔科戈诺夫著，苏群译：《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五、六章。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2]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

[1] 参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见段跃编：《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参见西季赫梅诺夫前引文；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并见李慎之前引文。

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1]。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

[1]　前引《苏联共产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1]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2] 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 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

---

[1]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 年 9 月 16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6、136、143 页。

[2] 西季赫梅诺夫前引文。

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1]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 1956 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 4 月 27 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2] 6 月 28 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 7 月 18—28 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

---

[1] 前引《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2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298 页；《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8 日）。

[2] Geoffrey Barraclough and Rachel F. Wal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5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0, p. 230.

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

---

[1] 毛泽东说格罗是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到布达佩斯一路骂群众，结果威信扫地，被迫下台。《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1957年1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80页。

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 10 月 21 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 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2]

23 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

[1] 《毛泽东与尤金大使的谈话记录》（1956 年 10 月 22 日）。

[2] 吴冷西回忆将毛泽东召集的讨论波兰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时间错记为 1956 年 10 月 20 日。与此同时，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说：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了，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说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金，当面告诉他：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苏方坚持这样做，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予以公开谴责。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因刘少奇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介绍当时情况的报告中完全没有类似的内容。从刘报告的说法看，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比较客气和缓和的，讲了两方面的可能性。吴冷西前引书（2），第 11—13 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630—631 页。

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 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 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 29 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

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1]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2]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3]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

---

[1] 参见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
[2]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
[3]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四、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

多了……这很危险”。[1]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要求“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明显地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2] 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就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3] 把哥穆尔卡上台同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1—323 页。

[2] 《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23 日）。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18—319 页。

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1]

1957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去。在 1 月 17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当中，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二十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当场表示：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议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2]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他显然认为他距离自己的“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4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4 页；《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6 年 1 月 24 日）。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向苏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些问题，几年后很快就同样地反映到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来了。只要不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人能够在领袖个人独断独行的情况下约束其错误发展。

国不要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他虽然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但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是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即“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1]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新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说是“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2]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说的是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包括毛泽东所举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所主张也不过是在毛泽东派人征求他们看法时，私下提出来的一些希望党和国家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

---

[1]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34 页。

[2] 同上，《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2—333、338 页。

的建议，本意并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1] 但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联系阶级成分或出身，进而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向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观点。讲学生闹事，他说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背后又有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讲到我们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表现右倾保守，他还是着眼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认定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2] 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是反对共产党，并且明确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

---

[1] 李慎之前引文。并见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未刊稿）（1957 年 2 月 27 日）。当时毛泽东曾提到，我们一些同志和党外朋友主张搞大民主，但他们不清楚，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

[2]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1—332、333—335、336—337 页。

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有群众严重不满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情绪，因而仍旧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1] 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你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而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就在于，凡是在毛泽东看来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凡是在毛泽东看来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2] 在这里，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 1957 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蚂蚁”在毛泽东的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说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

[1]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1 页；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9 页。

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1]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曾经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呢？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1] 其实，还在1956年12月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已经抹去了正面批评个人崇拜的内容。前引《学习文件汇编》第1辑，第27—37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42页。

第十五章

“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是第一位住进克里姆林宫的贵宾，赫鲁晓夫迎来送往，殷勤备至，唯恐招待不周；毛泽东强调中国在经济上还只是个小国，政治上要想为首很困难；赫鲁晓夫请毛泽东看“国粹”芭蕾舞，毛泽东看过一幕就拉着赫鲁晓夫回去谈“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不拿讲稿的讲演，惹得米高扬公然站在主席台上以示不满……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并且两次去的都是苏联，都是莫斯科。第一次去，他倍感压抑，心情很不舒服。但这第二次去莫斯科，情况则截然相反。他不仅受到了最高的礼遇，而且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俨然成为世界舆论，至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的中心。

毛泽东第二次赴莫，是在 1957 年 11 月。此行主要是去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到达莫斯科参加这个会议的党多达 64 个，其中 12 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有一些声望甚高的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礼遇明显是最高的。所有党的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的其他旅馆里面，只有毛泽东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叶卡林娜女皇的皇宫寝室里；所有的领导人讲话都要事先把印好的文稿交到大会主席团去，只有毛泽东破例可以不用讲稿，即席发言；所有的发言者都要站到主席台前的讲台上去讲话，唯独毛泽东可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讲话……

一、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是臭骂一顿

1957 年的赫鲁晓夫，正在走向其权力的巅峰，但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至少他在内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当时他还只能用一条腿站着，随时都还有可能被人推倒。

与从 1930 年代就开始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其他领导人相比，赫鲁晓夫是在 1949 年 12 月被推举为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才进入斯大林的“最亲近的圈子”的。因此，在斯大林逝世时，他虽然已经是党的最高权力部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但他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还比较靠后。在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权力中心已经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转向部长会议。马林科夫接替斯大林成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被推举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并

于其中）部长，卡冈诺维奇亦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斯大林过去的最得力的助手莫洛托夫再度出任外交部长，只有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得到职务，只是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并被建议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宣传、组织方面的工作。没有人相信赫鲁晓夫能够觊觎最高权力。[1]

不过，赫鲁晓夫这时的地位，很有点像当年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所处的情形。斯大林当年的主要权力也是在党内（总书记），他正是靠党的系统扳倒了原来排名在他之前的三大政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排名在他之后但仍具威胁的另外三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管赫鲁晓夫是不是仔细研究过斯大林当年扳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经验，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因为他看起来不会对其他争夺权力者构成威胁的这种情况，再加上他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帮助他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

用苏联学者的说法，赫鲁晓夫走上最高权力地位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一、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三雄政治时期；二、形式上的马林科夫领导时期 (1953 年 6 月至 1955 年 1 月)；三、赫鲁晓夫争夺个人政权的斗争时期 (1955 年 2 月至 1957 年 6 月)；四、赫鲁晓夫个人领导时期和‘年轻的’反对派组织形成时期 (1957 年 6 月至 1964 年 10 月)”[2]。换言之，赫鲁晓夫最初是靠协助马林科夫，于 1953 年 6 月搞掉了党内最具实权的内务部头子贝利亚，因而被马林科夫视为盟友，把他推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而后，他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力量，以马林科夫领导不力、政策错误等理由，发动中央全会在将近两年后的 1955 年 2 月通过决议，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主席的职务。紧接着，赫鲁晓

[1] Б.А. 斯塔尔科夫，刘力译：《“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俄）《史料》1993 年第 4 期，转见《国际冷战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 辑。

[2] Е.Ю. 祖布科娃，沈志华摘译：《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斯大林之后领导人政策中的个人因素》，转见同上。

夫又进一步发动舆论，以莫洛托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立场僵化为由，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由此，斯大林去世不过三年时间，赫鲁晓夫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登上了苏共党的“一把手”地位。

但是，赫鲁晓夫的地位这时并不稳固，老资格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以及伏罗希洛夫等人毕竟还都在党的主席团当中。赫鲁晓夫坚持要在苏共“二十大”上做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很明显是冒了风险的。很显然，几乎所有老资格的领导人在被谴责的斯大林的罪行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负有责任。但不如此，赫鲁晓夫就无法动摇斯大林留下来的这一套政治遗产，也不大可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地位。

赫鲁晓夫成功了。当波斯佩洛夫代表调查委员会声音颤抖地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汇报了调查出来的骇人听闻的结果之后，几乎所有中央领导成员都惊呆了。没有人敢于公开地反对向党的代表大会就此做出交代。赫鲁晓夫因此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和代表。

但是，赫鲁晓夫同时又陷入到严重的困境之中。因为多数苏共党的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和意图心怀不满，而且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可能在国内引起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他更没有想到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揭露会在国际上，特别是对共产党国家的政权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可以想象的是，赫鲁晓夫只是在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的秘密报告，并且迫不及待地把它传达到全党并分发给各国党的领导人之后，才逐渐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不过四十天，苏共中央就不得不通过一份决议文件，谴责少数党员和党组织没有正确理解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接着，它更进一步发出一系列的决议，严厉要求党员对秘密报告的讨论，必须限定在正确肯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范围之内。而与此同时，面对由于秘密报告内容的泄露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引起的思想混乱，欧洲许多国家共产党纷纷与苏联划清界限，波兰、匈牙利接连发生严重反共反苏事件……苏联的国际形象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领导地位，都极大地发生了动摇。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彻底抵消赫鲁晓夫在党内权力地位上所取得的成功。

要稳固自己刚刚取得的政治地位，赫鲁晓夫必须要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二大党——中国党的同情与支持。

赫鲁晓夫在争取中国党的同情与友谊方面是狠下了些工夫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54年赫鲁晓夫刚上台不久到北京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也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到中国来。为了表明他与斯大林不同，他不仅准备签署正式移交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协议，而且决心要把斯大林在世时签署的但大部分尚未开始付诸实施的经济建设援助协定扩大并具体落实下去。这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再增建15个工业企业并为前已签署的协定中规定的141项企业扩大提供设备的范围，追加提供总价值为4亿多卢布的设备等。当年担任苏联经贸部副部长的科瓦利详细地回忆了赫鲁晓夫当时在苏共中央内部所遇到的阻力。负责谈判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和科瓦利都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讨论中米高扬“缄口不语”，科瓦利则“一次又一次地提请第一书记注意本国重型机器制造业潜力的局限性”，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伏罗希洛夫公开声称：“当可怕的法西斯战争过后四处弹痕累累的时候，我国人民还不能胜任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但赫鲁晓夫“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批驳了所有在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他坚持认为，如果不同意提供这样大规模的援助计划，“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1]。赫鲁晓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这也成为他争取毛泽东同情和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资本。

当然，赫鲁晓夫也很清楚，要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也还是必须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与毛泽东保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苏联大使汇

[1] 康·伊·科瓦利:《1953年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莫斯科会谈，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北京会谈》，(苏)《远东问题》1989年第3期。

报的毛泽东关于不满斯大林的种种谈话，显然让赫鲁晓夫早有相当的把握。因此，已经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的赫鲁晓夫对中共中央政治局里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不仅丝毫没有反感，而且深感兴趣，批示苏共中央机关报摘要转载。进而，针对国内外因斯大林问题所引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浪潮，他也在6月间主持通过了一个用于修正秘密报告基调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坚持“二十大”秘密报告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像中国党一样，也突出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说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领导了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如此等等。到这一年的12月3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热烈拥抱，并专门把刘请到台上，坐到他和莫洛托夫之间，以示对中国党特别的尊敬。不仅如此，他又开始热情洋溢地大谈斯大林如何如何伟大，声称“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表示：“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1]

在1956年秋冬之际，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后，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高级领导人去访问刚刚平定下来的波兰与匈牙利，并顺访苏联。因为对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身份缺乏信心，因此赫鲁晓夫这时相信必须利用中国人的支持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促使波匈两国领导人接受既成事实，不致与苏联离心离德。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赫鲁晓夫的想法。但是，出面调解苏联与波匈两国党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波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助于加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团结，而且对进一步提升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

[1] 《刘晓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1日），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329页。

地位有益。因此，毛泽东支持派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访东欧。周恩来因此担负起了这次出访的使命。当他在1957年1月代表中共中央应邀到达苏联之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再度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扬斯大林的话，包括说什么"'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可分割的"；肯定"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的。换言之，赫鲁晓夫这时事实上也在把斯大林的罪行归结为是好心犯错误。[1]

在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之后，又转过来顺着中共中央的口径称颂斯大林，甚至把自己也说成是"斯大林主义者"，这大概难以改变毛泽东对他的不满。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周恩来去苏联时，毛泽东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任务，就是让他对苏军当初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以及草率揭批斯大林等问题当面向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提出批评，并要求后者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当时是到莫斯科来给他们"上大课"来的。这让当惯了老大，一向唯我独尊的苏共领导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不过有求于毛泽东的赫鲁晓夫，当时硬是忍下了这口气。据说当周恩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这番评论时，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想要走开以示不满，赫鲁晓夫当即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硬是迫使她重新坐回到座位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的批评，赫鲁晓夫也只是做了一些委婉的辩解，丝毫没有表现出后来那种一触即跳的坏脾气。

赫鲁晓夫当时明确承认，秘密报告太过情绪化了，考虑不周，特别是没想到会泄露，捅了娄子。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国内中共中央讨论时已经得出了明确的看法，周恩来对赫鲁晓夫只用考虑不周几个字来解释，当然不会满意。他在随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实际上并没有虚心接受批评，他们的表态"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据

[1] 前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1956年6月30日)；转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21页。

毛泽东后来说，他当时就知道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未必谈得拢，因此在电话里跟周恩来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1]

毛泽东是否真的会让周恩来把赫鲁晓夫等“臭骂一顿”，令人怀疑，至少另一种版本的回忆是，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在电话中简单讲述了有关情况后只是说：“把我们的想法讲给他们，听不进去就算了，不要再谈了。”[2]

不论以何种版本的回忆为准，周恩来结束访苏，向中共中央提交简要报告之后，毛泽东就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通过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差了。

他声称：“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这些人利令智昏，“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3]

二、赫鲁晓夫左右开弓巩固权力，毛泽东力排众议，表示支持

1957年4月底5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

[1]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并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15页。

[2] 李越然前引书，第114页。

[3]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345页。

华参加“五一”庆祝活动。伏罗希洛夫算得上是与斯大林同代的领导人了。尽管伏罗希洛夫访华在赫鲁晓夫等人看来，纯粹只是一种礼节上的表示，其代表团成员中甚至没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作陪，毛泽东还是有意将招待的规格提到最高，远远超出了1954年接待赫鲁晓夫的水平。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这种礼仪上的差别通常都具有一种特别的含意。而格外突出对当年与斯大林并肩战斗过的苏联老战士的尊敬，事实上就隐含着中国方面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做法的不满。

对于伏罗希洛夫接待规格之高，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也可以算是空前绝后了。毛泽东不仅亲往机场迎接，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和宴会，而且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是全体出动作陪。在北京是毛泽东陪同，去沈阳是朱总司令陪同，到上海是刘少奇陪同，到杭州是周恩来陪同。不仅如此，伏罗希洛夫所到之处，中国方面还特意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载歌载舞，形成了万人空巷的空前盛况。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的这种接待是否鼓舞了苏联党内那些斯大林的战友们。总之，伏罗希洛夫回国不久，苏共中央就爆发了一场旨在推倒赫鲁晓夫的党内斗争。事情的直接起因是由于赫鲁晓夫下令逮捕了马林科夫的主要助手并拿走了马林科夫做中央书记时保存的档案，扬言要处理那些当年“对滥杀无辜负有罪责的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伏罗希洛夫等人，忍无可忍，决定先发制人。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于6月18日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利用主席团11人中7人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优势，推举党内第二号人物布尔加宁主持会议，发起了对赫鲁晓夫工作作风和过左的经济政策的激烈批评，通过决议解除了其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于国防部长朱可夫与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等人带头反击，并紧急调派飞机等交通工具，以最快速度把各地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察委员会的委员接到莫斯科来，迫使主席团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将针对赫鲁晓夫的这场斗争，变成了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全会从6月22日一

直开到 29 日，最终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除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被暂时区别对待以外，马林科夫等统统遭到贬斥。[1]

这一场近似政变与反政变的斗争，发生在 1957 年 6 月 18—29 日前后不过十来天的时间里。一下子搞掉这么多位主席团成员，包括曾深受斯大林重用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些资深领导人，赫鲁晓夫不能不再度想办法争取毛泽东的同情与支持。

苏共中央 6 月全会刚一通过宣布马林科夫等人反党集团的决议，赫鲁晓夫就立即要尤金大使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情况。由于这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尤金大使通报时，是由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等听取的。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对赫鲁晓夫有所不满的刘少奇等人，当场就表示了诧异与不解。他们明确讲，莫洛托夫等人是老革命家了，怎么可能搞反党集团？何况，像王明这样的人我们都还留他当中央委员呢，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搞这一套？刘少奇等人这时的态度很激烈。[2]

得知中共中央的不满之后，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急忙派米高扬赶往中国，直奔毛泽东当时所在的杭州，要求接见。7 月 5 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米高扬，听米高扬滔滔不绝地介绍这次党内斗争的来龙去脉，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还在同米高扬会晤之前，毛泽东已经同刘少奇等人交换了意见。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显得更为理智一些。在他看来，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比，都是半斤八两，差不多，但总起来说，莫洛托夫更顽固些，喜欢搞紧张局势，还不如赫鲁晓夫。而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显然很反感莫洛托夫他们这种突然袭击的罢免第一书记的“政变”形式。他在接见米高扬时，已经说服了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他告诉米高扬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是有些震

[1]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22 页。
[2] 阎明复在 1997 年 10 月 24 日北京冷战与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动的，人们不了解内情，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但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昨晚刘少奇同志已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话通知了各省省委。当时的通报主要是讲：马林科夫等人尽管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可能有对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推翻苏共中央主席团最高领导人的做法，总的来说是错误的。[1]

搞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并且把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这些老人置于被警告的地位，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然而，赫鲁晓夫并不认为自己就双脚落地了。他清楚地看出，将军们的作用太大了，他必须取得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否则仍旧不可能高枕无忧。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苏联红军形成了军事首长负责制，党对军队的领导相对薄弱。而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凭借赫赫战功以及在军队和群众中的相当威望，对赫鲁晓夫并不十分顺从。特别是当赫鲁晓夫力图改变军队领导体制时，朱可夫很不以为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的发生，更使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的政治能量高度警觉。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开始全面批评赫鲁晓夫时，身穿元帅服的朱可夫只站出来讲了几句，那些批评者立刻就像矮了一截。朱可夫轻而易举地调集飞机运送各地中央委员以及随后伊格纳科夫、科涅夫元帅等勇闯主席团会场，吓得布尔加宁等人脸色灰白，不得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等情况，都清楚地显示出朱可夫的权力太大，将军们的作用太重要了，从而“引起了对他的警惕”[2]。因此，尽管朱可夫刚刚帮了赫鲁晓夫的大忙，赫鲁晓夫还是非搞掉朱可夫并根本改造军队领导体制不可。

赫鲁晓夫下决心扳倒朱可夫，已经到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国庆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各国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将前来莫

[1] 《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记录》（1957 年 7 月 5 日）。
[2] 刘晓前引书，第 48 页。

斯科，此举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麻烦。赫鲁晓夫特别担心的自然是毛泽东的反应。为了扳倒朱可夫，同时又能让毛泽东如期前来莫斯科，赫鲁晓夫再度想到了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办法。他当即决定，向中国方面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的生产技术。

关于中国要求苏联援助核技术这件事，中国方面正式提出来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就表示过希望苏联帮助搞核武器，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发展核工业的物质条件，应该先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由苏联帮助搞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用于科研和培训技术人员，逐步积累条件，以后再说。随后，苏联即决定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使粒子获得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并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1956年8月17日，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但是，在苏共中央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军方，向中国提供这种高技术的援助，始终是一个引起重大争议的话题，反对的阻力极大。这一点特别反映在直接用于军事目的导弹研制的问题上。中国方面1956年正式提出之后，苏联方面就以导弹技术过于复杂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等理由明确地拒绝了中方的提议。仅仅一年之后，赫鲁晓夫就不顾党内和军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与中国签订研制和生产导弹及原子弹的具体协定，足以见其对取得毛泽东的支持的重视程度。

1957年7月18日，在中共中央军委中分工主管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作，同时担任国务院下属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报告周恩来，希望与苏联进一步谈判磋商在原子能技术方面的合作事宜。周恩来通过外交部向苏方联系后，几乎是前所未有地马上就得到了积极的答复。8月6日，周恩来正式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议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

此进行磋商，苏方亦很快答复同意。9月7日，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包括了21名导弹、原子能、飞机和电子等方面专家、教授在内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双方从10日开始商谈，只用了30多天的时间，就于10月15日正式签订了中方盼望已久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即所谓“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将交付给中国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将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1]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准备之后，10月27日，赫鲁晓夫乘朱可夫元帅在东德访问的机会，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进而撤掉了一批朱可夫手下的元帅。这一次，赫鲁晓夫相信他不必再派米高扬飞到中国去进行解释了。他只是通过米高扬告诉刘晓大使说，朱可夫“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犯了错误。[2]

三、毛泽东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要为首就很难”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如期到达莫斯科，一来参加苏联四十年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二来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这次来访格外重视，早早就做出决定，把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列宁山等处，对毛泽东则给以特殊规格的礼遇，不仅要住到克里姆林宫里来，而且要住到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里去。

毛泽东入住克宫后，赫鲁晓夫更是热情备至。每天早上他都要前来请安，

---

[1] 参见聂荣臻前引书（下），第803—804页；约翰·W.刘易斯等著，李丁等译：《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1页；彭子强：《中国两弹一星揭秘》，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37页。

[2] 刘晓前引书，第50—51页。

并且迎来送往，与毛几乎是形影不离。受到苏方盛情接待的感染，毛泽东似乎也对赫鲁晓夫有了一些好感，不仅在内部讲：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帮帮他；当众也对赫鲁晓夫说过：好花还要绿叶扶，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们这次就是来扶助你的。[1]

为什么要“扶助”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斯大林逝世，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明显地需要明确一个以谁为首的问题。

关于多元化的观点，首先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明确提出来的。亚洲国家共产党人中也有提出应该以中共为首的想法。这些都反映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的号召力已经面临严重问题。就连赫鲁晓夫也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谦让，甚至提出苏中两党轮流担任各国共产党会议召集人的意见。这件事让具有东方集体主义传统的毛泽东反而有些为难了。

既然存在着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当然要成为一个整体，要一起行动，自然也就一定要有一个以谁为首的问题。毛泽东不是不想为首。以赫鲁晓夫的鲁莽、片面，以苏共中央在一些关系到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观点的说法，毛泽东无疑更愿意由自己来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但中国人向以谦逊为美德，不论毛泽东是否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在苏联在各方面还是“老大哥”的情况下，他不仅不会去争这第一把交椅，而且还会去帮助赫鲁晓夫说话，把赫鲁晓夫扶到“班长”（毛泽东的说法）的位置上来。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确实还不具备那个实力。靠枪杆子得到政权的毛泽东是深知这个“实力领导原则”的。

到莫斯科不久，毛泽东就在与波兰等国家党的领导人谈话时明确讲：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比比利时还少，只有 500 万吨，和波兰一样，而苏联是 5000 万吨。

---

[1] 李越然：《新中国领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2 页；李越然在 1997 年 10 月 24 日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在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发言也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

"为首"，就是"召集会议"的人，而这个会议不是第三国际，也不是共产党情报局，没有指挥各国党的权力，这是毛泽东再三加以强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为首"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期望的那个"为首"，多少还有一些区别。给苏联以负责召集会议的权力，这在毛泽东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会议召集起来了，这个"班长"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关键就在于指导员了。中国不当"班长"，但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

很明显，当毛泽东说"我们有革命的经验"的时候，话里话外就暗含着一种自豪的味道：我们是革命过来的，你赫鲁晓夫有过这样的经验吗？陪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他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在卫国战争期间如何勇敢地与斯大林争论西南战线的军事作战指挥问题，斯大林如何歇斯底里，苏军总参谋部的元帅如何胆小如鼠，而他当时的判断如何正确。赫鲁晓夫在那里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这边却只是津津有味地埋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等到吃罢了饭，毛泽东抹了抹嘴，往后一靠，这才把脸转向赫鲁晓夫，好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那个西南战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吗？[2]

在整个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得十分活跃，广泛接触了各国共产党领

---

[1]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第二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6页；等等。

[2] 参见李越然前引书，第159—160页；并见李越然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导人。除了经常性地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以外，光是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都分别进行了两次会谈，并且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的领导人，乃至同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团等也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因为按照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所谓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实现的。谈话的结果，多数党的领导人也并不都认为“和平过渡”一定是可行的。这就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两手”论。

所谓“两手”论，是毛泽东在临行前的10月29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当中提出来的。他当时明确告诉尤金说，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修正其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观点。他表示，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思想，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对于夺取政权问题，还是提“两种可能性”，即做两手准备比较好。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前者是为了便利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人的借口，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后者则是战略问题，因为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能设想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1]

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尝试去说服那些西方国家党的领导人不要相信“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为他在接触了这些国家党的领导人之后，已经注意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他们就不想革命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显然相信，富裕国家毕竟还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党来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经验，仍然是必须记取和学习的。为此，他坚持劝说苏共中央同意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只是在赫鲁晓夫等再三解

[1] 转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释，大会通过的宣言应该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否则他们没法向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毛泽东才稍微做了一些让步。

经过中苏双方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的宣言，明确肯定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当争取议会中稳定多数的时候，也强调了要开展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理论上起着正确的指导和导向的作用。[1] 换句话来说，中共中央的指导员地位，已经开始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共产党的认同。

四、毛泽东不拿讲稿引起误解，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11 月 14—16 日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7—18 日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与一些主要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尤其是着重做赫鲁晓夫和苏联党的工作，基本上处在一种了解情况和交换看法的过程中。在前一阶段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有过两度发言，但当时和各国发言者一样，态度都比较谨慎，讲得也比较扼要简明，不搞丝毫特殊，故没有引起任何疑问。到了第二阶段，即有 64 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大会上，毛泽东似乎相当地自信了。他在这时的讲话，也就是他在大会期间的最后一次讲话，讲得很长，兴之所至，就像他在国内党的会议上那样，讲得比较随便了，结果意想不到地引起了一些麻烦。

毛泽东赴莫前夕，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卫星上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正好满足了他要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的目的。自从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备受各国党的冷眼，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转见《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6 日。

波匈事件闹得社会主义国家人心惶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议员落选，“和平共处”甚至“和平过渡”的主张甚嚣尘上。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利用这次会议给各国党打打气。毛泽东之所以一上来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广泛交换意见，是因为初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会议，要说服人家，还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充分有理的良好印象，必须使自己的论据有相当事实基础。为此，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并亲自向赫鲁晓夫了解苏美实力的对比情况。

据说，那一天赫鲁晓夫专门请毛泽东到大剧院去看苏联的“国粹”芭蕾舞，把毛泽东领到过去专门供沙皇用的豪华包厢里就座。偏偏毛泽东不习惯这种过分的排场，非要坐到群众中去，赫鲁晓夫不得不下令让克格勃立即把剧院前三排的票统统收回来。等到毛泽东真的坐到“群众”中去了，只看了一场，他就说什么都不看了。有人回忆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实在看不惯台上的那些人用脚尖支着地转来转去。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突然想要与赫鲁晓夫个别交换意见。于是，赫鲁晓夫不得不中途退场，陪同毛泽东回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来。

毛泽东坐稳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力量对比上，究竟是苏联领先些，还是美国领先些？赫鲁晓夫答复说，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方面看，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得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才只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十五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1]

赫鲁晓夫的回答还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也并非不了解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毛泽东那个我们只有 500 万吨钢为首很困难的讲话，以及随后发动“大跃进”而不惜血本大炼钢铁以赶超美英的做法，都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这种差距并非毫不介意。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并没有这样看。他算了一笔账：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美国和丘吉尔手里有 7000 万吨钢，苏联实际只

---

[1] 前引阎明复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有900万吨钢，美英还不是要来请求苏联帮助他们，并把易北河以东和中国的东北及北朝鲜都划给苏军占领？“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并且，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心向背来做决定的”，“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1] 反正毛泽东是认定了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

不过，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进行演讲，难免会使具有不同观点的各国共产党人议论纷纷。

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按照毛泽东讲话的中文记录稿，他当时解释这是因为他“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而站在毛泽东背后的苏联翻译却简单地将这句话翻译成他是因为“头疼”而不便站着讲话，这让与会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感到难以理解。南斯拉夫大使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讲话中的一段小小的风波，清楚地显示了由于毛泽东没有预先仔细斟酌讲稿并提交俄文译稿所造成的麻烦。大使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当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通过站在身后的俄语翻译讲话时，苏联代表团中发生了一阵轻微的骚乱，随后米高扬对毛泽东的发言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示威性动作。毛一度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翻译就是这样翻他的话的。毛的确切提法到底是什么，大厅里除了中国人外谁也不知道。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同被他称为另一集团的苏联共产党等同起来，而且他是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

[1]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7页。

上的发言中说这番话的，这使得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绝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一度，米高扬背转向发言者……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1]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提到“两个不同集团”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这样一类字眼儿。他只是提到——尽管这在俄国人听来也未必入耳：“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它是一方排斥一方”，但他毕竟明确地讲了：“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并肯定“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2]问题在于，在口头讲演当中，翻译由于事先没有看到讲稿，中方又没有提供译稿，因此没有能够当场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引起麻烦的还不仅仅是这一件事。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上来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但这话在敏感的苏联人听起来，却显然变了味。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日趋壮大的中国在他们的东面。赫鲁晓夫后来曾经说过，不论毛泽东本意如何，说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从俄国人的习惯上来讲，也是不好的一种形容。对于俄国的地理环境来说，这个成语恰好说反了，因为只有西风才能够带来雨水，东风带来的只是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不利。说东风压倒西风，难免让人想起成吉思汗所带来的“黄祸”。

---

[1]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著，达洲等译：《在莫斯科的岁月》，北京：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453—454 页。
[2] 前引《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43 页。

同样让与会者不满意的是毛泽东引用的另一句中国“俗话”，叫“蛇无头而不行”。毛泽东本来想以此来比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党的关系，意思是说凡是集体，总要有一个带头的。但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蛇是不吉利的象征，他们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喻成蛇，也很不以为然。

最让众多代表们感到不安的，是毛泽东的另一段“极而言之”的话。毛泽东谈到了他颇以为自豪的那段关于“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试图让各国党能够鼓起勇气，“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就不难战而胜之。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辩证法思想，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不少与会的代表颇难接受。正像赫鲁晓夫后来所争辩的，原子弹可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原子战争打起来，整个世界也许都要毁灭掉，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靠？但毛泽东不同意。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对生命有着不同于西方人的看法。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有人告诉他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 27 亿人都会死绝的。他就不信。他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他还是列宁那条原则：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一定会有战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1] 然而，不要说死掉一半人未必能够换取全世界社会主义化，就是能够换取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化，这在有着不同文化

[1] 杰柳辛 1997 年 10 月 24 日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前引《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636、638 页。

背景的许多欧洲人听起来，也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观点。[1]

1957年11月20日，毛泽东一行离开了莫斯科。临行之前，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大学神采飞扬地向中国留学生重申了他的这些观点。显然，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苏联方面没有把他们感觉到的不满及时告诉中国人。赫鲁晓夫照样殷勤地举行宴会并送行。可以想象，毛泽东是带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他第一次访莫时的满意心情回国去的。他不曾想到，第一次赴莫尽管印象不佳，结果两党关系却日趋好转；第二次赴莫尽管心情愉快，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两党两国关系的渐趋恶化。

[1]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回忆了波兰党领导人对毛泽东这一说法的反应，但他显然误记了毛谈到的死人的对象，把全世界人口死掉一半，记成了中国6亿人准备死掉一半。参见赫鲁晓夫前引书，第394页。

第十六章

“联合舰队”事件

周恩来相信，凡是苏联已经定型的东西，包括导弹、原子弹，它都愿意给我们；赫鲁晓夫提议建立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大发雷霆，声言：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赫鲁晓夫刚开始想和美国搞全面缓和，毛泽东却不宣而战，炮轰金门，让莫斯科备感尴尬；中印发生边境冲突，苏联政府坚持不偏不倚；毛泽东断言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赶英超美了。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赶英超美已不在话下,中国就要超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外交方面,随着国内“大跃进”狂潮汹涌,中国的外交也开始进入到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时代。毛泽东1958年2月撤换周恩来的外长职务时,已经在酝酿革命化外交了。但是他当时大概也没有想到,他积极推行的革命外交会要把一心打算要与美国人全面缓和的苏联推上一种尴尬的境地。1958—1959年围绕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与冲突,从众所周知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到炮轰金门,再到中印边境冲突,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竟然出现严重危机。从苏联片面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到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再到赫鲁晓夫口无遮拦地把毛泽东形容成“好斗的公鸡”……“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党关系转瞬间竟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一、毛泽东大发脾气:“要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1958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渡过的。毛泽东虽然不大满意周恩来推行的旨在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提议用陈毅取代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但中国整个对外关系,包括对苏关系,总体上还是平和的。特别是在批判南斯拉夫党的问题上,毛泽东还表扬过赫鲁晓夫。

4月初,赫鲁晓夫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但南共起草的纲领草案竟然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这一基本矛盾,并且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剥削的意图,是可忍孰不可忍!苏共中央决定不

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1]

南共“七大”召开前夕，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同志式地”批评了南共即将提交大会讨论的新党纲。毛泽东最初看来对苏共中央文章的这种基调不大满意。5月4日，在南共“七大”召开之后，毛泽东亲自审阅发表了中共中央公开批判南共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直截了当地把铁托“领导集团”视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应声虫。5月9日，苏共中央再度致信南共中央，对南共“七大”刚刚通过的纲领草案也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对此，毛泽东很高兴，批示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并嘱咐邓小平将苏共中央信印给正在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时向苏联大使“表示热忱祝贺”。[2]

1958年这段时间毛泽东对“苏联同志”印象转好，还可以从几天后毛泽东的另一项批示中看出来。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告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我方经常在建设方针的问题上与苏联专家发生意见分歧。这是因为苏联专家坚持要建技术新、标准高、设施全的工厂，而我方则力争搞大干快上的中小项目。经过深入解释后，双方已经开始拧成了一股劲儿，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毛泽东对此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他并进一步将这个道理引申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称：“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3]

事实上，受到毛泽东这种情绪的影响，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也明确表达过高度肯定中苏关系的看法。相信这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

---

[1]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3、229页；并见《现代修正主义应该受到谴责》，《人民日报》1958年5月6日。

[3] 毛泽东：《四海之内皆兄弟》（1958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31页。

人这时对中苏关系的基本认识。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的（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因此，“从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应当加强政治团结，加强经济协作，加强文化交流”。[1]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喜悦没有能够持续多久。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四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投资1亿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3000万，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这件事当即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

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什么由苏联出资建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殖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因此，接到苏方的这一建议，彭德怀当即复函，主张苏方出技术及设备，由中方投资，所有权属中方，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他没有想到，长波电台，当时在苏联还是属于尖端技术一类，苏联军方并不情愿把自己的各种尖端技术都无偿让中方拥有。而且，从苏方的角度，他们也不理解，由他们投资控股，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装置，由双方共同使用，对中国有什么不好。因此，苏联军方仍坚持对自己的尖端技术要有控制权。

对此，毛泽东显然不能理解。他想到的是，既然你的东西要建在中国，所有权当然必须是我的。他在彭的报告上明确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

---

[1] 《周恩来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1958年3月19日）。

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不过，他这时似乎还没有把这件事同赫鲁晓夫中央联系起来，只把它看成是苏联军方的一种意见，因而特别强调，“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1]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毛泽东也许还不会大发脾气。但紧接着发生的联合舰队问题，使这个时候在主权问题上变得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过去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在斯大林问题已经揭露、波匈事件已经发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直截了当地批评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毛泽东自信自己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权威地位之后，苏联人居然又想出这种公然损害中国主权的主意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为恼火。

由联合舰队事件引起的这场风波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58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2] 核潜艇的制造，又是苏方当时的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既然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导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在当时的中国方面看来，要苏联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殊不知，转让生产导弹、原子弹的技术，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当时处境不妙，极力坚持，本来也是难上加难的。再要求转让核潜艇技术，自然要遇到更大的阻力。由于苏联军方这时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核弹头的苏联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得到周恩来的这封信之后，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转让技术，又能够满足中苏两国军方愿望的合作建议来。他当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大使尤金向中共中央转告他的这一提议。

7 月 21 日，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尤金大使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有关精神和赫鲁晓夫

[1] 毛泽东：《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批语》（1958 年 6 月 7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265—266 页。

[2]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49 页。

的提议。其中一项就是“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介绍说，关于海军建设问题，苏方目前的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今后与其大力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原子潜艇舰队。只是，“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我们有黑海，但在战争中，是会被敌人封锁的。波罗的海就更不用提了。在北面由摩尔曼斯克可通到北冰洋，但是那里并不宽阔，不能广泛活动。东面的海面上又临接南朝鲜和日本，不能算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根据已经公布的记录，毛泽东听到尤金的介绍，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啊”了一声，说：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你们却要搞合作社。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尤金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仍旧平静地回答说：这一点并没有决定，只是想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

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明显地不高兴了。他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斯大林在世时，有过四个合作社，后来经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现在要办，也可以。定个期限，过个几年可以取消。反正各个兵种都要消灭的，那时我们再分废铁。

尤金这时才发觉气氛有点不对了，忙说：这只是一个提议，还要由两国商量后才能决定的。毛泽东不想讨论下去了，说：对合作社问题我们没有想过，要先讨论一下，同意就去人，不同意，你们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1]

尤金走时已是22日凌晨，毛泽东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得知中方要求始于海军司令部中的苏联顾问的提议，说是应该要求莫斯科帮助提供核潜艇以加强海防力量和海军建设。国防部研究后认为是一个好

---

[1] 《尤金大使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

主意，既然苏联已经在帮助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在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就提出报告，请周恩来写信向苏方提了出来。但与会者怎么都弄不明白，赫鲁晓夫不是不知道中方对当年斯大林强加给中国人的那四个合营公司是多么反感，后来斯大林又要搞橡胶园、建菠萝罐头厂等等，统统都被毛泽东顶回去了。赫鲁晓夫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也是他自己表示那些合营公司不平等，主动废除掉的。为什么今天又提这样的要求呢?

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实在睡不着，干脆把尤金召到他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措辞尖锐地告诉他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几年前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取消了四个合营公司、撤销了旅顺基地。对于我不同意斯大林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加工厂，赫鲁晓夫同志还夸奖了我，说我顶得好。为什么现在又要搞海军“合作社”？这使我想到斯大林的东西又回来了。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长波电台也好，海军潜艇也好，都是所有权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什么你们条件不好，“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无非是要合营。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气愤当中，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了尖端技术转让的某些微妙之处。不过，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之间还要保密，没有道理，你有的我就应该有，否则还叫什么国际主义？因此，他怀疑苏联人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才不愿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他生气地说：你们大概认为，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

题吧。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也看不起中国人。[1]

二、毛泽东声称："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愿承担第一个打击"

接到尤金的报告，一周之后，即7月31日，赫鲁晓夫急急忙忙地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来了。毛泽东亲自前往机场把他接到迎宾馆。稍事休息后，他就赶往中南海去见毛泽东，解释说事情全让尤金给搞误会了。在批判过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苏共中央绝不会再搞任何形式的“合作社”。赫鲁晓夫坚持说，他的建议其实是要帮助中国在诸如黄河这样的河流旁边，搞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毛泽东很奇怪，再三强调:这是你们的大使尤金同志不止一次亲口说的，要建联合舰队嘛！赫鲁晓夫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也再三表示说：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象的。苏联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因此他们也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他们，对他们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了解。他甚至也很不满意地批评毛，说毛泽东“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粗暴地理解我们的政策”，云云；说毛既然看出尤金所谈的内容离开了共产党的原则，就应该先和他通过电话联系一下，澄清一下，不应该一宿不睡觉。赫鲁晓夫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着导弹的潜水艇舰队，装有导弹的鱼雷快艇、驱逐舰。苏联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中国。对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爽快，说所有权可以是中国的，由中方投资，苏联只

---

[1]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其实，中国方面也并非真的对苏联就很大方。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空军在福建上空的一次空战中发射了一枚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未炸坠地。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马上报告了苏联军方，因中国当时尚不能制造导弹，故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却始终不理。最后推托不过，才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给苏方。这使得赫鲁晓夫非常不满，不仅向中方表示了强烈不满，而且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最后，中方终于不得不将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转交给了苏方，但苏方发现，导弹竟然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

要在协议的基础上有权使用这个电台来指挥自己的舰队就可以了。[1]

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颇值得怀疑。即使在谈话当中，他也不能自圆其说。赫鲁晓夫在谈话中明确讲到，苏联最近打算加强在阿尔巴尼亚的潜艇舰队和导弹基地。毛泽东特别问道：在那个地方你们得搞合作社吧？赫鲁晓夫回答说：看起来是这样。不论对中国问题如何反应，至少毛泽东相信阿尔巴尼亚是非靠苏联保护不可的，故他对苏联在阿搞合作社并没有提出异议，反而表示说，他同意苏联这样做，说如果真有战争，他也主张中苏搞合作社。赫鲁晓夫必欲在阿尔巴尼亚搞合作社的事实说明，他所谓"共产党的原则"，其实并不存在，关键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的问题。其实，苏方既然对长波电台提出过合营问题，说自己绝不会就潜艇舰队一事提出合作社问题，逻辑上也难以成立。[2]

当年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对这件事的解释也许更容易让人了解赫鲁晓夫当时提议的背景。他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直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军人们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搞一个舰队，通过中国沿海随时进出太平洋，由在中国设立的长波电台指挥，就可以向美国实施有效的导弹袭击了。1962 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种想法的重演。据他说，如果 1958 年搞起了这个舰队，赫鲁晓夫就不需要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了，从中国的沿海就可以打到美国了。问题是当时苏方只想到了如何对付美国，却没有想到中国人对主权的看法。[3]

1958 年夏天的这次争吵，不论对后来的中苏关系留下了多大一片阴影，至少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还只是一片乌云掠过。从会议记录看，与赫鲁晓夫第一天会谈后，乌云大致就已经散开了。从 8 月 1 日到 3 日，接连三天

[1]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1958 年 7 月 31 日)。

[2] 十几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段交涉，但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记忆不清了。不过他说到苏联军方当时想要使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其在太平洋的潜艇，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前引《最后的遗言》，第 400 页。

[3] 库里克在 1997 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的会谈是在相当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直接利用了这一记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一书，在评价这三天会谈的结果时，也肯定地说，第一天双方“意见基本一致”，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重新变得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两个月后，赫鲁晓夫来信，明确表示同意就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问题开始具体的商谈。[1] 当然，赫鲁晓夫心里还是结了个很大的疙瘩。而最倒霉的则要算是尤金大使了。这件事把他吓得不轻，当时就病倒了，后来不得不被抬回了莫斯科。他的不满更是可想而知。

就在毛、赫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再度我行我素，又惹得赫鲁晓夫大为头疼。

原来，还在中苏双方这次争吵之前，即7月14日，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美的国王和王储被打死。第二天，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随后，英军在约旦登陆。中东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对于美英的这一公然干涉别国内政的粗暴行径，赫鲁晓夫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他提议立即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和联大特别会议，讨论美英撤军和恢复中东和平问题。由于苏联的干预和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美英的态度开始软化，同意了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到8月1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开始同意让联合国而不是由美英来维持中东地区的和平了。21日，中东阿拉国家提出一项和平提案，也被紧急会议迅速通过了。

中东局势开始趋于缓和，显示了苏联外交的重要作用。但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不宣而“战”，于8月23日下令炮轰金门、马祖两岛，惹得与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急忙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和菲律宾等地调集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配合台湾国民党协防金、马。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高度紧张起来。可以肯定，这也是毛泽东革命外交战

[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27页。

略的一次具体尝试。

金门、马祖，是中国福建省沿海的两个小岛，由于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下，蒋介石这时频频以它们为跳板，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和渗透，沿海诸省军政当局早就要求拿下这两个岛屿了。这个时候，美军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驻守台湾岛，再加上要跨过台湾海峡去进攻台湾，对海空军的要求很高，因此进攻的条件不成熟。但金、马没有美国驻军，又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通往福建沿海的铁路已经建成，大批炮兵已经调至福建前线，军用机场也已建好，可以就近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故从作战角度，要收复这两个小岛已不成问题，关键只是看美国是否会介入了。

毛泽东想打金、马，根本上还是对美国气不过。1954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发令炮击金门，就是因为气不过美国坚持不与新中国政府接触的强硬态度。结果，一顿炮击，虽然打出了一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但最终还是把美国人打到谈判桌前来了，迫使美国同意定期在日内瓦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想不到，由于中国坚持要与美国谈台湾问题，而美国坚持拒绝与中国谈判台湾地位问题，双方的会谈始终没有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因此，到1957年12月，美国政府借口该大使调任，转派低层级官员来应付场面，事实上不想继续这种接触了。对此，毛泽东坚持要把美国逼回到谈判桌前来。为此，中国政府外交部从1958年2月开始，接连三度发表声明，要求美国人重新选派大使继续谈判。最后一次6月30日的声明，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美国方面十五天内予以答复，否则一切后果将由美国政府承担。而为了给美国人以颜色，就有了7月14日彭德怀主持下召开的准备炮击金门的重要军事会议，并且决定了要在7月27日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具体行动计划。而这个计划制订之日，恰逢中东事件爆发，是为巧合，但也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声援中东革命的更大的口实。用毛泽东炮击金门当天晚上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

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1]

但是，打金、马，根本上只是要给美国人以教训，并非是想要引起与美国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而由于美蒋订有《共同防御协定》，对会不会引起美国介入的问题，毛泽东这时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中国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最后一天突然回应中方的要求，表示在改变谈判地点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考虑另派大使级代表与中国方面重开会谈之后，毛泽东的态度自然也就迅速开始犹豫起来。再加上这时又横插进一个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中苏关系出现麻烦，打金门自然就更不是时候。因此，临到最后就要炮击之际，毛泽东还是指示彭德怀放弃了炮击金门的计划。[2]

不过，毛泽东毕竟不会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台湾和中国一隅之地，这个时候的他关心的问题要远大得多，也宽广得多。这时中国的“大跃进”正在热火朝天地创造着各种奇迹，令毛泽东万分自豪，深信半年前提出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早已落伍，快一点的话七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甚至可以超过苏联，早早地就跨入共产主义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毛泽东不仅对美国人的傲慢深恶痛绝，对俄国人的态度变得格外敏感，而且也绝不会为了自己一国的利益就轻易地放弃声援和影响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因此，当他发现赫鲁晓夫调动军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向美国示威以援助中东事件时，他也不能不重新考虑炮击金门的必要性了。

8 月 18 日，在中东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重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当然，毛泽东还是力避与美国发生冲突。他指出：“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 95000 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

[1]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74 页。
[2] 毛泽东：《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 年 7 月 27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326 页。

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1]

问题是，不论是要占金、马，还是单纯只是为了侦察美国人有无帮助防御金、马的决心，毛泽东都没有按照结盟国家间应有的规矩，预先知会作为军事盟国的苏联政府。随着8月23日中国方面开始大举炮击金门，美国政府派遣大批军舰开赴台湾海峡，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再加上中国方面还大张旗鼓地宣传要“解放台湾”，这自然不能不让赫鲁晓夫深感不满。毕竟，苏联作为与中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的盟国，是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战争风险啊！

据苏联驻华代办这时报告称：朋友们只是在8月23日发动了炮击之后才告诉我们，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已在计划中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的意图。得到通报后，赫鲁晓夫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国方面：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在现在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来。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他不过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最多也就是准备把金门、马祖拿下来，并没有立即夺取台湾的打算，不会弄出大乱子。因此，毛泽东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方面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言外之意，莫斯科管得太宽了。对此，苏联大使馆难以接受，它在报告中明确认为：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时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2]

9月4日，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公开宣布金门、马祖也在美台协防的范围之内。注意到夺取金、马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冲突，同时也注意到苏联方面的焦虑，周恩来受命向苏联驻华代办转达了毛泽东新的考虑，这就是，

[1]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6页。
[2] 参见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Sto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Documents of Russia（SCCD），5/49/239/1/208; 5/49/131/1/198。

中国炮轰金、马，并不是就要武力夺取金、马，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沿海的挑衅，炮击是有分寸的，不会打出乱子。如果打出乱子，中国也绝不拖苏联下水。除非美国使用大口径的核武器，否则，如果只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苏联不必参加战争。[1]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要不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种分歧到 1957 年莫斯科会议时双方直截了当地交换了意见，都做了一些妥协。但是，从 1958 年 2 月毛泽东撤换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职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周恩来此前所坚持的和平外交方针，特别是无法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歧视问题，已相当不满意，力图用过去对国民党的那套办法，即与美国打打谈谈来迫使美国承认新中国并最终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炮击金门事件，就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这种强调武力威慑作用的革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后来讲，这次炮击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一面试探美国人对金、马的态度，一面声援阿拉伯人民。他很清楚这会使刚刚缓和的国际局势又紧张起来，但他就是要搞点紧张局势。因为他认为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可以促使许多人清醒起来，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未必不是好事。[2] 因此，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问题上不与赫鲁晓夫打招呼，显然不会是没有目的的。

不管赫鲁晓夫对中国方面没有事先通知苏联就用武力向美国进行试探一事如何不满，在美国与中国有可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的盟国，赫鲁晓夫还是做出了公开的表态。9 月 5 日，继美国宣布协防金、马之后，苏联政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10 日，赫鲁晓夫并进一步发出了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信中强调：“对我国伟大的盟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为了更有效地威慑美国，

---

[1]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66 页；《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信》（1958 年 9 月 27 日）。
[2]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75—76 页。

赫鲁晓夫这时还特地召见了中国大使刘晓，要求刘晓秘密转告毛泽东，说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空军力量，以便威慑美国第七舰队。赫鲁晓夫为此又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说是可以派携带 C–75 地空导弹的部队到福建来。对此，毛泽东专门复信表示欢迎，只是他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要赫鲁晓夫不必担心。但他还是不愿意让外国军队驻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他的提议是：最好请苏联政府供应我国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请苏联政府派来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1] 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是不想要苏联的援助，导弹和技术都可以运来，只是苏联的部队就不要来了。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导致他后来干脆怀疑赫鲁晓夫这个时候提出派导弹部队来恐怕是别有用心。

三、赫鲁晓夫摆出智者的架势，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在台海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开始得到一些在华专家关于中国进行"大跃进"的报告。报告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在一些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反对迷信外国、反对物质刺激、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众多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便如此，赫鲁晓夫 1957 年提出的目标也还是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达到共产主义。如今经济上落后得多的中国，反而说苏联"在它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打算自己一步跃过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404—405 页；刘晓前引书，第 62—66 页；《毛泽东给赫鲁晓夫的信》（1958 年 10 月 14 日）。

联方面深感不满。苏联驻华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当中明确批评中国的做法，称：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1]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还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有十五年赶上美国的想法之后，他就当即表示说，中国可以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还在莫斯科期间，他就审定修改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12月2日，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时间，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宣称：“在十五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2]眼看赫鲁晓夫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威望不高，毛泽东憋足了心气要和苏联比一比。而要比，其他已经都不在话下了，关键还是一个经济实力的问题。毛泽东就是不信邪。用他的话来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3]

1958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不断革命”的主张，强调“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4]。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随着毛泽东的头

[1] SCCD, 5/49/129/11/191–192；5/49/134/1/41，68.

[2]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1月号。

[3]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13页。

[4]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1页。

脑日渐发热，全党、全国上上下下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一时间捷报频传，全国各地到处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上面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1月底还说“以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3月底就变成了“在比十五年更短一些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开始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了。他断言：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我们十三年抵苏联的四十年，完全可能，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因此，到了5月1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主张。他并且已经开始认为：“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再过了四个月之后，即9月初，毛泽东已经干脆主张：“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1]。而为了迅速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他的改造社会组织的新设想，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人民公社由此迅速开始在全国范围的农村中普及开来。当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已经充满自信地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3]

前呼后拥地去了一趟河北的徐水县之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竟然被农村干部制造的粮食丰产的假象所欺骗，以为只要组织了人民公社，改变了生产关系，粮食亩产就能不断地“放卫星”，夺高产。他甚至开始为农村

---

[1] 转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2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36、368页。

[2] 陈伯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7期。

[3]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0页。

粮食吃不完、卖不掉而担心了。对自己多少熟悉一些的农业都如此，对自己陌生的工业自然更盲目。他开始公开讲：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我就不相信。我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在他的力主下，钢产量从年初计划的620万吨，增到850万吨，又猛增到1070万吨。他的理论是：我国有六亿多人口，再过十几年就是八亿人口，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一干就赶过英国、美国。不要迷信，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六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1]

中国真的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吗？“大跃进”运动的狂热和泛滥成灾的浮夸风，这时确实使毛泽东有些飘飘然了。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进一步讲：苏联已经41年了，还准备搞12年，它已经有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的石油，还是那么谨慎，还需要12年准备过渡。看来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毛泽东总结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破除……但是，他主张：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点面子。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依现在的速度，我们十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地球上天下第一国了。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

[1]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17、20、23日）。

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1] 以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中苏关系，没有不出岔子的。

苏联方面对中国的“大跃进”，开始是持积极称赞的态度的。包括对于人民公社，最初虽然基于苏联早年的经验而有所怀疑，但也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不同的意见。问题是，面对来自各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对于毛泽东来说，莫斯科对人民公社这一重大尝试保持沉默，实际上就等于是不赞成。这也正是中共中央联络部要求苏方积极评价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因。

事实上，随着中苏之间在台海危机等方面出现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做法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引起了一种盲目效仿的情绪，赫鲁晓夫已经不能不开始针对中国的这些做法和说法表示看法了。他在 11 月 30 日与波兰领导人的一次谈话当中，就开始直言他对中国的人民公社不赞同。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三十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2]。紧接着，赫鲁晓夫等人在许多场合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包括在 1959 年 1 月举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甚至曲折地表示了对中国一些宣传和做法的不满。他公开声称：“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3]

在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引发一系列严重危机以至不得不请毛泽东出面维持苏联党的中心地位之后，毛泽东早已不把苏联党

[1]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262—265 页。

[2]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7—190 页。

[3] 周文琪前引书，第 516 页。

和苏联经验放在眼里了。搞“大跃进”和创立“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具体实践他的超越苏联经验，成功地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是他投入最大热情和最引为豪的一件事情。他对此举之成败，几乎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也正因为如此，稍有成就，他就津津乐道。而一旦有批评，他便会怒不可遏。比如，1958 年 12 月，他读到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等高度称赞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的言论时，马上批示：“印发”，并声称：“极好看”。[1] 而对赫鲁晓夫等人拐弯抹角地表示不同意见，则会极端恼怒与不满。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庐山会议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悲剧。

沈志华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研究颇足说明当时发生了什么。

1959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所提交的意见书后，指示印发与会者人手一份。7 月 19 日，毛泽东进一步读到两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说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是中国驻苏大使馆 7 月 2 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中国“大跃进”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对此，毛泽东仍批示印发会议各代表。[2] 直到 27 日，毛泽东仍不动声色，且再度批准印发了一个中共江西省委党校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的材料。[3] 所有这些材料，因为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议论，因此毛还能隐忍不发，看来也并不十分担心会造

[1]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1，卷宗 60，第 175—181 张。转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366、367 页。

[3] 同上，第 387—388 页。

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但是，一天之后，当他读到《纽约时报》报道的赫鲁晓夫在波兰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时，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1]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

很显然，毛泽东所以会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进而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了什么“经”回来,乃至于为了捍卫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惜“向全世界作战”，其原因不外是要拼死维护他的政治正确性。他并非不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他原本也是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纠纠“左”的。然而，仅仅因为赫鲁晓夫突然公开出来批评他引以为豪的革命创举，恰好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头上书指责“大跃进”具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转而发现自己已退无可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稍做退让，就可能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

---

[1]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1，卷宗60，第237—238张。转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2]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日、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根本否定，进而势必会使自己成为赫鲁晓夫之流的笑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因此不得不横下一条心：无非是想早一点进共产主义，有什么错！

庐山会议因此迅速改变了风向。当年周恩来曾经明确表示对赫鲁晓夫过去不敢抵制斯大林的错误难以理解，如今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次事关中共党内生活性质的重要转折。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公开讲，自从庐山会议以后，党内生活就变得十分不正常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这种揭发甚至连被揭发者私下的议论也被端到桌面上来了。根据揭发，彭德怀等犯有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罪行，比如，据说彭德怀等人居然敢于议论说，毛泽东正在重蹈斯大林晚年覆辙，并扬言说，再这样搞下去，弄不好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军帮助呢！所有这些揭发，只能更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彭德怀等人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从此再难翻身。[1]

庐山发生的这场风波，使毛泽东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一度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反人民公社的讲演。[2]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已经用不着这样做了。

四、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必将破产

8 月 27 日，围绕着西藏问题一直发生摩擦的中印两国，终于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方的态度很简单，对于一直坚持同情且暗中支持西藏分离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必须针锋相对，“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3]。然而赫鲁晓夫这时正在极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367、391—392 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6、277、279 页。

[2] 毛泽东：《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 年 9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504 页。

[3]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121—125 页。

准备访美。对毛泽东刚刚弄出一个台海危机又闹出一个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赫鲁晓夫已不胜其烦。在取得了巩固的权力宝座，并且开始按部就班地与美国实现起“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已用不着对毛泽东卑躬屈膝了。印度是中立国家的主要代表国之一，苏联与美国之间的问题离不开印度等国家在国际的缓冲作用。因此，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不顾印度的重要性而不惜为了不确定的边界领土问题与之大打出手颇为不满。为了在中印之间表现不偏不倚，他不顾苏联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和中方的异议，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只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1]。

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为避免任何麻烦，赫鲁晓夫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下令停止了向中国提供早已准备好了的原子弹样品。这显然是许多苏联领导人一直想做的一个决定。但它对于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中国核工业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2] 特别是对于因为苏联在这方面的无私援助，还多少对赫鲁

[1] 赫鲁晓夫后来专门讲："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赫鲁晓夫前引书，第465页。

[2] 据沈志华等学者的考察：中国这时核工业的基础部分，即提炼核燃料与制造核部件的设备及技术均已在苏联帮助下建成了。如最关键的生产原子弹起爆燃料浓缩铀的兰州气体扩散厂的设备已全部运交到位并开始建设；生产核部件的包头二〇二厂也已得到了全部设计和技术资料，关键性的设备也已到货。其中1961年运到的莫斯科红旗制造厂的三台球面车床，是中国当时自己是无法制造的。直到十年以后，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球面车床才得以问世。正是在苏联已经提供的这些援助的基础上，中国科技人员才得以在1963年4月解决了六氟化铀、铀分离膜及轴承润滑剂、密封剂等难题；在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了可供原子弹使用的浓缩铀；进而解决了钚239燃料的生产问题，并建成了氢弹原料——氚的生产线。同样的情况，中国导弹工业也得益于苏联已经提供的帮助。这包括已经提供的地对地P–1（作教学用）、P–2液体燃料导弹及其制造技术。中国正是通过仿制P–2导弹，进而在此基础上陆续研制出中程和洲际导弹、固体燃料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等。中国防空部队最早击落台湾美制高空RB–57D高空侦察机以及后来击落U–2飞机，使用的也是苏联提供的C–75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萨姆–2导弹。中国据此仿制出红旗1号，进而研制一系列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中国也是通过仿制苏联提供的苏K–5型空对空导弹而生产出来的。而舰对舰导弹，也是依靠苏联转让的舰对舰П–15型导弹生产了上游1号，然后陆续研制出了岸对舰海鹰1号、空对舰鹰击6号等导弹。苏方没有按照协定提交的只是潜对地导弹。除了导弹实物和转让技术资料以外，苏联还应邀派专家来华参加勘察试验场地，并在测试场的布局、组织机构的编制、网站的设置、测试设备的订购、测试程序的制定等方面，给予了全面指导帮助。这些无疑也都大大加速了中国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晓夫抱有某种好感的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人，刺激尤其沉重。

9月25—27日，苏美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想正在实现。当他兴冲冲地从美国直接飞往北京，准备向毛泽东解释他的这一整套国际关系新理念，并劝告毛泽东务必按照他的这套理念行事的时候，双方之间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由于这时的心态已与过去完全不同，赫鲁晓夫充分表现出了他缺乏修养和脾气暴躁的一面。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由于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前已采取了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发表中立声明等颇为极端的做法，毛泽东深信赫鲁晓夫此次去美国肯定对中国不利。因此，对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即到北京来，中共中央不仅不看好，而且怀疑他根本就是要来吵架的。[1] 因此，当30日国庆宴会召开前，当毛泽东听说赫鲁晓夫的讲稿中有暗中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的说法之后，就当即表示了他的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赫鲁晓夫似乎丝毫不在意毛泽东的感觉，依旧毫不顾忌地在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时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可以想见，双方10月2日举行的会谈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气氛。

10月2日，毛泽东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及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以及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党会谈。这次会谈由下午5点一直进行至午夜12点，双方在包括台湾问题、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会谈开始，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他访美的情况并转达了艾森豪威尔的口信。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强调不想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说法表示很感兴趣，但对赫鲁晓夫声称美国方面因为中国扣押五名美国人的事情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218—219页。

感到愤怒的说法不以为然。毛泽东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当然方式上可以用和平的办法，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我们在与美国人的会谈中历来主张：只要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之间的事情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至于在押美国人的事，周恩来解释了扣押的原因，说明我们关押了像这样的美国人总共有九十名，但已经释放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目前只有五名美国人还关在中国，而他们全部都是间谍。根据中国的法律，应该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我们甚至觉得，我们释放了太多的美国人了。

赫鲁晓夫带有明显教训口吻地说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对于这些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和美国人做交换。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除非你们想“逗弄母鹅”，那当然可以把美国人关起来。

毛泽东明显地不高兴和恼火起来。他生硬地答复道：放当然可以放，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谁让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赫鲁晓夫变得非常不高兴，表示：那好，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的态度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使得交换意见复杂化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众议员，也不是代表美国利益的经纪人，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向你们陈述我们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回应说：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

赫鲁晓夫动了气：它也搞乱了我们的生活！

看到赫鲁晓夫动了气，毛泽东为缓和气氛，把话题又转回到了台湾问题上来，说：台湾问题很清楚，我们十年、二十年，也许三十年也不会去碰那些岛屿。

赫鲁晓夫显然还在生气。他生硬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对这个原则问题我们是同意的。你说你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解放台湾，问题是你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策略。要知道，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坦率地说，我们是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但是，作为盟国，我们对外却不能这样讲。我们会说，一旦因为台湾而出现侵略行为，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呢，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说法显然感到不快。他反问道：那你要我们怎么做？按照美国人说的，宣布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吗？

赫鲁晓夫声称：列宁当年为了避免在东方与日本发生战争，曾经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我们对台湾问题不会提出什么建议，但认为你们应该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至少应该了解你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措施吧？然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原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会将你们的朋友卷入的所有问题上，是不是应该交换看法呢？

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是在抱怨炮击金门的事情。他对此略加解释，强调自己并不想在台湾海峡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想给美国制造些混乱，相信美国人也并不想打仗。

赫鲁晓夫显然不明白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他说：如果你们炮击了这些岛屿，你们就应该夺取它们；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夺取这些岛屿，那么你们也就没有必要炮击它们。如果只是为了逗弄猫狗而向那些岛屿开炮是不值得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冷嘲热讽，毛泽东很强硬地答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政策。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的问题。

至于我们跟台湾的问题，则是我们怎样解放台湾的问题。

赫鲁晓夫显然不满意毛泽东的说法。他再度强调：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你们应当制订一项我们可以理解的政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干什么。你我都不想要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不仅是世界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做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都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做什么。这怎么行？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中苏双方围绕着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

赫鲁晓夫一上来就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他声称：我们都不想打仗，但是我们都可能犯错误，像几年前我们就把美国人拉进了南朝鲜。我们很自豪，我们现在成功地解除了战争的紧张状态。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特别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人在边界问题上有一百五十年的争端。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多五万平方公里或者少五万平方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阿尔特温划给土耳其。直到今天，在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是我相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们这些的目的是向你们表明，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超越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这样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小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跑出来，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对情况还不了解。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但我们也没有开罪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政治家那里可以得到一切东西。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你们应该在那里有情报，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企图。

毛泽东冷冷地回应道：尼赫鲁也说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错。在苏联，塔斯社不是在中印冲突问题上还发表了声明吗？

赫鲁晓夫当即质问毛泽东：你们真的想让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将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发表这个声明，那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而事实上，达赖有机会跑到印度去，你让尼赫鲁怎么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坚定地说：不对，这是尼赫鲁的错。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他们的。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揍揍他。

赫鲁晓夫问：那就要在边界上杀死人么？

毛泽东答道：问题是他们首先攻击了我们，是他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十二个小时。

周恩来也质问赫鲁晓夫：你相信谁多一点，是印度还是我们？

赫鲁晓夫强调说：即使是印度人首先进攻的，但中国人没有死人，而印度方面却死了人！你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该比我更清楚怎样避免流血冲突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周恩来强硬地表示：假如芬兰人进攻苏联的边界，你们难道不会还击？

赫鲁晓夫说：好啊，他们开始射击，他们自己死了人。我们只是和你们交换对冲突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对你们说这些。

毛泽东指出：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在西藏犯了错误，不该让达赖逃跑；另一个是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犯了错误，打死了印方人员，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也给你们扣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请戴上吧。

赫鲁晓夫愤怒地表示：不接受。我们坚持的是共产党的原则路线。

毛泽东强调：塔斯社的声明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

苏斯洛夫辩解说：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恶化了，帝国主义分子才会兴高采烈。

毛泽东再度强调：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

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在整个会谈期间，双方都表现得相当激动，经常出现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明显地对过去受中国共产党批评的经历感到愤愤不平。他气愤地质问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无论是在同尤金同志的谈话当中，还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你们都曾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而我们虚心地接受了批评。但是，当发生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们却不能责备你们。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了你们的傲慢。陈毅批评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是一顶政治帽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做？

陈毅当场回应说：塔斯社的声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资产阶级。对此赫鲁晓夫强硬地表示：你们想让我们屈服你们，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的作风。匈牙利事件时你们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听了，你们现在也必须听我们的。收回你们的政治谴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是真话。我们对任何人从来都不迁就，甚至是对我们的朋友。

陈毅说：但是你们也在我们家门口对我们进行政治谴责，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达赖喇嘛的逃跑都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强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不要从你元帅的高度上吐唾沫，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是吓不倒的。[1]

关于赫鲁晓夫与陈毅之间的这段争吵，当年为中方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的回忆。他说：听到赫鲁晓夫的指责，外交部长陈毅忍不住了，他当场顶撞赫鲁晓夫说：炮轰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1]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59 年 10 月 2 日）。

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

赫鲁晓夫当即涨红了脸，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

陈毅也毫不示弱，大声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据说，毛泽东在整个会谈当中一直冷眼旁观，说话不多。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冷不热地给了赫鲁晓夫一句，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一次争吵。双方对这次争吵还多少有些不太习惯。赫鲁晓夫回去后马上就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会谈的记录，但中共中央却很快得到报告说，赫鲁晓夫刚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了。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内部尖锐地批评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到了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的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2]

[1] 李越然在1997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第十七章

背水之战

赫鲁晓夫把毛泽东比喻成“旧套鞋”，惹恼了中国党；中共中央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争取各国党员干部，遭到抗议；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坦言：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赫鲁晓夫放话：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胡志明北京劝和，毛泽东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古以来没有这种法律……

1958 年以后的中苏关系，已经是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了。按照我们一般的了解，两年之后，即 1960 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苏关系就已经宣告破裂了。其实，历史却不是这样简单。的确，意识形态分歧的不可调和，赫鲁晓夫的傲慢骄横，确实在使毛泽东逐渐失去耐心。自信真理在手，他讲出话来也总是咄咄逼人。但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想一想中国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即使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也未必愿意眼看着两党两国关系真的就这么走向破裂吧。1960 年，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决心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团，面对多数国家共产党代表的激烈攻击，已经做好了最后破裂的一切准备。然而，几乎是在最后一刻，奇迹出现了。显然，赫鲁晓夫刹车了，毛泽东也刹车了。

一、赫鲁晓夫口无遮拦，毛泽东忍无可忍，称之为半修正主义

195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是否有必要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主动释放在押美国犯人等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尽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各自销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以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特别让毛泽东如鲠在喉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界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偏袒印度；第二是赫鲁晓夫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必欲限制中国的地步。但是，至少在多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根基还未发生动摇。毛泽东在 10 月 14 日约见安东诺夫时特别讲道：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一致。12 月在杭州开会，

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1] 因此，陈毅在这一年 12 月 27 日所做的一个报告特别告诫说："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一个指头甚至是一个指头不到的分歧，进行挑拨离间，完全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的。"[2] 显然，根据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还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报告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指的是南斯拉夫。

1960 年 1 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反映出这种情况。考虑到中苏分歧已成事实，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做出说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理论问题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对照性资料。但是，中共中央明显地还不打算对中苏两党关系做出某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公布的资料没有刻意搜寻和罗列中苏之间的不同点，而是就所有能够想到的重要问题，全面对照了双方的看法。从对照的结果看，双方仍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会议印发的最足以说明两党分歧的资料，主要是中苏两党 1959 年 9 月围绕中印边界问题的来往信件和苏联政府"表示遗憾"的声明。不过，会议同时也印发了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并根据周恩来建议印发了陈毅 1959 年 12 月 27 日的那个报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中苏分歧性质的看法基本上不出陈毅报告评价的范围。会后，中共中央甚至决定在周边关系上要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比如要争取和印度等国也包括和苏联，要尽早解决历史遗留下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 229—234 页。
[2] 见陈毅：《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报告提纲）（1959 年 12 月 27 日）。

来的边界问题，以便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 这一年春天，周恩来等为此接连出访了亚洲各国，并先后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或友好互助条约。

但是，1960 年初进一步引起中苏交涉的仍旧是中印边界纠纷的问题。1 月 19 日，在得知苏联领导人即将访印的消息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要求大使转告苏共中央，苏联领导人访印时最好不要过问中印边界问题，以免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并暴露两党之间的分歧。22 日苏联大使会见陈毅时答复说，苏共中央已经表示，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会“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对于苏联继续坚持中立的立场，中共中央依旧难以接受。26 日，周恩来再见苏联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提法表示惊讶，他强调：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中立，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都是一个新现象。这等于公开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他因此列举了五个事实表示中国的“担心和不安”。这包括 1959 年 9 月 10 日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国庆宴会上关于“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的说法等。当然，在 30 日的谈话中，周恩来也还是明确讲：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妨碍两党团结。[2]

这个时候，中方不能接受苏方暴露双方的意见分歧，苏方也同样不能接受中方暴露双方的意见分歧。但为争夺同情者，双方却都在千方百计、拐弯抹角地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第三方。

1 月 13 日，苏联大使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赫鲁晓夫表示，苏联打算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两年内裁减一百二十万军队。毛泽东当即要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苏联大使转告赫鲁晓夫说：中共中央

[1] 吴冷西前引书，第 248—249 页。

[2]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80—286 页。

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步骤。但是,中共中央并不想为此承担任何义务,更不想与苏联同一步骤。因此,在随后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上，中方代表康生、刘晓、伍修权明确表示对会议提出的普遍裁军主张持保留态度。康生在2月4日的发言当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一面表示赞成普遍裁军，一面声明在没有中国直接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将不承担任何裁军义务。[1]

同中印边境事件问题上苏联塔斯社的声明一样，中方在华约组织会议上的这一表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苏方对此显然也难以接受，并且反应强烈。在当晚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就突然在讲话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共，尤其对康生发言中的强硬措辞表示反感。他声称，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他随即语锋一转，把话题直接转到毛泽东身上去了，放言："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2]

第二天，即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口头通知，更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声称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通知同时批评康生2月4日的发言是错误的，说这种表态实际上等于是冲着社会主义国家来的。

[1] 《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2月4日)。

[2] 《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兄弟党代表团招待宴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4日),并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251—252页。

赫鲁晓夫把毛泽东比喻成"旧套鞋"，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又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由此引起的反感可想而知。中苏两党分歧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升级。虽然，由于当时国内开始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因此，直到3月上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周恩来、陈毅等继续在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1] 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却难以遏制地日趋公开化。在2、3、4几个月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口舌之争。

鉴于赫鲁晓夫事实上把争论半公开了，忍无可忍的毛泽东3月初亦明确提议借着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组织发表三篇理论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以阐明中方的观点。4月22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目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当然，多半是注意到国内的情况，毛泽东这时至少在公开场合似乎也还不想把中苏分歧引向极端。他指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说来，应当估计苏共是马列主义的党，他怕我们给他戴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因此，这些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文章对赫鲁晓夫留有相当的余地。文章含蓄地说，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并不是修正主义者"，称他们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许多"不正确的想法"。[2]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中印边界和对美政策这些具体

---

[1]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92页。

[2] 见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1956年后的毛泽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红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问题扩展到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方面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观点抱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印度资产阶级头子尼赫鲁和美国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的软弱态度，更使毛泽东确信，苏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误区是中苏关系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谈话时公开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而“所谓社会主义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他指出，与苏联的这些分歧“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如（他们）不改变，我们就把所有可证明的文件都拿出来”。[1]看来，毛泽东多少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一面继续肯定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一面却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把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画上等号，称之为“半修正主义”了。

二、赫鲁晓夫扬言：“如果你们要斯大林，就把尸体搬到北京去”

从1960年2月以来，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执更多地发生在国际会场上，争论的焦点也更多地转到裁军等关系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方面那些带有火药味的革命主张，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多数领导人都深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特别是要打破各国的舆论一律，做广泛的争取工作，让各国党的普通党员干部都能了解自己的观点。为此，在毛泽东的赞同下，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包括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共中央理论观点的文章，和抓住一些有利的场合，包括对来华工作的大批

[1] 《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与丹麦共产党耶尔森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专家，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工作。

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做争取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苏共中央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向东欧国家兄弟党领导人进行游说。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普遍感到“一场公开的尖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因为，就连这些国家许多原来对中国比较好的普通党员和学生青年，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不理解，经常提出一些“你们为什么总是主张解决世界问题要用战争”“你们为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之类的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情况相当敏感。看到任何反对、怀疑中方主张的言论和表示，他都会用十分尖刻的语调痛加驳斥，批示道：“狐狸尾巴，经常出现。色厉内荏，心绪不定。”“坚决把列宁打倒，打得倒吗？笑话而已。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而发现任何赞赏中国的表现，即使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哪怕只是文艺演出受到欢迎，毛泽东也会高度重视，并由此看出希望所在，批示说：“好朋友，一个也就够了，何况还有十个，或者几十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或者可能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是不是呢？”“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是工作做得还不错。”[1]

---

[1] 毛泽东：《在关于近两日苏联对古巴、刚果局势态度的电报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阿尔巴尼亚驻罗大使谈话摘要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可否将中苏分歧向使馆干部传达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捷共学生党员与中国留学生谈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日夫科夫正在撰文批评中共“教条主义”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位保共党员对中共看法的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位捷共工人党员谈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 年 7 月），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248—249、251、254、256、262、264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 256—258 页。

但不论毛泽东如何估计整个形势，在各国党中间，中国日渐陷于孤立已不可避免。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0 年 5 月，发生了美国派 U—2 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苏联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被拒，以至拒绝出席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情况。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赫鲁晓夫的两面性，因此受到中方的肯定和欢迎。中共中央甚至为此在 5 月 20 日举行了百万人集会，以声援苏联与美国的对抗行动。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充分利用一切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试图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比如，6 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会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参加会议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6 月 5 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以邀请与会的二十位外国工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介绍中方的看法，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的观点。这一尝试虽然由于受到以苏联代表格里申为首的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但中共中央显然相信这种做法是必要的。

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当 6 月 2 日苏共中央来信，建议利用 6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时，中共中央当然会认为这又是一个宣传美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和宣传自己主张的好机会。毛泽东没有料到，U—2 飞机事件的发生，不仅不会使赫鲁晓夫在理论上认输，恰恰相反，他反而必欲就中共乘机发动的宣传攻势进行回击。

6 月 16 日，中国党的代表团由彭真率领前往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 1 月起就开始做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不久，很快就感到气

氛不对头。与会各党事前都接到了苏共中央散发的针对中国党的《通知书》，对中国党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故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1]

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一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乘罗党大会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与会期间，就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考虑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已经发出多时，苏联党也于 6 月 10、12 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四十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特别委托代表团设法与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在两党间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在罗党大会之前，中共代表团就于 6 月 17 日先行抵达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讨论。罗党大会进行过程中，代表团又在兄弟党开会前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但两次长谈的结果，不是使双方更加接近，反而使双方更多隔阂。

在与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以及在兄弟党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特别对中共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声称：“你们这样做，是否是在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呢？”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 84 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

[1]　《中共中央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电》（1960 年 6 月 20 日）。

系统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和政策。[1]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称："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中共代表团虽然负有与苏联党当面交换意见的任务，但根据苏方当初的会议通知，代表团没有估计到在布加勒斯特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场面。尽管彭真唇枪舌剑，应付得体，事实上中共代表团已经处于被围攻的境地，极感被动。而赫鲁晓夫则颇为得计，言语中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比如，他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比如，他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称现代战争打起来，能活下来的人怕是也会因残废而死亡。又比如，他颇为傲慢地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得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2]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十分强烈。毛泽东也敏感地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他已明确提出中苏两党关系可能破裂的问题，要求大家要有准备，但不要怕。由于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做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代表团的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

---

[1] 参见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s. Peking*, London, 1963, p.99—103。

[2] 《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时的发言》(1960 年 6 月 22 日)，并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 281 页。

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1] 但事实上，会议的最后还是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吵。彭真和赫鲁晓夫在会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使两党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2]

严格说来，布加勒斯特会议虽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也使中共中央意识到有组织地在兄弟党干部群众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震动较大。但毛泽东当初尚未估计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中苏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应该说，两党关系不致出现较大变化。让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不久，苏联方面就于7月4日和16日接连通知中共中央：停止在苏联出版发行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援华的苏联专家。而这两项严重决策的直接原因，都是基于苏联党对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向苏联国内群众和来华专家进行思想宣传的强烈反感与畏惧。21日，苏联外交部破天荒地向中国驻苏代办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中方停止向苏联机关团体散发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宣传错误观点的发言和文章，并要求中方召回散发这些材料的人员。[3]

撤退苏联专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科技、军工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无疑极端反感，但他显然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只是轻蔑地批道：这“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4]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很显然，也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困难，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7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8

---

[1] 《中共代表团声明》（1960年6月）。

[2] 吴冷西前引书，第293—298页。

[3] 《苏联政府外交部致中国政府外交部照会》（1960年6月21日）。

[4] 毛泽东：《在关于最近苏联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变化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年7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52页。

月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没有试图做出格外激烈的反应。会议明确地把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这一表现限定在两党关系的范围内，强调它仍属部分分歧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在通知中，中共中央介绍了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分歧发展的历史，但仍旧强调说，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分歧的关键主要只是在于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二人口要不要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关系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要不要不断革命、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整个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因素会日益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1]

三、毛泽东部署莫斯科会议方针，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苏冲突公开化，引起了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的严重不安。8月上旬，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到中国，直接前往北戴河，会见正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等人。他明确讲，他此行是劝和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十年、八年以后，收获一定

[1] 《中央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1960年8月5日）。

很大。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也经过一段时间”。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

但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做法还是充满了愤慨。他愤愤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谈话中，毛泽东最重的一句话是：“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胡志明听后当场就用越语向随行的黄文欢、阮春水悄悄说：“这说法更重了。”[1]

由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的判断无疑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注意到理论上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外，8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还明确主张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之所以会有这种估计，根本上是因为苏联早就曾经以类似的方法对付过不听话的南斯拉夫、波兰这些兄弟国家。而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开始出现了。[2] 在19日与从莫斯科回来的胡志明谈话中，周恩来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就得出印象说：“赫鲁晓夫主张全世界搞和缓，同美国的关系要和缓，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3]

不过，尽管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比之为中国的“右派”，甚至断言他代表

---

[1] 《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2]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页。
[3] 《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0年8月19日)。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苏共和苏联的总体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多数领导人看来还不认为应当改变对苏联的总体评价。周恩来在 8 月 14 日回答一些人关于如何区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问题时，即明确讲：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的，搞社会主义的，讲国际主义的，所以目前的问题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

十天后，在向民主党派报告中苏关系现状时，他讲了大致相同的话，说明分歧主要是斯大林问题和战争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争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从两党两国关系和整个阵营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25 日接见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仍旧强调说：中苏之间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在行动上我们两党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路线。28 日，周恩来向各省统战部长说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时，更进一步肯定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就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两党两国关系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决不能因此造成反苏情绪。乌云总是要过去的。[1] 就连 9 月 25 日澳共总书记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苏联向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经济压力比美国还坏时，毛泽东也还是表示说：“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2]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估计，毛泽东接受了胡志明的劝和与苏共中央提议，于 9 月 15 日派出以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但只要不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必然还是各执一端。因此，会谈从 17 日开始一直开到 21 日，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接着，从 10 月 2 日到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为准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而召开的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争论了三个星期，两党分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

[1]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40—341、342、344—345 页。

[2] 《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等人的谈话记录》(1960 年 9 月 25 日)。

即便如此，在10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仍旧一致决定由刘少奇率团去出席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张不放过这次正面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继续做争取两党团结的工作。会议决定，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成员包括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等四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刘宁一、廖承志、刘晓等三位书记处书记。同时从新华社、外交部、中联部抽调了相当数量的领导人和翻译来充任顾问和工作人员。会议甚至决定，这次会议如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目的，刘少奇就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访问苏联。毛泽东讲：八十一党会议上会有一番恶战，斗争可能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濒于破裂的边缘，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为此，斗争要讲策略，比如，刘少奇一般不要直接出面争论，位于二线，让邓小平和彭真站在第一线，如此便于转圜。

刘少奇11月5日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亲往机场迎接。第二天刘少奇拜访赫鲁晓夫时，谈到了会议开得好就准备正式访问苏联的问题，赫鲁晓夫格外重视，也大讲中苏团结的重要，强调说我们双方谁也离不开谁。7日举行红场阅兵和游行活动时，赫鲁晓夫又刻意让刘少奇首先登上列宁墓，并让刘少奇站在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中间。科兹洛夫报告时，也丝毫没有讲一句带刺的话。在大会开会前夕，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科兹洛夫和米高扬还专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理解赫鲁晓夫开幕式时在大会讲话的意图，说赫鲁晓夫讲话的精神是强调团结的，不想挑起争论。米高扬甚至许诺说，一开完这次会议，他们马上就来与中国方面讨论苏中贸易、援助以及专家等问题，继续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考虑到苏联方面的态度，代表团曾经对是否改变原定发言基调问题进行过讨论。然而事实上，11月10日开幕式上赫鲁晓夫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仍旧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党的观点。这迫使中共代表团决定继续按照原定

方针进行发言。根据原定方针，邓小平的发言将直接把矛头指向赫鲁晓夫。14 日下午邓小平指名道姓地历数赫鲁晓夫和苏联党错误做法和错误观点的发言，迅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 从邓小平发言后，接连几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卷入到争论中来了，中共代表团再度处于被围攻的境地。

11 月 16 日晚，得到刘少奇电报的毛泽东召开会议，迅速研究了这一情况。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在京的领导人，进一步召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变，对会议声明必须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坚持自己关于对战争要准备两手而不是一手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否则拒绝在大会的声明书上签字。为此，有必要做好破裂的思想准备。接到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打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也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讲，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不怕破裂。[2]

激烈的争论一直进行到 23 日。这一天，赫鲁晓夫做第二次发言，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他一面继续肯定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是正确的，一面开始承认当时时间紧迫，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尽全面；一面继续坚持说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面又反对说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一面继续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一面又承认要根本制止战争，只有靠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后，他还专门讲了一段要团结的话，反对争论不休，主张向前看，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互相让步。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天邓小平的发言也顺势降了温。

25 日，起草委员会再度开会，彭真参加了起草会议声明的讨论。这一天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插曲。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挑头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呼吁团结。鉴于赫鲁晓夫有所让步，一些小党又强烈地反对分裂，主张团结。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后，当晚向中共中央请示，

[1] 参见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s. Peking*, p.124—129。

[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 386—387 页。

可否适度让步和妥协。代表团说明，目前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主要集中在了六个方面：即处理兄弟党问题的原则；国际会议上解决分歧的办法；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宗派活动问题；所谓民族共产主义问题；是否应当在声明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眼看会议即将结束，在有些问题上事实上苏方很难让步，如肯定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苏方已显示出有松动和让步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味坚持以前的三条，不允许写上苏共“二十大”，破裂将不可避免；如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考虑到各小党团结的愿望，避免破裂，就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我们妥协的条件。

26 日晚，毛泽东再度召集会议，商谈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条件问题。会议没能取得一致的意见。27 日，由于收不到中央的答复意见，中共代表团仍旧不得不坚持原有的立场，向各方表示，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不会在声明书上签字。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到了 28 日的晚上，政治局还是做出了决定，一致同意从原先的条件上再做让步。

中共中央 28 日夜里的指示电主要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当前观点正确，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的队伍还不巩固，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做好与赫鲁晓夫破裂的准备，几乎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各国党和从事革命运动的分子，都不愿意看到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而达成一致的会议声明。第二，代表团应准备应付四种情况：一是把苏联党按在声明草案中的所有“钉子”，主要是苏共“二十大”问题、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统统拔掉，顺利签字；二是拔掉三个“钉子”，但苏共坚持要搞一个约束各党的内部协议，我们可以在声明上签字但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协议；三是保留有关“二十大”的内容，同时又搞内部协议，我们在坚持部分措辞修改后可以签字，同时声明反对内部协议；四是三个“钉子”不去，还要搞内部协议，则绝不签字。[1]

[1]　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 407—409 页。

多半也是因为担心破裂在即，这一天夜里12点，赫鲁晓夫专门找到胡志明，要胡志明以他个人的名义打电话，建议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到胡志明住处个别谈话，协商妥协的办法。当晚，胡志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给刘少奇打了电话，但遭到中共代表团拒绝。[1]不过，中共代表团当晚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做出了决定，争取以保留苏共“二十大”的内容为让步条件，促使苏方让步，取消声明中所谓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提法。

29日，根据前晚的决定，彭真利用在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机会，约科兹洛夫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彭真当场问科兹洛夫：你们是不是想破裂？科明确答复：不是。彭于是亮出底牌，提出中方妥协的四个条件：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协议；第二，声明中不能写有所谓反对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内容；第三，要写上在国际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我们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措辞要修改。对此，科兹洛夫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临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科兹洛夫转达的中方的妥协条件。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通知彭真，苏共中央已基本上同意了中方的条件，但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一次正式会谈。

30日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按照约定在列宁山顺利地举行了会谈，基本上按照中方的条件达成了妥协。于是，赫鲁晓夫正式向刘少奇发出访苏邀请，双方会毕还高兴地一起合了影。[2]

第二天，即12月1日，在激烈争吵了将近三周，在多数党都认为中苏破裂不可避免之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突然满面春风地握手言欢，弄得那些几周来一直跟着赫鲁晓夫激烈攻击中国党的多数党的代表们一时间莫名其

---

[1] 见《毛泽东接见胡志明等同志的谈话记录》（1960年12月3日）。

[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415—419页。

妙，瞠目结舌。全世界随后都注意到，在为庆祝莫斯科大会成功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应邀坐在主宾席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向他们频频祝酒，气氛热烈，共产主义阵营一派团结景象。

这个结果显然也让毛泽东感到满意。12 月 3 日，毛泽东在听取刚刚回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以及接见路过北京的胡志明时，对这一结果一再表示相当欣赏。他特别称赞胡志明所起的和事佬作用，但同时也讲：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将来还会吵，吵一阵，和一阵，生活规律就是这样嘛。[1]12 月 9 日，毛泽东又亲率政治局成员前往机场迎接会后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顺利归来的刘少奇一行。直到 1961 年 1 月中旬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仍旧明确讲：这次八十一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讲团结，跟苏联、跟社会主义国家、跟兄弟党都要讲团结。就是骂过我们的党，也还是要和它讲团结。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斗争—团结。[2]刘少奇也在会上讲：看来对付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付那些搞修正主义的人，也不太难，比较容易。我们党战略上有一套，策略上有一套。斗争并没有结束，很可能是高一阵低一阵，至少还要斗争十年，要做这个准备。但经过这次斗争过后，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都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3]

本来已经滑到了破裂边缘的中苏关系，出人意料地又延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

[1] 《毛泽东接见胡志明等同志的谈话记录》（1960 年 12 月 3 日）。
[2]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 年 1 月 18 日）。
[3]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 448 页。

第十八章

“九评”赫鲁晓夫

周恩来为抗议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搬走斯大林遗体，毅然离会回国，毛泽东率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现象有阶级背景，判断他代表苏联高薪阶层利益，和帝国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差不多；王稼祥反对一斗到底，愈弄愈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相当地发了狂，搞“三和一少”，向资产阶级投降；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

从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到1959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却没有谁想到过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联想到当时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决定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的这种要求从实际出发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国党当时既没有从意识形态的亢奋中清醒过来，也不存在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主宰，他的意志决定了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一、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1961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生产先进的米格–21型歼击机的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等。[1] 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毛泽东这时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

但是，在1961年，仍旧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一是苏共在“二十二大”决定把

---

[1]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40、394、397、400页。

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

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因不愿受苏联控制因而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因为无法压服阿尔巴尼亚接受苏联的意志，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放弃在阿的海军基地并撤出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兄弟党”受到苏联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坐视不顾，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除此之外，苏共“二十二大”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毛泽东指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1]。但让毛泽东深感吃惊的是，苏共“二十二大”除了继续对阿尔巴尼亚党大张挞伐以外，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这包括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19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21日更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两天后，即23日晚即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苏共“二十二大”做法的不满。为显示中共中央团结一致抗议苏共“二十二大”的态度，毛泽东还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全体赴北京机场迎接周恩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本意是去莫斯科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了。当赫鲁晓夫7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泽

[1] 见D·C.瓦特编著，于树生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东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在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1]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2]，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儿，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因为赫鲁晓夫代表的社会阶层，同帝国主义代表的社会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开始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二十二大”会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词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二十二大”会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更加严厉了。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3] 当胡志明问他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

[1]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40页；前引郑谦、韩钢书，第306页。

[2]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年12月）。

[3]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记录》（1961年11月17日）。

法，我有什么办法？”[1]

不管中共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二十二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修正主义了。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塌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塌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塌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联党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1962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旧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讲：“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2] 如今许多人

[1] 《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谈话记录》(1961年11月14日)。

[2] 这段讲话在1966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38页及注释18。

引用毛泽东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1966年毛泽东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1962年毛泽东当时的讲话来用，这是不妥当的。[1] 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的建议来。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2] 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中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据此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大建议。

2月27日，用王稼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王稼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3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张：“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

[1] 郑谦、韩钢前引书，第308页；等等。

[2] 见周文琪前引书，第530—531页。

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我们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我们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6 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1]

很明显，这时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当 7 月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时，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做出强硬的声明，而是笼统地对大会呼吁全面裁军的态度明确表示了赞同。[2] 中国代表团的这种做法，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二、“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的威信，他转而在中国找修正主义

1962 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

---

[1] 徐则浩前引书，第 557—564 页；张沱生：《艰难的探索，可贵的努力》，《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6 页；《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4—458 页。

[2] 徐则浩认为，代表团的做法不完全反映王稼祥的意见，因当时代表团没有向国内请示就同意了会议的共同文件。但此说是否准确，尚有待深入研究，因为面对如此重大的方针性问题，又是第一次代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不同于以往的公开表态，代表团未得授命即贸然行事，颇不合乎情理。另外，即使徐所说属实，代表团的做法也必定是受到王稼祥的思想和建议的影响，绝不是毫无根据地行事的。徐则浩前引书，第 565 页。

事件，当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一定联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同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身份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有关的。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旧可以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上的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从而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1]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然继续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间的团结，但却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是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这不可避免地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受到苏联方面“挑唆”，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地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2]

当然，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以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还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因为身为国家主席，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内心倍感压力，因此力主要吸取教训、深刻反省。他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主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

---

[1] 参见 Odd Arne West 提交给1997年10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苏同盟是如何瓦解的？——政治、饥荒与难民》；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2] 《毛泽东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吉吉）谈话记录》（1962年6月21日）。

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个工作中开始贯彻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集体化和公社化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他们同时也注意到与苏联对抗、勒紧裤腰带来援助各国革命党的做法，不仅在国际上使自己过分孤立，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也损害极大，因而主张转取缓和的对外政策。甚至，他们还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党内关系过于紧张，因而提出应当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也在这时上书要求平反。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

其实，还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表现出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论“大跃进”的问题了。他当时就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这话显然是冲着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去的。因为他们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在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1]

让毛泽东感到更为严重的是，他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了。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民主的责难，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何况，彭真在这个时候的一段讲话更容易让毛泽东怀疑这些人就是冲着他来的。彭真是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谈到这个话题的。由于党内一些人一向习惯拿毛泽东做挡箭牌，彭真显然对此十分不满。因此，他在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争论时不免脱口而出，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

---

[1] 在大会当中，有人公开发言，认为对“三面红旗”是不是正确的问题，原则上好讲，实践上难讲。刘少奇在大会讲话中则表示，对“三面红旗”，有些问题看得还不那么清楚，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页。

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呢？我想，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陈伯达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然而彭真并未被陈伯达的话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人刚刚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有如此率直的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会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何等之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万岁”之声响彻云霄之时，他对林彪“封”他“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

到林彪的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不仅很舒服，他还对讲这种话的人很少感到不满意。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说得出来吗？[1]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他，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2]

不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以回答。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3]

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

[1] 丛进前引书，第411、413页。
[2]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9日）。
[3]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

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乃至为了保持本国人民生活水平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必须要掌握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身为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自然就成了毛泽东枪打的第一只出头鸟了。

1962年8月，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主张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疑义，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他当即警觉起来，并开始表示严重不满。在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他尖锐地批评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在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现象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以外，包括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看上去与毛泽东观念中的革命方向不一致的主张，在他看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1] 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

[1]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

示不同意见呢？

1962年10月20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中印两军围绕着有争议地区在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基于斗争的原则，毅然下令实施了自卫反击作战，不仅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而且一气追入印度境内上百公里。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了中国党的做法。当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开始受命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1963年2月15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1] 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2]

---

[1] 《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一文的修改和批语》（1932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7—248页。

[2] 参见徐则浩前引书，第567页。

三、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又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表示，他也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文章，可以暂时挂上一笔账。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他咄咄逼人地尖锐质问道：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对方的文章都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1]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 《毛泽东接见契尔沃年科大使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这一来信的答复。对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映。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时来中国的大都是站在中国党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因此得到的意见大都对中共中央的这种做法表示支持。比如，当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说：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时，这位新共总书记当场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1] 甚至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2] 略有不同的只是因为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的情况下，明确主张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3]

6月14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4]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

[1] 《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1963年5月21日）。

[2]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3年5月29日）。

[3] 《毛泽东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4]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见《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63年10月翻印，第18—73页。

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还未在报刊上公开交锋，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词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做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共中央对苏共无端攻击。十天之后，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终于也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答复中共中央的《建议》一文，将中苏分歧在党内外全面公开化。据不完全统计，此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三百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7月5日，按照先前的约定，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双方的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由于苏共《公开信》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中共代表团也毫不含糊地在会谈中尖锐地提出了赫鲁晓夫当年如何吹捧斯大林如今又如何咒骂斯大林的两面派问题。[1]感情恶化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会谈后，中共代表团于7月22日返回国内。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从1963年9月6日起，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地响起著名播音员齐越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

[1] 吴冷西前引书，第616页。

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齐越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他们绝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曾经直接参加过中苏论战和组织“九评”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会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他说：中苏之间当年的那场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为什么说是“空话”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解决问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2]

其实，一个党、一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和政策是对还是错，也不是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在一时之间所能判断的。只有在实践长久地检验和比较之后，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优劣之后，人们才能得出最终的判断。经历了中苏论战那段沉重的历史以后，几乎所有人都能够了解，毛泽东当年关于苏联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是要革命的，不要修正主义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已。中苏两党的决策，靠两党自己和本国的人民在当时也是判断不出来的。事实上，当亿万中国人被“九评”所激动的同时，亿万苏联人也同样地在为苏共中央的论战文章所激动着。说到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所掀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更多地导致的其实只是中苏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而已。

“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得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显而易见，在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大张挞伐、无限上纲之后，要想再使这种激烈的相互攻击停止下来，不仅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已不大可能，就是在两党和两国民众的情感上也不大可能了。但是，在经过了几年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

---

[1]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2]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237页；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

泽东反倒对现在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 1963 年 7 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1]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下发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改写了其中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不过，事实上在“九评”写作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其实就已经得出了。如果再往早些说，应当说还在 1962 年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时，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它所带来的危险，远不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够预见到的。

---

[1]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插话》（1961 年 1 月 18 日）。

第十九章

战争即将爆发？

毛泽东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苏联军方借题发挥；边界冲突忍无可忍，珍宝岛一仗打出了军威；毛泽东很高兴，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方在新疆边界实施报复，大战即将来临？老帅们受命分析形势，毛泽东提议中央领导人撤出北京；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林彪差点儿炸掉密云水库……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到1969年可以说是走到最危险的地步了。这一年3月爆发了中苏珍宝岛之战；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宣传“要准备打仗”；5—6月，中央军委办事组等军事部门多次开会讨论部署战备工作；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实施报复作战，消灭了我边防军一部三十余人，并扬言要对中国施行外科手术；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总理会谈，商定缓和两国间紧张关系，但中共中央判断苏联施放战争烟幕，毛泽东担心苏联会打原子弹；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中央领导人撤退南方，林彪发布“第一号号令”，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各大城市深挖洞广积粮……

所有经历过那个年头的人都能够记忆起当时的战争气氛。的确，事实上中苏之战那时也确实曾经一度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问题是，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到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有效地缓和局势，反而过度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度的反应。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材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

历史走到这一步，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一、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

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1] 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 1969 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摩擦早在 1964 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 1959 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按照苏方的说法，仅 1962 年一年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就有近 5000 次之多。1963 年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 175 起。[2] 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 1964 年以后开始的。[3]

1963 年 3 月，《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就清朝政府与沙皇政府关涉两国边界问题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做出评论，认为那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4]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关注。苏军当年重新进驻蒙古布防，苏联政府进一步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无疑也给中国方面以相当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自 1964 年起，开始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举行了边界谈判。

由于对中国方面坚持革命与战争的观点以及不断高涨的反帝反修的革命鼓动的恐惧，赫鲁晓夫还在两国正式举行边界谈判前夕，专门于 1963 年 12 月 31 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

[1] 转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9 页。

[2] 转见李丹慧：《1964 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

[3] 自 1960 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 1964 年 10 月以前共发生 1000 余起。但自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 4189 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

[4]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 年 3 月 8 日。

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也针锋相对地在两国边界谈判过程中，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1]

从2月开始的这一谈判，由于双方各执己见，相互指责，完全无法达成妥协。眼见苏联方面坚决不承认在中苏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不平等条约这一事实，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并非无意地就此提出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它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呢”。[2]

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账，索要那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借古喻今，敲山震虎，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3] 但是，9月2日，《真理报》公开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指责中国领导人已不仅是想要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地位，而且在国家关系上也暴露出了扩张主义的倾向。[4] 赫鲁晓夫随后也利用会见日

[1] 《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2]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3] 《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4] 《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回应毛泽东说：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摩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1960 年代中前期，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开始升级，特别是 1964 年 8 月初发生北部湾（又称东京湾）事件[2] 之后，美军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南部边界地区。公开宣称自己是越南人民大后方的中国一方，自然高度紧张。[3] 一边是美国可能扩大战争，中国可能被卷入越南战争之中，一边是苏联借口毛泽东的边界问题谈话在中苏边界开始调兵遣将，这种情况显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战备工作。中国大规模的“三线”[4] 建设的方针，即受此影响而迅速确立起来的。[5] 但是，直到“文革”开始，中苏边界的摩擦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太大的紧张感。与南方来自美国在越南领土上的大规模战争相比较，来自北方特别是来自苏联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威胁，看上去似乎远不是那样紧迫。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的纠纷依然持续不断。而双方之间主

---

[1] N.S. 赫鲁晓夫同志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N.S. 赫鲁晓夫同志于 1964 年 9 月 15 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 年 9 月 16、20 日，转引自 S.N. 冈察洛夫、李丹慧前引文，《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 年 10 月号。

[2] 北部湾事件，又称东京湾事件，指美国驱逐舰 8 月 2 日在越南沿海与越南海军发生严重交火，导致美国总统下令轰炸北越以示报复一事。

[3] 毛泽东在北部湾事件发生第四天，即 8 月 6 日，就明确认为“要打仗了”。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1964 年 8 月 6 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120 页。

[4] 所谓“三线”，就是指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所做的最内层的划分。一线是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是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二线即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军方的文件，“三线”的具体地理划分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七百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5] 有关 1964 年中共中央“三线”建设方针形成的过程，可见陈东林：《1964 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转见世纪中国网（www.cc.org.cn）。

要的摩擦地带已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按照通行的两国边界一般依照国际中心航道走向划分的原则，应当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根据中方的看法，冲突多半都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 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 1968 年 1 月 5 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四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 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 年 12 月 27 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 年 1 月 23 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二十八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 2 月 6 日到 25 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 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六个点射。

终于，3 月 2 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 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 3 月 4 日到 12 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一亿五千万人，四亿人次以上。[1] 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

[1] 见《人民日报》1969 年 3 月 13 日。

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1]。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2]

二、毛泽东主张破除迷信，强调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战备热潮以外，它其实更多地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3]

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在边境兵力的人数上。从19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1940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

[1]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等。

[2] 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3]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油印)(1969年)。

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和四十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1]

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九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2]

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仗是这样说明的：

3月2号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三十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七十个人上岛围堵我们。9点17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七个。打到9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余人，其中打死五十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

3月15日，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

---

[1]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

[2] 《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四个大口径炮兵营。但是，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也做了充分准备，先于 14 日夜上岛并在江叉口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 15 日凌晨 3 点出动六辆装甲车、三十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 8 点 2 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9 点 40 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 1 点 35 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 3 点 13 分又出动十辆坦克、十四辆装甲车和一百多名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一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六十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四辆。[1]

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

[1]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 年）。

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1]

三、毛泽东并不想扩大冲突，主张：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在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而这场作战，明显地更侧重于政治的考量和对局部摩擦的满足，而缺少了对它可能促成的后续的军事后果的战略设想。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电报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在边界冲突的问题上，主张在迫不得已时用武力给对方以惩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中方对待具有敌对倾向的对手的既定的斗争方针。在对付苏联边防军的问题上，由于对方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机械化程度高，因此在以往的摩擦中，中国边防战士即使凭借棍棒，也往往大吃其亏。这

[1]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种情况自然促使边防部队产生了要教训苏方的强烈愿望。中央军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根据当地军区的报告和要求设想出来的。而依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1]

珍宝岛1969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1968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1968年12月28日，特别是1969年1月23日，在珍宝岛上中苏双方再度发生严重冲突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打击。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2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2] 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并且15日的战斗是由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两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

---

[1] 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同前引，并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 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同前引。

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三十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1]。

3 月 15 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很显然，在“九大”召开之际能够用武力教训一下苏联修正主义，借以动员国内，制止内战，确立新秩序，这或多或少也是毛泽东能够批准此次行动的一个间接的目的。因此，他一再讲，让它打进来好，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当然，毛泽东并不是真的想让苏联人打进来，因此他同时特别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2]。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T－62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 3 月 22 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 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3]

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

[1] 《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 年 7 月）。
[2]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 年 3 月 15 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3] 王永钦：《1966—1976 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 年第 4 期。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那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1] 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发动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 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有关珍宝岛这次冲突，已知3月2日，中方四十六军一三三师出动一个侦察连又两个侦察排，二十三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原黑龙江省军区一师一团）出动一连及重机枪排，十六军出动一个无后座力炮连，总共约三百人奉命上岛设伏。苏军当天只出动了几辆BTR—60装甲车。15日，中方先是派出一个步兵排和一个步兵班上岛，苏军出动了五辆BTR—60装甲车、六辆T—62坦克。打响后，中方再派两个七五无后座力炮班、一个四〇火箭筒班上岛，并以3月9日秘密部署的八五加农炮营的炮兵群，从中方江岸一侧进行了火力支援。17日，双方又发生过规模不大的岛上冲突。此后，由于15日作战中苏军一辆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触到中方步兵埋设的反坦克地雷，被炸坏一侧履带，失去行动能力，遭苏军坦克人员遗弃在岛上，中方夜晚组织坦克兵上岛拆卸T—62坦克的红外线夜瞄器和火控等重要部件，苏方发炮阻止，并拟将坦克摧毁，双方为此展开了炮战。直到4月27日和29日，中方才利用夜晚将已被苏军炸入江中的坦克分解后拖到中方江岸一侧，然后运至抚顺坦克大修厂，修复后送去北京。综上所述，3月间中

[1]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 转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苏两军在珍宝岛直接作战三次，双方各死伤官兵一百多人。

四、毛泽东估计到苏联可能报复，但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危险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 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得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 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

[1] 参见 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189—191。

[2] 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1]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 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3]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4] 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5] 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6] 基于

---

[1] 参见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Ostermann前引文，p.187。

[2] 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前引文。

[3]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286页。

[4] 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5] 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6] 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2]

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三百余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圈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4]

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5]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

[1] 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2] 转见（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3] 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4]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同前引。
[5] 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1]

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五、毛泽东担心爆发核战争，认为领导人集中在北京太危险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并不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以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但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泽东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2] 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

---

[1] 见《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2] 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出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同前引。

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1] 而四位老帅 7 月 11 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2] 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的态度，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本来并不认为真的会大打起来。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 5 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3] 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

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全国动员起来，一方面可以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一方面也可以对苏联的报复有所预防，有备无患。然而，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特别是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毕竟，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

---

[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 301 页；王永钦：《1966—1976 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同前引；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 42 期。

[2]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3] 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期。

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1]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2]

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特别是新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命令提出的九项要求，其中很大部分都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被作为造反派标志的打砸抢活动，一下子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被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坚持予以执行。[3]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之一、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4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六、毛泽东不相信苏方有意缓和，决定全面备战，实行大疏散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信息。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苏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4]

---

[1] 转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4] 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1] 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但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会谈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

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2]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3]

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

---

[1] 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202页。

[2] 同前引王幼平日记。

[3]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柯西金和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俄）《远东问题》1992年第4期、1993年第1期。

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突然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即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双方在会谈中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会谈是有益的”一句。[1] 而柯西金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会谈的结果意见不一，因此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3] 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高层内部的反应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对苏联意图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于是，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条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口号。这条口号长达八十余字，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口号了，它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强烈担心所在。[4]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

---

[1] 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页。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3页。
[4] 《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1] 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2]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具体研究落实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开到27日结束。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做了专门讲话，强调：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9月30日，林彪视察西郊机场，发现地面飞机摆放过密，深恐遭敌打击，又正赶上国庆节将临，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他当即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此前还考虑过要不要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的问题，后经北京市委实地勘查研究认定不会有太大危险而作罢。但国庆节期间，各方面仍旧高度紧张，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甚至秘密调派直升机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准备紧急疏散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3]

---

[1] 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2] 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同前引。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同前引。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所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商定，从10月20日起，两国谈判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考虑到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有关苏联大军进驻外蒙的情报，中共中央仍旧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1] 因此，国庆节过后，林彪就率黄永胜等前往张家口地区检查部队设防情况，周恩来也特地要总参整理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并分发给外交部等部门领导人参考。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都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10月14日即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周恩来则率领留守北京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同时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2] 他这时一面紧急组织其他中央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一面全面检查首都的战备情况，尤其关心首都机场反空袭、反空降的应急方案。

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通过电话指示在京的黄永胜下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根据黄永胜的传达整理的军委前方指挥部“第一号号令”迅速下达各有关单位。命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为此应立即疏散重武器，指挥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同时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于是，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

---

[1]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同前引。

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1] 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七、毛泽东主动缓和对美关系，中国从此放弃世界革命主张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尤其是这一战争紧张形势，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建设方针，大批工厂内迁，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就山西武斗盛行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再联合。[2] 而当时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的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

[1] 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2]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同前引。

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1]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19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中共“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2]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

---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2]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势。[2]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3]

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做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

---

[1] 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2] 周在老帅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帅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3]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4] 同上引注。

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压。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1]

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义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2] 但没有资料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

[1]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2] 同前引注。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做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它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它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1]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是 3 月、4 月、6 月还是 8 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 7 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2]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 7 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 8 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

---

[1]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4—645 页。

[2]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同前引。

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 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 1969 年 10 月 20 日至 1970 年 2 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 1970 年 2 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 1970 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毕竟同 1969 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 1970 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和在外交上找好一个帮手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改变。自 1958 年以来，毛泽东始终以世界革命为己任，坚持不顾国家的外交利益，以“反帝反修”为号召，坚持支持并援助一切敢于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各国左派共产党人和激进的革命小组织。这个时候突然转而向过去的“头号敌人”美国寻求外交接触与缓和，不可避免地要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在那些激进的革命组织和派别当中的革命形象，使将近十年来以毛泽东为偶像的世界革命运动陷入动摇与混乱。但是，这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决心。

1969 年 12 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

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 1970 年 1 月 8 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 20 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

结语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

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1]。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2]。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3] 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

[1] 《新民学会资料》，第61、65页；《毛泽东给陶毅的信》（1920年2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

[2] 有记录可查的这种谈话即有两次：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另一次毛强调："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见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14、236页。

[3]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1] 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

---

[1]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8、436—442页。

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1]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 1942 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2]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

[1]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344—351 页。

[2] 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 年 1 月 2、7 日），RPSDMH，495/74/342，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963 年 9 月 9 日）；等等。

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1]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2]。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3]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4]

---

[1] 参见《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除中文记录外，并见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2]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另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6月开除南斯拉夫之后，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曾访问过波兰和苏联。他们注意到，在波兰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们起立欢呼几乎每一位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就是不欢呼铁托和毛泽东的名字。据留苏学生反映，苏联党这时经常有人在机关和学校作报告，说中国党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搞富农路线。见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年7月。

[3]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4] 《刘少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1、27日)。

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1] 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八个月之久。19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

---

[1]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师哲前引书，第431—461页。

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1]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十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2]。一个十三岁的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3]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

---

[1] 前引 RPSDMH, 495/19/217；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曾明确谈到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

[2]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 6、8 页。

[3]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 33 页。

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强化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 年 12 月 16 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泄。

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度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领导，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共产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1] 又比如，1950 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

[1] 冈察洛夫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5 期；师哲前引书，第 437—438、454—458 页；裴坚章前引书，第 19—20 页。

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画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1956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故此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1]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

[1] 参见《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 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词，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1]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 1959 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

---

[1] 《毛泽东接见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23 日），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3 页。

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1950 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同样，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同样使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他的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

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等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同这种深入脑髓的阶级观念一起，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摩擦，发生在1940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之时，他对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判断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设想过派十五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1] 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2] 同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而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近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直接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致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问“不要随便乱说”[3]。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相信要保护和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1]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2]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
[3]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这就使得毛泽东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承认起来并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约的产生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八路军去为保卫苏联而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1]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东这里的"民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地域、血缘、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对特定人群的认同感的自然流露。当苏联1947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

---

[1]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7月15日)。

既讲阶级利益，又讲民族（国家）利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对毛泽东来说，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党与国、阶级与民族，在毛泽东看来，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唯如此，民族（国家）利益，有时还要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党才更能反映和代表国家及民族的根本利益。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已的国家是不够的，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因此，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格外重视来自苏联的援助，而对以牺牲本国革命利益来援助苏联则不以为然，更不满意俄国人在援助中共的问题上总是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俄国人“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时反复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

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1] 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神秘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像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公”与“私”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都不那么言“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做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19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19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甚至也不念中国百姓之益。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

[1] 根据徐焰披露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除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战斗机是斯大林无偿提供给中国志愿军的以外，其余都是有偿提供的，并且一部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这段时期中国仅欠苏联的军火款就有3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7亿美元。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另外，毛泽东自己讲，中国欠苏联的账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毛泽东与日共中央委员的谈话》（1964年1月5日）。

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也无所顾忌。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1]。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2] 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兄弟党，马列主义的党，却想方设法去占有一些不“义”之财，“实在不光彩”。[3]

不难想象，毛泽东 1949 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4] 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 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

---

[1] 在中共党内，在许多年里，任何敢于对毛泽东这种对外援助表示异议者均受到打击。王稼祥 1962 年就因为写报告向毛详细说明这种援助对国家损失太大而遭到贬斥。当然，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才有所改变。因此文不涉及与苏联决裂之后的问题，故略之。《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讲话》（1963 年 4 月 25 日）。

[2]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3 页。

[3] 前引《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并见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等。

[4] “谦谦君子”一词出自中国古代《诗经》，以后泛指讲仁讲义之人。故中国从来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说。

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事后明白过来，更是极其不满。

在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1] 毛泽东在1960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1954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2] 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1958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之所

[1] 参见师哲：《回忆刘少奇同志的国务活动》（1982年3月）；1950年代担任过中方俄语翻译的林利，在1981年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中，也突出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2] 根据已知的资料，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里公开对中国表示赞赏并主张其强大的，多半只有莫洛托夫等少数几个人。前引师哲回忆。

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的便宜。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1]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利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还是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 1956 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

[1] 不过，1959 年 9 月中国得到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因想要自己研究仿制而不愿交给苏方，最后勉强交给苏方仍将红外线弹头传感器扣在自己手里一事，却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多数中共领导人可能与毛一样能够分清“利”和“义”的关系，但是，当这种“利”不是金钱，而是自己掌握的先进的足以傲视群雄的技术的时候，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

言论之中，分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 1958 年 7 月 22 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1]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 1947 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 1950 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 1949 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 1949 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

[1]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2—333 页。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1476 页。

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1]

[1] 刘少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直率。1949 年 11 月和 1950 年 1 月，刘少奇都有过关于应当重视中国革命理论经验的谈话。在 1950 年 1 月的谈话当中，刘直截了当地对苏联人表示了不满，称，外国同志只知道苏共的历史，对中共更为艰苦和危险的斗争几乎不了解，即使知道，也是皮毛，这个问题需要苏共高层领导与中共高层领导共同研究来解决。前引冈察洛夫文；库里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6 期。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 年 3 月 29 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1] 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对此也是不以为然。[2]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

---

[1]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即《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1—542 页；《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 年 8 月 1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卷，第 530—532 页。

[2] 《毛泽东接见波立特的谈话》（1955 年 4 月 29 日）。

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1]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2]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 50 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 91 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 15 家国防

---

[1] 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 4、18—19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第 283—284 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5 页。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1—322 页。

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1] 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像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的话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泽东所谓"东

[1] 参见裴坚章前引书，第39—42页；王泰平前引书，第220—222页；Sergei Goncharenko,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1]

1957 年 11 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十五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后英国可能达到三千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四千万吨钢。因此，从 1958 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2]。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

[1] 《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91—298 页。

[2] 转引自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

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开始是十五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1]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 1958 年 5 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2]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做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做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3]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

[1] 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潮》，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77、108 页。

[2] 参见赫鲁晓夫前引书，第 552—555 页。

[3] 《毛泽东接见澳共总书记的谈话》(1959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61 年 12 月 5 日)，等等。

结 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更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二）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三）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四）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压制他、

不许革命和冷落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大发脾气。显然，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分歧。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与他的个性、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其现实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终极目标的永恒性及其手段、方式和过程的灵活性，则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为标准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颇感困惑的现象。1950年代初，当毛泽东强调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力推动和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后，当他赞同与

周边国家政府和平共处的时候，又转而劝说周边国家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把那些在停止武装斗争后难以在其国内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国来定居，甚至硬性解散了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以换取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当1950年代末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时候，他显然又毫无顾忌地推动周边乃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党起来实行武装斗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外交利益。但到了1970年代初，当他下决心要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的时候，他又转而实行对美缓和，进而劝说与美国处于全面对抗中的兄弟党采取同样步骤，为此他又不惜得罪了那些跟着中国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共产党人。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种政策变动及其对内对外所带来的连锁性的影响，我们亦不难联想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种种恩怨，固然是这样或那样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强人政治的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膨胀无度的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显然也是极其关键的。

附录　金冲及序

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

杨奎松同志这部研究毛泽东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选择的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过去又缺乏系统论述的重要课题。它的突出优点是：作者肯花大力气去钻研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原始资料，力求把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在读者面前重新再现出来；同时，又勤于思考，能够在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敏锐地发现问题，系统地进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这就使读者感到对许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认识。作者的文字也流畅好读，很有点挥洒自如的气概。凡是稍知此中甘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而他的辛劳没有白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我很为作者高兴，并且觉得这种研究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在读这部著作时，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少事情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似乎显得犹豫，

甚至会一再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从事革命和建设，前人没有经历过，需要艰苦地摸索着前进。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难以捉摸的未知数，还有不确定的变数，却要求你很快作出决断。很多在事后看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和难下决心。这就像一艘大船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波涛，不知道水面下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旋涡，无法在事前都看得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处在这种状况下，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他们不能不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设想，经过许多次权衡利弊的反复比较，然后才能下最后的决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谋善断”。事实上，在作出决断后，还会遇到许多事先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还会发现原有判断有不准确或不恰当的地方，因而在行动过程中作出若干调整。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说，有人能在一开始时就对周围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种种重大决断，然后没有丝毫改变地加以实现，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后人正是需要从前人那些艰难而复杂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多懂得一点世事，增长自己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书中的所有看法我都赞成。力求重现历史，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当代的历史资料，既太多又嫌少。说太多，是指有关资料浩如烟海，这是古代历史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最勤奋的研究者也只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说嫌少，是指有些重要历史环节却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留下的也不能说全然可靠（例如俄国档案中有关中共主张的记载，少数地方因经过翻译和转述，可能同原意有出入）。作者的分析，有时就只能借助于推断。这种推断，有准确的，也可能有不够准确的。作者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但这对有些不熟悉事情全

部情节的读者也可能留下片面的印象。但不管怎样，这些都可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为了弄清一些复杂的问题，有时像努力攀登高峰的探险者那样，需要经过长期而顽强的探索，在前进中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也总比只在原地踏步要好。

作者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些，可以说是我对本书的一点读后感。

金冲及

1999年3月

参考文献暨征引书目

一、档案文献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Archive of Presidential, Russian Federation.

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1946,Vol.9，1951,Vol.7.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

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档案。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hristian F. Osterman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96.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ony Saich，Netherlands, 1991.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沈志华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油印)，1927 年 5 月。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油印），1928 年 6 月 29 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提纲》，毛泽东，延安：解放社 1939 年单行本。

《反投降提纲》，毛泽东，延安：解放社 1939 年单行本。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9—1927）》，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1997 年版。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3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1990 年版。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档案文献》，张木生译，沈志华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67 辑，1998 年 9 月。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布兰科·拉齐奇著，夏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992 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18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1997 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两条路线斗争》（油印本）。
《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陆定一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康生在中央党校的报告》，1944 年（油印）。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7 年 2 月。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竖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
《毛泽东在莫斯科（1949—1950）：新的档案证据》，保罗·温哥罗夫著，张卫东译，《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 年 1—2 月）》，A. 列多夫斯基编著，李玉贞译，《党的文献》

1995 年第 6 期至 1996 年第 3 期。
《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的十二点建议》，A. 列多夫斯基编，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
《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编印。
《学习文件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北京出版社 1963 年版。
《学习文件汇编》第 1—3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63 年 10 月翻印。
《延安日记》，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刊社 1981 年版。
《“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 年 3 月 31 日，尤金记，李玉贞译，《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 年第 2 期。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油印)，1969 年。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油印)，1945 年 5 月 2 日。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未刊稿，油印)，毛泽东，1957 年 2 月 27 日。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8 册，中共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9—1991 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秦孝仪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7 年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秦孝仪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8 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
《中苏友好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二、报刊资料

Chinese Law and Geverment,Vol. 30, No. 1–2 .
《百年潮》，1997—1998 年。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
《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 2 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湖南教育月刊》，1919 年。
《革命史资料》第 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
《共产党》月刊，1921 年。
《国际冷战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2 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2002 年。
《红旗》1958，1960 年。
《解放》周刊，1938 年。
《解放日报》，1943—1944 年。
《救国报》，1935 年。
《救国时报》，1936 年。
《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0 年。
《人民日报》，1950、1956、1957、1958、1960、1963、1964、1969 年。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 1—3 辑，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文献和研究》，1986 年。
《新华半月刊》，1958 年。
《新华日报》，1938 年。
《向导》周报，1923—1924 年。
《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

《中国青年》，1940 年。
《中国文化》，1940 年。

三、回忆录

《艾奇逊回忆录》，艾奇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9 年版。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亨利 · 基辛格著，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
《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赵勇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出使苏联八年》，刘晓，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崔可夫赴华使命》，崔可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熊向晖，《中共党史资料》第 42 期。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回顾与思考——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网页：www.shenzhihua.net。
《回忆与怀念》，伍修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回忆与思考》，李维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冈察洛夫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5 期。
《缅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戎马生涯的回忆》，曾克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吴冷西，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费 · 丘耶夫著，王枝南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油印），林利，1981 年 7 月。
《萧劲光回忆录》（续），萧劲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新中国领袖》，李越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吴冷西，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与莫斯科决裂》，舍甫琴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在莫斯科的岁月》，韦利科 · 米丘诺维奇著，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在志愿军总部》，杜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四、大事编年

《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彼得 ·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王希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国际事务概览，1961 年》，D. C. 瓦特编著，于树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周文琪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越关系四十年》，郭明主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五、著作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58，Zhai Qiang，The Kent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75, Zhai Qiang,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Military Aid of U. S. S. R i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K. P. Ageenko, P. N. Bobylev, T. S. Manenkov, I. F. Yakushin, and R. A. Savshkin, Moscow, 1975.

Stalin, the Cold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 : A Multi-Archival Mystery, Brian Murra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朝鲜战争》，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观点》，齐德学、沈志华、杨奎松编译，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战史部 1998 年版。

《大外交家周恩来》，李连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5 年版。

《大跃进狂潮》，谢春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韩怀智等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徐焰，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红色中华散记》，埃德加·斯诺著，奚博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开国总理周恩来》，力平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1956 年后的毛泽东》，郑谦、韩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著，王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彭德怀传》，王焰等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 1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让历史来审判》，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德·沃尔科戈诺夫著，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斯大林政治评传》，姜长斌等编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稼祥传》，徐则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明评传》，周国全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金春明、席宣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文人毛泽东》，陈晋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乌昼啼——1957 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段跃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年版。
《现代国际关系史》，颜声毅等编著，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杨奎松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 年版。
《援越抗美实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钱江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张闻天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谱）》，张培森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共产党史稿》，王健民，台北：正中书局 1965 年版。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两弹一星揭秘》，彭子强，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原子弹的制造》，约翰·W. 刘易斯等著，李丁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裴坚章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王泰平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杨奎松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彼德·琼斯、西安·凯维尔著，郭学德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六、论文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Evgueni Bajanov,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Chen Jian，China Quarterly，No.133, 1993.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Zhai Qiang，China Quarterly，No.129, 1992.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69，Chen Jian，China Quarterly，No.142, 1995.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Sergei Goncharenk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1996.

Opposing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68，Zhai Qiang，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8:1, 1999.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Odd Arne Westad, 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96.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mber 16–October 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Alexandre Y.

Mansourov，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 Winter 1995–96.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54，Zhai Qiang，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No.57，October 1993.

《1964 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陈东林，转见世纪中国网（www. cc.org.cn)。

《1966—1976 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王永钦，《当代中国研究》1997 年第 4 期。

《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徐焰，《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李丹慧，《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李丹慧，《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4、5 期。

《各苏区土地问题》（油印），李六如，1934 年 6 月。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谈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齐德学，《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 年第 3 期。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杨奎松，《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5 期。
《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姚旭，《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王亚志，《军事史林》1994 年第 1 期。
《历史考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对中苏经济关系的初步研究（1948—1953）》，沈志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 年。
《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 10 月 2 日的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沈志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2 期。
《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著，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马贵凡，《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重要尝试》，杨奎松，《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沈志华，《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培森等，《党的文献》1988 年第 3 期。
《延安整风中的王明》，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4 年第 4 期。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郑谦，《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期。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杨奎松，《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中国红军打通国际战略方针的演变》，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增刊。
《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油印），埃德加·斯诺，1949 年。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沈志华、李丹慧，《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
《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李丹慧，《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李丹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4、5 期。
《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丁之，《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5 期。

修订版跋

本书修订，主要基于四个原因。首先当然是出版社的安排和建议。其次则是因为本书出版时，因当时条件所限，个别章节内容未能收入其中，使本书内容上不尽完整。如今时过境迁，能将删去的内容补入，也算了却笔者的一大心愿。再次则是因为本书最初是面向最普通的读者，为杂志连载而写的，因此在引文注释方面尽量精简。在经过了几年几万册的销售之后，相信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有机会能够从学术角度对本书的引文注释加以完善，是笔者求之不得之事。最后，自本书出版后，有关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因俄国档案的进一步披露，又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入。学者们在中苏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抗美援越问题上，以及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与摩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1] 对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回

[1] 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沈志华、李丹慧两人的研究最为突出，有关他们的成果可见于他们的个人网站：www.shenzhihua.net。另外像戴超武的《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和牛军的《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起源》等，也都是较新的研究成果。笔者出书后在这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出来，如《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研究》2003 年第 11、12 期)。在国际学术界方面，现在英国伦敦的挪威裔文安立教授和德国学者海因茨基教授等也都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应，并且适当补充本书的论据，自然更为笔者所乐见。只可惜，因修订时笔者人在香港，资料欠缺，增补注释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理想。而尽管笔者有所努力，由于篇幅及体例所限，再加上受到本书主题和原有叙说形式的制约，一些由于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出现而提出的颇为重要的话题，也并未能被吸纳和论述于本书之中。

笔者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严格说来并不在于发现历史。笔者自信，本书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而已。事实上，对于许多亲身经历过或熟悉那段中苏两党关系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他们过去毫无所知的呢？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本书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所以想要回应新的发掘和研究，并不是对进一步在书中发现或重建新的史实有兴趣，而是对新近的研究尚有种种不能满足之处，因而会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看法的冲动。不过，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笔者也还是略感宽慰。因为，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印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强调具有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特有的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追求的领袖个人，在中苏两党和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

笔者一向认为，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仅仅从被赋予了太多形式化内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家等）乃至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是因为它实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般的党与党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复杂性远不是拿我们今天一般的国家关系所能比拟的。它们之间既有利益相左的民族关系，又有利害相同的盟友关

系；既有亲密的兄弟关系，又有竞争的对手关系；既有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又有容易引起情感纠葛的师徒甚或父子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中苏两党两国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文化差异，或者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或简单地认为它主要起因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或起因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所引发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却可能会有失偏颇。一个最简单的也是被人们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中国党内做主的当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周恩来，情况还会如此吗？或者人们能够按照20世纪60年代初王稼祥等人的主张来处理对外关系上的问题，中苏关系会有那样的发展吗？再者，假如当初莫斯科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情况又会如何？这里面的答案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的多数学者，往往习惯于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问题，相信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关节点。笔者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理当是所有国家政治领袖心之所系。但是，历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之不同，恰恰在于它更注重特质的而非一般的研究。欧美国际政治学研究之所以会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关系变动的重要研究依据，是基于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的规律和在此基础上正常的国家关系来说的。相对于具有特殊政治运行方式的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的国家来说，这种研究的方法明显地有其缺陷。这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总统或首相之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基于各个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意见综合而成，而且是直接受到包括议会及相关监督机构的监督的。领袖个人的意志即使能起到重大作用，也还是有限度、有制约的，并且必须要考虑一旦错误判断导致错误决策，个人及其政党不仅会下台，而且可能有从此一蹶不振的代价问题。而在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判断和意志往往决定一切，不受监督，更不要担心因为自身的错误而受到惩罚的问题。况且，在党国体制下，任何这种判断都不可避免地是先党而后国，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党利益的基础上，而它又必定是从其意识

形态的逻辑出发的。建立在如此复杂的前提之下，其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判断，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局限，甚至可能会被扭曲。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举出1962年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分歧就足够了。十分明显，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看出当年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关系和少去援助各国激进组织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但是，毛泽东不仅不以为然，且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外交政策。

笔者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民族隔阂、利益冲突，包括存在着结构方面的致命弱点。这也正是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摩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第一，民族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是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存在于共产党国家关系中的特殊结构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作为对立一方的美国阵营中也未必完全没有[1]，但是，它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二，也并不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之间都发生了类似中苏之间那样严重的冲突与对立，除了中苏之外，苏联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与越南劳动党之间，特别是其他小党小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一般也并未发生太大的问题；第三，即使存在或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往往最终也能够得到缓和或化解，这也包括曾经极端对立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党的关系；第四，如果说中苏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是苏联必欲控制中国，而中国反抗苏联控制的问题，那么，中国与反修的日本党、兄弟的越南党、最知己的阿尔巴尼亚党也相继闹翻，又是为何呢?

很显然，中苏之间在民族、国家以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矛盾，固然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复杂微妙和在某种情况下的隔阂与紧张，但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关系的根本破裂，更不会走到兵刃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中

[1]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美国阵营内部同样激烈存在。美英干涉苏伊士运河、干涉中东事件，包括美国后来出兵格林纳达等等，无一不反映了这种情况。

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泽东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通常相信，如果换了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或者王明，中苏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当然，有读者因为注意到笔者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就简单地认为笔者是在强调毛泽东个性或性格的作用，这也并非十分准确。任何一个成功的喜欢独断专行的政治领导人，毫无疑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任何领袖人物突出个性的表现，也都是有条件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领袖人物的个性作用。

笔者修订书稿之际，恰值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之时。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宝国在演绎汉武帝从最初登基备受内外挤压，到内削藩王、外平匈奴的过程中心态及性格上的明显变化。其实，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众多历史领袖人物中，类似的情况可谓俯拾皆是。人的性格或个性固然可以从“三岁看到老”，但是，社会成长的经历、政治生活的环境，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心态上的改变，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强烈个性，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任性到收敛再到张扬无忌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在研究毛泽东与1958年台海危机的问题时，笔者就注意到了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情况。通常人们解释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这段历史时，较多谈到的都是毛泽东想要以此来声援当时的中东人民，帮助中东人民牵制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太具宣传色彩了。但即使换一种角度来解释，比如强调当时福建前线军民强烈要求收复金门、马祖，军方压力较大，毛泽东亦受此触动之类，与以后的结果相对比，也显得太过牵强。事实上，人们大多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就始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都使毛泽东成就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中国的愿望备受打击。通过1954年第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了。然而，美国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勉强应付到1957年底，竟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此举无疑又是对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巨大的挑衅。但此时，恰逢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度乐观，因而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跻身于强国之林所必须的钢铁产量，更是在毛泽东的力推下，节节上升，一发而不可遏止。于是乎，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 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赶上美国的十五年奋斗目标了。[2] 6月，他进一步估计超过英国两年即可。[3] 再到9月初，他已经在兴奋地要求党的领导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心态上明显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对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8年炮击金门是怎么回事呢？根本上就是毛泽东必欲给美国人以颜色。中国外交部接连受命发出声明要求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在美国拒不理睬的情况下，更进一步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美国十五天之内给予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美国承担。在仍旧得不到美国答复的情况下，7月14日，即最后通牒限期的几乎最后一天，彭德怀等即受命具体研究落实了炮击金门，给美国人以教训的军事计划。此计划之所以后来与中东事件挂上了钩，是因为恰好在14日这一天伊拉克发生了政变，政变者宣布退出

---

[1] 《乘风破浪》（社论），《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

[2] 参见《八大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活动情况》第十四号（1958年5月21日）。

[3]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4] 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8页。

美国组织的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第二天美国因害怕连锁反应，出兵黎巴嫩，以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毛泽东据此才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与声援中东事件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此时心态上极为敏感和亢奋的，还有本书中所提到的7月21—22日为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一事。毛泽东所以突然震怒，原因也是一个，就是认为俄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必欲与中国合营，是看不起中国人。[1] 这两件事接连发生，且都是直接涉及民族自尊心问题，自然不是偶然的。今天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显然是有欠周全的。事情很清楚，毛泽东此前在与苏联关系上所感受到的类似的刺激可谓比比皆是，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自称把自己关在莫斯科的屋子里几天闭门不出，背地里骂娘，但也仅此而已。1958年毛泽东的反应之所以大为不同，当然是另有背景。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在对美、对苏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固然有其强烈个性的因素，但这种个性的张扬明显地是和当时的国内“大跃进”形势所带来的亢奋心态密切相关的。由于其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看不到这里面的种种复杂情形，不了解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领袖在争取美国承认和处理与苏联关系上的种种曲折背景与是非恩怨，也就无法理解和解释曾经

[1]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24页。

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者，何以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致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的个中原委。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本书主旨所在，故利用修订之便，特再作如上引言。

杨奎松

2005年1月30日于香港大学

[General Information]
丛书名=杨奎松著作集
书名=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2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7
页数=609
原书定价=480.00
DX号=000007836218
SS号=13070269
ISBN=978-7-5495-2320-7
中图法分类号=K260.7-53（历史、地理>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分类号=11030503
主题词=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参考文献格式=杨奎松著.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2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07.
简介=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